

乔典运《满票》的转载、改编与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1980年代,作家乔典运充分展现出在文坛的独特存在。他既不同于王蒙、高晓声、邓友梅等在“十七年”期间就已成名的“重放的鲜花”们,更不同于刘震云或者刘索拉这样的“新时期作家”。他的创作起步于1950年代,在“文革”前就发表过不少作品,而且也出过书、改编过电影剧本,但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当所谓的“农民作家”或“工农兵作家”几乎群体“失声”时,他却以《村魂》《乡醉》《满票》《冷惊》等一系列小说重新绽出耀眼的光芒,被评论家称为“乔典运现象”。这里以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满票》为例,同时将《村魂》作为“参照”,探讨其发表、转载、摘编、入集的传播路径,包括作家本人对相应电视剧改编的不以为然甚至冷漠。这将有利于我们重新回归作品本身和作家的心路历程,并重新回到文学现场。

关键词:乔典运;《满票》;转载;电视剧改编;“重刊本”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01-05

《满票》无疑是乔典运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而另一短篇《村魂》似乎总像它的“影子”一样存在着。《村魂》的发表时间略早于《满票》。它们分别发表在《奔流》1984年第8期、1985年第3期,先后被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1984年第10期、1985年第5期转载,在此期间又先后被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文摘》1985年2月19日、1985年5月14日转摘,后又分别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年短篇小说选》《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说选》。《小说选刊》1985年第7期发表了乔典运的一篇“创作谈”——《别了,昨天——关于〈村魂〉和〈满票〉》。2016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乔典运文集》,其中前两卷均为短篇小说卷,第一卷为《村魂》,第二卷为《满票》。

下面我们就酌以《村魂》为“参照”,简要梳理《满票》的文本、转载、摘编、改编及其“文学传播”。

一、初刊本

《满票》在《奔流》1985年第3期发表时,配发了作家张宇的一篇文章《读〈满票〉随想》。对于乔

典运研究而言,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不仅因为他们交情深厚,该文是“知人论文”之作,更是因为文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除了何老十给自己投的一票,另一票到底是谁投的?

小说一开头:大队变成了村,大队长也要变成村长了(后来的正式称呼为“村主任”)。模范大队何家坪举行改选,干了三十年多的原大队长、老模范何老十却落选了——上千选民,他只得了两票。村民们个个像做了亏心事,还有人哭了。张五婆从河边柳林里走出来,劝他想开一点,“我只当人们都和我一样投你的票,谁知道人们没一点良心”。张五婆丈夫死得早,只有个儿子小成,那年何老十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救了他一命,从此两家亲如一家。何老十再往前走,正在担水的何双喜讨好地表白自己投了他一票。“你介绍我入了党,这是给了我第二生命呀!”“一辈子啥都能忘了,也不会忘记给了自己又一个生命的入党介绍人呀!”何老十差点陪着落了泪。路上,他又碰见了许多人,都面带愧色地念颂着他的好处,都说投了他一票,他也都相

收稿日期:2025-05-15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期刊史研究等。

信。远远地看见老伴走了过来——过去，他从没有把她当成活人看待过，现在他突然感到有点怕她，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老伴说：“算了，别难过了。……要不是我投你一票，真要变成……独生子女了……”他梦游般走到家，一阵孤独和凄凉袭击着心头。里间传来儿子和媳妇的笑声。何老十不许媳妇穿红戴绿，儿子只好叫媳妇在屋内偷偷打扮。何老十“吭咳”一声，气得肚子都要炸了。儿子看不过眼，忍气吞声地劝道：“老早一家人都说不叫你干，你总是不服。谁当干部像你？……你图个啥？落个啥？上午要不是秀花俺俩投你两票，就会吃大鸡蛋。”“你也来日哄老子！两票是你们投的？老子还自己投自己一票哩！”何老十的不满终于爆炸了，冲进里间，“一头扎倒床上，止不住老泪纵横，默默地流着……”

“满票”原来是两票！再回到作家张宇提出的问题：除了何老十自己投的一票之外，另一票是谁投的呢？张宇说：“是极左的幽灵投的票！”^[1]

异曲同工。《村魂》中也写到了选举，主人公张老七“改选时谁也不投他的票，几十年的干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下了台”——

那天，当宣布他落选时，全队的人都先后后到他家里安慰他，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说他是最好的人，心干净得很，是全村人的榜样。^[2]

二、转载本

《满票》在《奔流》杂志发表时配有两幅插图，插图作者刘万林后来成为著名的人物画家，担任过河南省国画院常务副院长。翻开当年的《奔流》杂志，几乎每期的重要作品都配有插图，插图作者包括李伯安、马国强、王今栋等，后来均为卓然大家。这期《奔流》的头篇文章是南丁写第四次作代会的，题为《黄金时代》。文章开头写道：“胡耀邦总书记到会。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祝词。巴金老的散文诗样的开幕词。光年的洋洋洒洒三万余言一气呵成诗情与哲理交相辉映的长篇报告——《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这个会，开头就开得好。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引出来王蒙在闭幕词中的这句话：‘这几天，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3]

《小说月报》1985年第4期转载《满票》，又重新配了两幅插图。插图作者蔡延年，1943年生，其时任职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他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在此前后出版有系列连环画《神鞭》《燕子李三全传》《金马奇案》等。正文内容并没有明显删改，包括文末作者简介，也基本

上一仍其旧：

乔典运，五十五岁，河南省西峡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二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农村，陆续发表过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三中全会以来，发表中、短篇小说三十余篇。^[4]

那么文学选刊为什么大多不采用原刊的插图呢？可能是基于刊物整体风格的考虑，或者原刊著作权等“技术性”原因吧。

《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转载《满票》时，倒是选用了原刊的一幅插图（该期有多篇作品则是重新绘制的插图）；再就是，文末所附作者简介做了相应补充：

乔典运，男，一九三一年生，河南省西峡县人。一九四七年毕业于陕县简师，一九四九年参军，担任过文化教员。一九五三年复员后回乡生产，一九八〇年调县文化局工作至今。一九五五年开始文学创作，三十年来，发表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近百篇。其中《笑语满场》获一九八一年《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失眠》获一九八一年《广州文艺》朝花奖。^[5]

这一时期的《小说选刊》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不止一篇“创作谈”，作家乔典运的相关文章《别了，昨天——关于〈村魂〉和〈满票〉》刊登在该刊1985年第7期。

也就是从这篇“创作谈”中，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张老七”“何老十”都是有原型的。他们是乔典运的朋友，作者对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同时，他们又是陌生的，是“熟悉的陌生人”（下文还将述及）。

三、摘编本

著名作家南丁回忆：1985年的某一天，在河南省作协（当时叫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的办公室，乔典运告诉他，听张宇说《奔流》的编辑将《满票》删去两千多字，希望南丁替他说话。“作协办公室在二楼，《奔流》编辑部在一楼。我随即拿起电话要通《奔流》，说不要删典运的稿子，恢复原样。”后来，《满票》获全国大奖，乔典运向他表示感谢，说要不是当初他出面干预，“保持了《满票》的完整，《小说选刊》不会转载，更不用说获奖了”。^[6]

那么，一篇真正优秀的短篇小说的“硬核”是什么？人物、思想、文学语言……恐怕缺一不可。那么，摘编或缩写会不会“以辞害意”呢？

1985年5月14日，由上海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文摘》在第3版《小说欣赏》栏目摘编了《满票》。不同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全文转载，

这篇大约 13000 字的短篇小说,此次被压缩至 1500 字左右,因此只能称为“摘编”了。这样是否能够保留原作的“精华”呢?或者说读者还能不能够“欣赏”到这篇小说的“佳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作为一份期发行量曾高达 330 万份(至少是小说原发期刊的几十倍)且以自费订阅为主的报纸,其“放大性传播”的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同时,像《报纸连载》《名作缩写》等栏目所发表的作品一样,经过改编者或责任编辑匠心独具的加工处理之后,完全可能形成一种抵达读者心灵的新文本。

在此之前,该报 1985 年 2 月 19 日摘编乔典运的《村魂》时,栏目就不叫《小说欣赏》,而是《小说梗概》,且前有一段类似“编者按”的文字——

农民作家乔典运的近作《村魂》,塑造了一个农民党员张老七的形象。张老七是个好人,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他唯“上”是从,以致伤害了乡亲们的利益和感情,因而又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如何看待张老七这个人物?《小说选刊》今年第一期刊登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褒者认为,小说富有哲理性的思想主题会给人以警醒;贬者认为,小说不应该把张老七这样的落选干部誉为“村魂”。现将小说梗概介绍如下……^[7]

上述“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是指《〈村魂〉读后》和《这是什么“魂”?》两篇“读者短评”。其实,这期《小说选刊》还有一篇更重要的评论文章——杨旭村的《画出复杂的灵魂——读〈村魂〉》。

另外,《村魂》还有一个摘编本,被收录在 1986 年 12 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争鸣短篇小说 40 篇》里。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它们的篇幅大体相当,但是着眼点不同,摘编后的开头以及重要的细节也不同。这个摘编本也附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张老七有点像愚公,他的身上不乏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实干精神。他就是“村魂”,他所追求的“认真负责”精神永远不能丢。另一种意见认为,张老七是愚忠的形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冤魂”。张老七应该告别,不能抬高为“村魂”。^[8]

四、文集本

1984 年 6 月,乔典运新时期的第一部小说集《小院恩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录了他自 1978 年以来发表的 16 篇小说——最早的一篇是发

表在《河南文艺》1978 年第 2 期上的《父子情》。“文革”前的作品该集均未收录。

1989 年 2 月,乔典运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美人泪》,该集收录《村魂》《满票》《美人泪》等 15 篇小说,并以《别了,昨天——关于〈村魂〉和〈满票〉》作为代序。——这也是《满票》自发表以来,第一次被收进作者的小说集。

1998 年 9 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乔典运小说自选集》(“南阳作家群丛书”之一),该集更是收录了《满票》《冷惊》《乡醉》《村魂》《问天》《笑语满场》以及《香与香》《多了一笑》等重要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2016 年 7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乔典运文集》,其中第一卷、第二卷为短篇小说卷,分别名为《村魂》和《满票》。这套六卷本文集虽然存在明显的瑕疵,但它仍然不失为最重要的版本。它的难能可贵之处至少有三点:一是“尽最大可能,收录了乔典运先生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1997 年去世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家出版社和报纸刊物上所发表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以及相对比较完整的未发表手稿作品”;二是“一概保持原貌收录”;三是“有的作品类型中同时收录了变化比较大的几个文本,以反映出写作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作者所背负的精神枷锁”^[9]。

但是它的瑕疵也不容忽视。比如,这套文集的编排顺序是“较重要的作品以影响度由大到小,获奖档次由高到低为先后,其他大致按照发表和写作的时间先后”,事实上造成了编排顺序的主观和随意。再如,作品发表时间和出处的明显错讹,包括作家最重要的短篇小说《满票》,原发于《奔流》1985 年第 3 期,却误为“1986 年第 6 期”,后来《小说选刊》1985 年第 5 期转载,也误为“1986 年第 10 期”;中篇小说《多了一笑》发表于《长城》1992 年第 1 期,后被《中篇小说选刊》1992 年第 3 期转载,却误为“1992 年第 2 期”。另外,作为文集附录二收录的《乔典运创作年谱》,不但体例欠规范——像“1979 年,《平常不平常》《三百三十一“×”》《气球》《稀罕报恩》等作品在多家知名刊物发表”这样语焉不详的表述,而且还把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相混淆,把《贫农代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3 月版)误为“短篇小说集”,把《河南三十年短篇小说选(1949—1979)》误为《河南三十年短篇小说》等硬伤。

五、电视剧《满票》

1987 年 12 月,第七届(1986 年度)全国优秀电视

剧“飞天奖”评奖揭晓,根据乔典运同名小说改编、由江苏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满票》获短剧小品一等奖。

“飞天奖”无疑是中国电视剧的最高奖,第一届(1980年度)、第二届(1981年度)均名为“全国优秀电视剧奖”,第三届正式命名为“飞天奖”,并开始把电视剧分为连续剧(三集及以上)和单本剧(一至二集)评选,同时增设“短剧小品奖”。第七届“飞天奖”的评选范围是1986年3月16日至1987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共评出20个作品奖、12个单项奖。其中,《红楼梦》(36集)获连续剧特别奖,《努尔哈赤》(16集)、《雪野》(7集)获连续剧一等奖;《希波克拉底誓言》(2集)获单本剧一等奖;《满票》《计算机的烦恼》《滩头》分获短剧小品一、二、三等奖^[10]。——显而易见,其时电视连续剧已占据主导地位。

电视剧《满票》的基本情节遵循了小说原作:何家岭村选举村长大会结束了,当了三十多年村长的何志十(电视剧中人物名字),每年都以满票当选,可这次竟只得了两票而落选。新村长王国强、青年社员何双喜、儿子苦根、邻居张五婆,甚至何志十自己的老伴,都当面夸奖他的优点,说赞成他来当村长,并且声明自己投了何志十的票,可是,怎么只有两票呢?而且其中一票还是他自己投的。但凡是见到老村长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为什么不愿或不敢向他说实话呢?可见他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其主题可概括为:该剧表现了一个失去群众信任的老村长落选之后,尚未觉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缺陷的悲剧。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亦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具体而言,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组)承包土地,即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种什么、怎么种,承包户说了算。大约在1981年,河南省正式肯定“包干到户”并开始普遍推行。在此背景下,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同时农村基层干部(主要是村、组)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些靠“忆苦思甜”、讲“阶级斗争”甚至靠“造反”起家的干部,已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小说中何老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个老模范,三十多年来一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官清如水”,而且小说还特别强调他“在旧社会是个老长工”。作家乔典运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指何老十和《村魂》中的张老七)作为农民的领头羊,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路,人民不再被他们领到那寸草不生的秃岗上了。这总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11]¹⁵¹

1982年公映的电影《陈奂生上城》(小说原作者

高晓声是江苏作家)让我们感受到:1980年代,江浙地区广大农村重新焕发生机的不仅是农业、种植业,还包括蓬勃发展的手工业、集体企业等,与地处内陆的河南省相比,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所以,电视剧《满票》由江苏台拍摄也属“题中应有之义”。当然,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等因素,剧作者也做了一些改编,比如“何家坪”改为“何家岭”,“何老十”改为“何志十”,村里那位年轻的“王支书”也被改为新任村长“王国强”,另外,电视剧中的青年农民何双喜应该脱胎于小说中张五婆的儿子“小成”。

1980年代,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地处中原的作家们对于电影、电视剧改编普遍表现出轻视甚至冷漠,乔典运也不例外。我们注意到,如此重要的一部电视剧,在他的“创作谈”或者回忆文章中几乎未曾涉及,也包括相关评论或研究文章,亦罕有提及。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短剧小品”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电视短剧”,与后来的“电视小品”完全不同。后来我们所说的“小品”,首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从此“小品”这种新型喜剧文艺节目风靡全国。它是一种专属于电视的文艺样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舞台剧的表现形式,却极大地简化了各种形式元素之间的关系而专注于对语言的锤炼”,“具备了早期的‘新闻报道剧’和‘电视短剧’的一些特征,适应了观众的日常文化消费需要”,“成为知名度和影响力均可与《新闻联播》等量齐观的另一项‘中国特色’”^[12]。自1987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更是多次举办全国性的电视小品大赛。

六、重刊本

1979年1月,《奔流》杂志复刊(《河南文艺》自1974年1月至1978年12月共出版36期后完成历史使命);1981年5月,《莽原》创刊,这样,像上海的《上海文学》与《收获》、北京的《北京文学》与《十月》、安徽的《安徽文学》与《清明》一样,河南的文学刊物也形成了一“小”一“大”的格局。《莽原》创刊号登载有乔典运的短篇小说《旋风》,后来,他又有多篇作品在该刊发表,如中篇小说《从早到晚》(1986年第3期)、《定时炸弹之谜》(1988年第4期)、《小城今天有话说》(1992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4期转载)等。

2012年3月,《莽原》在该年第2期的《当代名篇聚焦》中重新刊发了乔典运的《满票》。其时作者已去世15年,而他的这篇代表作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此次重刊不但配发了韩宇宏的评论《〈满票〉及乔典运的文坛地位》,而且由新生代小说家南

飞雁详加评点——包括三十余条旁批和大约一千字的“评点后记”，这些文字充分体现出一位小说家的眼光，它们作为“副文本”与小说原作一起，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文本。比如，关于小说开头：“大队变成了村，大队长也要变成村长了。”批注为：“大队长，村长，村委会主任，政治的变迁带来的不仅是称谓的改变。小说无论篇幅长短，开篇之句最显功力。乔老此句开篇，语句平常，格局开阔，何其老到。”批注认为乔典运“深得古典白话小说精要”：“‘有限全知’的叙述角度自《金瓶梅》悄然出现，在《红楼梦》中登峰造极，乔老此作叙述风格严谨，何老十自然是全知叙述，所以其心绪中再细小涟漪也可一览无余，其余人物则全是有限全知叙述。前史全借何老十的角度讲出，然而根据前史推论，何老十造福众人甚多，应该是真正的‘满票’，何止两票？所以，有限全知叙述带来的是悖论，是批判，是反思。正反之间，意境全出。”写到村里一条叫五眼泉的小河，选举这天，何老十“早早吃过饭，就来河边搭踏石”，评注曰：“从王支书到众村民，以一条河、一条路过渡，又暗合过河拆桥的寓意，多么丰富的多义性。”在《评点后记》中，南飞雁将选择《满票》作为评点文本的原因归结为“好其文”“仰其人”“从其心”三条，认为就小说的技术而言，《满票》几无瑕疵；在选材上也是功力尽显，“选票的背后是民心，是民主，是生活，是追逐。何老十的失败，是因为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车轮”。这篇小说发表在1980年代，而点评者则是一位“80后”小说家，这也让他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学生态系统，任何一个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都不得不面对时代给予他的认知的困惑和表达的艰难，但这并不能阻碍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大师出现。”^[13]

七、余论

1987年秋，《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和河南省文联创作研究室在郑州联合召开了乔典运作品研讨会。其时，“乔典运现象”已引起文坛关注。进入新时期，乔典运的创作之所以被称为“现象”，是他既不同于王蒙、高晓声、邓友梅等这些“重放的鲜花”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创作出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更有别于刘震云（《新华文摘》1987年第11期同期转载乔典运的《冷惊》和刘震云的《塔铺》）、刘索拉（《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同期转载乔典运的《满票》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真正意义的“新时期作家”。他的创作始于1950年代，“文革”前不但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出过书并改编为电影剧本，但那时他属于“农民作家”或者

叫“工农兵作家”。这一群体，在当年的文坛不可谓不活跃，而且其中一些人本来也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是由于在那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文学作为一种有自身规律和特性的艺术活动来看待，只是把文学和作家当作政治活动的附庸和工具。在进入新时期之后，与乔典运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家们几乎在文坛集体“消失”，他却重新焕发了文学青春，《村魂》《乡醉》《满票》《冷惊》等一系列作品引起文坛关注、广受读者好评。他对小说中的人物有了新的独到的思考：“对《村魂》和《满票》中的人物，虽然我熟悉透了，但熟悉不等于认识了。认识人是很困难的，连几十年朝夕相处的朋友也很难认识，因为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的思想。”^[11]^[149]他笔下虽然写的仍是再熟悉不过的农民，但此一时彼一时，“他越来越像一个心理学家那样观察思考人的心理现象，这是最坚固、最厚重、最顽强的现实，是一面任你千声呐喊万声呼叫也难以撼动的冰冷的墙。对这座心理墙壁的冷静透视和叩问，使乔典运在当代文坛上成为一个执着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农民、超越了题材而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普遍的人文意义”^[14]。

参考文献：

- [1] 张宇. 读《满票》随想[J]. 奔流, 1985(3): 13.
- [2] 乔典运. 村魂[J]. 奔流, 1984(8): 13.
- [3] 南丁. 黄金时代[J]. 奔流, 1985(3): 3.
- [4] 作者简介[J]. 小说月报, 1985(4): 87.
- [5] 作者简介[J]. 小说选刊, 1985(5): 103.
- [6] 南丁. 回望乔典运[M]//王海涛. 乔典运研究.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55.
- [7] 村魂: 编者按[N]. 报刊文摘, 1985-02-19(3).
- [8] 争鸣要点[M]//闻逸. 争鸣短篇小说40篇.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6: 79.
- [9] 编者的话[M]//乔典运. 乔典运文集(第一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 1-2.
- [10]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全国电视剧飞天奖[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26-29.
- [11] 乔典运. 别了, 昨天: 关于《村魂》和《满票》[J]. 小说选刊, 1985(7): 151.
- [12] 常江. 中国电视史: 1958—200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74.
- [13] 乔典运. 满票[J]. 南飞雁, 评点. 莽原, 2021(2): 91-104.
- [14] 刘思谦. 乔典运: 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M]//王海涛. 乔典运研究.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4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下转第11页)

生态叙事、地方经验与女性书写

——论青青的散文写作

朱鹏杰,肖瑞雪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作家青青的散文集《白露为霜——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王屋山居手记》《访寺记》等,构成了独特的生态散文书写系列。她的散文以中原区域为核心坐标,不仅聚焦自然山水、乡村田野的生态景观,更运用生态叙事的手法,探索与其他生命主体平等交往的可能与价值。同时,她的散文深植于童年记忆与乡野经验,注重在民间文化场域中展开书写,关注节气流转与民俗传说,由此探究生态文化与田野大地的深层联系。她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精神观照,完成对自然、田野、寺院等空间的观察和书写,用丰沛的情感为当代生态散文创作提供了独特样本。

关键词:生态文化批评;生态散文;青青;女性意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06-06

生态散文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展开的文学思考。面对水土流失、河流污染、土壤污染、雾霾天气等生态问题,散文作为与时代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学艺术形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做出回应,形成了生态散文。这是一种跟生态现实密切相关、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创作范式。在生态散文的创作中,作者的生态观、审美观、伦理观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带有鲜明个体特质的散文样式。中国生态散文的发展与本土生态现实密切相关,“1992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步骤迅速加快,过去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自然环境与精神生态问题旋即凸显出来,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劣与人们精神世界的迷惘、委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症结”^[1]。面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困境,生态散文作者书写彼时的生态困境,同时又将视野扩展到精神领域,从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角度审视生态危机,从而形成了当代生态散文的特色。

多年来,学界对于生态散文的研究,多在生态批评的视阈中展开,这是一种研究环境与文学作品之

间的关系,并以生态学视点审视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文学批评^[2]。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学界对生态散文的研究也开始呈现跨学科的趋势,生态批评逐渐发展为生态文化批评。以作家青青的散文集为例,虽然其中的大部分篇章都与自然万物有关,但是也有与乡野民俗、禅宗文化、社会现实甚至自我感情有关的内容。例如,《王屋山居手记》主要书写自然生态与个体感悟,《访寺记》关注宗教文化与精神生态,《白露为霜——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关注的则是乡村田野与亲情场域。从生态文化批评视阈出发,可以发现其创作特质——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与审美;对乡下田野的回忆与探究;以前两者为根基,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引发的生态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些创作特质基于独特的女性视角展开,形成了女性生态散文写作的特质。

一、生态叙事与生命互动

对青青来讲,自然是她生命场域的依托,而自然中的动植物不只是观赏的客体,更是可以交流的伙

收稿日期:2025-02-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以来江苏生态散文创作研究”(24ZWD002)

作者简介:朱鹏杰(1981—),男,河南许昌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批评。

肖瑞雪(2001—),女,四川德阳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美育。

伴。在她笔下,乡野自然充满生命力,能够包容和滋润人类。动植物在自然场域自在生长,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天然状态,契合宇宙秩序和时令变化,给作者、读者以生命的启示。正如学者鲁枢元先生所言:“‘禽兽虫鱼’在自然天性、生存方式、相处关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都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人类与其他物种不但可以友好相处、共同成长,甚至还可以与其他物种进行‘语言’层面上的交流,达成共识。”^[3]青青笔下的动植物大多依据自己的生物特质成为独立个体,与作者展开交流,呈现出“跨物种交往”的特征。

青青笔下的植物是可以交流的,不管是春天的柳树、玉兰,还是夏日的向日葵、紫籽槐,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和“情感”,呈现出动人的生命力。她写初春的柳枝“腰肢柔软”^{[4]10},把柳枝在春天苏醒的特质展现出来;写春分的玉兰“彻底地放纵了自己”^{[4]19},连翘是“快意”^{[4]20}的,春分时节植物的欢舞状态被她以拟人的手法展现,读者仿佛看到了春天的生命力肆意流淌。到了立夏,青青笔下的紫籽槐开得华丽而又有层次,“紫籽槐开花的时候,好像无数只小猫藏在树丛里,只有她们的尾巴露出来……紫色的,但不是一味的紫,而是从上到下,逐渐展开的紫色,深紫、浅紫、粉紫”^{[4]44}。一幅盛大的花朵画卷在其笔下徐徐展开,紫籽槐也具有了自己的生命,跟读者呼应起来。她笔下的植物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质,也契合了季节的变化,呈现出主体性与生命质感,成为与作者“交往”的对象。她写到五月济源大明寺的娑罗花,“周六的大雨并没有完全打落她们,她们满树雪白一般,在夕阳里等着我……我用手抚摸着毛茸茸的花,心里有握住人手的感慨。花有灵性,也知惦念”^{[5]46},个体与自然通过植物连接在一起。她写到自己与葡萄的“深度交往”,“黄昏时我总是站在葡萄架下,伸手摘一颗放在嘴里吃。葡萄上一秒还在枝头上,这一秒已经在口腔里,她连惊呼都没有发出来,就在我牙齿间碎了。一股酸甜的汁液充满了口腔”^{[5]61}。“我”与葡萄在密切接触中融为一体,葡萄的汁液带给“我”身体和情感的双重感触。她写红薯出芽,细腻描绘出其新生之美,“紫红的茎根根直立,上面一簇新叶子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干净出尘,上面还有一层茸茸的小毛……那些带有小茸毛的红薯叶子纯真干净”^{[5]102}。她将生命初生的脆弱、美好与纯真的特质表达出来,让读者联想到新生的婴儿、初诞的猫狗,不同物种的生命因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不同个体间的呼应和交往。

在青青的笔下,不仅有多姿多彩的植物,也有各种动物,既有乡野常见的蚰蚰、螳螂,也有家养的猫

狗,每一种动物在她笔下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质,有的还呼应了传统文化和生态智慧的内涵。在《立秋》中,青青写道:“虫子总是比人更加敏感地感受到泥土与空气的温度,它们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隐者,隐身于青草与泥土中,极像一个禅修者,饮风吸露,只吃少量的植物果实,在秋夜拉琴弦,悠扬歌唱。”^{[4]76}这段描写不仅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把秋虫的习性和特点展现出来,而且还结合文化传统,探究了它们所蕴含的精神启示。青青对动物的描写总是在生态和文化的双重维度展开,立秋时节,地表的热气散去,空气变凉,“青蛙噤声,秋虫登场,蝉声渐渐稀疏,大自然有种强大而静默的力量,让这个世界有着奇妙的秩序”^{[4]76}。这段描写从动物的更替说起,探究了自然、生命、季节之间的关联,富有生态内涵。她笔下的生物充满生命活力,她写到不同生命之间的“交锋”,“一只戴胜飞到我裙子边,也许把我当成了一块石头,它大胆地啄啄我裙子上的花朵,黑而圆的眼睛灵活地转动……一只绿色的螳螂从草丛里摇摇晃晃地出来,在一个小竹叶上停了下来。戴胜看到了它,立即趋前,螳螂伸出绿色的‘大刀’,挥舞几下,戴胜连连后退”^{[6]31}。戴胜与作者的相遇,充满了人类和其他生命交往的快乐;随着螳螂的到来,两个不同物种的生命开始“交锋”,昭示了自然的活力与包容。除了昆虫,她还写到猫、猴,写到这些生物与作者和其他人的交往。她写浚源寺的猫与她相遇,“它迈着柔软的步伐向我走来,用它美丽晶莹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在草地上翻了一个滚儿”^{[6]176},这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她写弘福寺的猴子,“只见院内香客拥挤,梵音阵阵,猴子们上蹿下跳,有的在殿堂的屋檐上走动,有的跟在香客后面学人拜佛,有的在菩提树下追逐嬉闹”^{[6]174},把猴子的特征展现得惟妙惟肖。

对动植物的关注和描写构成了青青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豫西南村庄的乡土风情,还是王屋山的山野自然,各处寺院的空旷庭院,她始终关注的是自然中的各种生命。在她笔下,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她融入自然场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启示。在《王屋山居手记》中,她写道:“无数次到山谷里漫步,王屋山自由烂漫的气息与我的身体长在一起。”在《访寺记》中,与自然关联的感触和佛教智慧连接,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场域。她走访的寺院既有位于人声喧嚷的繁华都市,如南京西路的静安寺等,也有藏身在曲径通幽处的林泉秘境,如万杉峰下半山崖处的草庵等,抑或是掩映在深山中没有名气的山神庙,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空寂”。这

种空寂不是寂静或无人,而是寺院与自然有机融合而成的氛围,是个体、宗教和自然的“交接”。青青说道:“与其说我喜欢寺院,不如说我喜欢大自然。”寺院本就是存在于自然环境良好的地方,这样才能得天地灵性、悟佛教真意。青青去过的寺院大多保存着古朴的自然风光,古木恣意生长,山泉淙淙,幽鸟鸣啾。如慈云寺“山寂而宜禅,群山如莲,青龙潭萦绕,群木罗户,映以环溪。有延超住持,如星子夜值,定而无喧,朴乃知足。夕云朝秀,占尽风情”^{[6]20}。又如香积寺“雨繁密如注,院子里的桃花在雨里静静地坠落,落花盈地,香气怡人”^{[6]81}。在她的笔下,寺院不仅是精神寄托的空间,更是生命、智慧与自然关联的门户,寺院中的自然事物更是因此带上了几分佛性。她写青莲寺的风景,“院子里青砖老建筑在夕阳里轻轻地呼吸着,阴影里的青草舒展了腰身,几只喜鹊在塔上点头。佛殿前的子抱母柏高高停在半空,一株撑出半天的绿云,一株枯槁已干”^{[6]109}。这种风景充满了佛教“空寂”的意蕴,不但唤醒了作者的童年回忆,而且打开了读者与自然、文化交融的路径。

二、地方经验与自然疗愈

对于生态散文来说,“地方”具有丰富的涵义。首先,地方是具有归属感的空间,是个体停留、经历过的区域,是与个体的身体发生过关联的空间,“地方不仅是生态散文作家游览、停留、观察的自然空间,更是其经历、体验的生活世界,跟作家鲜活生动的身体感受紧密联系在一起”^[7]。其次,地方是生命存在的物质空间,更是家、家园和家乡的同义词,往往与作家的亲情、童年密切相关,而这些正是他们创作的生命基因,“生态散文作家对于自己生长的地方往往有着来自基因的感触,这是一种深沉的爱恋,是基于身体成长的经历和文化造就的心理,是生态系统与个体在共同空间里相互作用的结果”^[8]。青青的童年在豫西南的农村度过,对她而言,这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精神原乡,是属于她的生态地域。正如程相占所言:“生态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遵循过程秩序和演化原则,提倡地域认同、文化与个体多样性,追求人类生态地域主义。”^[9]这个生态场域囊括了她的全部童年,与乡野、亲人、各种动植物紧密相连。她的笔下有慈祥的奶奶、调皮的小鸡、忠实的大黄狗,有挺拔碧绿的梨树、枣树、榆树、杏树、洋槐树,这充满生机的环境赋予她生命中的自然基因,她与动物嬉戏、和植物耳语,而这些都是她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青青的笔下,地方首先是与自己的亲人、童年

联系在一起的。青青跟着奶奶长大,她的奶奶深谙农事养殖之道,掌握自然节气规律,对气象变化有敏锐的感知和判断。在奶奶经营的园子里,应季蔬菜总吃不完,春天的菠菜、蒜苗、香菜,夏天的长豆角、西红柿、辣椒、茄子、黄瓜。奶奶嘴里嘟哝着“惊蛰到春分,下种莫放松”,手里熟练地打理这些蔬菜;芒种前后,奶奶格外担心天气的变化,每晚睡前她都站在院中观察云彩和水缸,如果水缸冒泡,就意味着第二天有大风暴雨甚至冰雹;奶奶依靠着节气规律和对风、雾的观察做着最原始的天气预报,树梢的一丝不稳定也会引起奶奶的注意,“她伸出刚刚洗过衣服的手,高高举起,她朝我叫道:‘西北风来了,明天就会冷起来’”^{[4]98}。奶奶的小儿子虽然是一个浪子,但是颇有顺应天时的灵气,他教的《夏至九九歌》浓缩了节令的精华,“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首罗纱……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4]37}。传统的自然智慧沉淀在岁月历史中,在民间乡道口口相传,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除了童年、亲人,地方也与各种民俗文化、传说故事联系在一起。青青散文中有不少民俗传说,在看似玄奇的故事中,展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体现了朴素的生态思想。她笔下的各种传说都扎根大地,带有泥土性,亲切朴实。她写大槐树上有精灵,一年酷暑,天气巨变,乌云密布,闪电雷鸣,有旺娘俩跑到老槐树下避雨,“一个大火球随着一声震耳的响雷直接落在那棵老槐树上,把树干从中一劈两半”,而有旺娘俩却毫发未伤,“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树干,一道烧焦的痕迹上面,留着几道深深的爪子印和一撮黄毛”。至此,有旺娘在清明、端午就给大槐树供奉祭品。这个故事展现了民间简单朴素的万物有灵论,蕴含着最质朴的生态思想。青青还记录了立春闹春的风俗,《南阳府志》载:“立春日,啖春饼,祭芒神于东郊,鞭土牛劝耕。”这一天人们吃春卷,敬奉春神句芒,句芒鸟身人面,掌管春天和万物生长。有些村庄还会制作泥牛再击碎,以象征“催耕启农”,祈祷风调雨顺、农事顺利。在《永泰寺》一文中,青青不仅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描写了娑罗树的生物属性,“娑罗树枝有七叶,花如小塔,花型如豆,白如绒,气芬芳,花能泡茶”^{[6]89},她还描写了这棵娑罗树背后的传说,“公元521年永泰公主出家为的格局,尼时,手捧树苗,亲植于此”^{[6]89},把树和历史文化连接在一起,呈现了超越植物本身的文化价值。

寺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是延续传统文化的稳定载体,寺院的布局修建、碑刻、偈语、禅诗等不仅蕴含了佛家思想,还体现了朴素的生态观。

在《鹿门寺》中，孟浩然仕途不举，遂隐居鹿门山，在自然山水中修养性灵，“住在鹿门山，他怡然自得，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与青山白云相往来”^{[6]222}。天长日久，心灵变得冲淡质朴，写下《夜归鹿门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把山水、寺院和禅境的完美融合展现出来。山水对个体来讲本就有疗愈作用，而融合了佛教智慧的寺院更有效果，那些坐落在山水自然之中的寺院，往往因为山林的空寂和佛教思想的传播获得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对个体有强大的安抚作用。诗人王维丧妻后岑寂独居，流连寺院佛门，他写《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10]诗人表达了参透自然永恒、万物无常、时空圆融的禅境。寺院的布局往往追求佛教意蕴和山水艺术的合一，从而形成独特的地理文化意蕴。青青在《中台禅寺》中写道：“中台禅寺一改传统寺的格局，采用垂直的自然高耸，揭示了禅宗‘顿悟自心，直了成佛’的顿悟法门，四大菩萨殿形成的群楼象征‘悲智愿行’，朝山大梯意味着‘因次第进’的修持法门。”^{[6]122-123}在这样的环境中留居，浸润在佛教山水园林的美学气氛中，从而获得宁静和启悟。

三、精神反思与生态回归

青青的散文主要关注个体生命行走和居留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尤其关注自然、亲情和文化方面的内容，也对城市化、商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可以说，被城市化、商业化浪潮裹挟的当代人，内心浮躁、精神焦虑、欲望无边、过度消费；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强调“竞争”，造成人与人之间冷漠化、疏离化。青青的这些反思，以自然哲理、乡村经验和寺院智慧为依托。

青青书写了乡下的互助互爱，与当下城市中个体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她笔下，乡邻情谊体现在相互帮助上。“奶奶家”在村子的最西头，在黑夜中是夜行人第一眼看到的农户，所以隆冬子夜“奶奶家”的大门总会被陌生人叩响，这些人“有找寻走失母亲的落魄儿子，有肩膀上搭着《易经》和刘伯温卦书的算命人，有扛着二胡、架子鼓和三弦的说书人”^{[4]110}。而面对这些“不速之客”，奶奶并没有警惕并拒之门外，她选择了打开门，收留这些过客，并且“为他们升起炉火，开始为他们下鸡蛋挂面。他们放下手中的物件，口中冒出‘啾啾’的声音，一股股白色水汽弥漫在屋子里”^{[4]110}。寒夜的水汽氤氲，房屋里充满了食物的香气，更有着乡间的质

朴情谊。而在城市中，钢筋水泥楼群如丛林一般，人与人之间、乃至邻居之间，互不交往，彼此成为互不关心的陌生人。

青青还写了乡野带给城市的独特启示，她文中最常出现的就是乡村的夜晚。她写乡下夜晚降临的美好过程，“先是青色的黄昏，像轻纱一样徐徐降临，鸟儿们在竹林里锐声尖叫归巢。天色转为宝蓝、深蓝，如果有新月的话，已经可以看到弯弯的微笑一般的眼睛，温柔而安静地注视人间。接下来，在母亲的呼唤声、牛羊的叫唤声中，黑暗先像轻纱般笼罩……”^{[5]14}这种富有层次感的夜幕降临，在城市是看不到的。城市的夜晚尚未降临，各种灯光就已亮起，月亮在亮如白昼的城市灯光映衬下只是遥远天空中的一个亮斑。青青笔下的夜晚，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意象，意味着乡村、前现代、童年，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的珍贵之物。

青青笔下的寂静是自然馈赠之物，带有一种迷人的味道，让内心安宁。如果一日之中没有一点寂静的时光，人的内心或许就会烦躁不安。但在城市里，寂静是不存在的。城市的夜晚是躁动的，各种灯光照亮深度睡眠需要的黑夜；室内有各种各样的电器，散发出隐隐的噪音以及无形的电波，扰乱生命的磁场，让人难以安宁。尤其是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中，每日见到的是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听到的是人声和噪声，何处去寻找自然的寂静？都市人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长大，被城市化异化，成为脱离自然的一代人。青青认为：“我们其实正在失去最宝贵的资源，那就是内心的宁静和大自然里不受现代化噪声污染的寂静，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中，寂静正快速退缩。”她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表达着自己的担忧与思考，呈现出自觉的生态意识。

回到自然，回到乡下，逃离城市生活的异化，对于大多数城市人都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说，寺院是城市人接触自然、获得静谧的适可场域之一。在《国恩寺》中，青青借助六祖惠能的经历传达了对禅宗真义的理解：“菩提自性，本来清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6]100}为读者提供了澡雪精神的法门，即在日常行住卧间体认禅机，于平常生活中照见本心，求得精神安顿。这是直指“圆融”的智慧，而这本来就是自然传达给我们的哲理。“圆融即多元统一体内的协调与平衡，也就是天地神人之间和谐共处，这显然也是生态学的理想境界。”^[11]至此，佛教与生态具备了内在的统一性。在寺院这样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场域，我们既能接触到静谧的自然，享受自然对

身心的安抚,又能体悟到佛教修行和生态智慧。

四、女性意识的拓展与连接

作为女性作家,青青的散文还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这源于女性独特的体验与情感,是女性对自我、社会及人类的独立思考。青青的女性写作与自然写作常常融在一起,在描写自然事物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验,从而形成女性情感与自然意象相呼应的特点。所以,青青的散文既有自然写作的主旨,也有女性意识的流露,形成了独特的女性生态写作风格。“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2]青青的散文以女性视角,形成由内而外的双重关照,将自己的心灵体验拓展至广阔的自然场域。她擅长捕捉自然界蕴藏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擅长用细腻的笔触去表达在自然事物中发现的隐喻和启示。她笔下的自然兼具女性和母性的双重维度,如同舍勒所言:“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爱情左右。”^[13]

青青在写作中创造性地构建起“女性—自然”的象征体系,通过对植物意象的隐喻书写形成超越性的女性写作。在《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中,她写到了秋日的柿子和“柿子色”,“透明的软红色,上面有一层秋霜,像美人脸上的薄粉。……放进嘴里,又凉又甜,简直就是青春期恋人月光下的嘴唇一样,性感又纯洁”^{[5]37}。她不仅从视觉上细腻描绘了柿子的颜色,更通过隐喻传达了柿子和女性之间的亲密关联,挖掘了属于女性的独特情感。这种感性的色彩书写,也许只有女性才能完成。在青青的笔下,女性意识主要体现为自我的独立与觉醒。在《延庆观》一文中,她写了一个修行的女子唐上上,她摒弃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穿着从垃圾堆拣来的紫红旧裙,每日于延庆观旁的石头上清修打坐。“她说她本是兰考人,从前写诗,叫唐露丹,离婚后改名唐雪灵,在当地的石头上坐了半年,在那里读经、悟道,希望自己的心在悟道中解脱,冰雪灵秀。”^{[6]47}物质和外在世界不再是这个女子的主要依靠,内心的清静与提升才是她的生存支柱。通过对唐上上的描写,青青追问了女性个体生存的支柱,是家庭亲人、物质消费还是精神自我?她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但在故事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女性的精神独立所带来的强大精神力量。青青的散文里还有与女性生育有关的体验,这些体验也常常与自然

事物联系在一起。她在《清明》一文中写道:“万物都如初生的婴儿张开了眼睛,就连她们的呼吸也是如此清明洁净,充满了新生命的香甜……那些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芽孢,花骨朵般娇俏,刚刚展开的也是闪烁着湿润的光泽,好像婴儿从子宫降落的瞬间。”^{[4]21}通过对新生植物的观察,把它们初生的时刻跟女性分娩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赋予生命同样的尊严,揭示了自然与女性共同承载的生命创造力量。

五、结语

青青的散文写作出自她独特的生命经历——从南阳一个小山村的童年回忆,到随后的访寺、王屋山居,她始终以独特的生态、生命和女性融合的视角来审视来路,把自然万物当作自己的伙伴,把情感投射到树木、花朵乃至昆虫、猫狗身上,在它们身上挖掘、发现生命的真谛和生存的奥义,构建了一个基于情感体验和生命表达的生态写作体系。在她笔下,无论原始自然还是乡村田野、寺院园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为个体提供反思、净化的生态坐标,是生命彰显自我的场域。作家艾云认为,对青青来说,“大自然给了她保护与恩典,让她免受伤害,这正是她视自然为图腾而崇拜的根源”^{[5]8}。这种深刻的自然认知直接影响了青青的散文创作,使她的作品充满了与自然万物相遇的节点。青青通过写作,探讨与自然界其他生灵交往形成的生态人文场域,于此审视世界,体察生命,学习生态智慧。这种基于自然生存、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酿成的文字,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阅读感受,也拓展了生态散文创作的精神空间。

参考文献:

- [1] 龙其林. 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0.
- [2]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 鲁枢元. 天地之中说聊斋[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2: 51.
- [4] 王晓平. 白露为霜: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6: 10.
- [5] 王晓平. 王屋山居手记[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
- [6] 王晓平. 访寺记[M]. 贵阳: 孔学堂书局, 2024.
- [7] 朱鹏杰. 自然、文化、生命交融的西北景观:论西行悟道的生态范式[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17-20.
- [8] 朱鹏杰. 中外生态散文和生态美学:多维视野中的生态散文研究[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159.

[9]程相占.生态美学引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162.

[10]彭定求,杨中讷,沈三曾,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1302.

[1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247.

[12]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南开大学学报,2001年(4):28-33.

[13]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刘小枫,编校.罗悌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8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cological Narrative, Local Experience and Female Writing

— On Qingqing's Prose Writing

ZHU Pengjie, XIAO Ruixu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Qingqing has published prose collections such as *White Dew for Frost: One Person's Twenty-four Solar Terms*, *Wangwu Mountain Residence Notes* and *Visiting Temple Records*, and has developed a unique ecological prose writing system. Her prose centers o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ecological landscape of natural and rural fields, but also employs ecological narrativ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and value of interaction with other living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her prose writing is deeply imbued with childhood and rural memories. She focuses on folk culture, considers the influence of solar terms changes and ghost legends, and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ulture and fields. She undertook the observation and writing of nature, fields, temples and other places through her unique female perspective and spiritual field, infused with rich emotions, providing a unique model for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rose cre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criticism; ecological prose; Qingqing; female consciousness

(上接第5页)

The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Qiao Dianyun's *Full Vote*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writer Qiao Dianyun fully demonstrated his unique presen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He was neither like Wang Meng, Gao Xiaosong, Deng Youmei and other “repeatedly blooming flowers” who had already become famou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nor was he like Liu Zhenyun or Liu Suola, who were “writers in the new era”. His creative career began in the 1950s, and he had published many work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also published books and adapted film scripts. However,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when the “farmers’ writers” or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writers” almost lost their voices, he once again shone brightly with a series of novels including *Village Soul*, *Local Drunkenness*, *Full Votes* and *Cold Shock*, and was called the “Qiao Dianyun Phenomenon” by critic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ssemination paths of his short story *Full Votes*, taking his novel *Village Soul* as a reference, to explore its publication, reprinting, excerpting, and inclusion in collections. The article also pays attention to Qiao's indifference or even coldness towards the corresponding TV series adaptations. This will help us refocus on the writer's works themselves and his mental journey, and return to the literary scene.

Key words: Qiao Dianyun; *Full Votes*;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reprint edition

域外共鸣:论《北征》在古代朝鲜诗论中的诠释维度

赵与栋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古代朝鲜诗学批评对杜甫《北征》的接受呈现出三重诠释维度:其一,认为《北征》展现了杜甫的忠厚精神,其通过历史类比婉曲评述时事,以维护君臣伦理。其二,指出杜甫《北征》融合了史传文学的叙事技巧、策论的逻辑思辨、辞赋的铺陈手法等,视其为五言长篇古诗的典范,视杜甫为“以诗用文而一变”的开创者。其三,认可《北征》等诗具有树名教励风俗等文教功能,实质上将杜诗塑造为承载儒家伦理的载体。发掘朝鲜诗学视野中的《北征》论,不仅可窥见杜甫诗歌在朝鲜半岛的接受特点,亦能为中国本土的杜甫研究提供跨文化参照。

关键词:朝鲜诗论;杜甫;《北征》;诗法革新;文教功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3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12-06

杜甫诗歌自东传朝鲜以后,因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内核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受到朝鲜王朝王室与文人的推崇。朝鲜王朝早期,刘辰翁批点本《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就已传入,随后由官方主导的以《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为底本的《纂注分类杜诗》(1443),及后续谚解本(用朝鲜语注释的版本)《分类杜工部诗谚解》(1481)陆续编纂告竣。尤其是《杜诗谚解》的刊行堪称杜诗文献在朝鲜半岛本土化衍生的重要里程碑^[1],其中《北征》是杜诗东传过程中的核心文本之一,在《纂注分类杜诗》等重要注本中均有清晰的注解,关于朝鲜半岛杜诗注本中的《北征》注释,学者左江在著作中已予以关注^[2]。此外,卫玠则融合中国古代诗家所论,将汲取纪行赋长处、叙述与议论并重概括为“北征体”的艺术特征,且着重分析了后世模仿《北征》的诗作以印证。^①亦有韩国学者从古代朝鲜模仿《北征》的长篇纪行诗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朝鲜文人金光炫、蔡彭胤、洪良浩等的效拟之作^[3]。但是《北征》在朝鲜王朝所引发的反响,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随着《杜诗谚解》的普及,围绕《北征》的诗学批评也逐渐由单纯的文本注释,转向了对诗歌精神

内涵与现实意义的再阐发,于朝鲜文人所撰的诗话、文集中多有存录。然而,朝鲜古代诗学批评文献中的杜甫《北征》诗论,目前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梳理朝鲜古代诗学文献中对《北征》的评论,探讨其批评视角的多维展现,以期为深入理解杜甫诗歌在朝鲜古代文化中的影响提供一个颇具深度的视角。

一、忠厚精神:朝鲜诗论对《北征》主旨的接受维度

杜甫的《北征》以诗笔凝练地记述了其从凤翔到鄜州探家归途中所见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4]的惨状促使杜甫深刻反思时事,但其笔触并未直抒愤懑,而是以含蓄内敛的方式委婉道出。张戒在评及《北征》时云:“放归鄜州而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5]杜甫因触怒肃宗被贬谪,于诗则不言君之恶,张戒以为有“微而婉”的忠恕之意,而杜甫其他诗篇叙及陈陶斜、潼关之败时,刘克庄以为“直笔不

收稿日期:2025-03-01

作者简介:赵与栋(2001—),男,贵州省遵义市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少恕”^[6]。显然，杜甫在笔涉君主与臧否大臣决策时采取了不同的言语态度。《北征》诗中稍有暗刺君主嫌疑的是“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二句。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以为杜甫所述不“失臣下事君之礼”^[7]，这一观点提出后，在中国学界引发广泛共鸣，钱谦益编撰的《钱注杜诗》与仇兆鳌所作的《杜诗详注》均遵循这一阐释路径；而杨伦在其《杜诗镜铨》中亦认同这一观点^[8]，且为凸显杜甫“忠君”的思想，特别指出杜诗此语“立言有体，深得为君讳恶之义”^[9]。古代朝鲜诗论亦多围绕“用意忠厚”展开诠释。宣祖年间文科及第的郭说（1548—1630）曾记云：

唐人咏马嵬之事尚矣，刘禹锡诗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白乐天诗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官军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诛贵妃也。岂特不晓文章体制，亦失事君之礼也。老杜则不然，《北征》诗曰：“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乃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祸，赐妃子以死，无预于官军也。^{[10]335}

郭说几乎完全转述了魏泰对有关马嵬之变诗歌表述的评鹭，折射出朝鲜文人对以“事君之礼”为纲的批评准则的认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叙事因间接承认官军逼迫的犯上行为，将明皇置于被动境地，被斥为“失事君之礼”，消解了君主“畏天悔祸”的道德主体性。而杜甫《北征》“中自诛褒妲”的书写，不仅没有破坏“君为臣纲”的伦理体系，还塑造了明皇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圣君形象，符合朝鲜士林对帝王的理想期待。朝鲜王朝《诗文清话》评子美《北征》诗亦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用意忠厚，立论精当乃如此。白乐天《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泪相和流’此等叙述岂非实在？于臣子终非所宜。”^[11]认为杜甫以“褒妲”喻杨贵妃，避免了直接指斥君主，是通过历史类比的叙述婉曲讽谏。相较之下，白居易《长恨歌》虽实录史事，却“措语太露”，被斥为“非臣子所宜”。《诗文清话》中的评论再次凸显出古代朝鲜诗学对“温柔敦厚”诗教的重视——诗歌需在批判与忠君间维持平衡，以维护君臣伦理。曾三次出使明朝的朝鲜王朝著名文臣李晬光（1563—1638）亦持此论，他着重批评了刘禹锡诗，以其不似《长恨歌》以记事见长，故而“尤似太露”^{[12]1076}。李沃（1641—1698）在《和杜篇并序》中

亦云：“如《北征》诸篇，忠君爱国之意溢于辞表，后世称之，列之于左徒《离骚》、诸葛武侯《出师表》者，良有以也。”^{[10]146-147}他以杜甫《北征》为例，指出其“忠君爱国之意溢于辞表”，并将《北征》与屈原《离骚》、诸葛亮《出师表》并举，肯定其“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的道德境界。活跃在朝鲜王朝英祖时期的文人南羲采广辑群书，所撰《龟岫诗话》为古代朝鲜诗话中规模最宏大者，其引苏轼评《北征》云：“坡云‘《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余谓义山《华清宫》诗曰‘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盖言褒妲能灭周，而玄宗不久便归，是贵妃之倾城犹在褒妲下也。语虽不及于杜，而比刘白似胜。”^{[13]7222}南羲采认可苏轼对杜甫忠义气节的肯定，指出其“识君臣大体”的儒家君臣伦理堪称典范，继而论及李商隐《华清宫》诗通过褒妲倾覆西周与杨妃引发安史之乱的对比，揭示出唐玄宗蒙尘避难的短暂性，比刘禹锡、白居易更为委婉含蓄。但相较于杜诗《北征》则有“必如幽王之祸，然后为快也”之嫌，故“诗格虽新，旨意未稳，非唐臣子所忍道者”^{[13]7460}。其评价重视诗歌对儒家政治伦理的承载功能，也关注艺术表达层面的独到性，总体来看更重前者。

朝鲜文人首重伦理道德价值的倾向还体现在对杜甫《北征》诗与韩愈《南山》诗价值的高下判断上，二者诗之相较最有名的说法本出自黄庭坚。《潜溪诗眼》记载了这桩论诗公案，孙莘老言老杜之《北征》胜于退之《南山》，而王平甫则持相反之见，二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时山谷闻此论争，以为《南山》技巧较《北征》更显繁复，《北征》书写“一代之事”，识君臣大体，比之以工巧见长的《南山》，其雄浑胸襟更胜一筹，此言一出，孙、王二公纷争平息^[14]。山谷此论亦在朝鲜的诗论中激起回响，如以圣节使出使明朝的宋麒秀（1507—1581）就强调：

《北征》忧君岂退之《南山》徒务富丽之比？句律清新，岂以文为诗之比欤？呜呼！诗之为道难矣哉。^{[10]63}

宋麒秀所论可谓呼应了黄庭坚“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的观点，将诗歌的伦理价值置于艺术技巧之上。不同的是，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宗师，曾以“文章最忌随人后”^[15]教导后学，其自身发展了韩愈诗中的拗律、以音调反常、句法等特点以强化拗峭挺拔的风格，故尚且对韩愈《南山》诗工巧的一面加以青眼。朝鲜文人则不同，宋麒秀认为《南山》诗有“徒

务富丽”之嫌，韩诗引以为名的“以文为诗”亦不如杜诗“句律清新”，较黄庭坚的折中之论对杜甫《北征》诗的肯定更甚。同样崇杜贬韩的还有梁庆遇（1568—1629）的《霁湖诗话》。梁氏诗话著成于朝鲜“穆陵盛世”这一汉诗创作的鼎盛阶段，论者以为其在朝鲜诗话体系中建构了以诗律为核心的批评范式^[16]，《霁湖诗话》云：

杜诗《北征》诗曰：“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两“或”字，令人咏赏有三叹之音。而韩公《南山》诗，衍为五十一“或”字，亦似支离。诗欲精妙，不要斗富。^[17]

在《北征》前半部分，杜甫极写战乱后的荒芜，而此四句插入鲜丽饱满的山果描写，为下句“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埋下伏笔，山果繁茂宛如世外桃源，然终是虚空，愈加凸显北归途中的悲惨见闻，抒发了深沉的忧国之情。而韩愈《南山》诗则是偏于技法，极尽铺陈以表现终南山景色，故梁庆遇评其“衍为五十一‘或’字，亦似支离。诗欲精妙，不要斗富”，直指韩诗过度追求形式奇崛，反失浑然天成之趣，且不免于支离破碎。相比之下，杜甫《北征》仅用两“或”字，却能以简驭繁，不离主旨。朝鲜文人中亦有持论较为宏通者，李晬光以杜、韩诗与李白“天上白玉京”诗相较，直言“李诗气力不及《北征》，雄浑不及《南山》”^{[12]1071}，认为《北征》与《南山》都堪称古今长篇中的杰作。申光汉（1484—1555）则从创作实践角度指出：“北征雅丽杜工部，南山刻镂韩文公。”^{[10]56}所谓“雅丽”，即《北征》继承《诗经》雅颂传统，以沉郁顿挫之笔书写家国忧思；而“刻镂”则指《南山》以赋体入诗，穷极物态，雕琢工巧，呈现出崇雅而不废工的倾向。而在中国学界，方东树等清代学者认为《北征》《南山》二者体格不同，不可相较，转而大肆赞扬《南山》^[18]，朝鲜学者与此不同，他们不似清人重“尊体”为《南山》正名，更强调“雅正”以维系文化认同，故独许《北征》占据主流，朝鲜诗学对《北征》的诠释，揭示出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机制。朝鲜文人的“用意忠厚”论强调诗歌需以含蓄方式实现政治批判，同时维系社会伦理，虽弱化了杜甫批判现实的锋芒，却赋予其诗超越时代的道德意义，进而建构出杜甫作为忠君爱国者的典范形象。

二、诗法革新：朝鲜诗论对《北征》诗学价值的建构

杜诗的典范性包含道德和审美两个层面的内

涵^[19]，《北征》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中国诗论家较早已注意到其在诗法革新等方面的意义，叶梦得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也。”^[20]叶氏指出，魏晋以前的抒情传统强调内在情志的凝练表达，而非以叙事铺陈为能事，反映出其对诗歌形式流变的认知，他将《北征》《述怀》类比司马迁史传，把杜诗“穷极笔力”的特质阐释为对史传笔法的诗性转化，揭示出“其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明人沿袭此论，谢榛云：“子美《北征篇》，诗中之文也。”^[21]揆诸朝鲜半岛古代的诗学文献，朝鲜文人中亦不乏颇具卓见者，他们对杜甫《北征》诗的诗学价值亦有较为深入的阐释。

其一，朝鲜诗学家以《北征》为古今五古之冠。曾出使清朝的著名文人南龙翼（1628—1692），曾专门记录明人王世贞对杜甫不同诗体的评论：“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不足多法也”，以为“不易之定论”^{[22]2191}。王世贞的评论主要是就近体诗而言，故南龙翼尚觉未尽意，他进一步对比李、杜的五古成就评道：

李、杜之五言古，如《古风》《纪行》可以相埒，而如杜之《石壕吏》《潼关吏》《无家别》《新婚别》《遣怀》诸篇，李固不可敌。《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王屋山人》，则五言杜实优矣，而不论于神、圣之中。^{[22]2191-2192}

南氏以杜甫长篇五古《北征》及《三吏》《三别》等名篇为例，肯定杜甫在五言古诗领域的成就。洪翰周（1798—1868）亦从诗体成就角度对杜甫大加褒扬，其在《智水拈笔》中遍评诗家，认为“惟杜工部格律独造，兼长各体”，评《北征》诗云：“大篇巨章自唐始盛，杜之《北征》《咏怀》《壮游》《八哀》诸篇……多宏篇巨什，前无古人。”^{[10]549}尽管洪翰周主张“诗不多篇，亦不多句”，但他还是肯定了杜甫《北征》诗在长篇五古方面的卓越地位。

其二，肯定杜甫《北征》诗在诗歌发展演变中的贡献。《北征》宏大的叙事结构和细腻的细节把控铸就了该诗显著的“赋”的特色，而杜甫一系列以铺叙见长的诗篇使其被宋末元初的诗文大家刘辰翁视

为唐代诗坛由独重比兴到渐取赋法的过渡性人物^[23]。朝鲜诗学家亦认为,《北征》赋法的运用对后世影响深远。金载瓚(1746—1827)在《题琴湖相公续〈北征〉诗卷后》中回顾了赋法入诗的历史源流:

诗与文判不相夺,雅、颂不可为典、诰,《左》《国》不可为风骚,是犹兵农虽相寓,其为用未尝一者也。诗以世迁,文逐运移,拗情之体胜,而建安以下文涉于诗,叙事之法作。^{[10]244}

金载瓚以雅、颂等诗体裁与典、诰等公文不可混同为例,强调诗、文诸体本应各守其垣,但其亦有文学史家的眼光,观诗学流变,建安以降叙事法度渐入诗域,如江河互济,已成为文学演进的动力之一,此论与叶梦得相通。在此背景之下,杜甫《北征》以其赋法铺陈,实为诗史一重要里程碑。故金载瓚又说:“至少陵,创立壁垒,别设机轴,以《三百篇》兴比之旨,兼二十代记述之手,综错阖捩,极其神化,郁为诗中之太史。……下上千年,诗运三变,少陵之诗,诗以用文而一变。”他认为,杜甫《北征》等诗在保持诗歌韵律性的前提下,将史传文学的叙事技巧、策论的逻辑思辨、辞赋的铺陈手法熔铸一炉,创造出“综错阖捩,极其神化”的境界,进而将杜甫定位为“以诗用文而一变”的开创者。较叶梦得指出杜甫《北征》有史传笔法还要更进一层,突出其以“《三百篇》兴比之旨”为统领。又如李学逵(1770—1835),亦是格外注意到《北征》诗中融入有策论文般的论辩思辨,故其曰:“至于议论序事,自别是一体,五古如元次山之《春陵行》,杜樊川之《李甘诗》,昌黎之《荐士》,少陵之《北征》是也。”^{[10]276}他将《北征》归为“议论序事体”。“议论序事”是在诗歌中融入散文式的用字、造句以及诗人对事物的判断等,乃是以文为诗的特点,朝鲜古代诗论的这些看法,颇为切中要害,可视作叶梦得、谢榛等人论调的域外知音。中国当代杜诗研究大家莫砺锋在此看法基础上指出,杜甫《北征》“以文为诗的写法,对后来中唐的卢仝、韩愈一派有非常大的影响”^[24]。可见,中、朝两国诗论对杜甫“以文为诗”创作方法的诗史意义都有深刻的认识和肯定。

三、文教传承:朝鲜诗论对《北征》文化功能的阐释

朝鲜王朝时期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强调“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杜甫被塑造为“忠义”典范,其诗渐成为道德教化的载体,古代朝鲜文人受此

影响,格外看重《北征》诗所蕴含的文化教化功能。金沂(1448—1492)在《翻译杜诗序》中说:

臣窃观子美博极群书,驰骋古今,以侗佻之才,怀匡济之志,而值干戈乱离之际,漂泊秦陇夔峡之间,羁旅艰难,忠愤激烈。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荣悴,禽鸟之飞跃,千汇万状,可喜可愕。凡接于耳而寓于目者,杂然有动于心,一于诗焉发之。上自朝廷治乱之迹,下至闾巷细碎之故,咸包括而无遗。……《北征》书一代之事业,而与雅颂相表里。《八哀》纪诸贤之出处,而与传表相上下。谓之诗史,不亦可乎?而其爱君忧国之诚充积于中,而发见于咏叹之余者自不容掩,使后之人有以感发而兴起焉。此所以羽翼乎《三百篇》,而为万代之宗师也。^{[10]46-47}

金沂认为,杜甫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形成的“忠愤激烈”之情感,与其“匡济之志”的政治抱负相互激荡,可视为继承《诗经》精神传统的重要表征。他着重指出,杜诗兼具历史感与艺术感染力,其中“爱君忧国”的伦理价值对后世读者具有强烈的感召作用。随后,金沂通过多重论述建构了杜诗翻译的政治文化意义。首先,他强调君主的文化功绩,指出当时的统治者“日御经筵,六经诸史靡不毕究”,更意识到诗歌具有“有关世教”的社会功能,故特命文臣翻译杜甫诗集。其次,提出杜诗“显晦与世道升降”的命题,将文学经典命运与时代政治关联,以期通过杜诗的翻译实现“复掩前古,卓冠百王,振起诗道,挽回世教之几”的愿景,将君主的译诗工程比附为盛世的文化表征,包含对当下政教秩序的肯定。在阐释杜诗接受路径时,金沂特别强调“稷契许其身”“一饭不忘君”的精神内核,构建起“辞语声律为末,忠君许身为本”的价值序列。金氏重道轻文的诠释反映出朱子理学影响下的文学观念,也体现了朝鲜士大夫阶层希望通过翻译汉籍强化儒家伦理认同的动机。要之,杜甫诗集在古代朝鲜享有崇高地位,《北征》等诗篇备受赞誉,除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外,首要的原因是官方文化政策的重视。宋麒秀亦云:

子美之诗所以见称于人者,以其有忧时伤世之念,而间关道路长悬魏阙之情,而文章之见于诗辞者,又皆有恳恻不已之而言而已。不然,则虽曰“诗坛大成”,而徒为谨密之辞矣,与夫尚浮辞而欠性情者奚择哉?惟其忠爱之诚,自有感发人之心志者,

故后之主之者,咏歌不足而形于赞美,千载之下犹可以树名教励风俗。虽有所尚之不同,而终不敢显斥也。^{[10]64}

宋麒秀强调,杜诗被历代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承载的“忧时伤世之念”包含着对民生疾苦的现实观照。相对而言,他刻意淡化了杜诗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而将论述重心置于诗歌的伦理功能,批判“尚浮辞而欠性情”的创作倾向,直言杜诗所蕴含的“忠爱之诚”具有树名教励风俗的功能,实质上将杜诗塑造为承载儒家伦理理想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宋麒秀是在科考策问中提出上述认识的,确实能够反映当时统治者所关心的文教问题。宋氏此论,恰揭示了统治者借杜诗弘扬儒家伦理、巩固政教秩序的深层意图,为后世理解朝鲜文人对杜诗的特殊情结提供了重要视角。

古代朝鲜文人对杜甫《北征》诗格外观照的背后,还蕴含着他们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本土化共情,高丽末期至朝鲜王朝屡遭外患的集体记忆,使得他们在解诗时尤其重视诗中的伤痛经验及其所蕴涵的忧君忧国之情。安重观(1683—1752)在《东避录序》中说:

古之人于丧乱漂流之际皆有所叙述,以识其身心之所困迫、时变之所极挚。若周人之赋《兔爰》、杜甫之作《北征》、李忠定之撰《传信录》之类是已。此岂惟自道其不幸而已,抑以写夫忧君与国、感愤悲恫之不能已者,盖亦忠臣孝子之志也欤?^{[10]190}

安重观以《诗经·王风·兔爰》、杜甫《北征》等作品为例,指出古代文人在丧乱流离之际的书写不但记录着个体“身心困迫”的具体境遇,且承载着“忧君与国”的集体情感。安氏结合自身丁未年清州狂寇叛乱时“莽戎卒兴,远近震骇,士女之奔迸于道涂者,若兽挺而禽窜”的流亡见闻,意识到今人认为前代文本中的战乱抒写“过于忧伤”实源于读者与作者的经验隔阂,“尝读《兔爰》《北征》之诗及《传信录》等,窃悲其人忠孝之盛,而或疑其过于忧伤。以余之遭今日者方之,殆亦有甚焉。盖悬想与躬见,不翅不如也”^{[10]190}。通过现实经验的重述,杜甫《北征》等诗中的乱世书写与忠义之志益加受到韩国文人的敬仰。丁范祖(1723—1801)在回顾壬辰之乱中士人群体的抗争时,特意指出士大夫龙潭公等人携布衣之士主动投身战事,前赴后继,最终成就光复之功,之所以一呼百应源于“考其平日志业,

皆有足以奋发其忠义也”^{[10]221},而这平日志业中就包含有杜诗等经典的精神统领,故丁范祖在《龙潭遗集序》中回顾天宝旧事,感伤壬辰之乱时曰:

积之躬而为学问,施之事而为忠义,体用源流之相须,有不可诬者也。昔杜子美当天宝之乱,伤君父之蒙尘,痛逆胡之猾夏,孤诚幽愤形诸赋咏之间,论者谓子美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读《北征》诸诗可验其所存。后之君子读公集而不知公之所存,其可乎哉?^{[10]221}

丁氏将文学传统中的“诗史”精神与当下现实抗争相勾连,强调杜甫《北征》等诗篇饱含忠义之气,并以壬辰之乱中抗乱报国的龙潭公之遗集相比拟,为本国的忠义文人设立价值坐标。尽管杜诗东传朝鲜并被格外强调有益于风俗世教的文教功能,但其首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安重观、丁范祖等人读《北征》而感伤本土离乱则表明,杜诗最深层的真挚情感能够跨越时空界限、民族差异而引起读者自发的认同和感动。杜甫《北征》诗中的乱离与悲痛,在朝鲜文人的阅读体验中已经和他们自身历史中的苦难记忆交织,形成深刻的情感共鸣,其在古代朝鲜的接受堪称古典诗歌域外传播的典范。

总的来说,朝鲜文人对《北征》的阐释,体现了对儒家诗教传统的坚守,亦折射出朝鲜文人在文化接受中的主体性选择,其以“诗贵含蓄”“诗尚典雅”为标准,相对轻视诗歌叙事、语言等外在层面的造诣,显示出中朝文学审美的差异,更凸显了杜甫诗歌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复杂面相。朝鲜文人还在涉及《北征》的评论中融入了本国历史语境特有的现实关怀,使诗歌脱离单纯的文本模仿,升华为抒发民族情感与政治理想的载体,深化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深远影响。

注释:

①参见卫珩《“流离困厄赋〈北征〉”——北征纪行书写及其艺术特色》,《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2期,卫珩所论较为可靠,但未涉及域外文献;关注域外文献的相关研究如张寒《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述评》,《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韩国)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等,虽对古代朝鲜对杜诗的评论有所涉及,但尚无针对《北征》的专论。

参考文献:

[1]马琳.朝鲜半岛杜诗文献的衍生及其文化特征[J].天津社会科学,2024(1):121-128.

- [2] 左江. 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3:30-37.
- [3] 이국진. 두보시「北征」의 수용양상과 그 의미에 대한 일고찰. 동양한문학회연구[J]. 2011(33)71-107.
- [4] 杜甫. 杜甫诗全集[M]. 闵泽平, 校注. 武汉: 崇文书局, 2023:243.
- [5] 张戒. 岁寒堂诗话校笺[M]. 陈应鸾, 校笺.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18-19.
- [6] 刘克庄. 后村诗话[M]. 王秀梅,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59.
- [7] 魏泰. 临汉隐居诗话[M]//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第二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1214.
- [8] 王宇可. 直笔在史臣:《北征》“不闻夏殷衰, 中自诛褒妲”辨[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52-64.
- [9] 杨伦. 杜诗镜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62-163.
- [10] 左江. 高丽朝鲜时代杜甫评论资料汇编(全二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 [11] 佚名. 诗文清话[M]//蔡美花, 赵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三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2043.
- [12] 李晔光. 芝峰类说[M]//蔡美花, 赵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二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13] 南羲采. 龟渊诗话[M]//蔡美花, 赵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九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14] 范温. 潜溪诗眼[M]//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第二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1253-1253.
- [15] 黄庭坚. 赠谢敞王博喻[M]//刘琳等, 点校. 黄庭坚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1185.
- [16] 马金科, 李安娜. 诗律正脉: 朝鲜朝中期诗律观: 以梁庆遇《栗湖诗话》为中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83-94.
- [17] 梁庆遇. 栗湖诗话[M]//蔡美花, 赵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二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1414.
- [18] 许光. 独吟与合唱: 论清人对《北征》《南山》轩轾之争的讨论与评鹭[J]. 社会科学论坛, 2016(8).
- [19] 张伯伟. 典范之形成: 东亚文学中的杜诗[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9):163-188.
- [20] 叶梦得. 石林诗话校注[M]. 逯钦立,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47.
- [21] 谢榛. 诗家直说笺注[M]. 李庆立, 孙慎之, 笺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87:259.
- [22] 南龙翼. 壶谷诗话[M]//蔡美花, 赵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三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23] 莫砺锋. 杜甫诗歌讲演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8.
- [24] 莫砺锋. 杜甫十讲[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10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ransnational Resonance: On the Interpretive Dimensions of Northern Journey in Ancient Korean Poetic Discourse

ZHAO Yu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ception of Du Fu's *Northern Journey* in classical Korean poetic criticism reveals three interpretive dimensions. First, Korean scholars regarded *Northern Journey* as a manifestation of Du Fu's loyalty and magnanimity, arguing that the poem subtly critiques contemporary affairs through historical analogies while upholding the ethical principles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subject. Second, they highlighted how *Northern Journey* integrated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nd the logical reasoning of policy essays, thereby establishing it as a paradigm of five-character extended ancient poetry. Du Fu is thus celebrated as an innovator who "revolutionized the use of prose techniques in poetry." Third, Korean critics acknowledged the cultural and didactic functions of *Northern Journey*, such as promoting moral teachings and inspiring social customs, effectively framing Du Fu's poetry as a vehicle for Confucian ethics. Exploring Korean perspectives on *Northern Journey* not only illumin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 Fu's re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also provides a cross-cultural reference for Du Fu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Korean poetic discourse; Du Fu; *Northern Journey*; poetic innovation; cultural and pedagogical functions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度融合

陈柳钦

(钦点智库,北京 100142)

摘要: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结合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与理论支持。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智能化升级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提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模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框架。两者的结合促进了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发展和区域协同合作,并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优化产业链结构,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及全球生态治理参与能力。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度融合,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必须通过政策支持、跨国合作和社会参与,推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生态文明;融合;和谐共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4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18-09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关键力量。近年来,“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学术与实践领域,并被认为是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这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动力。从发展理念层面分析,新质生产力强调自然生产力的作用,在实践中践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的理念,同时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拓展两者的双向转化路径,进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范式。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统一,成为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两者的结合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实现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源于对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反思。它不仅超越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模式,还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智能化应用和绿色发展,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与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与智能化升级,这三者的深度融合体现了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生产力的提升不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象征,而是向高效、可持续、绿色发展的转型。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成果推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模式的绿色转型,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系统和绿色技术的应用,企业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有效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负担,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标志着未来经济转型的新方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动力源泉。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近年来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2025-06-07

作者简介:陈柳钦(1969—),男,湖南邵东人,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教授,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产业经济和生态经济。

与生态保护的双赢。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应对,更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反思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科学指引。它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模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在这一框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经济转型的需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理念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厚的生态文明意蕴,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在经济社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要求。

尽管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密切联系,但如何将两者有效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仍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国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形成历史性交汇,需要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格局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力。在全球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结合,不仅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有效路径,更是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二、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契合性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态飞跃,是人类在掌握了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基本规律基础上的科学选择,内在地具备绿色的特征,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能。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注重通过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推动高效、低碳的发展模式,与生态文明思想的理念相契合,尤其是在强调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方面。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提供了绿色发展的理论框架,而新质生产力则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为其提供了实现路径。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一)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全球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新质生产力作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创新力量,强调通过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来推动高效、低碳的经济模式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够

为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可持续性提供解决方案。

第一,技术创新:构筑“两型”发展模式的关键引擎。技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推动资源节约型经济模式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在生产过程中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少资源、高效益”的发展方式。例如,通过智能化技术和先进的制造工艺,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废弃物的回收率和再利用水平也大幅提升,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负担。同时,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的实施,尤其是在低污染、低碳排放技术方面的突破。创新技术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能耗和更少的污染排放进行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还能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为社会提供更加绿色和高效的生产方式。

第二,绿色技术: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绿色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低碳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绿色技术包括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它们通过推动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显著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绿色技术不仅在能源转换领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还在绿色制造和生态修复领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绿色技术,企业能够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生态修复方面,绿色技术可以有效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为全球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念核心与新质生产力的契合点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不断深化,生态文明思想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3]这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导向。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其本质是通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模式实现高效、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生态优先、绿色经济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等方面的理念与新质生产力的理念相契合,形成了推动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第一,生态优先与绿色经济的有机融合。生态

优先理念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保护应当处于优先地位。在新质生产力的引导下,生态优先理念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转型,力求实现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目标的统一。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就是推进绿色发展,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基础上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技术,尤其是在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方面的突破,有效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挑战,更是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寻找发展的新途径。它要求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这与新质生产力的理念高度契合。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产业升级,绿色经济不仅能够促进资源的节约利用,还能够减少污染排放,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的构建,最终实现生态优先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

第二,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结构与调整。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的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至关重要。传统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文明思想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而新质生产力正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优化,推动传统行业向低碳、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例如,在能源产业中,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替代传统的煤炭、石油等高污染能源,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绿色建筑、环保材料、智能化生产等技术的应用,也在推动高污染、高能耗行业逐步向绿色和高效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优化以及社会各界的协同作用,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调整产业结构,还能够推动经济模式的深刻变革,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三、新质生产力理念中的生态文明元素

新质生产力理念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思想为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通过科技进步、绿色创新与低碳发展的综合应用,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经济增长,还能有效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绿色创新与资源节约

绿色创新与资源节约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代表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型。通过推动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与资源节约型经济模式的实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绿色科技与循环经济。绿色科技在新质生产力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推动环保技术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开发与应用。通过绿色科技的创新,人类能够在多个领域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环境污染的最小化。例如,清洁能源、智能化节能系统以及绿色建筑材料等技术的突破,极大地推动了低碳排放的产业升级,减少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还帮助企业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此外,循环经济模式的实施,依靠资源的再利用和回收,极大减少了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负担。在这一模式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得到更有效的管理,废弃物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为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友好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推动低碳发展与减少资源消耗。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新质生产力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节约价值。低碳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它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发展的进程。低碳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问题,还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的有机结合,是推动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政策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激励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低碳技术的市场化进程。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也是关键所在,通过推动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向绿色和智能化方向转型,能够显著降低整体资源消耗,实现低碳经济目标。这一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不仅助力能源消耗的减少,还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与融合。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模式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保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可持续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和优化生产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和谐统一。企业不仅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升自身竞争力,还

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环境保护的多赢局面。

第一,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具体而言,技术创新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绿色制造和清洁技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加大,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和技术研发,鼓励绿色产业和低碳技术的应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进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第二,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结合。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承担起了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重提升。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企业能够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从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现代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还需要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环境的可持续性。例如,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清洁技术、节能减排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消耗的降低,并通过绿色管理体系减少环境足迹。同时,企业还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生态保护项目,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与环境保护的共赢。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还能够为社会和环境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共同进步。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旨在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共生。新质生产力超越了传统生产力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观念,将生态价值纳入生产力评价体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行的路径。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不仅能够促进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还能有效推动生态修复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发展,探索科技进步如何促进这一良性互动。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往往依赖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而新质生产力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通过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和社会活动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生态文明思想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提出了人类应当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它倡导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终使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保持良性互动。

第二,科技进步推动生态修复与自然资源保护。科技进步在生态修复和自然资源保护中的应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自然生态系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造成了广泛的生态退化和资源枯竭。然而,通过创新的生态修复技术和资源保护手段,科技为恢复生态平衡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生物修复技术、植被恢复技术以及水土保持技术等,已经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帮助受损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功能。此外,先进的资源管理技术,如智能化水资源管理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等,能够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科技创新不仅为生态环境提供修复与保护的手段,还通过促进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社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意蕴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4]6},其承载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殷切期望。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生态治理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模式,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促进了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而生态文明思想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一)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引领可持续商业模式

在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推动下,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绿色创新和技术升级,企业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思想为企业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理论依据,鼓励其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并减少环境足迹。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和谐共生。在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指导下,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和技术升级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

生。绿色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突破上,更包括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的深刻转型。企业通过引入清洁能源技术、节能减排工艺和智能管理系统,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有效减少了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通过技术进步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形成社会、经济和环境三重效益的共赢局面。这种绿色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也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助力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可持续商业模式。生态文明思想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商业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协调。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企业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推广绿色产品和服务,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绿色管理和生产方式的应用,使企业能够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废弃物排放,并减少碳足迹。随着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采纳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提升了社会责任感,还增强了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这种转型帮助企业在日益注重环保的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实现商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共生。

(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绿色产业升级

区域协同发展与绿色产业升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绿色技术的共享与合作不仅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推动了产业向低碳、环保方向的转型。通过政策引导和跨区域合作,绿色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为全球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第一,绿色技术共享与合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区域间绿色技术的共享与合作,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绿色产业的发展。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技术共享,区域间能够互相借鉴先进的绿色技术和解决方案,实现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共同突破。例如,发达地区的绿色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发等方式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提升整体区域的绿色经济水平。这种跨区域的技术合作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的绿色转型,还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为区域内外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政策引导与区域合作推动绿色产业链优化。通过政策引导与区域合作,绿色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为全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支持。政策的有效引导能够推动绿色产业的规范化和

市场化发展,鼓励跨地区、跨国界的产业合作。例如,通过政府出台绿色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生产方式,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的绿色产业链建设。区域合作通过共享优势资源,协同推动绿色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延伸,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目标。通过这种协作机制,绿色产业的升级不仅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推动了全球绿色产业链的优化,助力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提升国家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升国家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创新、技术突破和低碳转型推动国家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而生态文明思想则为这一进程提供理论指导,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一,绿色创新与低碳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5]。这些要求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是高度统一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向高质量、低碳转型,增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绿色创新在清洁能源、绿色建筑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促进了传统行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技术升级与创新应用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够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这种低碳转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提升了国家在全球绿色经济竞争中的地位。通过绿色创新,国家能够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占据先机,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推动全球绿色经济格局的优化。

第二,生态文明促进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这一思想的引导,国家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生态文明理念促使国家实施绿色政策,推广绿色技术,确保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推动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也为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生态文明思想,国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退化等全球性挑战,助力全球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展现大国的国际责任与领导力。

第三,增强全球竞争力与应对挑战。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绿色技术的突破为国家提升全球竞争力提供了关键支撑。通过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创新管理模式以及调整产业结构,国家能够在全球经济竞

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同时增强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时,技术创新为国家提供了解决方案,提升了其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韧性。新质生产力不仅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进步。通过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转型,国家能够在全球绿色经济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未来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四) 推动全球绿色转型与生态治理

全球绿色转型与生态治理是应对环境危机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框架,还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协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绿色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引导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技术共享、经验交流和责任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力量。中国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中,积极推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通过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话语权,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提升,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力量^[6]。

第一,全球环境保护的共同框架。生态环境治理是全球性问题,必须紧跟时代、放眼世界,主动融入全球绿色科技创新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7]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推动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退化问题。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创新与低碳技术的应用,推动全球绿色经济转型,降低生态环境的负担。而生态文明思想则倡导全球协作,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这一框架,国际社会能够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合作和政策协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森林砍伐、污染排放等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支持全球绿色经济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协调,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和环保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国际政策协调在推动这一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签署协议,分享绿色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全球绿色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各国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时加强协作,不仅确保绿色经济发展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还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这

种全球协作机制为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确保低碳经济目标的实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第三,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新质生产力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保障代际公平提供了关键保障与动力源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存量,新质生产力强调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技术创新,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与损耗,实现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为后代留存丰富的资源财富^[7]。生态文明思想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它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重协调,提出通过绿色生产、资源高效利用、社会责任承担等手段,确保全球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与稳定。通过实施生态文明理念,各国能够在各自的发展路径上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贫困减少、健康保障等方面的进步。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方向,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核心力量,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经济向高质量、低碳转型,还通过优化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促进社会的绿色转型。通过引领绿色创新和智能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污染排放,推动了低碳经济的普及。与此同时,它促进了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新质生产力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助力社会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迈向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一) 深化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产业升级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产业升级是核心驱动力。通过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发展以及建立绿色技术转移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的绿色竞争力,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一,加强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关键绿色技术的研发,如碳捕集与利用技术、智能节能系统和生态修复技术,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技术创新,能够实现对能源的高效利用与低碳排放的控制。碳捕集与利用技术、智能节能系统和生态修复技术的突破,不仅推动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治理提供了科技支撑。碳捕集与利用技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二氧化碳转

化为可再利用资源,助力低碳产业升级;智能节能系统依托数字化、自动化技术优化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和生产成本;生态修复技术通过精准干预加速环境恢复,提升生态系统韧性。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劲动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

第二,推动绿色产业集群与生态产业链建设。推动绿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加速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步骤。通过构建环保型产业链,促进新能源、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壮大,能够推动产业协同升级,提升整体绿色竞争力。政府应加大政策引导力度,鼓励企业加快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和创新,支持绿色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协同化发展。加强上下游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不仅能降低行业碳足迹,还能提升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构建经济增长与环境友好并行发展的新格局。

第三,建立绿色技术转移与市场推广机制。建立绿色技术转移和推广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是推动绿色技术广泛应用的重要途径。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平台,促进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加速绿色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依托技术转移中心和孵化器,将先进绿色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实现低碳技术的规模化推广。鼓励企业通过投资、合作和合资等方式,加快绿色技术的市场化进程,提高其竞争力和普及度。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产业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劲动能,实现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

(二)构建低碳生产模式与可持续消费体系

构建低碳生产模式与可持续消费体系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发展低碳基础设施和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推动社会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型。

第一,优化生产流程与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引导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推广清洁生产技术,是降低碳排放和资源浪费的关键。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工艺升级、能源管理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企业能够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绿色生产效率。清洁生产技术不仅减少污染排放,还通过循环利用和智能废物处理,降低环境负担,构建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引入低碳技术,如能源回收系统和绿色制造工艺,加快碳减排步伐,助力低碳经济发展。新质生产

力以绿色创新引领产业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第二,发展低碳建筑与绿色交通。低碳建筑和绿色交通体系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依托绿色科技创新,推动节能环保材料、高效能源系统在建筑领域的应用,降低能耗与碳排放,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在交通领域,加快绿色出行方式的普及,推动电动汽车、智能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体系建设,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通过政策引导、数字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构建绿色、智能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城市低碳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助力智慧、可持续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培育绿色消费市场与推动低碳生活。培育绿色消费市场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改变消费方式的重要举措。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推动节能环保产品的推广应用,鼓励消费者选择低碳、绿色产品,促进消费模式向可持续方向转型。绿色消费市场的壮大不仅推动低碳产业链的发展,还加速了绿色技术的市场化进程,助力低碳经济升级。加强环保教育,提高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营造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使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产业供给,引导社会迈向可持续发展新阶段,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共进。

(三)强化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治理创新

强化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治理创新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通过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教育体系、推动示范区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能够有效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促进绿色社会转型。

第一,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当作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要从抓教育着手,在全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4]19},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9],将生态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行动上自觉地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推动绿色教育和环境保护课程的普及,不仅能培养下一代的环境保护意识,还能激发全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行动。通过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和公众参与机制,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的宣传活

良好氛围。

第二,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是探索生态友好型城市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通过实施低碳、绿色发展的试点项目,推动绿色产业、智能低碳生活方式和生态修复技术的落地,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加速城乡地区的可持续转型。示范区依托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绿色能源、智慧环保、循环经济等前沿技术应用,为生态治理提供可行范例。通过政策引导和区域协同,推动绿色发展模式向更大范围推广,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全国的系统化、规模化落地,构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格局。

第三,强化社会治理创新与数字化治理。强化社会治理创新,尤其是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环境监测、污染治理和资源管理的精准性,是提高生态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环境质量的实时监测、动态预警和智能分析,增强生态环境管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数字化手段不仅提升污染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还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通过构建智慧环保系统,新质生产力助力政府和企业精准决策,实现污染防治的系统化、智能化管理,加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生态治理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深化。

(四)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责任体系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责任体系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效推进的手段。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生态保护、强化企业环境责任以及推动信息公开与社会参与,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有机统一。

第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要想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平衡发展,就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模式,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新质生产力推动市场化机制赋能生态治理,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绿色金融,引导企业和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减少碳排放,使减排成为经济收益来源,进一步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升级。绿色金融可以通过贷款、投资、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形式,为生态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加快低碳、可持续项目落地,助力绿色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与市场机制融合,将生态保护成本转化为可持续经济收益,推动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向更广泛、精细化方向发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共进^[11]。

第二,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环境责任体系的构建,引导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通过严格的环境监管措施,确保其遵守环保法规,减少污染排放。落实“污染者付费”原则,使企业为自身环境影响付出成本,强化绿色发展意识。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企业环保升级,推动清洁生产技术、低碳工艺的广泛应用。同时,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投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绿色竞争优势。环境责任体系的完善,不仅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也助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第三,推动生态环境信息公开与社会参与。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环境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建设,提高生态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通过定期发布环境监测数据、污染排放情况及治理进展,政府和企业增强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促进环保责任落实,避免出现“生态红利”被少数群体独占的现象。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与智能监测系统,环境信息共享更加精准、高效,提高治理决策的科学性。透明的生态信息机制不仅增强企业与政府的环境责任感,也激发公众环保意识,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生态治理。全民共治的环保模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确保生态安全持续向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六、结语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融合为现代经济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这一理念在全球面临环境与发展压力的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强调通过创新和绿色技术的应用,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推动实现绿色、低碳的经济转型。生态文明思想则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倡导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绿色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为减少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切实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生态文明思想核心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进一步强化了对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重视,推动各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履行环保责任。这一过程中,政策引导、科技创新和社会协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出台绿色政策和提供创新支持,引导企业和社会向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企业通过采用绿色技术和优化生产模式,不仅提升了竞争力,也为社会和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社会各界通过增强环保意识和参与生态治理,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深入。

然而,要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度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如何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市场化应用,尤其是在成本、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突破;二是全球治理框架尚不完善,国际合作亟待深化,如何协调各国利益诉求,促进绿色转型领域的务实合作,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三是生态补偿机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也需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这些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尽管如此,随着全球各国不断努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通过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强化国际合作与政策支持,全球社会能够逐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度结合,不仅为我国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随着这一理念的深入推广与实施,未来社会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与资源节约,最终建设更加绿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

[2]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21-04-23(1).

[3]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2024(11):4-8.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6] 孙杨,王志贤. 新质生产力驱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0):19-27.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1).

[8] 刘双双.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内在逻辑、关键着力点与实践路径[J/OL].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4(2024-12-11)[2025-05-26]. <https://doi.org/10.14132/j.cnki.nysk.20241211.001>.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1.

[10]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11] 王佳琪,张鹏.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7(1):53-6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HEN Liuqin

(Qindian Think Tank, Beijing 100142,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provides new momentum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 a low-carbon economy and 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telligent upgrading,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etal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emphasiz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roposing a win-win model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reb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pplic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wo promot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ster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ncourages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optimizes the industrial chain structure, enhance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mproves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a key path to promo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t requires policy support,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advance the achievement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Key words: new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gr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从“赛博空间”到“元宇宙”： 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路径探析与反思

刘鹏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近年来,新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成为趋势,“科技+非遗”渐成潮流。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推动虚拟数字世界“赛博空间”演进为虚实相生的“元宇宙”。站在数字化浪潮的开端,河南积极布局元宇宙产业,在图像3.0时代基础上实现了数据资源的整合,但元宇宙在非遗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及传承教育方面仍有很大应用空间。同时,技术往往是双刃剑,数据化传承与“个人知识”存在悖论,“数字人类”可能引发伦理问题,都需谨慎考量。因而,元宇宙语境下河南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仍需关注人的主体地位,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传承人、社区居民的作用。

关键词:非遗数字化;元宇宙;个人知识;数字人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5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27-08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技术的应用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概念提出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就制定了《数字化遗产宪章》。中国自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始终重视非遗的数字化保护:2010年10月,原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非遗档案数字化建设;2022年5月,“文化数字化”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1];2023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为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了行业标准。新技术的迭代从未停止——从音频影像数据库建设、传统技艺过程的影像录制,到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等,而“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在图书馆、博物馆、遗址保护、教育、文旅融合等领域迅速引发关注。河南于2022年9月开始布局元宇宙产业,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更因其具备全方位立体传输信息和

沉浸式体验特征,可视为一种新型科技媒介。在河南现有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上,元宇宙在非遗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及传承中的应用路径亟待辨析,而科技媒介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悖论也需深入反思。

一、从“赛博空间”到“元宇宙”的技术迭代

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依托于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而在元宇宙概念出现前,“赛博空间”的概念已率先进入公众视野。作为虚拟空间的两种形态,元宇宙不仅是赛博空间的技术升级,更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现实与虚拟融合的全新空间形态。

(一)赛博空间与元宇宙

“赛博空间”是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于1984年在其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所创造的词语,“吉布森将小说中的虚拟空间命名为‘赛博空间’,描绘了虚拟技术控制的社会和高科技文化建构的后现代未来社会图景”^[2]。随后,这一概念超出小说和计算机技术领域,进入文化研

收稿日期:2025-06-02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区赋能乡村振兴研究”(24HNFY-LX138)

作者简介:刘鹏昱(1985—),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究的视野。

赛博空间由控制(cyber)和空间(space)两个词组合而成,指由计算机、现代通信技术所创造出的网际空间或虚拟空间。该空间“是由图像、声音、文字、符码等所构成的一个巨大人造世界,它由遍布全世界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所创造和支撑”^[3]。也就是说,赛博空间是虚拟空间,而人们沉浸其中时,其感觉却又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空间”。

巧合的是,“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同样源于科幻小说,1992年,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雪崩》(Snow Crash)一书中首次提出。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定义尚未统一,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是:“元宇宙是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呈现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基于未来互联网的具有连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3D虚拟空间。”^[4]

研究者大多指出了元宇宙“虚拟空间”的特性。有的研究者认为元宇宙属于赛博空间的范畴,是赛博空间的一种技术趋势^[5]。“元宇宙”作为一个术语出现在2004年Cory Ondrejka^①的研究中,他认为“元宇宙”尽管同样也在描述一个虚拟的空间,但却是一个非虚构的真实世界,人们以真实世界为“隐喻”在“元宇宙”中通过化身进行交易、娱乐^[6]。国内王建民(2023)也认为,不能仅将元宇宙等同于“虚拟空间”,而应将其视为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元宇宙不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之外构造出一个虚拟世界,而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融入,实际是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数字化,人们的学习、工作、交友、娱乐等都融入元宇宙的元素。”^[7]

总的来说,赛博空间和元宇宙,都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虚拟空间认知的深化而产生的概念。赛博空间是由通信网络构建的虚拟网络空间;而元宇宙在技术上,有了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新硬件,在功能模拟和感官真实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高度,形成超现实的虚拟世界。在形态上,元宇宙是现实世界的孪生数字世界;而在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上,元宇宙“是一个可扩展、可交互、网络渲染的超大虚拟空间,用户以数字身份在元宇宙中进行同步性、持续性的交互,并体验与真实世界相似的感受”^[8]。

元宇宙在技术上会经过数字孪生(即现实社会的镜像),到数字原生,指“在数字世界中用新的技术方法创造出原生的数字化产品或数字化服务”^[9],如文旅宣传中的元宇宙虚拟数字人,最后达到虚实共生的世界。

(二)作为科技媒介的元宇宙

元宇宙并不能仅理解为一种技术更新,更是通

过数字技术将现实世界模拟到近乎相同甚至超越的水平,这种超现实,“改变了人对物的感觉和直观认知方式,使对物的认知不再基于感官的粗糙或模糊判断,而是建立于对物的认知的数字空间可视化的科学基础之上”^[10]。元宇宙作为三维立体的空间,“同时实现人一物一实践在媒介交往端的融合,在更大范围内生成了社会化媒体、现实社会与智能设施之间广义网络的连接”^[11]。

由此可见,元宇宙也可视为一种科技的交往媒介。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文化传播、生产消费离不开媒介,而媒介反向建构着现实社会。尼克·库尔德利等认为,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社会经历过三次“媒介化浪潮”。“第一次,是以印刷机发明为标志的传播媒介的机械化;第二次,从电报开始,到电视、电话和其他电信形式的传播媒介的电气化;第三次,是传播媒介的数字化,与计算机和各种数字媒介有关,也与手机、互联网和日常生活中日益融入的智能设备有关。”^[12]

每一次媒介化,并非简单对原先媒介技术的淘汰,而是加深了这些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当前,我们正处在第四次浪潮,即数据化浪潮的开端。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日益增加,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不同设备在技术层次上通过软件和计算系统相互深度关联起来。而支撑元宇宙的有六大基础技术,即:物联网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和电子游戏技术,上述技术相互关联,形成现实与数字空间相融合的虚拟真实空间。

例如,通过敦煌博物馆开放的元宇宙世界《明日之境》,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敦煌魅力。2022年3月,第五届河南智慧旅游大会在线上和线上同时举行,参会者以“虚拟人”身份进入虚拟会议空间,这里不仅有会议发布广场,还有一条充满古韵的繁华商业街以及三生树、花海、汐语湾等游览观光区;“虚拟人”沉浸式穿越在会议中,全程观看会议内容,还可以单独点击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再如,大遗址考古借助元宇宙数字孪生,“线上线下双向驱动开发大遗址内容的数字化交互空间,实现用户感知的真实性与虚实高度结合的沉浸式体验”^[13]。

目前,元宇宙在图书馆、博物馆、古遗址等展示传播的应用上,都呈现这种沉浸式体验和虚实相融的特征。

(三)元宇宙与文化产业

元宇宙的概念一经问世,就与互联网产业密不

可分。2021年Facebook公司更名为Meta,随后,微软、苹果、英伟达等国际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入局元宇宙,国内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也纷纷进入这一赛道。

元宇宙被视为全球最大的产业风口之一,国家层面的布局也已开启。2022年初,韩国出台首个元宇宙中长期战略规划,从“市场环境、企业主体、消费者培养及法治保障等方面布局韩国元宇宙”^[14]。中国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产业规划中,元宇宙也成为热点产业。上海市继《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和《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年)》之后,于2023年6月印发《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2023—2025年)》。

河南是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启动元宇宙专项行动计划的地区。2022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南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从技术、产业、应用、生态、基础等方面,对元宇宙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该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发展文旅元宇宙,“推动景区、博物馆、文化馆、主题公园、艺术中心等深度运用扩展现实等技术,在虚拟世界中建设数字孪生体”^[15]。而“从体验的沉浸化、参与的开放性、个性的释放需求和虚拟技术的便捷化等微观视角看,文旅产业运用元宇宙技术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元宇宙的融入也会带给文旅行业更大的想象空间”^[16]。

河南作为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富,历史名城众多;此外,文物丰富多样、遗址遍布,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自不待多言。同样,河南丰富多样的非遗资源,也是文旅产业开发的重点。

当然,在“元宇宙”概念出现之前,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在河南文旅产业中就已经有所应用。如2017年,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与腾讯合作,建设全国首个云生态智慧景区。而常规的数字化赋能非遗,主要以互联网、音频、视频、图像等为主,或者说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体现了图像3.0时代的一般特点。

二、图像3.0时代河南非遗的数字化保护

米歇尔曾用图像学1.0、图像学2.0和图像学3.0来概括图像学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即图像1.0阶段,摄影术的发明使全球跨文化图像集合而成为可能,即图像—世界;第二阶段为生物图像,即信息科学和数字模拟这一辩证关系与生命科学融合的产物;第三阶段,即图像3.0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其代表为数据替身。”^[17]在图像3.0

时代,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影像化、数据化,影像化和数据化也是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的一般特征。

(一)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现状

目前,河南共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4个;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25个、代表性传承人126名,省级代表性项目1030个、代表性传承人1147名,市级代表性项目3311个、代表性传承人3976名,县级代表性项目9481个、代表性传承人10971名^[18]。这些数据说明河南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而非遗数字化保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首先,非遗数字化档案、数据库建设,是通行的基础保护手段。运用数字技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工作,利用摄影、摄像等数字化手段,如实记录非遗的生存原貌。2006年,河南启动“中原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对全省民间文化资源进行了初步普查,形成了大量文字、图片、影像资料。2010—2015年,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遗数据库建设的招标项目。

其次,建设了展示非遗信息的专业网站。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钧瓷网、河南豫剧网、河南曲剧网、河南曲艺网(河洛大鼓、大调曲子)等。

再次,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与抖音、微信、小红书等合作,并建设非遗数字博物馆。如2020年的“老家河南黄河之礼”非遗数字馆小程序。

最后,对一系列博物馆(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进行数字化提升,包括太极拳博物馆、宝丰汝窑博物馆等。其中,黄河博物馆数字化提升,“主要通过沉浸式场景搭建、三维建模、视频拍摄、实地取景、采访拍摄等,展示黄河号子、传统堵口技术等非遗”^[19],已经涉及虚拟现实技术。

(二)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问题辨析

为顺应时代趋势和国家文化战略,河南积极布局非遗数字化建设,于2022年设置专门机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慧化中心”。目前工作刚起步,各项工作还有待推进、完善。

第一,河南作为戏剧大省,在国家级非遗项目中,戏剧占比最大,很多剧种处于濒危状态,如二夹弦、大平调、罗卷戏、太康道情等,对这些剧种进行数字化保护目前还不完善。

第二,虽然河南非遗保护也与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短视频网站联合,并推出“宋潮来袭”等非遗公众号,但“在短视频快餐式的流量逻辑之下,非遗短视频呈现碎片化、表象化和娱乐化,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非遗的有效传承”^[20]。

第三,现有的数字资源更新较为滞后,需要利用

最新的技术手段,拍摄更加清晰的图片、影像,替换那些陈旧的数字资源。

第四,积极探索省级资源、市级资源、县级资源、村落资源之间的系统协调和资源共享模式。

总体上看,河南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主要还是数字资料的保存与互联网、新媒体上非遗的传播,在数字化传承方面还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非遗传播,仍然是“读图时代”的文字+图片,或视频。一方面其流于对非遗外在形式的拍摄、传播,而不能很好地揭示非遗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这些图片、视频都是片段的、零碎的,不能体现非遗的整体系统或全貌。

正如唐宏峰(2022)所说:“图像学3.0描画着这个数字时代的影像生活,各种监控视频、手机录影、行车记录仪、自拍、朋友圈、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在虚拟的空间中弥散”^[21],非遗、非遗传承人要融入这样的数字时代,自然不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替身”。

当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这些数据整合成一个系统的尝试,河南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如基于大数据的“河南非遗热搜榜”,再如2023年7月正式上线的“河南非遗一张图”,“通过与百度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相结合……更加直观和系统化地展示了河南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基本信息、流传历史、技艺传承、拜师授徒、传承谱系、门店信息、照片、视频、资讯等”^[22]。而基于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综合利用各种数据的元宇宙,其沉浸式体验和超现实的空间,将超越图像3.0的二维屏幕,成为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又一新的方向。

三、元宇宙语境下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

元宇宙的应用首先是在游戏领域,2003年美国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开发的第一个3D虚拟平台“第二人生”(Second Life)向公众开放;随后元宇宙游戏成为开发者和受众最先体验的领域。元宇宙依托当前科技手段所体现的沉浸式体验、实时交互、临场感、群体性创作等特征,不仅在体育、游艺和竞技类非遗上有天然的技术优势,在文化产业、非遗整体性保护和传承教育上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一)元宇宙赋能非遗生产性保护

河南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使元宇宙的应用最先出现在文旅产业上。2022年7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推广暨元宇宙创造者大赛。“老君山、少林寺、黄帝故里、武侯祠、龙门石窟、太昊陵等河南知名文旅IP的高度

写实虚拟场景集中呈现在国内首个综合性文旅元宇宙数字空间‘元豫宙’中。”同年,国家级非遗项目《辉县剪纸》的数字藏品也正式发布。

体育、游艺和竞技类非遗融入元宇宙游戏具有天然便利的条件。腾讯游戏《王者荣耀》与越剧的结合、《斗罗大陆:魂师对决》与洪拳的融合已开“游戏+非遗”的先例,河南有少林功夫、太极拳、八极拳、心意六合拳、摆石锁等传统武术,可以开发传统武术类元宇宙游戏。

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是统一的整体,相互依存。非遗目前的六大类别为:(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中,每一类别都与地方文化、生态环境、物质空间或场景有相互关联,因此,对非遗的保护不仅是外在的形式、表演、技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民俗生活或文化场景也应得到保护。而元宇宙视域内的人机交互技术、沉浸式体验、虚拟数字人等,可以使文旅产业场景构建中的互动交流与体验更为逼真。

此外,新技术的应用,如阿里巴巴、京东、美团等平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支付习惯和日常社会互动;同样,元宇宙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消费应用,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体验和习惯。如果说互联网平台购物是“读图+支付”,那么元宇宙消费则是“超真实体验+支付”。在元宇宙数字场景中,受众可以调动多种感官参与人机交互,不仅非遗产品的各种细节、形态得以同时展示,其制作过程也可被受众亲身体验;运用VR等技术构建的全景沉浸式数字购物体验、全景虚拟店铺,甚至可以获得超越实体店铺的购物体验。而更进一步,基于AR技术开发的非遗数字化的文化内容,可以叠加在与之相关的各类文化旅游产品、文化旅游景区等现实环境的场景中,这种虚实融合的增强现实,无疑也会促进旅游体验、文化传播和终端消费。

(二)元宇宙赋能非遗整体性保护

通过总结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人们发现仅仅对一个非遗项目本身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非遗的活态传承不能脱离其民俗生活,不能离开与其相互依存的物质文化遗产或文化场所。因而,既要保护非遗本身,也要保护其周边的物质文化和其依存的生态环境——这已成为学界和政府机构的共识。

非遗中“文化空间”一类,是“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

空间性和时间性”，本身就是综合的整体。如河南宝丰的“马街书会”就是典型的文化空间，具有曲艺多、规模大的特点。疫情期间，马街书会搬上“云端”，2023、2024年线上线下结合已成为常态；但仅用影像、直播等方式，无法完整展现其规模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融入元宇宙，可以使受众对场景、人物、艺术获得综合的真实感官体验。

此外，早期的整体性保护引进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而旨在“原生态”保护原住民文化、生活的生态博物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关于“文化表演”“游客的凝视”“旅游纪念物兜售”等方面的批评与反思。若将生态博物馆建设融入元宇宙，则能消解上述问题：通过线下的真实博物馆和线上数字孪生的元宇宙场景相衔接，游客可细致、逼真地体验生态博物馆内的民居、文化与生活，甚至可以完成线上购物；线下现实生态博物馆虽保留参观游览功能，但可减少私人领地被陌生游客闯入的情况，游客也能避免商品兜售的打扰。

继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措施之后，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一项重要的非遗保护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河南有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宝丰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区两个。目前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通行做法是将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重点区、边缘区”，这种划分基于文化遗产的集中性与延续状态的优劣，却可能造成保护区内的“文化隔离”；此外，保护区内既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街区等重点保护地点，也有新建的展示馆、传习所等，但这些场所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反而成为离散的“文化孤岛”，这也为研究者所批评。

而元宇宙融入古街区整体保护已经有成功案例，如福州三坊七巷、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等。未来若将元宇宙融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可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各区域、保护街区及村镇的数字孪生场景、建筑与当地的非遗深度融合，并在元宇宙中形成交织的文化线路网络，让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一个整体系统的面貌为受众感受与体验。

（三）元宇宙赋能非遗传承教育

近年来，非遗的传承、传播形成了许多路径，如非遗的展示展览、非遗进校园、非遗在社区、非遗研学等活动，而非遗传承人又有传承、传播的义务，因此其疲于应付、分身乏术。而“元宇宙基于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物联网以及穿戴设备将所有真实世界中存在的非遗物理存在物、传承秩序和规则进行由实向虚的转换，可为非遗传承提供虚拟永续载体和全景式互动场域，用户在非遗元宇宙可自由选择交

互对象、交流方式以及深度参与非遗内容的设计、生产、传播等全过程。”^[23]这种受众自由参与创作的“参与感”是元宇宙发展的动力，也为非遗传承带来新的活力。

此前，由于疫情影响，教育界在线授课、在线会议已经成为常态，而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5G技术等新技术加持下，催生出临场要求。在元宇宙概念提出后，临场要求又升级成为“在场”沉浸式体验。在内容、场景和交互性三个层面，元宇宙为非遗的教育、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

具体的实践中，元宇宙校园在美国，在国内的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都曾举办线上毕业典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立了首个校园元宇宙模型。一些研究者已经将元宇宙应用在民间文学类非遗“沪谚”的传承、教育上^[24]。

河南非遗进高校、中小学、幼儿园，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已经积累多年经验。如信阳师范大学、南阳师范学院、郑州轻工业大学等组建学生社团，并请传承人展演、授课；郑州城市职业学院、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则将自身专业与非遗结合。未来，河南的非遗教育融入元宇宙，将会为非遗的普及教育和传承带来更大的空间与更多的传播频次。

四、元宇宙传承非遗与人的主体性悖论

综上所述，元宇宙在非遗的传播、保护上应用前景广泛，并为非遗传承教育拓展了新的路径。但非遗保护在拥抱数字化技术的同时，也带来科技与人性之间的追问。因为，“媒介科技并不是中立的，每一种新媒体都会将其与身体、感官、时间、空间的新关系强加给社会”^[25]。虚拟与现实结合的元宇宙是否会带来人的身份错位，沉浸式体验是否会产生如沉迷游戏一样的“虚幻感”，非遗虚拟数字人是否可以作为“传承人”的新形态，都值得探讨。AI技术的以假乱真，也要求我们充分保障传承人的肖像权。元宇宙作为一个从科幻文学中诞生的概念，反映了人认识自身、认识世界，并探索人类未来走向的永恒欲望。而我国非遗保护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新技术的应用在丰富非遗传承、传播形态的同时，最终是要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从“游戏”“虚拟现实”回归日常生活本身。

（一）数字化传承与“隐默知识”的悖论

元宇宙应用于非遗传承教育，也并非无懈可击。非遗的数字化传承，在先进技术支撑的基础上，还有一个认知论上的依据，即知识是客观的，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最终表现形式都是非个人化的，或者说是与个人无关的。有研究者指出：“比较而言，传统舞

蹈、武术、音乐和手工艺等类型的非遗更适合开展数字化教育,因为它们大多与程序知识的获得相关(即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某些任务,如舞步),容易通过观察或模仿进行学习”^[26]。其立论基础符合客观主义认知论,即舞蹈、武术、音乐、手工艺等技能、技艺类非遗,可以通过拆解动作、技术要领等,获得每个动作、细节、音符的客观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

而迈克尔·波兰尼从“个人知识”的角度,对客观主义认知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即使科学体系也离不开个人参与,技能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是某种个人化的技能或技艺;知识具有隐性性,认知活动涉及个人的情感和直觉。”^{[27]6-8}他指出:“不仅在知识领域,而且在礼仪、法律和许多不同技艺之领域,人类知道如何使用、遵守、享受它们,或依靠它们来生存,但又不能明确知道它们的内容。”^{[27]76}也就是说,习焉不察的传统习俗、礼仪等都有其知识传递的隐性性,而技艺更是如此。“不能被详细说明的技艺不能通过指导原则而传承,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它只能通过示范方式从师傅传给学徒。”^{[27]23}

就非遗知识、技能的传授来说,宋俊华(2013)从非遗传承方式的角度将其分为口传、身传、心授、综合性非遗等几类。其中,心授类非遗“主要通过人的观念潜移默化地表达或传承,并且口述、身传的非遗创造、表达和传承的过程深受心授非遗的影响”^{[28]60},而综合类非遗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创造、表达和传承的非遗”^{[28]61},如说唱表演、戏剧表演等,自然也不免技艺习得和心理上的潜移默化。这从中也能反映非遗知识传承中的“不可明确说明性”或“隐性性”。

也就是说,非遗作为一种“行家技能”,同样“需要通过观察和模仿,在不知不觉中学会那些技艺的规则,包括那些连师傅都不清楚的规则,因为,行家技能也只能通过示范而不能通过准则来传达”^{[30]64}。犹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神乎其技而不可言传。事实上,在“数字梅兰芳”大师复现项目中已遇到此类问题:“因梅先生演出服装上用的金线,是用金箔缠绕着棉绳制作而成,不能还原;想重现‘穆桂英出征’里的头盔,也无法数字复刻,因民间工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使数字化建模难度进一步加深。”^[29]

如上所述,元宇宙应用于非遗保护,其底层技术逻辑,是获取非遗的知识,模拟非遗产生过程的行为、动作,从而形成3D虚拟形象和场景,这是一种客观、机械的知识。那么,在元宇宙场景中的非遗传承教育,就不能使人体悟、领悟到非遗中蕴含的个人

创造性,或者不能传递非遗中潜移默化、不可明确言说的隐藏规则。因而,便与非遗知识的个人主体性产生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宇宙传承非遗,可以用于抢救濒危非遗,但不能因此而取代传承人地位。

(二)“数字永生”的科技神话

随着“科技+非遗”融合的深入,在元宇宙传播、传承非遗的浪潮中,虚拟数字人无疑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如网红非遗数字人“苏小妹”、以满绣非遗传承人刘思彤女士为原型的孪生数字人、粤剧文化数字人“小勤”等,一批非遗“数字传承人”涌现。

数字人或数字传承人“出圈”,增强了非遗的吸引力和传播范围。“数字人被视为计算机屏幕上类似人类的角色,或具有具体化的类似生命行为的代理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言语、情感、运动、手势以及头部、眼睛或身体其他部位的运动。”^[30]数字人是元宇宙中基础的“生命形态”,可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再现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人物,也是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纽带。如传统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非遗,具有综合性和技艺的复杂性,依赖视频或图片的传播已不能满足受众对其全方位了解的需求。

而借助虚拟数字人来传播非遗,首先,能让非遗传承人获得更加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以新的形态增加吸引力,辅助传承人解决分身乏术的问题;最后,为非遗传承和融入市场带来了新的形式和更多可能。

目前,非遗元宇宙中的虚拟数字人,其理论基础之一是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具身元宇宙”,人们仍需要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和XR(扩展现实)等设备进行人机交互的沉浸式体验,虽然“不论是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只要人类能够产生身心沉浸的体验感,虚拟现实也将成为现实”^{[31]5-7},但是这种真实体验不能离开身体而存在,因而是具身的。

埃隆·马斯克则认为,从脑机接口到技术成熟后的全脑接口,人类可以将意识、记忆等独一无二的东西上传云端或下载到机器中,从而达到“数字永生”,也就是思维、意识可以脱离人类的身体而存在的“离身元宇宙”^{[31]3-5}。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已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设备植入手术;在国内,2023年10月24日,清华大学医学院团队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使截瘫患者实现“脑控喝水”。这些都意味着机器可以与神经系统进行直接的信息交互。从假肢、假牙、心脏起搏器等机械器官,到人

脑与电子设备连接,完成信息交换,再到(可能实现的)所有神经元与AI连接的“全脑接口”,不仅机械器官与人体合二为一,受到意识的控制,而且人的意识、记忆等可以下载到机器,与机器共生。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与元宇宙相融合,或许“数字永生”将不仅仅是一种科技的幻想。

如果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机械姬》或《流浪地球2》中的数字人“图丫丫”都成为现实,那么这些超越了人与动物的区分、人与机器界限的“赛博格”是否还是人类?人类身份和生命本质是否要重新定义?人是否还有主体性?人性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都需要重新思考。而包括非遗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技能、文化是通过教育、习得来传承,还是通过脑机接口直接复刻,都还未可知。

五、结语

当代社会与数字化联系越来越紧密,当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离不开电脑、互联网,手机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移动互联网设备时,无疑,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与数字化媒介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非遗作为传统时期的“生活文化”,要重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与数字化技术结合。非遗数据库的建设、数字博物馆的开发、非遗数字藏品,以及利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公众号等的传播,都是为应对非遗市场接受度不高、受众少、传承困难等问题所做的努力。作为一种新的交往媒介,元宇宙与非遗的融合,更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激活受众对非遗的兴趣和情感,同时,也拓宽非遗的传播范围和传承路径。图像3.0时代,人们“在线”通过二维屏幕接收录音、录像、视频、图像,而元宇宙则是三维立体虚拟空间。原本,我们通过身体的机能和感官去感受世界,而元宇宙通过人机交互、虚拟真实等技术,解决了非遗传播中身体“不在场”但可以感官真实在场的问题。然而,就当前的“具身元宇宙”来看,即使感官真实,也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毕竟,通过知觉实际被给予并能被经验到的“生活世界”才是人作为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且,“个人知识”的相关研究也说明,传统技艺、知识的某些不可明确言说的隐性,使其需要依靠师傅传授徒弟的亲身示范方式,即使今后技术更加先进,科技也应当“以人为本”,元宇宙中的数字传承人须以现实社会中的传承人为原型,更不能完全取代传承人的传承主体地位。因而,元宇宙语境下河南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仍需关注人的主体地位,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传承人、社区居民的作用。尽管元宇宙技术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可

能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数据安全问题、传承人的隐私保护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其中知识产权问题关系非遗作品的原创性和所有权。因此,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合法性与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林登实验室前信息管理最高负责人,元宇宙游戏“Second Life”的技术官。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 (2022-05-22) [2025-03-23].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 [2] 刘玉堂,姜雨薇.虚实互嵌与伪仪式化:赛博空间Vlog的生成逻辑与反思[J].理论月刊,2021(1):89-90.
- [3] 汪安民.文化研究关键词[M].修订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317.
- [4] 成生辉.元宇宙:概念、技术及生态[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3.
- [5] 付茜茜.“元宇宙”:赛博空间的技术趋势与文化症候[J].学习与实践,2022(4):132-133.
- [6] 师晓娟,孔少华.“元宇宙”发展逻辑及其对数字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66-67.
- [7] 王建民.元宇宙: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J].天津社会科学,2023(2):103.
- [8] 李洪晨,马捷.沉浸理论视角下元宇宙图书馆“人、场、物”重构研究[J].情报科学,2022(1):10.
- [9] 李伟,卫子昊.从“缺场共在”到“虚实共生”:元宇宙时代身体—技术的关系变迁[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8):53.
- [10] 曹克亮.元宇宙.新数字劳动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及其伦理审视[J].江汉论坛,2022(10):46-47.
- [11] 肖珺.元宇宙:虚实融合的传播生态探索[J].人民论坛,2022(7):41.
- [12] 尼克·库尔德利,安德烈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刘洪育,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50.
- [13] 余洁,易露.元宇宙赋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虚实交互创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3(5):130-131.
- [14] 罗梓超,张婧,吴晨生,等.韩国元宇宙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9):22.
- [15] 河南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EB/OL].(2022-09-21)[2025-03-25].<http://m.henan.gov.cn/2022/09-21/2610742.html>.
- [16] 张柏林.元宇宙赋能文旅产业的理论基础、实践前景与发展策略[J].河南社会科学,2022,30(11):118.

- [17] W·J·T·米切尔. 元图像: 图像及其理论话语[M]. 唐宏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25-27.
- [18] 秦华. 河南非遗热搜榜发布[EB/OL]. (2023-07-03) [2025-04-23]. <https://hct.henan.gov.cn/2023/07-03/2771622.html>.
- [19] 黄河博物馆数字化提升[EB/OL]. (2022-02-14) [2024-04-28]. <https://hct.henan.gov.cn/2022/02-14/2397559.html>.
- [20] 林加. 传播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创新发展路径[J]. 中国编辑, 2023(5): 100-101.
- [21] 唐宏峰. 图像学3.0: 20世纪图像理论的三个阶段[J]. 美术, 2022(9): 11.
- [22] 温小娟. “河南非遗一张图”获评2023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EB/OL]. (2023-10-13) [2025-04-23]. <https://hct.henan.gov.cn/2023/10-13/2830072.html>.
- [23] 刘中华, 焦基鹏. 元宇宙赋能数字非遗的场域架构、关键技术与伦理反思[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3(1): 22.
- [24] 鲁力立, 陆怡婕, 许鑫. 寓教于乐: 元宇宙视角下口头文学类非遗的科普VR设计[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2): 143-145.
- [25] 费·金斯伯格, 里拉·阿布—卢赫德, 布莱恩·拉金. 媒体世界: 人类学的新领域[M]. 丁惠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8.
- [26] 赵跃, 吴晓梅, 朵婷, 等. 拥抱文化数字化战略: 非遗数字化实践回顾与前瞻[J]. 图书馆建设, 2023(6): 86.
- [27] 迈克尔·波兰尼. 个人知识: 朝向后批判哲学[M]. 徐陶, 许泽民,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28] 宋俊华, 王开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 [29] 原海博, 郑丽敏. 数字媒体视域下京剧与科技跨媒介融合: 以数字梅兰芳构建为例[J]. 中国京剧, 2023(3): 105.
- [30] 李伟, 林彦虎, 华梦莲. 如何使数字人类更具可持续性: 一种伦理学的分析视角[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3, 45(10): 100.
- [31] 苏佳佳, 叶浩生. 元宇宙与具“身”认知[J]. 心理研究, 2023, 16(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From “Cyberspace” to “Metaverse”: An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Digital Protection Path of He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U Pengyu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1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 has become a growing trend, with “technology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emerging as a prominent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virtual reality and big data has led to the evolution of cyberspace—a virtual digital world—into the metaverse where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coexist. Stand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gital wave, Henan Province has actively laid out the metaverse industry, and the data resources based on the Image 3.0 era have been integrate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the metaverse in the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CH,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of ICH, and ICH inheritance education. Moreover, technology is often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paradox of data-driven inheritance and “pers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ethical issues that “digital humans” may bring, all need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taverse, the digital protection of ICH in Henan still needs to focus o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eople, avoiding over-reliance on technology which may lead to the neglecting of the roles of inheritor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Key words: intangible heritage digitization; metaverse; personal knowledge; digital human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 融合发展研究

张彩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创新的作用。新时期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要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其产业发展潜力和价值,因地制宜地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必须有政策支持与社会资本投入,解决资源整合、人才匮乏和资金短缺等现实问题。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不但能够挖掘乡村经济发展潜能,而且能够传承与创新乡村文化,实现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6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35-05

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传统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城乡、区域发展也正在向一体化方向迈进。在此大背景下,以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并获得巨大发展和广阔市场空间。

一、经济发展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

(一)经济转型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发展阶段,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带来了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大好机遇。在传统制造业与重工业产能过剩以及国家重视环保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其中,乡村旅游作为一种集文化、生态和休闲为一体的独特旅游形式,不断满足现代人对自然、健康以及文化认同的旅游需求,成为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文化创意产业随之兴起。在信息技术、数字媒体、创新设计的引领下,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开拓新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文化

创意产业不仅可以有效增加产业附加价值,而且可以在解决就业、拉动消费、改善城市人文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需求与社会变化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推动人口、资源、资本等要素有序流动。而乡村旅游及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向往乡村自然环境与传统乡村文化,从而推动了乡村旅游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兴起为乡村创造了文化复兴与升级的可能。传统乡村文化可以通过文化创意设计和技术加以复兴和打造,转化为旅游的特色文化产品和服务,吸引众多旅游消费者和投资者。

(三)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的互动与融合

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主要意义,在于既能促进乡村经济振兴,又能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文化创意产业能够丰富乡村旅游的文化体验、增加文化创意产品的供给等,从而提高游客对乡

收稿日期:2025-05-15

作者简介:张彩虹(1981—),女,河南孟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乡村旅游的文化体验感和旅游满意度;而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和创作灵感,两者相互推动、相互支持,形成“1+1>2”的发展格局。

在全球化经济和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推动乡村经济建设,通过创新思维加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原动力。

二、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城乡结构性变化下的新形态,深刻影响着农村建设,也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逐渐成为推动国家经济转型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型城镇化使乡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其中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无疑对乡村旅游起到了促进作用,进一步奠定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迁移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部分城镇居民也重新选择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去乡下消费并寻求相应休闲体验。

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乡村地区的资源环境面临压力,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都需要加强保护。一些乡村过度依赖农业发展,未发展其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因此乡村振兴建设不能仅依靠基础设施推进,而需要发展创新性产业,例如将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以此激发乡村内部发展动力。

(二)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旅游已逐渐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国家各项利好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乡村凭借其特有的自然风光、历史风貌、民俗文化等,开发出各式各样的旅游项目,吸引众多游客。这些项目为游客提供了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的独特体验,同时带动周边农业、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

但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乡村旅游产业同质化严重。一些乡村旅游在内容和服务方面缺乏创新,导致乡村旅游特色不突出,难以吸引和留住游客,回头客较少。其二,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过度商业化,在发展旅游市场时未将生态保护置于重要位置,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损害。其三,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服务质量与旅游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游客满意度较低。其四,一些

乡村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尤其是在深度贫困地区,道路、住宿、医疗等设施较为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广大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1]。

(三)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分析

在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旅游消费需求多元化、旅游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传统的乡村旅游已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将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有效结合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旅游的特色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性相互融合,能为旅游者提供更为丰富与个性化的旅游体验,提升乡村旅游的价值。

其一,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有助于乡村旅游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乡村旅游可以通过艺术设计、文化创意设计等方式,将乡村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创意理念,在发展过程中推出具有艺术创意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或乡村旅游特色活动,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猎奇、求新和求异需求。

其二,文化创意产业的引入有助于拓宽乡村旅游空间,打破乡村旅游的空间局限。文化创意产业涵盖手作、设计、演艺、数字创意等领域,这些产业可以与乡村的自然风景、民俗文化相结合,开发更多旅游产品。比如,通过创意设计改造乡村农产品,打造乡村品牌,吸引更多消费群体。此外,文化创意产业还可以推动乡村旅游从“看风景”向“赏文化”的“文化体验”模式转换,丰富游客体验。

其三,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对实现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融合,乡村不仅能够经济上获得更多收益,还能在文化上实现推陈出新。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帮助乡村摆脱传统单一产业的束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市场,解决居民收入问题。

三、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与路径选择

(一)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

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和发展的方向,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要手段。

1. 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创新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相互融合的基础在于文化,而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是融合的核心内容。乡村的历史遗存、传统民俗、地方艺术以及自然景观,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的源泉。在融合过程中,要对文化资源进行科学梳理和有效整合,深度挖掘文化内涵,然后借助现代化设计、艺术、科技等手段,对文

化资源进行创意转化,使其既具备吸引现代游客的游玩功能,又具备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效果^[2]。

例如,乡村传统手工艺可通过与现代设计、工艺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契合现代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对乡村民俗节庆进行文化创意策划与组织,能够丰富活动形式,增强观赏性与参与感,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感。

2. 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

首先,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能推动文化产品创新,还能够促进产业链的发展与整合。这一融合要求乡村旅游各个产业环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领域紧密衔接,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体系,涵盖旅游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生产、文化体验场景打造、文化创意活动组织等多个环节。通过完善产业供应链,将单一的乡村旅游经济转型为集创意、文化、服务于一体,且文化内涵丰富的综合性产业,提升产业附加值。

其次,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通过跨行业、跨部门合作,构建一体化经济区域,既能推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又能激活文化产业活力。例如,在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可引入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等多元主体参与创意设计与项目运营,实现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双向赋能。

3. 市场定位与品牌打造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需精准定位目标市场,塑造特色鲜明的乡村品牌。当前,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日趋多元化,不同游客对旅游体验的需求差异显著。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入,能够针对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差异化产品,如为追求文化体验的游客打造地域文化主题文化创意工坊,为偏好自然艺术的游客设计沉浸式艺术体验项目。

品牌塑造是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成功的关键。发展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需将乡村特色文化与现代市场需求有机结合,打造鲜明的品牌形象,提升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应注重营造整体文化氛围,并通过线上线下整合营销,扩大乡村品牌影响力。

(二)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两者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各地需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选择融合路径,全面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1. 开发特色文化旅游项目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项目,是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提升旅游价值的核心举措。可将传统节庆与现代创意相结合,融入当代文化元素,打造主题鲜明的节庆旅游活动,如民俗音乐节、非遗绘画展等,以创新形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旅游业发展。同时,对乡村传统节庆、民俗体验、文化展演等进行文化创意再造,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提升其文化与经济价值。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吸引民间资本和企业参与。依托本土文化、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构建特色文化旅游模式,开发契合消费者需求的文旅产品^[3]。

2. 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与乡村旅游融合的示范区

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与乡村旅游融合示范区,能够促进产业集聚与跨界协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创意资源汇聚地和经济转型引擎,可在乡村落地生根,吸引创意人才与企业入驻,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对接。

在此模式下,示范区可开展创意设计、手工艺品制作等体验活动,并设立文化创意产品展销平台,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园区内的艺术工坊、创意实验室、文化体验区等功能区,与乡村旅游核心项目形成互补,共同打造兼具参与性、趣味性与文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3. 推进“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跨界合作

推进“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跨界合作,可通过多元形式实现产业融合。将乡村旅游与电影、音乐、摄影等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开发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与艺术团体、影视公司、设计师等合作,打造多感官沉浸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既能满足游客娱乐需求,又能提升乡村文化品位与创新活力。

在这一模式中,文化创意产业凭借资源与技术优势,为乡村旅游注入新动能。例如,通过影视拍摄、艺术创作、设计赛事等活动,既能扩大乡村知名度,又能反哺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4]。

(三) 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政府作用

1. 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围绕乡村振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标,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引导乡村旅游提质增效,鼓励文化创意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优秀文化资源挖掘与活化利用。同时,通过强化乡土

文化资源保护力度,进一步深化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增强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资金扶持是推动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关键引擎。国家与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发放低息贷款等金融手段,破解乡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资金瓶颈,支持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创新项目落地。这些政策不仅为产业融合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还引导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经济转型。

2. 政府协调与平台建设

政府在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中承担着核心协调职能。由于融合项目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文化创意企业、旅游企业、投资人及农民等,因此需要政府统筹协调资源,化解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确保资源高效配置。

具体而言,政府可通过搭建跨部门、跨行业协作平台,推动主体间的深度合作。例如,组织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交流大会、展会活动,促进企业资源共享;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组建产业联盟,鼓励企业联合投资,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

(四) 社会资本与民间力量的参与

1. 社会资本的投资与资源配置

社会资本的注入为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撑。随着我国社会资本市场的日益活跃,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投资展现出浓厚兴趣。在产业融合进程中,社会资本不仅能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启动资金,助力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还能支持旅游项目开发、文化产品升级。

例如,企业可通过设立文化创意基金、文旅产业基金等方式,定向扶持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创新项目。这种市场化投资模式不仅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还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推动乡村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民间力量的创新与推动

民间力量凭借创新思维、灵活的市场运作能力,成为产业融合的重要驱动力。企业、个体创业者、艺术家、设计师等群体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精准把握消费需求,高效整合资源,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例如,民间艺术家和设计师可将乡村自然资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开发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企业则可在细分市场中探索创新模式,如打造“乡村民宿+文化体验”的复合业态,开发差异化乡村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四、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实践挑战与对策

(一) 资源整合与产业链延伸的困境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整合、产业链延伸的巨大阻碍。首先,乡村地区普遍存在资源碎片化、小散弱的现象,存在不同的乡村资源、文化资源整合难题。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旅游资源、自然资源、产业资源等无法有效整合,使得一些地方尽管资源丰富,但产业链并不完善。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必须冲破资源整合的障碍。比如,传统型文化项目未必与现在的旅游需求一致,文化创意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有时缺乏专业化的市场调研和技术支撑,使得文化创意产业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其次,产业链延伸是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深度融合面临的困难之一。很多乡村虽然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丰富,但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很多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创意元素、生产环节与旅游业相关性不强,在乡村旅游产业链条上存在断链现象。比如很多乡村的手工艺品、特产食品等文化创意产品不成规模、不能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广大游客越来越高的个性化和高品质需求。文化创意产业延伸还需要更多高精尖人才与先进技术,这些都是乡村地区的稀缺资源。因此,克服资源整合与产业链延伸的困难,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同建设完善的协同合作机制。

(二) 人才短缺与技能提升问题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存在着人才短缺和技能不足问题。乡村长期依靠农业经济发展,缺少相应文化创意人才及高技能产业工人,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文化创意及设计离不开高素质人才,乡村地区本身就不具备对应的设计师、艺术家、营销人员等来支撑文化创意产业,这不仅延缓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脚步,更使乡村旅游项目难以从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助力。

此外,现有农村从业人员的技能短板,尤其是乡村旅游服务技能以及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方面的能力不足限制了农村产业的发展。乡村旅游的旅游特色即为文化创意,需要旅游服务者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强化乡村在创意设计、文化产业运营与管理、旅游运营与服务等方面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比如,可以通过与高校、职业培训机构的互动合作,提供针对乡村产业需求的培训体系,提

升乡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文化创意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人才引进,以政策扶持、环境创新吸引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人才移居乡村落户兴业,缓解乡村的人才稀缺问题。

(三) 融合发展中的资金瓶颈与融资困境

资金短缺是制约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核心难题。产业融合需大量资金投入,涵盖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及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然而,多数乡村经济基础薄弱、融资渠道单一,导致优质文化创意项目因缺乏资金支持难以落地。

在传统融资模式下,乡村企业和文化创意项目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融资难度大的问题;加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较高,银行及传统金融机构参与意愿较低。因此,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成为破局关键:政府可牵头设立乡村融资专项基金,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同时,探索风险投资、股权融资等多元化资本注入方式,缓解产业发展的资金压力。

(四) 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与平衡

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源于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资源,但部分地区因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破坏问题凸显:水源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受损等现象频发,不仅威胁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更动摇了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根基。

实现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需从以下方面发力:其一,强化制度保障。政府及相关部门

应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法规,将环保标准纳入项目规划与实施全过程,最大限度降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其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乡村旅游项目规划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推广低碳、循环的绿色旅游模式,推动乡村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

五、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浪潮中,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经济、文化、生态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当前面临资源整合难、人才短缺、资金匮乏等挑战,但通过政策引导、产业链创新、社会资本参与及生态保护强化,融合发展前景广阔。未来,需进一步探索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合力,释放乡村发展潜力,实现经济效益、文化价值与生态保护的共赢,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方晓晴, 骆梦影. IP 文化创意对乡村旅游韧性的贡献:以桂林传统村落为例[J]. 热带农业工程, 2024, 48(5): 121-124.
- [2] 程宇. 新常态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实现路径[J]. 产业创新研究, 2024(18): 62-64.
- [3] 赵晓燕. 乡村振兴背景下吕梁传统手工艺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N]. 大河美术报, 2024-09-20(17).
- [4] 魏嘉航, 李雨桐.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案例剖析:以临沂市富泉村为例[J]. 中国市场, 2024(26): 64-6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ZHANG Cai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lays a dual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ng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identifie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longside challenges in this new phase and proposes context-specific integration strategies to unlock industrial potential.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policy support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to address critical issues including resource fragmentation, talent shortages, and funding gaps. Ultimately, such integration not only activates rural economic potential but also revitalizes cultural heritage,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culture.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前景展望

武 蕴

(郑州师范学院 审计处,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已成为关注焦点。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已实现从操作层到战略层的全方位渗透,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为整个经济管理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人工智能将在经济管理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会带来企业经济管理的精细化与高效化,更是推动企业持续创新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人工智能;经济管理;信息化;智能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7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40-05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现代企业为突破管理效能瓶颈、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亟须部署创新技术解决方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依托其算法优势与实践价值,正深度重构企业信息化管理与智能化运营体系。在经济管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强化数据清洗、建模及核算的精准度,结合机器学习驱动的预测性分析,为企业决策层提供兼具科学性与时效性的战略洞见。这不仅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目标达成率,更在动态市场环境中构建起可持续的竞争壁垒。对于具有战略前瞻性的现代企业而言,系统性整合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优化治理架构、实现全价值链升级的必然选择。

一、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融合的意义

人工智能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人类智能,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领域,经济管理专注于资源优化与组织效能,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二者结合意义重大^[1]。

(一)提升管理效率

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者常面临多源异构数据资产的整合困境,部门模块生成的非结构化数据往往呈现碎片化分布特征。人工智能在企业

管理中的基本应用是利用计算机替代人工完成部分量大、复杂且重复的工作,其能够通过构建特征工程框架与知识图谱映射机制,实现对多元数据的自动化处理,并导出可视化的数据报表,进而使管理者更好地掌控企业各部门发展状况,对运营战略进行实时调整。另外,人工智能在企业管理中能够有效调控整体资源,帮助企业管理者完成从采购的供应链端到市场销售的客户端的实时监测,从而实现整体的资源溯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为经济管理带来了颠覆性变革,智能化系统的高效运作使得机器能够胜任重复性、规律性的任务,实现管理效率的质的飞跃^[2]。

(二)提高决策质量

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中凸显出其卓越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为决策提供了更为精准、科学的支撑。其能够收集并处理大量的数据,从中学习并提取有用的特征和模式,深度学习算法能够自动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有用的特征,无需人工提取,这使得人工智能在处理大规模、高维度的数据时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到数据中的复杂关系和模式,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人工智能系统会不断地调整其算法和参

收稿日期:2025-03-06

作者简介:武蕴(1971—),女,山东曹县人,硕士,郑州师范学院审计处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数,以最小化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通过不断地优化和迭代,能够逐渐提高其决策能力。传统的数据分析方式在数据收集完毕后才能进行分析,无法满足实时性的需求,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就能够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和趋势变化,为决策提供及时的支持。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标志着决策层面的重大进步,为企业带来了更加稳健、富有远见的发展路径。

(三)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经济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人工智能凭借其卓越的数据处理与精准决策能力,已成为企业洞察市场动态、捕捉商机的得力助手。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深度融合,增强了企业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为其把握市场节奏、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3]。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企业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优化决策和提升竞争力。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应用,企业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不断创新和进化。另外,人工智能促进了不同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机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行业将面临变革,新兴产业将不断涌现。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二、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分析

(一) 金融管理

金融领域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融合的核心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当前,投资者已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准确地预测金融市场动态,制定更为高效稳健的投资策略。人工智能在处理庞大金融数据方面的卓越表现,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强大的风险控制和信用评估支持^[4]。这些智能化应用不仅提升了金融行业的运营效率,还为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智慧金融产品的兴起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这些产品整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精准营销、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智能化升级。这种技术赋能使金融机构能够以较低的实施成本,将大模型技术贯穿前中后台全业务流程,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系。由此可见,金融领域正站在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深度融合的前沿,引领着行业的发展方向。

(二) 生产管理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企业生产管理范式,其

应用已从辅助工具演进为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在生产设备管理维度,基于物联网传感器和机器学习算法的预测性维护系统,大幅提高预测设备故障的准确率。在运营调度方面,智能优化算法实现了生产计划的动态调整,提高了资源利用率、缩短了订单交付周期。另外,结合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技术,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工艺参数,降低产品缺陷率。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并积极将其融入实际生产环节,人工智能正助力企业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巩固市场地位。

(三) 供应链管理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构供应链管理的传统范式,其应用已从局部优化扩展到端到端的智能化转型。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人工智能在库存管理和货物配送等环节展现出强大的优化能力,使企业能够更准确地掌握供应链信息,做出更明智的决策^[5]。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需求预测模型,结合历史的销售数据、市场发展趋势以及消费者行为等多源信息,可大幅提高预测准确率和库存周转率。基于智能路径规划算法,通过实时交通数据与运力资源的动态匹配,可大幅提高配送效率和降低运输成本。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仓储系统实现了革命性突破:融合计算机视觉与机器人技术,分拣准确率达到 99.9%,操作效率提升 3~4 倍。以京东物流的“亚洲一号”智能仓库为例,其日处理订单能力达百万级,人力成本降低 60%^[6]。这种技术赋能不仅优化了传统作业模式,更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了供应链的可视化与可预测性。这一趋势不仅揭示了人工智能在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巨大潜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提升与成本降低。

(四) 数据分析

在经济管理领域,数据分析已从辅助工具演进为核心战略资产,成为驱动企业决策的数字中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数据解析范式正经历革命性重构,为现代组织构建起多维动态认知系统。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中主要体现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彻底改变了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传统模式,无论是销售数据、消费记录,还是市场趋势,人工智能都能以高效、准确的方式进行处理和分析,这种深度数据分析为企业与组织提供了全面的市场洞察,不仅有助于企业了解自身运营状况,更能敏锐捕捉市场的细微变化,为制定精确的市场策略提供有力依据。此外,人工智能的预测分析能力同样令人瞩目,通过

对历史数据的深入学习以及对趋势的精准把握,人工智能可以为企业揭示未来的市场走向和客户需求,前瞻性的分析能力可使企业预见未来,及时调整战略,以最佳状态应对市场挑战。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领域的应用提升了分析的效率与准确性,更为企业与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市场洞察与预测能力,为经济管理领域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新动力,推动企业与组织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不断前行。

(五) 自动化

自动化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重要实践领域,正驱动全球经济管理模式发生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机械化向智能化演进的自动化进程,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呈现出指数级发展态势,其核心价值已从单纯替代人力劳动,升级为重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工具。自动化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和提高产品质量,为企业和组织带来了流程优化、成本降低及效率质量双提升的显著效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入,自动化在仓储、物流、生产等多个环节都展现出了革命性的潜力。在物流管理领域,人工智能的引入颠覆了传统模式。智能化的物流系统实现了对物流动态的实时追踪,并能通过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预测未来的需求变化。这种前瞻性的管理方式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显著提升了物流的响应速度和服务准确性,为客户带来更为卓越的服务体验。在自动化生产领域,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生产线,企业和组织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监控与管理,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使企业能够更加敏捷地应对市场变化,快速调整生产策略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这场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动化革命,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素。

(六) 智能决策

经济管理的决策环节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为企业和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与利润。明智的决策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而人工智能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和自动化决策等能力改进了决策流程,优化了业务运作,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人工智能可以实时分析数据并做出决策,使决策过程更快速灵活,还能够预测潜在的风险并提供预防措施,帮助企业规避潜在的风险。人工智能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为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能够深入挖掘数据中的隐藏规律和趋势,揭示出传统方法难以发现的信息,使得企业与组织能够基于更全面、更准确的数据做出决策,避免盲目性与主

观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人工智能在风险管理与预警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实时分析与监控,人工智能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和异常情况,这种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方式使得企业和组织能够在风险发生之前就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有效降低风险并避免损失,为企业和组织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得到相关决策后,还需要相关的专家团进行辅助决策。并且项目每进入到一个环节,就会产生相应的反馈,然后再由系统作辅助修正,直至项目基本达到完美预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企业决策将趋于灵活化、快速化和智能化。技术赋能的核心在于“增强人类智慧”而非完全替代,保持人机决策的动态平衡将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关键竞争力。

(七) 营销管理

营销管理对于企业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技术已逐渐渗透到营销管理的各个方面,成为企业优化市场洞察、精确策划和高效执行的关键工具。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企业能够深入挖掘和分析庞大的用户数据,揭示出消费者行为模式、偏好趋势等宝贵信息。人工智能可以显著提高市场营销的效率。传统营销过程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资源,而借助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工具,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更快速地处理数据、生成报告和执行任务。例如,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告投放系统可以自动优化预算分配,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投放最相关的广告内容,从而确保广告资源获得最大化利用效果。在预测分析方面,人工智能能够识别潜在的市场模式和趋势,助力企业做出更精准的决策。这种技术应用不仅增强了企业对市场动态的敏锐度,更使营销策略的制定与执行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赢得战略先机提供了强大支持。将人工智能与营销管理深度融合,已成为现代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这种融合不仅体现了科技与商业的完美结合,更彰显了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追求卓越的决心与智慧。

(八) 客户服务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客户服务领域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企业而言,部署人工智能客服系统不仅能显著提升工作效率,还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通过自动化处理订单状态查询、常见问题解答等重复性任务,企业既释放了人力资源以专注于复杂问

题解决,又减少了人为失误带来的损失。另外,人工智能支持的多语言服务能力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关键支持。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服务质量和响应速度的核心技术驱动力。通过部署网上聊天机器人和语音识别技术等手段打造的智能客服系统能够实现7×24小时精准服务,大幅提高客户问题解决率。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引擎,能让用户获得量身定制的信息和服务,通过个性化服务加深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联系。通过收集和分析客户行为数据,企业能够准确识别潜在买家的兴趣点,并据此推送相关产品或促销活动。众多企业纷纷将人工智能纳入客户服务体系,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服务创新,既体现了企业对市场趋势的前瞻把握,也彰显了其通过卓越服务构建客户忠诚度的战略决心。

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前景

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前景具体表现为未来突破点众多,这些突破点不仅源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还源于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

(一)技术层面的突破

自主代理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即能够自主执行任务、做出决策并与环境互动的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自主代理可以全天候连续工作,不会感到疲劳,确保不间断的支持和监控。其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适用于时间敏感的环境。单个代理可同时处理数千个请求,提高业务流程效率。性能始终如一,不会因疲劳或注意力不集中而影响决策质量。能够适应个人用户的需求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随着技术不断地创新,自主代理人工智能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代理将具备更高的记忆能力、推理能力和多模态交互能力,能够处理更复杂的任务。

多模态学习与跨领域融合:多模态学习与跨领域融合是两个密切相关且日益重要的概念,它们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多个应用领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多模态学习是一种利用来自不同感官或交互方式的数据进行学习的方法。这些数据模态可能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学习通过融合多种数据模态来训练模型,从而提高模型的感知与理解能力,实现跨模态的信息交互与融合。跨领域融合是指在不同领域之间自动地传输和融合知识的技术。跨领域融合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机器学习和

数据挖掘算法在新领域中的性能,从而提高算法的泛化能力和可扩展性。多模态学习与跨领域融合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的发展。未来,多模态学习将进一步深化对多种数据模态的理解和融合能力,为跨领域融合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和技术支持。同时,跨领域融合也将推动不同领域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创新合作,促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产业的升级发展。

边缘计算与实时数据分析:边缘计算是一种分布式计算范式,它将计算资源和数据存储放置在接近数据产生地点的边缘设备上,而不是集中在远程的中心数据中心。边缘计算的核心理念是在尽可能靠近数据源的位置执行计算任务,以减少网络传输时间和成本,同时提高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和安全性。实时数据分析是指对数据流进行即时处理和分析,以快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洞察。在许多应用场景中,如自动驾驶、工业制造、智能交通等,实时数据分析至关重要。它能够帮助系统快速响应环境变化,优化决策过程,提高整体效率和安全性。在经济管理中,实时数据分析在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优化决策等方面至关重要。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边缘计算在实时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未来,边缘计算将与更多技术融合,如5G、云计算、区块链等,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二)应用层面的突破

智能制造与生产力革命:智能制造是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结果,它通过应用传感技术、网络通信、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先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智能化和互联化。智能制造提升了制造企业的灵活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且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个性化需求。智能制造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正引领着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力革命。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质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智能制造正在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面貌及发展趋势。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智能制造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个性化服务与精准营销:个性化服务是根据客户的个人特征、需求和行为习惯,针对性地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和产品。这种服务方式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力求为客户预置多种备选方案,让顾客依照自己的个性需求自由选择。精准营销是通过深入了解和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兴趣和行为,利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和数据分析方法,对目标受众进行精准定位和个性化传播的营销方式。其核心在于将广告和信息传递给真正感兴趣的消费者,提高传播效果和转化率。个性化服务与精准营销相辅相成,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精准的营销信息,以提升客户体验、增强品牌竞争力、推动业务增长。

风险管理与智能决策: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智能决策系统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的市场数据、企业运营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识别出潜在的风险因素。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智能决策系统可以对风险进行量化评估,确定风险的大小和可能性。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智能决策系统可以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如调整投资策略、优化资源配置等,来降低风险的影响。在风险应对的过程中,智能决策系统可以对风险管理效果进行持续监控和评估,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人工智能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识别潜在的欺诈行为、评估信用风险等,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安全性。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为经济管理提供更智能的决策支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已实现从数据采集到战略决策的全链条渗透。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与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深度整合,企业可构建实时市场响应机制,进而为企业创造显著的竞争优势。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未来众多突破

点的实现,人工智能将在产业优化、可持续发展、医疗健康等维度催生更多突破性应用场景。人工智能的创新,不仅可以为企业创造巨大价值,还将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因此,积极探索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提升行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这不仅关乎企业个体的数字化转型,更是推动整个经济系统向智能化、可持续方向演进的关键驱动力。

参考文献:

- [1]刘江帅,周翔宇,王曙杰.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在网络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电子世界,2019(23):77-78.
- [2]叶茹.人工智能在高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路径研究[J].财会学习,2022(18):38-40.
- [3]张呈宇.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在网络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8(10):130-131,134.
- [4]谢志勇,周翔.基于机器学习的医学影像分析在药物研发和精准医疗方面的应用[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9,39(02):90-100.
- [5]刘祖仁,傅广,杨波等.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2025(01):161-172.
- [6]朱国军,汤娜,郑鸿浩.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先企业牵引实现数字化价值涌现机制研究:华为与京东双案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5.
- [7]蒋俊辉,王瑞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管理科学与工程,2019,13(1):68-7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Management

WU Yun

(Board of Audit,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economic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key focus.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management has achieved all-round penetration from the operational level to the strategic level, which not only helps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economic management field. In the futur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AI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t will not only bring about the refinement and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but also serve as a key driver for promoting sustained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nomic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intelligentization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逻辑、知识建构与实践转换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心的分析

陈华森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政治发展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其积极效能。在国内外社会政治背景下,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优化和体系建构、世界民族政治的风险规避,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世界民族政治风险、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知识建构提供了根本保障、政治支持、反面例证、社会基础。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度融合,与民族发展政策紧密衔接,与民族政治过程有效互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实践转化,有利于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生成逻辑;知识建构;实践转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8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45-10

民族与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民族区域和国家领导的关系既是一个社会性的民族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性的民主问题。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政治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再到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宪法》保障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和义务进行具体规范^[1]。

1947年设立内蒙古自治区至今,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制度和政策基础的中国特色民族政治走过了近80年的发展历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统一的自治模式。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天下统一”“因俗而治”“和而不同”的传统政治智慧^[2]。然而,近些年的国内外民族政治实践表明,自治区域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自治

民族”与“非自治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受到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及时创新我国民族政治话语,有助于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话语“是人们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用来建构思想、建构事实、建构形象的理论工具”^[3]。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和实践具有理论指引和实践导向作用,因此,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4]。

从发展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开端于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形塑于秦汉以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觉醒于各族同胞共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5]。在概念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的超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话语,存在民族团结、国族建构、共同体建设三种话语趋向^[6]。从建构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

收稿日期:2025-05-09

基金项目:2024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重点课题“政治空间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贵州实践研究”(24GZZD43)

作者简介:陈华森(1970—),男,江西丰城人,政治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政治文化。

体话语具有三个维度的隐喻机制:话语、语义和符号^[7]。抗战时期以《新中华报》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从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角度成功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8],《生活日报》等香港进步报刊的友敌想象、编读实践与统战宣传,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多维立体空间^[9]。本文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视角,从生成逻辑、知识建构、实践转换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是在“中华”“中华民族”等话语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经过理论和实践探索生成的话语。这既是一个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自发生成过程,也是一个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政治建构过程,其基本的制度平台就是民族区域自治。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的制度逻辑

在政治话语语境中,“自治”一般意为某一(些)民族、团体、地区等在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管辖之外,对本民族、团体、地区的内部事务行使一定的自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语境下,少数民族在其所属区域进行自治,其地方法规不得超越上位法和国家宪法、法律。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治国文化。例如《史记·陈涉世家》言: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汉书·南粤传》道: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新唐书·北狄传·黑水靺鞨》说: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宋李纲的《上道君太上皇帝》有:杜牧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战为最下策者,诚为知言。

然而,“自治”本身却有摆脱过度管制并张扬消极自由之观念内涵和实践诉求。这一偏向具有潜在的政治风险。消极自由关注的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伯林认为这种自由是人的本性使然,是“免于……”的自由,“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中”^{[10]189,200,191-192}。个体和群体自由领域的保障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但消极自由彰显“自由是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群体的或社会的自由,即便有

社会自由,也根据和尊重个人自由才能得到合理解释。”^[11]在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这种自由观可能导致过分强调排他性的本民族权利,并进而导致忽视甚至侵犯其他民族的基本权利。有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制度设计就表现出上述消极自由的排他性倾向。“个别地方出台的自治条例过分强调自治民族权益保障,忽视民族自治地方‘多民族构成’的基本事实”,这对“促进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内部存在的‘多民族构成’这一基本事实是不协调的”^[12]。

根据宪法,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13]。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可以建立以一个或者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自治地方。”^[1]根据这些规定,自治地方自治主体的自治权归属于“区域”,不能排除生活在该区域的其他民族的自治权,还明确地包含其他民族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法“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旨在防范排他性的民族政治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共同体”关系。

不过,宪法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强调,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按照地方名称、民族名称、行政地位的顺序”设计民族自治地方名称的规定,可能使“自治民族”具有“排他性”的身份,甚至被赋予了“排他性”权利。照此逻辑,某个或某几个民族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其他的民族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就可能被认为顺理成章。另外,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对突出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权利,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利这种消极自由的排他性与各民族“平等”的要求之间于是形成张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与前文所规定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13]是不自治的。因为前文落脚在“地方”和“区域自治”,虽然说明了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但没有排除该地方聚居和散居的其他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而后文落脚在“民族”,且限定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从而为排除该地聚居和散居的其他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预留了可能。但是,这同一条

款中的“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又跟“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是相冲突的,因为该条文同时赋予了该地方聚居和散居的其他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优化,需要借助民族政治话语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成也就具有了自然的制度逻辑。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体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的实践逻辑

由于制度设计而导致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在自治权利中体现的消极自由的排他性倾向,在民族政治体系建构实践中也有体现。例如,某省3个自治州的自治条例中,明确说明3个州是“XX省东南部A族、B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是“XX省南部地区C族、A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是“XX省西南地区C族、A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该省11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中,有6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同样也说明:该县“是A族(或A族、B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在该6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中,有3个自治县的条例同时说明:“除A族(或A族、B族)外还居住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上表述赋予了A族(或A族、B族)在该县自治的权利,但并没有同时赋予居住在县内的A族(或A族、B族)之外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等的自治权利。其中3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中“除A族(或A族、B族)外还居住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表述,仅体现了当地的居住状况。

“采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一语的立宪(法)者,并不认为当地汉族和散居少数民族享有区域自治权利。否则,根据‘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意愿确定自治机关形式的规定,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14]如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汉族和散居少数民族不与主体少数民族享有同等的自治权利,自治机关的确立和运行也就不能体现该区域各民族的共同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内的汉族聚居区的政权机关,采用全国一般的现行制度,无需实行区域自治”;在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否需要单独建立民族自治区,应视具体情况及有关民族的志愿而决定”。据此可以解释我国相关法规为什么没有明确赋予“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自治权利。

基于消极自由的政治权利保障需要而确立的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基本政治逻辑是保障自治民族的政治权利。出于联合和动员不同民族反对政治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的需要,列宁主张“各民族绝对平等”,“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民族特征”实行“广泛的自治权和区域自治”,反对“要联合统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分裂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15]186,187}。他为此反对“使国内各民族彼此隔离,使他们进一步疏远,把它们和学校分开”;反对“把学校事业从国家手里分出来交给每个个别民族”;主张“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各民族的工人结成一个联盟”^{[15]204,205}。列宁要建构的是一个既有消极自由的民族自治,又有积极自由的国家共同体。遗憾的是,在国家建设阶段的苏联并没有整合好差异性和特殊性,没有建立起有效而巩固的国家共同体认同。

如何预防政治生活中过于固化民族身份、过分彰显民族利益而导致族际区隔,在政治体系实践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整合民族话语、促进民族整合,就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自然实践逻辑。

(三)世界民族政治的风险规避: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的比较逻辑

苏联在建国过程中确立并在建国后长期坚持民族自决,以民族为基础划分行政区,并将加入国家共同体的民族确定为分别独立的政治单元,以此为基础构建联邦制国家。不过列宁认为“把独立性和隔阂状态合法化,并把它们提高为原则,提高为法律”是有害的,要消除隔阂,“坚定不移地实行最紧密的团结”,“不承认任何强加的壁垒,因此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他主张可以保证“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垒”,“中央有直接了解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15]34,35}的集中制。但是列宁也指出:“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16]这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权宜政治抉择。也恰恰是这一抉择并以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强化和固化了苏联各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族际边界,助推了以差异区隔为表征的民族政治发展,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不断增强。意识到政治风险后,苏联在后期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国家民族意义上的“苏联人民”。但是,“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经过较为充分的发展而羽翼丰满,以及民族意识持续旺盛的情况下,构建‘苏联人民’的行动在明里暗里处处受阻而难以推行,最后便无疾而终。在国家认同受到严重侵蚀

的情况下,……并最终击毁了一个强大的国家”^[17]。

欧美国家的族群体制类似,“在多元文化主义等族际政治理论的影响下,各个‘族群’的自我意识和‘族群’认同也迅速发展”,“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7]。2014年9月,苏格兰独立公投拉开帷幕。“集体自恋是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最强预测因素,暗示分离主义思想中存在自恋式扭曲。”^[18]2017年10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公然违宪、对抗中央政府进行独立公投。“一些潜在的民族或地区的分离者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比利时的弗莱芒地区、法国的科西嘉和布列塔尼地区、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和威尼托地区甚至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等八个被认为是独立的‘高危地区’,……热切希望加泰罗尼亚的分离或独立能够成功,从而给他们做出示范并继而提供合法性支撑。”^[19]

以上世界民族政治发展的历史事实,以及当下国际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现实挑战提醒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规避世界民族政治发展的风险。这也就从全球范围的比较意义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成创造了实践可能。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知识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需要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和政治主体的日常语言习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其基本“知识”和行为“常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知行合一”,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族治理效能。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知识建构的根本保障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13]。这一规定彰显了中国是各民族公民共同治理的国家。这一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具有鲜明体现。其中的“中华”是民族政治概念,“人民”是公民政治概念,“共和国”是政体政治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族政治意义上意为“中华民族共同治理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是民族政治和公民政治的统一。

宪法规定: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明确的是,自治地方的自治主体不是仅为“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利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独享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依据当地经济、政

治等需要,并参酌历史情况,各自治区内得包括一部分汉族居民区及城镇。”^[20]这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置的初衷,不是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划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区域,而是要构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和其他民族共同治理的政治共同体。宪法还规定: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其中,“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为“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与其他民族公民共同治理区域事务预留了可能的制度和实践空间,可以防范政治实践中可能的“排他性”政治风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衷以及宪法规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创新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源泉和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21]³⁰⁰。这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预防和化解可能的民族分离的政治导向。这一导向也为政治实践层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建构指明了政治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知识建构的政治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巩固了领导地位。新时代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夯实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22]。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疫病防治,铸牢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23]。1949年到1976年,“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1岁……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为迅速的一段连续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相应的预期寿命高了3岁多”;1978年到2015年,“人均GDP年均增长8.6%,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在一段连续时期内的增长都要迅速”;1978年到2014年,全国“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7.9%,世界第一”^[24]。

西部12省区市数据显示,2022年(如表1)“本专科招生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均教育经费”是2005年的2.24倍、8.4倍,年均分别增长13.18%、49.41%;“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减少45.25%,年均减少2.66%。以上治理效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结晶。

表1 西部12省区市2022年与2005年教育数据比较

地区	指标	2022年本专科	2005年本专科	2022年文盲人口	2005年文盲人口占	2022年人均	2005年人均
		招生数占总人	招生数占总人	占15岁及以上人	15岁及以上人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
		口比重(%)	口比重(%)	口的比重(%)	口的比重(%)	(万元)	(万元)
重庆市		0.92	0.40	2.20	11.65	0.40	0.05
四川省		0.72	0.33	4.29	16.61	0.31	0.04
云南省		0.58	0.19	5.56	20.07	0.34	0.04
贵州省		0.68	0.18	7.98	10.73	0.39	0.03
陕西省		0.84	0.56	3.35	10.33	0.36	0.06
甘肃省		0.60	0.28	9.05	20.83	0.34	0.04
青海省		0.41	0.22	9.69	24.07	0.52	0.04
西藏自治区		0.32	0.27	34.55	44.84	0.92	0.08
宁夏回族自治区		0.64	0.25	5.96	18.71	0.39	0.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62	0.28	3.91	8.32	0.39	0.07
内蒙古自治区		0.61	0.30	3.75	11.25	0.36	0.05
广西壮族自治区		0.83	0.25	2.96	8.64	0.33	0.03
西部平均		0.65	0.29	7.77	17.17	0.42	0.0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34,48,691,7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政治整合,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5]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有利于形成一个超越各民族自我认同之上的共同政治权威,以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实现政治整合。党的政策引领、国家的制度保障,强化了各民族的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空间嵌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6]。2022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2]。2024年,“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27],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庄重宣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知识建构强化了政治支持。

(三)世界民族政治风险: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知识建构的反面例证

按照列宁的解释,民族自决权在政治生活过程中可以细化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特殊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取消“一切由国家任命的地方的和区域的政权机关”;各地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同国语平等使用,取消义务国语”。在宏观政治体制下,民族自决权赋予“各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事实证明,列宁“不应当用暴力,而应当完全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吸引其他民

族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15]688-689}的共和国建构方略是正确且行之有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基于消极自由的政治取向,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体制和机制约束,极易生发颠覆国家共同体的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分离主义政治思潮、政治运动甚至政治革命。基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政治权利取向政策,如果没有及时与政治义务取向政策相结合,没有有效构建和巩固“国家共同体”意识,也会为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提供可能的土壤。

研究表明,1994年发生的23场战争中,有18场是由与民族分离主义相关的种族冲突或民族对抗引起的,造成了2700万人流离失所;2000年发生的51场战争中,有20场的直接诱因是要求民族分离或民族自治。1990年到2007年,民族分离主义催生了25个新国家,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早已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它也是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持续已久的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法国的科西嘉独立活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等,正是西方国家备受民族分离主义困扰的现实表现。”^[28]以上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尽管会有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歧视的诱因,但是消极自由价值取向导致的个人对其自身及其所属群体过度的政治价值张扬,是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

近些年来,由于爱尔兰和美国的介入和影响,北爱尔兰民族分离局势趋向缓和。由于法国的介入和欧盟将“埃塔”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并予以严厉打击,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渐趋减弱。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诱因一旦有朝一日被激发,在网

络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将带来深远而重大的消极影响。以往和当下世界民族分离主义的危害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播种、维护、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知识建构的社会基础

自治区政府的组建,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落实机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治的基本特色。1958年6月召开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政府领导中,主席和副主席共9人,其中主席为蒙古族,副主席8人中蒙古族有4人^[29]。1955年9月召开的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主席和副主席共4人,其中主席为维吾尔族,副主席3人中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各1人^[30]。1958年3月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的主席和副主席6人中,主席为壮族,副主席5人中2人为壮族^[31]。1958年10月召开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政府主席和副主席8人,其中主席为回族,副主席7人中3人为回族^[32]¹⁰⁵。1965年9月召开的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和副主席9人,其中主席为藏族,副主席8人中5人为藏族^[33]。

当前的5个自治区政府领导中,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9人,其中主席为蒙古族,副主席8人中蒙古族3人^[3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10人,其中主席为维吾尔族,副主席9人中维吾尔族3人、哈萨克族1人、满族1人^[35];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9人,其中主席为壮族,副主席8人中没有少数民族^[36];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8人,其中主席为回族,副主席7人中回族2人、满族1人^[37];西藏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13人,其中主席为藏族,副主席12人中藏族5人、满族2人^[38]。

实践表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民族政治实践,形塑了中国特色民族政治话语,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话语基础上,为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和其他民族在区域内的协同治理奠定了社会基础。民族区域自治为我们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统领和优化民族政治,“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9]创造了现实条件。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实践转化

自治是有政治条件的:“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

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40]“在法律或行政规定范围内独立行使一定的权力,管理自己的事务。”^[41]政治实践中的“自治”容易倒向主张不受外界约束和控制的消极政治自由权利之治,甚至会产生不受外力规制的“自我之治”或“独立之治”。这与主动与外界融合的“共同体”导向的价值、路径和方向相反。民族自治在革命时代和建国阶段有利于整合各民族的力量,促使各民族联合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和发展阶段,确立和保障以民族自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但是,如果相关约束和规制的制度和机制不健全、实效不足,则会导致排他性民族自治量变的过度积累,从而诱发自治民族过分强调其自治权利并进而排斥其他民族的基本政治权利,甚至导致与其他民族分离、隔离,严重者将引发以某一民族或某几个民族为主体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194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为一联邦国家”,“各平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按自愿联合原则组成”,“每一联邦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苏联之权”^[42]。直至1977年10月通过的《苏联宪法》仍然规定:苏联“是统一的多民族的联盟国家,根据社会主义联邦制的原则,由各民族实行自由自决和平等的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自愿联合组成”;“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43]这一规定直至苏联解体都没有改变。理论上,通过根本大法规定自由加入和退出共和国之权,可以起到有效保障联盟民族基本政治权利的作用。但是该规定的优先价值是基于消极自由的自治权利,而不是基于积极自由的共同体整合。由这一优先次序决定,当民族自治和国家一体二者发生冲突之时,“共同体”是屈居第二的。这就从体制上确认了共同体解体的合法性,并为其解体提供了制度化的政治空间。

苏联是希望建立一个牢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实行的也是联邦制。但美国宪法非但不鼓励民族分离,反而为民族分离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可以说民族分离在宪法约束下是不可能的:“国会得准许新州加入本联邦,但未经有关州立法机关及国会同意不得在他州之内建立新州,亦不得合并两州或数州之部分地区建立新州。”^[44]美国国徽的图案标识及其绶带上写着的拉

丁文格言“E PLURIBUS UNUM”，正是在彰显“共和”“联合”“统一”的“共同体”政治价值。有学者由此认为，美国宪法的原旨是超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共和主义”^[45]。

新时代的中国，如何在继承我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政治文明精华，避免前车之鉴，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治发展模式，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创新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统领性话语，需要充分融入民族政策、政治制度以及族际政治整合实践。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度融合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的形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创新奠定了政治基础。2018年修订的宪法中，“共和”出现了84次，且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出现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人民共和”可以具体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全国人大中“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各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3]。以上条款蕴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的制度安排。

理论上，现实民族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异化为“你当你的家，我作我的主”的离散化现象。民族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可以具体化为“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了防止实践中的民族离散化，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可以将现行宪法第四条的“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扩展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之相适应，将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和第九条中的“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修改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法中的其他相关条款，也需做相应修改。

另外，要严格审查各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于不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原则

的条款，要责成其及时修订完善。特别是要把其中类似“XX地区A族(或A族、B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修改为“XX地区A族(或A族、B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其他民族参与区域自治”。要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深度融合，需要相关法学理论和立法专家进行论证，立法部门付诸实践，更需要国家领导人进行推动。“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21]300}这是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明确阐释，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好发展的清晰定位。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发展政策紧密衔接

以贵州、四川、西藏、北京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为例。2022年开始，贵州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调整，逐步调减少数民族高考考生加分。符合“三统一”原则^①的一类区域^②考生，2022年至2023年加5分，2024年起不加分；二类区域^③考生，2022年至2023年加10分，2024年至2025年加5分，2026年起不加分；三类区域^④考生，2022年至2023年加15分，2024年至2025年加10分，2026年起加5分^[46]。2024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规定：“三州十七县两区”和攀枝花市东区、西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加10到50分，同一地区的汉族考生可加5到25分^[47]。西藏自治区规定：执行汉族录取分数线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以及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夏尔巴人“加10分”^[48]。北京针对市属高校招生录取：“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转学到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5分向高校提供档案，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49]。

以上地区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体现了“普遍但有区别”的原则，总体朝着少数民族不加分的趋势发展。“普遍原则”主要基于历史补偿和现实帮扶逻辑。201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民族教育发展仍面临一些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整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要“促进教育公平，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推进民族教育全面发展”^[50]。其中隐含的就是“普遍但有区别”的历史补偿和现实帮扶逻辑。

不同地区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普遍但有区别”的原则，就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策。不过,在实施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是不是给政策受惠对象讲明了这是国家统一领导以及发展较快较好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扶?如果没有,政策实施就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国家的类似倾斜政策都是应该的,甚至会形成“弱者特权”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政治上消除了民族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体制。根据上述不同地区的加分政策,在发展基础平等的条件下,不同民族考生都处于不加分的相同的起跑线上。这一“零加分”政策以及处于不同发展基础地区加分梯度有别的共时性平稳实施,预示今后少数民族差别化政策的发展方向——无差别的同一化。差别化民族政策体现的是“差别性一体”,无差别的民族政策体现的是“同一性一体”,两者的初衷和目的都是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具体的政策文本中,这一价值导向需要显化、强化,促进不同民族相互理解和支持,避免误解和冲突。

以上四个地区的高等学校招生规定中,四川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专门强调:“请招生学校充分考虑四川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从促进民族大团结、促进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发展的政治高度,给予理解和支持。”如果要更好提升这句话的高度,可以改为“……从促进民族大团结、促进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高度……”。大多数地区只是说明给予少数民族差别化照顾,但是没有说明理由。这也许是我国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因此,各地区高考招生规定中,涉及少数民族差别化政策照顾的领域,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贯穿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链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发展政策的一体化融通。

(三)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政治过程有效互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族际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但是“大杂居中的小聚居”仍然是目前以及将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各民族居住格局的主流,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别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创新现有民族政治话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政治过程的有效互嵌,是维护我国国家统一、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民族政治过程有效结合并付诸实践,可以统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前有一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部分贫困、就业、失业等社会问题”“发生在两个不同民族成员个人之间的问题”“实际工作中的评职称、分房子、提干部等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泛化为民族问题,甚至在处理单位职工或社会成员违反规章制度或违犯国家法律的行为时,也将一般的社会问题泛化为民族问题,将一般的政治问题泛化为民族政治问题^[51]。民族问题泛化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会助长“优越民族”“特权民族”群体的形成。经过努力,这一现象近些年有较大改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要体现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21]299}这一重要财富。多民族特色要切实成为一大有利因素,就必须保证各民族间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共同体”关系。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共同体关系的基础,为各民族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民族政治过程做好了铺垫。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300}。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渗透于字里行间,中华民族一体和国家统一的价值导向鲜明。

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创新要更鲜明,更突出。以往我们比较普遍使用的民族关系话语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大一统”“多元一体”“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可以起到统领其他话语的作用,在实现话语体系统一的同时兼顾不同领域的民族关系表述。这一话语简洁明快的特性,可以节约宣传成本、提升宣传效能,方便民族政治主体加深理解、加强认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话语明确而充分地运用于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政治过程,可以让各民族政治主体感受到自己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统领和

注释:

- ①即申报少数民族加分项目的考生高中阶段须在同一县(市、区、特区)具有三年完整户籍、学籍和连续三年实际就读。
- ②包括贵阳市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安顺市西秀区。
- ③包括贵阳市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遵义市赤水市、播州区、仁怀市、绥阳县、桐梓县、习水县、湄潭县、凤冈县、余庆县、正安县,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城区、六枝特区、盘州市,安顺市平坝区、普定县,黔东南州凯里市,黔南州都匀市,黔西南州兴义市,贵安新区,毕节市、铜仁市所辖非民族自治县。
- ④包括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所辖除凯里市、都匀市、兴义市外的其他县(市),民族自治县。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Z]. 国务院公报,2001(14).
- [2] 郝时远,王希恩.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报告:201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 [3] 王延中. 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J]. 红旗文稿,2024(20).
-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29(01).
- [5] 黎雪.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设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成就[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
- [6] 郝亚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话语趋向[J]. 民族研究,2022(4).
- [7] 刘涛,庞宇瑶. 概念的跨域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概念隐喻及其修辞机制[J]. 学术论坛,2024(4).
- [8] 郭永虎,白路凡.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的建构:基于中共中央机关报视角[J]. 前沿,2024(3).
- [9] 林如鹏,李庚.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基于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考察[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 [10] 以赛亚·伯林. 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M]. 胡传胜,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11] 刘明贤.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探析[J]. 哲学动态,2004(9).
- [12] 王允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实效、困境与创新[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 人民日报,2018-03-22(01).
- [14] 王飞.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几点思考:基于宪法等法律规定解读立法意图[J]. 广西民族研究,2014(5).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列宁论民族问题[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16] 列宁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4.
- [17] 周平. 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J]. 政治学研究,2017(2).
- [18] DAVID COLLEDGE, JOANNE INGRAM. Outgroup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upport for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WAH and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 Support for Scottish Independence[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Issue 2, 2023:424-436.
- [19] 周少青. 西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批判与反思:以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独立运动为例[J]. 世界民族,2018(1).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EB/OL]. (2011-09-30) [2025-05-30]. <http://www.71.cn/2011/0930/632051.shtml>.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2] 中国共产党章程[N]. 人民日报,2022-10-27(01).
- [23] 夏自金.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探究:以德宏州为例[J]. 中州大学学报,2024(6).
- [24] 罗思义. 中国取得的是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成就[N]. 文汇报,2016-09-30(05).
- [2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01).
- [26] 陈华森,鄢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嵌入:以云南和贵州为中心的探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
- [2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1).
- [28] 宋全成.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1).
- [29]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74.
-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51-52.
-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147.
-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概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05.
- [33] 西藏自治区概况[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396-398.
- [34]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政务公开[EB/OL]. [2024-09-20]. <https://www.nmg.gov.cn/zwgk/>.
- [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政府领导[EB/OL]. [2024-09-20]. <https://www.xinjiang.gov.cn/xinjiang/zfld/zfld.shtml>.
- [3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EB/OL]. [2024-09-20]. <http://www.gxzf.gov.cn/zwgk/zzqzfld/>.
- [37]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自治区政府领导[EB/OL]. [2024-09-20]. <https://www.nx.gov.cn/zzqzfld/>.

- [38] 中国经济网. 时政社会 [EB/OL]. [2024 - 09 - 20]. <http://district.ce.cn/zt/rwk/sf/xz/>.
- [3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5.
- [40] 现代汉语词典: 第 2 版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4: 701.
- [41] 新华词典: 第 4 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351.
- [42] 苏联宪法 [M]. 北京: 时代出版社, 1949: 8, 12.
- [4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1977 年) [EB/OL]. (2007 - 12 - 22) [2024 - 09 - 06]. <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3242>.
- [44]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 [M]. 朱曾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2.
- [45] 万绍红. 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 233.
- [46] 贵州: 明年起高考加分政策有大调整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1 - 03 - 30 (11).
- [47] 四川省 2024 年普通高校招生实施规定发布 [EB/OL]. (2024 - 05 - 08) [2024 - 08 - 09]. <https://edu.sc.gov.cn/scedu/c100494/2024/5/8/204b28b7c1e440208dbeb62cb8f42e70.shtml>.
- [48] 西藏自治区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 [EB/OL]. (2024 - 05 - 06) [2024 - 08 - 09]. <https://www.jyzc.com/article/859023.html>.
- [49] 北京市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EB/OL]. (2024 - 05 - 08) [2024 - 08 - 09].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405/t20240508_3666118.html.
- [50]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
- [51] 姜勇, 李乐. 泛化民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定义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s Generative Log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CHEN Huas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China's basic political systems,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has play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ts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the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and systemic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together with risk prevention within global ethnic politics, have given rise to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lements lik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isks identified within international ethnic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provide fundamental guarantees, political support, negative examples an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iscourse. Deep integration with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close linkage with policies of ethnic development, effective mutual embedding with the processes of ethnic politics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iscourse, can contribute to consolidat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ing it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generative log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人工智能治理的比较法简析

栗鑫

(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澳大利亚悉尼2007)

摘要:在全球互联和区块链技术的背景下,如何确立人工智能治理系统的法律监管体系,成为法律界的研究重点。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监管面临多重挑战:监管碎片化、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界定、问责制与责任承担等问题,均需逐步探讨与解决。唯有通过构建全球监管框架、强化国际合作、推进伦理与透明度建设、筑牢数据隐私安全防线、完善行业专项法规,以及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标准等多维度设计,方能有效完成人工智能治理系统的法律构建。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比较法;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标准;分级监管;法律框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09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55-05

人工智能系统代表着一种快速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化环境、经济体系和众多商业领域。在人工智能和法律领域发展早期,研究重点聚焦于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推理、表示和学习^[1]。学者们从权威和偏见等典型视角,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展开了大量探讨。随着科技与法律的发展,除了对这些传统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外,诸多新问题也亟待关注。目前,国内外人工智能驱动的诊断系统和自动化金融决策系统已进入建设阶段,但这两个应用场景均引发了伦理争议与监管困境。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虽然已经逐步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但在全球互联和区块链背景下,如何平衡监管保障与创新发展,并使其符合各国普遍认可的伦理和法律标准,仍是一项艰巨挑战。

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揭示了三大显著难题,主要集中在伦理标准不统一、企业合规难度大以及监管要求存在差异等方面。本文基于对欧盟、英美法律体系的比较,探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以及各国针对这些风险已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旨在探寻平衡创新发展与监管程序的法律规范及策略。

一、人工智能治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实现自动化决策,而这些决策往往直接影响个人的权利、机会以

及自由。缺乏有效监管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算法偏见与“黑箱”困境。从有偏见的信息中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维持系统性歧视,特别是在信用评级、执法和招聘实践中。当今的人工智能模型作为“黑箱”^[2]系统运行,当评估其决策过程时,特别是在深度学习网络中,会带来困难。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并融入医疗、金融和自主系统等关键领域,“黑箱”在人工智能中的概念变得越来越相关和重要。在人工智能治理中,“黑箱人工智能”是一个关键问题,指的是内部机制对用户或观察者不透明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系统通常基于复杂的机器学习,比如深度学习,其决策过程难以被人类观察,出现错误时也难以被发现,进而衍生出多重风险。

(1)透明度和信任危机。人工智能的不透明性可能产生错误或者不公平的结果,可能会破坏公众对其决策的信任,特别是在医疗、金融和司法等高风险领域。

(2)偏见和错误隐藏。由于内部机制不透明,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隐藏偏见或错误,从而导致不公平或有害的决策。

收稿日期:2025-06-07

作者简介:栗鑫(1979—),女,河南郑州人,法律博士(JD),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研究助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律师,研究方向:公司法及公司治理。

(3)责任主体认定难题。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难以追溯,一旦出现问题,难以明确责任归属主体。

其次,隐私和安全隐患。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和数据处理行为,引发了人们对个人数据保护的担忧,同时也存在数据被政府或企业滥用的风险。

最后,法律界定与责任归属模糊。人工智能并非简单的机械运算,而是具备创新智能的思考过程。因此,如何确保其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明确人工智能成果的著作权归属,以及建立结果问责制、保障决策公平性,成为法律领域亟须探索的关键问题。

二、人工智能治理的主要法律挑战

尽管法律界已经普遍意识到对人工智能治理和决策进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但现实问题仍阻碍着有效法律框架的构建。其中,核心挑战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现有法律体系的更新节奏,传统法律模式在全球互联与区块链技术背景下,难以应对监管空白与执法不协调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1)全球人工智能政策的分歧。各国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导致国际合作难度加大,难以形成统一的治理标准。

(2)技术认知壁垒。政策制定者可能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导致人工智能法规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不足。

(3)创新与监管的平衡。过度严格的政策可能抑制技术发展,而监管宽松则会引发伦理与安全风险。

(4)数据治理难题。确保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的公平性、隐私性与安全性,仍需复杂的制度设计。

(5)责任认定困境。在自主系统中,如何明确人工智能决策的法律责任主体,存在法律与伦理双重挑战。

三、人工智能治理法律监管之比较法分析

鉴于以上各种问题和风险的存在,各国人工智能监管内容及方式也不尽相同,而这种不一致导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标准的不统一以及治理结果大相径庭。总体而言,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AIA)建立了基于风险的监管体系,而美国则主要依赖其人工智能公司的自我监管实践。我国则通过严格的措施构建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专注于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各国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给跨国企业遵守法规带来了障碍,也增加了监管套利的机会。

(1)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它是世界上首个全面的人工智能立法框架,旨在通过统一的法律框架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确保其符合欧盟的价值观和原则,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2)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是欧盟的一项全面数据保护法律,旨在保护隐私和

个人数据。该条例确立了合法性、公平性、透明性、目的限制性、准确性、完整性、保密性及问责制等基本原则。重要的是,该条例还明确了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如对不遵守者处以高额罚款,这些措施使该部立法具备切实的可执行性,而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极具借鉴意义。

(3)美国相关法规。美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联邦人工智能立法框架,但联邦政府和各州均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相关立法。例如,2020年的《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小企业人工智能进步法案》,以及2024年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人工智能教育法案》。

(4)中国相关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首部法规,于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2025年3月7日颁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将于2025年9月1日起施行^[3],届时该办法将为人工智能治理中部分内容提供法律指导。例如,部分人工智能执法员已经在深圳等城市的政府部门任职,若人工智能在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中发挥作用,根据该办法,必须对该部分内容进行标注。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判断人工智能决定的法律缺陷、错误决定如何追责等问题,都将被纳入考量。在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模型的设定合法性及责任承担问题,也应同步解决。

(5)判例及相关立法的缺乏。目前中国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判例及案例并不多,正如上文所言,中国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对人工智能治理开展相关立法。而在英美判例法国家,尽管人工智能在现实生活中发展迅速,但相关的案例并不多,大多以法案形式先行立法。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隐藏的风险日益凸显,亟须相关法律的指导与规范。

综上所述,不同法域对人工智能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立法形式与内容。然而,互联网和区块链已将各个国家变为区块链上的一个节点,随着人工智能治理的深化,碎片化的规定必然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国际性条约的出台或许成为必要。正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诞生,统一的人工智能公约与成员国的立法内化实属必要。

四、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

相较于上述各国法律对人工智能治理后期应用环节的规制,法律对人工智能治理在形成阶段潜在和显现的风险也已展开干预。

首先,数据收集和使用问题。人工智能模型搭建依赖训练,而训练高度依赖训练者输入的大量数据。数据的来源及合法性、使用范围及质量(如真实性、准

确性)是数据模型的核心,也是人工智能决策的依据,直接关系人工智能结果的公平性和正确性。例如,通过网络爬虫收集的数据可能引发合规风险。

其次,数据隐私风险。人工智能技术涉及跨境数据传输,这带来了数据隐私保护及地缘政治层面的审查挑战。不同国家对数据合法性的界定存在差异,如赌博行业信息在美国合法,但在中国大陆属于非法范畴。此外,确保数据在人工智能系统内的安全存储与处理同样面临挑战。

最后,人工智能决策的伦理风险——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需要重点考量。在法律决策中应用人工智能系统,引发了对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重大担忧。许多人工智能模型(尤其是深度学习算法)常被视为“黑箱”,其复杂决策过程难以解读,进而引发信任危机。人工智能系统基于统计概率而非伦理道德作出决策,这本身就暗藏伦理问题。例如,在医疗场景中,人工智能系统若作为筛选工具,决定优先治疗生存概率高的患者,可能对少数群体构成歧视。人工智能伦理体系要求设计者将人类价值观嵌入系统,以解决这些无法仅通过数据计算化解的关切。在实践中,ECCOLA(学习算法的伦理考量和挑战)工具被设计为通过伦理政策治理人工智能,以弥合伦理研究与行业实践的鸿沟。

当人工智能系统介入法律决策,法律责任与问责制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其根本法理争议在于人工智能在法律体系中的主体与客体定位。例如,若人工智能生成的建议导致司法误判,由于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成为责任主体,开发者、用户(行政机构)或其他相关方如何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目前仍无定论。此外,人工智能可能对司法独立构成威胁。若法官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建议,可能会受算法中隐含的偏见或特定意识形态影响,进而作出不公判决。

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

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如文本)的作者和所有者是谁,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首先,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过程中,人类所做的是输入数据,而作品是由计算机依据模型运算生成,通常缺乏一个或多个特定人的创造性劳动,从而导致无法认定产生创造性的新作品,也无法产生知识产权。但现实中,这种运算超越了简单计算,不同人工智能会产生不同的作品。这种差异性或者说是创造性,是存在于数据模型的创造性还是运算过程之中,很难具体定位。

其次,传统知识产权法主要保护人类创作的作

品,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如何处理存在法律争议。例如,美国版权局重申,版权保护保留给人类作者的作品,完全由人工智能创建而没有人类创造性投入的输出不符合版权资格。而中国法理中,只有自然人及法人具有法律人格,可以作为法律主体,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主体存在,所以也不存在成为著作权人的可能。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则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承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版权。对于具体版权归属哪类主体,一些法律理论开始考虑承认人类操作者和人工智能系统为共同创作者的可能性。然而,有意义的人类创造性贡献对于版权保护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六、问责设立和责任承担

当人工智能治理结果出现错误,确定哪个主体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负责,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首先,责任承担主体难以确定。人工智能执法者的错误决定,是应该由程序的设计编程人员,人工智能培训人员还是人工智能治理所代表的机构,作为主体承担责任或者共同承担责任,无法概括认定。

其次,责任类型难以确定。责任主体需要承担什么类型的责任,独立责任抑或共同责任,部分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这些在大陆法系需要有具体的法理和法律支持,在英美法系也需要对具体案例论证及判决支撑,并非一句话就能简单归责。

再次,人工智能系统因其错误决策带来的损失,该如何通过问责过程受到审查。在软件开发、部署公司和最终用户之间,哪个实体应该承担责任尚不明确。我国现行法律,只是规定需标注哪些内容是人工智能生成,而问责体系在确定人工智能治理产生的民事责任时并无结论,需要法理推导及支持,然后适用相应的法律法规确定。理论上,根据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原则,如果版权属于开发者,那么由人工智能治理产生的责任也应该相应地由其承担。然而,仍然需要区分责任是源于人工智能本身还是源于决策者,以确定责任承担者。

最后,合理的处罚对于这个体系至关重要。违反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如巨额罚款或暂停服务。有可执行的法律才具有实践意义。

七、有效人工智能治理的法律规范途径

(一)基于风险的分级监管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世界上首次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尝试。众所周知,该法规声称遵循基于风险的方法——根据风险程度来选择和设计监管工具,即“风险越高,规则越严格”原则。为此,《人工智能法案》区分了四个风险类别(不可接受、高、有

限和最低)。根据人工智能系统所构成的风险定义监管要求。

尽管基于风险的监管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治理的正确方向,但其有效性仍需在实践中验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监管框架需要不断调整以应对新挑战。此外,基于风险的监管的成功实施需要跨学科合作,整合技术、伦理和法律的综合视角。

(二)合成内容监管——比较法概览

人工智能已经通过智能设备与我们相伴,还在机器人技术、科技产业、政府和公共管理中出现。此外,它在法律领域,如预测性司法中的应用也在逐步增加。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例如深圳,在基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处罚领域有许多创新实践,人工智能可以起草和审查法律文件。深圳福田区推出的 AI 数字员工可以快速生成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外,在食品和特种设备监管等领域,人工智能预警系统和其他技术被用于增强监管执法能力,通过在线监测、信息共享和智能监督进行检查,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扰。在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警用巡逻机器狗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巡逻和监控任务,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效率。

与此同时,专家和大众也提出了许多担忧,例如人工智能可能会对社区中的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如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以及种族和民族群体)构成挑战。基于性别、种族、宗教等因素的偏见和歧视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GB 45438—2025)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5年9月1日起在我国实施。该标准要求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合成内容进行清晰标识,旨在明确相关服务提供商的识别责任,规范内容创作和传播各阶段的标识行为,进而提醒用户识别虚假信息。这一规定旨在合理成本内增强安全性,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文本对话、内容创作和设计辅助等领域的应用,防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风。

类似的立法在美国体现为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 AI 100—4 报告《降低合成内容带来的风险:数字内容透明度的技术方法概览》,该报告概述了检测和追踪合成内容的各种技术方法,包括两个主要路径:合成内容检测和溯源数据追踪。

此外,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了重要的透明度要求,强调需要清晰标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具体涵盖三个领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技术标准和检测措施、例外情况和细微差别。

这种强制标识和追溯的立法本质与著作权法中引用并标明作者等规定类似。在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时,引用作者和来源至关重要,各国著作权相关规范已较为完善。结合版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这些做法共同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同理,人工智能可采用类似逻辑并融入现有法律框架,通过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成果,同时保障信息安全和相关权利,构建负责任且透明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系统。

进一步推论可知,若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程序(如深圳的执法机器人参与行政处罚),则在处罚决定或法院判决中,必须标明哪些部分属于人工智能的参考建议、推理过程和决策结论。这一做法类似于判决书中包含陪审团意见、法官具体观点及最终结果的表述逻辑——若人工智能参与法律程序,其具体应用环节需明确标明。

(三)伦理和公平框架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依赖训练,而训练需要依托强大硬件和人力进行数据输入。因此,先进的硬件往往催生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计算能力较弱的主体则难以跟上技术发展速度,这客观上可能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成为重要议题,例如人工智能生成工具的开源与应用推广等。

此外,人工智能算法的公平性也是关键问题之一。由于训练数据可能存在偏见,人工智能系统可能无意间产生歧视性结果。部分研究提出了包含问责制和公平性的理论框架,强调人工智能治理需确保无偏见的数据处理、决策透明度及高效工作流程。

总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需根据上述预期风险进行监管等级分类。例如,人工智能系统,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必须严格遵守数据隐私法规,处于高级别监控,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这些法规要求人工智能提供商实施数据加密、安全存储和严格访问控制等措施。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如医疗诊断和自主武器系统,应接受严格的评估程序。而对于普通人工智能(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此类监管限制应保持在最低水平,以效率为先,在发生纠纷或争议时,具备可追溯性即可。通过这种方式,可在关键领域保障安全,同时促进创新发展。

(四)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企业和政府应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的初始阶段就纳入伦理道德考量。伦理设计是一种系统、全面地在新技术系统和设备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纳入伦理考量的方法。这包括透明度设计、安全性设计和

可持续性设计。

在此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一套高阶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包括:(1)隐私保护和安全;(2)可靠性和安全性;(3)透明度和可解释性;(4)公平性;(5)可申诉性;(6)问责制;(7)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8)人类、社会和环境福祉。这些原则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4]

除此之外,作为偏见审查的一部分,人工智能公司需确保训练数据包含多样化的代表性元素,同时系统应具备可解释性,使用户能够请求、解释并管理人工智能决策,进而提升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五)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

正如前文所述,在世界互联及区块链技术基础上,单独的人工智能治理监管框架会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监管碎片化,同时为监管不当及监管不力提供机会。只有加强各国协商与国际间合作,才能减少此类摩擦与失衡。例如,联合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通过借鉴气候变化、网络犯罪条约的模式,在制定全球人工智能基础法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六)跨学科合作

技术带来的问题需通过技术进步解决,而法律的责任是为技术发展提供框架,并明确责任边界。例如,人工智能在法律决策中的应用需平衡技术创新与法律伦理。这涉及开发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模型及工具,如 SHAP (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 和 LIME (Local Interpretable Model-agnostic Explanations) 等,为黑箱模型的决策提供解释。同时,需保障数据隐私安全,并建立清晰的责任框架,以实现法律风险下的合理归责。此类问题无法通过单一学科解决,需技术、伦理、法律等多学科协同合作。

八、结论与建议

人工智能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构建以国际合作、

风险分级监管和人工智能伦理设计为核心的法治框架,可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构建全球监管框架。制定统一的国际条约与指导方针,规范人工智能研发与部署。

(2)强化国际协作机制。促进全球机构间的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

(3)深化伦理与透明度建设。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嵌入伦理准则,提升决策可解释性以增强信任。

(4)筑牢数据隐私安全防线。完善分级监管措施,强化用户数据保护。

(5)细化行业专项法规。针对医疗、金融、法律等关键领域,更新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行业标准。

(6)建立合成内容统一标识体系。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标识规则(如标识样式、AI 内容占比等),提升规范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 [1] RISSLAND E L, ASHLEY K D, LOUI R P. AI and law: a fruitful synergy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3, 150 (1 - 2): 1 - 15.
- [2] RAI A. Explainable AI: from black box to glass box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20, 48: 137 - 141.
- [3] 关于印发《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的通知 [EB/OL]. (2025 - 03 - 07) [2025 - 06 - 0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3/content_7014286.htm.
- [4] SANDERSON C, DOUGLAS D, LU Q, et al. AI ethics principles in practice: perspectives of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2023 (2): 171 - 18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Brie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LI Xi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Sydney 2007, Australia)

Abstract: AI governance still confronts multiple challenges—regulatory fragmentation, data compliance and privacy protection, copyright in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assignment of accountability and liability—each requiring incremental reflection and resolution. A robust governance framework, ground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isk-based oversight, and ethical AI design, can ensu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le maximizing social benefits. Some strateg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uch as strengthening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s,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ethics and transparency, ensuring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unified standard for labeling synthetic content.

Key words: AI governa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labeling AI synthetic content; graded supervision; legal framework

战役下的战“疫”

——论解放大西南时期的疟疾疫情应对

温金童¹, 孟柏辰²

(1. 陇东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2. 甘肃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时期(1949年11月—1950年4月), 疟疾疫情严峻。在刘邓首长统一领导下, 第二野战军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指战员群策群力、大胆尝试, 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应对疟疾的方式方法, 积累了宝贵的防疟、治疟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不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有着重要启迪。

关键词:刘邓大军 解放大西南 疟疾 防疫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0

中图分类号:R5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60-06

人类历史上, 传染病的肆虐往往与军事行动如影随形, 深刻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在气候湿热、环境复杂的地区, 疟疾作为一种由蚊媒传播的致命性疾病, 更是军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威胁。解放大西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阶段的关键一役, 部队自北方干燥地区长途跋涉进入西南“瘴疠之地”, 面临着严峻的疟疾疫情挑战。有效应对这一疫情, 不仅直接关系到数十万指战员的生命健康与部队战斗力, 更关乎解放西南战略任务的顺利达成, 其历史经验对于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公共卫生实践、特别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疫情防控,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刘邓大军即“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是由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边界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1][2]}。其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 1949年1月15日,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 正式改称第二野战军。(下文若无特殊说明, “刘邓大军”“二野”“第二野战军”均指同一概念)由刘伯承、邓小平统率, 贺龙协同指挥的解放大西南战役, 为时不过57天, 前进约3000华里, 提前两个月完成

战役计划, 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约九十万人, 解放了贵州、重庆、四川、西康、云南等西南广大地区, 保障了西南边疆安全。

一、谈“瘴”色变: “椒花落时瘴烟起”

1949年5月23日, 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二野宜应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 经营川黔康。”^{[2]91}1949年6月17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 “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月为较适宜, 一则准备时间充裕; 二则那时沿途才能存粮食……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2]12}领受中央任务之后邓小平即提醒大家: “我们这支部队, 长期战斗在太行、太岳, 绝大部分是北方人, 对南方不了解, 以为西南是蛮夷、瘴疠之地, 心存疑虑。所以我们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机关要搞一个计划, 装备物资要补齐。”^{[2]95}解放大西南之后, 邓小平谈到西南地区工作时还特别强调: “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 卫生工作作用很大。”邓小平对西南疫情有充分的认识, 强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3], 这些认识颇具战略前瞻性。部队对西南“瘴疠”颇多疑惧, 亦非偶然。

疟疾, “发作之时, 多见毛孔栗起”, 寒颤鼓额, 寒罢则一身壮热, 体若烧炭, “头痛烦渴, 而后汗出,

收稿日期: 2025-05-01

基金项目: 2024年度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项目“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的思考”(GSJC2024-52-04)

作者简介: 温金童(1968—), 男, 安徽阜阳人, 博士, 陇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史研究。

热退身凉。如此寒热往来,反复发作,间日一发,或一日一发,或三日一发,或为一日数度发的瘧症(恶性疟)”^[4]。疟疾多发生于低洼潮湿、气候炎热的亚热带、热带山谷荒野积水区域。等待二野前去解放的“大西南”位于中华版图西南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区,其独特地理气候为疟疾流行提供了理想温床^{[1]102}。史料记载,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即因“泸水瘴烟”受阻,唐代白居易诗“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亦印证此地疟疾之患^{[5]473}。泸水今为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辖,是州政府所在地。当地民谚有云:“要到潞江坝,先把老婆嫁。”意指泸水一带气候炎热,瘴疠肆虐,一旦涉足此地,生还之望渺茫。“相传马岱过水之二千人,中水毒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7]马岱的传说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足见汉、唐时疟疾给人们带来的长期心理阴影。由于疫情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确定泸水的一些地方为“高疟区”。1957年的泸水卫生工作总结报告中还指出:本县“疟疾发病率占六种疫情中的81%”^[6]。

云南地处高原,平均海拔1600公尺以上,滇西、滇南与缅、越接壤,部分地区邻近热带,气候湿热,“瘴气”弥漫^{[5]463},疟疾四季不断,尤以七、八、九、十这四个月最为猖獗。患者以20~40岁男性居多,外省人较易感染,恶性疟疾在滇西、滇南与越、缅交界地区多发^{[5]461}。这类恶性疟疾误诊风险大、病情发展快,不及时防治易危及生命。此外,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占多数,部分区域卫生条件差、传染病多发。滇南红头苗等族群的“施蛊”传说无形中加剧了指战员的心理压力。为此,各级领导经常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同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借用民间用具等要谨慎,人烟稀少地方不可单独行动^{[5]463}。

刘邓大军此前多在气候相对干的华北、江北作战。进军江南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力部队打过长江后,“时值江南多雨季节,雨具缺少,衣服、背包多被打湿,更因连天阴雨,天气转冷;渡江前估计江南天热,棉花拆去,夜晚耐不住寒冷,且部队经连续作战,到江南后生活习惯(饮食)之转变身体一般抵抗力降低,此时期疾病以热性病(疟疾)为多。部队经月余休整后开始行动,正值夏秋天气,酷热时令,冒暑行军,蚊蝇丛生,蚊帐缺乏,饮食不慎(开水供给不周)等原因,发生疟疾、痢疾、肠胃炎、中暑较多,其中疟疾是最多”^{[5]444-445}。第四兵团1949年7—9月患疟疾人数占各类疾病发病总数的69.92%。二野特种兵纵队整训期间2926人感染各

型疟疾^{[5]453}。第十八军8—10月3万余人中有8000余人患疟疾,恶性疟占28.1%^{[5]460}。部分战士感染后一两天内即病死,个别甚至未及明确诊断便已死亡。

1949年7月20日至8月31日的43天中,部队发病13595人,其中疟疾8097人,占比60%,为我军史上发病最猛的时期。四十三师驾机班12人中5人查出疟原虫。仅四十五师8月20日单日发病就达232人,而全军在8月15日发病510人。恶性疟致死快,部分干部、战士产生恐惧心理^{[5]442}。

第四兵团1949年9—10月全兵团发病22152人,其中十三军3302人、十四军17230人、十五军1377人、兵直243人。7月7日至12月初,兵团野战医院收容8532人,治愈3184人,治愈率37.32%;死亡128人,死亡率1.5%。传染病类型及占比为:疟疾69%、痢疾14%、肠胃炎13%、感冒4%^{[5]454}。其中尤以十五军最为严重,全军“49915人,1949年感染疟疾者达25271人,几乎50.63%的指战员都感染过疟疾,占各种疾病的百分比为57.53%”^{[5]458}。第十四军也反映:“渡江南进以后,威胁部队健康最严重的是疟疾!”^{[5]469}很显然,疟疾已经严重影响刘邓大军的战斗力,不及时应对,势必会延误解放大西南的进程。

二、疟疾猖獗:流行病学调查

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西南地区“疟疾多,占发病总人口的70%!疟疾中又以恶性疟疾为多”^{[5]461}。

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防控的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西南地区以雅安地区的疟疾流行史料表现得较为完整,以此为代表亦可窥见西南地区疟疾流行之一斑(见表1)。雅安地区的疟疾自古就流行,唐时即有疟疾肆虐的诗文记载。“雅安地区的疟疾历来就很厉害,每年染病者可占据疾病半数以上。”^{[5]473}此种状况发展到解放大西南时期,似乎并无大的改观。雅安军民染病率,迄今无精确统计,据说每年患病者不下总人数之半,甚至个别家庭或机关全体感染,妨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进行。

疟原虫在人体外生活时,最适宜的温度,间日疟为25摄氏度,恶性疟为30摄氏度,三日疟为22摄氏度,平均适宜温度为25.6摄氏度。而雅安气温以五、六、七、八、九诸月与此数字接近,且九月份发育的疟原虫至十月份可致病,故在九、十月份发病最多。在温、湿度高的环境中疟原虫易繁殖,适宜疟疾传播的相对湿度是63%以上,同时,湿度愈高,疟原虫更易繁殖。雅安相对湿度九、十月份为最高,所以

此期间疟疾为最多。此外,蚊虫的滋生不能离水,雅安

之水至十月仍难渗干,所以疟蚊仍可继续繁殖。因此,九、十两月患疟疾最多之理不言而喻(见表2)。

表1 1947-1949年雅安各型疟疾月发病统计(门诊数据)

月份 病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合计	百分比(%)
间日疟	8	15	13	11	5	28	84	57	28	84	25	7	365	56.06
恶性疟	/	1	1	1	1	10	26	46	72	76	33	6	273	41.94
三日疟	/	1	/	/	/	3	/	/	3	3	1	2	13	2.00
总计	8	17	14	12	6	41	110	103	103	163	59	15	651	100.0

资料来源:根据《西康军区卫生处关于雅安地区疟疾概况的调查(1950年5月23日)》,《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4-475页内容制。

表2 1949年雅安地区气候、雨量及相对湿度统计表

月份 分类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气温(摄氏度)	7.60	10.6	12.8	16.1	22.8	23	25.6	24.5	22.2	17.9	13.2	9.5
雨量(毫米)	13.1	25.5	61.5	123.5	160.3	221.8	944.5	421.5	225.9	195.6	41.7	17.8
相对湿度(%)	75.0	78.2	78.3	80.7	75.0	84.2	86.5	86.1	91.7	90.5	90.7	79.0

资料来源:《第四兵团卫生部进军中地方卫生状况及多发病(1949年9月4日)》,《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5页。

疟疾爆发的情况在进军大西南的各部队中都有表现,再度印证了疟疾的流行病学理论。如第十四军由于“个别单位对上级有关卫生防疫工作的指示执行不坚决,因此非战斗减员太多。秋季全军发病26702名,其中疟疾12176名,占发病总数的45.6%”;第十五军在进入秋季的41天中,“全军发病13495名,其中疟疾8097名,占总发病的60.16%”^{[5]452}。

私、隐瞒上级的不良倾向,反对对药品、器材不爱护、任意铺张的浪费现象及贪污等坏行为。

3. 卫生教育方面主要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应加强消毒观念,“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力争现有卫生人员本年内技术提高一步。每个战士要了解普通卫生常识,懂得热带病的预防方法。卫生战士学会一般的卫生常识等”。多数部队都加强了对卫生人员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思想觉悟;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单纯治疗观点”^{[5]448}。为了提高随军南征医务人员的防疫水平,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印发《南方多发病与夏季急性传染病手册》(内有疟疾、天花、痢疾、伤寒等13种疾病的防治知识),要求医生、医助以及干部人手一册,随身携带并组织学习,各级卫生机关跟踪学习情况并及时上报,确保学习效果^{[5]441}。

三、群策群力:多管齐下斗疟“疫”

(一)从政治、思想及卫生教育入手,强化党的领导

(二)健全卫生组织,加强制度建设

1. 政治上主要是“在党内外不断地深入动员、教育,全体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卫生工作,形成群众运动,定期检查与总结”^{[5]446}。党员干部发挥表率作用,关心爱护战士。如四十二师一二九连干部悉心照料生病战士赵保南,助其康复^{[5]449}。赵保南病愈后,不但自己注意防病,而且夜间去厕所和上哨时还主动查铺,帮着战士盖被子,主动打扫卫生,成了连队卫生工作的表率。有的部队要求治疗中加强政治责任心,诊断时细致全面,杜绝疏漏导致的伤亡,发扬革命人道主义。部分战斗单位以“保证人马健康,进军大西南”为口号,要求卫生干部迅速制定计划,发起医务工作运动。卫生人员在进军中深入连队全心服务战士,保障部队健康,响应党和上级号召进军西南。

卫生组织及制度建设主要包括:1. 卫生战士:每班1名,排设1名卫生干事,连有卫生委员,行政上由各级干部(或卫生干部)负责领导。2. 会议汇报制度:卫生战士工作检讨会,每周1次,布置与总结工作;班向排2~3天汇报1次,排向连5天汇报1次。汇报内容:卫生检查及一般卫生情形、发病情形^{[5]455}。3. 制度上:建立正规医疗制度,强化组织纪律,要求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及时反馈情况。全体卫生人员需全力保障部队健康,目标为每月发病人数不超过全体人数的10%,力争95%的人员能够顺利进军西南。

(三)高度重视预防工作

2. 思想上着重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命令,全盘推动,树立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明确六个“反对”:反对松懈麻痹、享乐骄傲、自满怕困难的恶劣倾向,反对大医生作风,反对问病给药不负责任,反对医生不动手的大医生派头,反对假公济

对疟疾加强防治。一向在无疟或少疟区久居之

人最易感染,而且由于气温关系,滇南、滇西一带即使冬春季也有疟蚊滋生,所以进军大西南必须全力做好防疟工作^{[5]462}。各级行政领导重视行军的卫生工作,并派出专人对通过区域进行了环境调查,弄清了山地气候多变、冷热不均,以及瘴气区蚊子多等方面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各部队准备了生姜、辣子、大蒜、烧酒、蚊帐,其中四十二师一二四团全团带烧酒 900 斤,军直每人准备了生姜、大蒜 4 两^{[5]448}。

由于西南天气日趋炎热,疟疾发病率高,部队疾病减员剧增,为此,在莲塘后勤卫生会议上,兵团首长提出了保证“人马健康”的口号,并围绕这一号召提出了具体要求。四十二师提出“七多”“四要”“五不要”,即多喝水、多用冷水擦身、多洗头、多漱口、多洗晒衣服、多消灭虱子、多洗脚;要挖好厕所、要盖好被子、要喝好薄荷水、要熏好蚊子;不要吃生冷东西、不要到野外露天睡觉、不要用老百姓的碗筷(用时要用开水煮沸消毒)、不要盖油布、不要随便脱衣服^{[5]456}。为普及防疟知识,部队创作了朗朗上口的快板宣传口诀:

预防疟疾快板^{[5]479-480}

南方水多蚊子多,疟疾病症也较多。
夏末秋初正流行,大家注意防发生。
先发冷,后发热,头痛腿酸没有力。
环境卫生要搞好,室内烟熏蚊子逃。
夹被掀起做蚊帐,这个办法可试试。
睡在帐内更保险,蚊子不能钻进去。
得了此病快求医,打针吃药要隔离。

(五兵团 赵学泽)

这段通俗易懂的快板,概括了当时部队倡导的主要防疟要点,包括重视环境、物理防蚊、识别症状及及时就医隔离。这些防疟要点与后续部队推行的防疟措施有一定契合。

1. 防蚊叮咬。睡觉必须放下蚊帐,不宜穿短裤、打赤脚,伏案工作或静止不动执行任务等,尤须注意之。

2. 治疗患者。使其血液中没有疟原虫存在,减少传染之根源。

3. 杀灭虫卵。疟蚊产卵多在静止的水面,而不在流动水中,特别是池塘、水潭、湖泊、水流极缓的溪间、蓄水池、家畜饮水器,以及阴沟、水厕等处,是疟蚊最适宜的产卵场所。针对上述情况,整治环境:或排水以保持流畅;或用地填坑洼;对水井、水缸、蓄水槽等实行加盖;也可以在池、水潭养鱼以捕食孑孓,或栽种浮萍、菱角、芡实等植物,以遮盖水面;或用煤油洒于水面;或施用除虫菊等,效果都好。

4. 杀灭蚊虫。成蚊多在暗房、地窖、水井壁、鸡舍、茅屋等处隐藏越冬,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上述地方以烟熏消灭之,或用硫黄(一般每间屋 80~100 克)、辣椒、除虫菊末等混合物燃烧烟熏之^{[5]463}。这种方法除可用作预防虫害外,对其他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一定防疫性质。

5. 滴滴涕灭蚊。喷洒滴滴涕药液,不但杀灭成蚊及幼虫,对蝇、臭虫、虱等其他有害昆虫的杀灭也有效果。同时,药力维持时间久,一次施用后,若无特殊情况,药效可持续一两个月。施用前,须严格注意下列事项:

第一,滴滴涕在石油溶液内能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引起中毒。故须防止沾着皮肤及内衣。

第二,喷洒时戴口罩、手套。

第三,食物和食具坚决避免与滴滴涕接触。

第四,室内喷洒滴滴涕后,要流通空气,4 小时后再关闭门窗。

第五,滴滴涕液有引火性,施用前和施用后要谨慎明火,保证安全。

6. 服药预防。药物内服防疟,以阿的平为最好,每人每周服用量 0.4~0.6 克,每星期三、六或一、三、六分服(每次 0.2 克)。

7. 避免瘴气。在滇南、滇西地区,为避免瘴气,每天起床时间宜近七到八点钟,在此之前不要去郊外活动。遇有瘴气时,立即戴上口罩,或用帽子捂住口鼻。云南民谚说“太阳尚未起,不要起得早”,“若遇瘴气到,帽子是一宝”^{[5]463}。即指上述情况。

第十四军的防疟工作做得较有特色,效果也很明显。其四十二师一二五团二营卫生人员提出了“三勤”口号:手勤、腿勤、嘴勤。并在防病工作上提出了一些鼓舞性的口号,如“人马健康工作做得好,进军西南立功劳”“喝冷水要注意腹泻和痢疾”“出汗时不要脱衣,防止伤风和感冒”^{[5]448-449}等,这些也是他们行军途中的标语。行军前召开卫生干部会议,布置任务,研究具体的防病措施。如该部队提出“三热(水热、菜热、饭热)”“三平(鞋平、袜平、走路时脚放平)”“五好(吃好饭、喝好水、穿好衣、戴好帽、睡好觉)”^{[5]455},号召部队切实执行。

兵团卫生部针对行军中个人及饮食卫生中易被忽略的问题,于 1949 年 9 月 4 日专门发出《行军卫生工作指示》,要求各单位行政领导密切配合,做好行军中卫生防病工作,保障指战员健康,胜利完成进军大西南任务,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并提出以下七点补充要求:

1. 要重视预防工作,充分认识做好卫生防病工

作与保障部队各项任务完成的辩证关系,提高对预防疾病重要性的认识。

2. 卫生人员要经常深入班、排找病人,发现病人,特别是发现传染病病人,要及时进行隔离治疗,迅速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以防止蔓延。

3. 每到宿营地后,首先向当地了解疫情,及时向行政领导提出卫生防疫工作的建议,并要经常看望、检查病人,进行卫生监督,督促干部、战士洗脚、洗澡等。

4. 严禁吃零食和腐败变质食物,严禁吃生菜和喝冷水,发动大家多吃大蒜。

5. 展开护脚保温活动,经常查铺、盖被,防止受凉而引起疾病。

6.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蚊虫叮咬,晚上睡觉要挂好蚊帐。

7. 勿睡潮湿之地,经常换洗衣服,保持室内外和个人清洁^{[5]447}。

此次进军经过的地区,气候变化较大,有时白天热,晚上冷,还会遇到瘴气,又是恶性疟疾流行区域,为了保护指战员身体健康,在思想上、物质上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足够大蒜、生姜及药品(饮食单位与个人均带),加强收容工作,严密组织,重视各级交班制度,避免病号掉队。加强行政管理和卫生宣传,避免露营,防蚊虫叮咬。强化行军治疗工作(保证开水、药品供应,对伤病员做到“三快”“三好”,执行卫生机关任务,转变医疗观念,防治疟疾并普遍服奎宁,防止漏服),利用行军休息时间督促洗澡洗衣,并上卫生课讲防病常识,以形成自觉行动。在生活标准内改善伙食,且不宜一次过多吃肉^{[5]443-444}。

(四)及时开展治疗工作

面对病号猛增的严峻形势,二野各部按上级要求采取“两集中、一隔离、三合一”的突击治疗措施,即集中医疗力量与病号,隔离需隔离的病号,采用针灸+药物+理疗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了连队卫生战士的作用,整顿并健全了群众卫生组织,使突击治疗效果巩固在加强预防方面,有了可靠而广泛的群众基础。排以上干部重点学习南方多发病防治,自学与集中研讨相结合,聚焦疟疾、痢疾防治及针灸治疗;各团对卫生员开展短期训练,理论与针灸实操并重^{[5]443};连队卫生战士通过上课或集训接受卫生防病教育。

“人马健康”运动中,先突击治疗现有病员,充实部队战斗力。同时通过“三评”“一追”(即评病员多少、评预防、评健康,追寻病源),开展卫生防疫教育,推动运动深入。运动后全军病员由2438人下降到670人,其余1768人病愈归队。

药物治疗方面,第十四军开拔前“领取155万片阿的平药片、20万片硫酸奎宁,按兵团要求开展服药防疫工作。通过行政动员、上卫生课普及相关知识,规定各连卫生员保管药品,每人按21~30片发放,连队平均实际服用3000片。按健康状况分三种情况确定服药对象,服药者占全军人数85%。连队执行比机关彻底,对机关人员不愿服药等不良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及处分通报,干部带头服药效果好。服药后一周疟疾发病逐渐减少,少数人服药后食欲减少(退)但无其他不良反应”^{[5]469}。第十四军对恶性疟疾采取不等血检确诊,即速用盐酸奎宁+葡萄糖液静脉注射(缓慢注射,必要时6~8小时重复),能口服后即改口服药的治疗方案。

其他各种类型的疟疾,除给以必要的抗疟治疗外,还必须给予一般的对症疗法及护理,如采用阿的平治疗。

四、进军大西南时期防疫工作的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

任何一项工作,没有党的领导,要想取得成功都是困难的。搞好卫生防疫工作,必须在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经常性地做好检查督促与支持工作,所属各卫生机关必须经常请示汇报,不断给领导提供情况,协助出主意、想办法。实践证明,哪个单位的卫生人员与党政军首长联系紧密、配合到位,哪里的工作成绩一定是显著的。特种兵纵队之所以能在最短时间扑灭疟疾流行,主要在于各级党政军首长的全力支持,各级行政力量充分配合,卫生机关全力以赴,能够集中人力、物力突击治疗,医护组、饮食组都尽心竭力,打针服药,改善饮食,使病愈快,恢复健康也快。第二野战军卫生部的通报资料充分说明,要做好卫生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各方面必须积极配合,尤其是党政军首长的坚决支持,包括从政治上指导医务人员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要求医务人员切实加强对南方多发病的学习与研究,千方百计提高疫病防治水平。

(二)重视卫生教育

卫生文明、卫生行为、卫生模式的养成绝不是行政命令之所能达到的,它依赖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8]。防疫工作要收到成效,卫生教育要经常性地认真进行。首先,卫生管理必须严格。医务干部缺乏且业务水平低,导致医疗中打错针、乱用药、诊断不清、消毒不严等问题时有发生,增加病员的痛苦并造成不应有的死亡;虽制定制度但收效有限,根源在于未触及根本。其次,需加强在职干部业务学习。提高医务人员诊断治疗技术水平,避免诊断迟

缓及用药、操作失误,保障疟疾防治工作顺利开展。特种兵纵队疟疾发病率如此之高,除了受驻地环境及水灾影响外,医务人员对南方多发病的认识与估计不足,是应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5]453-454}。可见,在全体医务人员中进行教育势在必行,以避免遇到这种情况仍然措手不及。最后,充分发挥卫生战士的骨干作用。防疫注射时,结合部队中心工作进行为好,动员要深入,宣传解释要耐心细致。具体执行的卫生干部一定要政治责任心强,技术过硬,及时发现各种可以避免的缺点、错误^{[5]470}。

(三) 倡导预防医学

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防重于治已成共识,但如果没有必要的动员,人们要认识这一规律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实践,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解放大西南时期的整体卫生工作暴露出预见性差、部分人员和单位轻预防重治疗、对部队卫生防病工作开展不够、未充分发挥卫生战士的作用并协助行政干部加强管理教育,以致抓得紧时,情况就好些,稍有一些放松则卫生状况不好,病号也就多了起来^{[5]472}。甚至一些卫生机关与同志,还没有认识清楚防疫工作的重心,只注意治疗,而不注意事先预防。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其原因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具体实践方面的。各卫生领导部门要带头纠正错误观念,不仅要认真治疗已患传染病的病人,而且要积极预防传染病的蔓延和发生,防患于未然。

(四)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消毒隔离是最直接有效的防疫措施。解放大西南时期,全军各部面对病号迅猛增加的严峻形势,大都采取了“两集中、一

隔离、三合一”的突击治疗措施,在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一道,群策群力,初步建成了以“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为核心的疫情防控机制。随着革命事业的大发展,这些初具雏形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断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健全与完善,为新中国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 [1] 傅岩. 饮马金沙: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纪实[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 [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与大西南[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3]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8.
- [4] 李铁君,陈燕燕. 中医气象学与养生防病[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179.
- [5] 何正清. 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M].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 [6] 政协云南省泸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泸水文史资料选(第三辑)[M]. 怒江州:怒江州新闻出版局,1993:154.
- [7] 政协云南省泸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泸水文史资料选(第一辑)[M]. 怒江州:怒江州新闻出版局,1986:68.
- [8] 张玲,胡澜. 川陕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特点及历史价值[J].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2006(4):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ti-epidemic Admist Battles: On the Response to Malaria Epidemic During the Liber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WEN Jintong¹, MENG Baichen²

(1. School of Marxism,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1949, when the Liu-Deng Army liberated Southwest China, it faced a severe malaria epidemic. Under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Chiefs Liu Bocheng and Deng Xiaoping, the medical workers and commanders of the Second Field Army pooled their wisdom and efforts, boldly explored,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pproaches to combat malaria through practice, accumulating valuable experience in malari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provid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implem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iculously in the new era, an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maj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Liu-Deng Army; liber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Malaria; epidemic prevention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的建构及其成效探析

曾芳莲, 曾新华

(赣南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为解决医务人员短缺难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地方医师、改造国民党军医等方式,壮大中共医疗队伍。建构这些医务人员的政治认同,成为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规训、沟通阶级感情、回应利益诉求、建构认同桥梁等举措,提升医务人员政治认知,增强政治认同生成的暗示效应、从众效应和模仿效应,推进医务人员情感认同、利益认同和信仰认同的统一,形塑了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党建构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的实践,彰显了党把医疗卫生工作视为政治工作的独特理念,蕴含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底色,展现了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党务实高效的人才政策,为解读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国之治”密码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中央苏区;医务人员;政治认同;建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1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66-06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依附感和归属感,是凝聚社会奋斗合力的情感根基,可以被有意识地建构^[1]。中央苏区时期,为摆脱医务人员短缺困境,苏区政府动员地方医师、改造被俘或起义的国民党军医,使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如何有效建构这一群体的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教育规训、沟通阶级感情、回应利益诉求、建构认同桥梁等机制,使医务人员的政治心理经历了从被动服从到主动认可,再到坚定信仰的过程,使其情感认同、利益认同和信仰认同得以统一,培养了一批军中“红医将领”,创造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奇迹^[2]。本文通过探析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的建构实践及其成效,为解码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国之治”提供新的视角,为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提供历史借鉴。

一、强化教育规训:建构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的重要抓手

教育规训是指政治系统通过运用思想政治柔性教育和制度强制规范相结合的方式向人们灌输意识形态政治信息,提升其政治认知,使其思想和行为符合政治系统要求^[3]。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用教育规训提升医务人员对党和苏维埃革命的政治认知,使其逐渐认识和理解党的革命主张,为其政治认同生成奠定了基础。

(一) 政治教育:建构政治认同的柔性力量

中央苏区时期,医务人员政治立场不仅关乎伤病救治的医疗效能,而且直接影响革命力量的存续与发展。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改造医务人员,提出要“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4]⁴⁶,要让医护人员明白,卫生工作必须服务政治使命^[5]。瞿秋白同志强调,要把忠实服从于苏维埃的旧知识分子当作职员看

收稿日期:2025-05-27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ZZX23009);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9XDJ016);2024年度江西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项目(XCSX24207)

作者简介:曾芳莲(1981—),女,江西赣州人,法学硕士,赣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苏区卫生。

待,勉励他们积极工作,将其转化为支持革命的力量。1934年10月,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医院政治工作的训令》,旨在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政治引领,培养政治可靠、医术精湛的医者^{[4]31-32}。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医务人员的政治教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其运作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制度化的教育路径。选派政治教员进驻医疗机构,通过组织医务人员集中学习,使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个性化的引导机制。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领导人十分注重开展个别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国民党军医李治刚加入红军时,工作热情不高、积极性不足、对党的革命前途认知模糊。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先安排贺子珍与其进行日常思想沟通,再亲自“以具体事实材料联系其亲身体会作为教育依据”实施引导。这一“事实体验教育法”被证明为“折服其反动思想和树立人民思想的有力法宝”^{[6]322}。三是社会化的动员模式。毛泽东等领导干部常深入中药铺,给中医师们讲述革命道理,邀请他们加入革命队伍。1930年,毛泽东拜访当地名医戴济民,从人道主义阐释革命价值:“参加革命工作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人道主义”。从某种角度看,动员地方医师、改造国民党军医加入中央苏区医疗队伍,“不简单是红军中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带有严重政治意义和革命战争组织任务的,关系非常迫切”^[7]。

经过党的教育,不少地方医师和起义、被俘国民党军医逐渐了解并认同苏维埃革命,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中有带着自家药铺义无反顾加入红军的戴济民^{[4]47-48},有倾家荡产、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没有动摇献身革命决心的傅连璋^[8],还有亲身尝试用煤油治疗肺结核的李治等。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孙仪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他回忆说:“我之所以能为革命事业做点工作,主要是由于党贯彻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9]这一评价从微观层面印证了党对医务人员政治教育的实践成效。

(二)组织净化:规范形塑的硬性力量

队伍的纯洁性不仅是中央苏区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也是医务人员政治认同塑形的前提。对于损害革命利益的贪污腐化分子、反革命异己分子,以及屡教不改、恶劣成性且违反法令的害群之马,中央苏区坚决将其清除出革命队伍。第二十二军医生彭耀庭和第一军团医生彭国荣,故意违反苏维埃法令,虐待伤病战士,最终被开除军籍^[10];第四预备医院副所长王祖坤和第三后方医院院长钟碧楚,因严重贪污

腐化被撤职查办^[11];福建四都医院李桂寅,谋害伤兵,被公审并枪决。中央苏区政府以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像消灭“病菌原虫”一样把他们清除出革命队伍^[12],不仅有效保持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队伍的纯洁性,塑造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良好形象,而且为强化医务人员的政治认同筑牢了组织基础。

拉兹洛说:“认识事物就是将其纳入我们已知的某物,并通过以前的知识将其区分开来。”^[13]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教育,严肃医疗卫生队伍党风党纪,这与国民党政治腐败、军纪败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不断刷新中央苏区医务人员对党和苏区革命政治制度的既有认知,使其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历史发展方向,强化了其对党的政治认同。如被俘医生陆寿铭、吴永怀,二人在经过多次思想斗争之后,终于认识到去白色区域是死路一条、是亡国的选择,毅然决定留在苏区全身心干好革命工作。这正是认知转变和认同强化的具体实践。

二、“一切为了伤病员”:建构医务人员的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是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感性认知,主要包括内心体验和情感倾向,是政治认同得以持续发展的心理驱动力。情感认同越强烈,政治认同越容易达成。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化的情感培养路径,构建以“一切为了伤病员”为医疗卫生工作核心价值的实践体系,为建构医务人员的情感认同提供结构性支撑。

(一)关爱伤病兵,激发医务人员情感共鸣

伤病兵优待制度是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以条文形式禁止对伤病兵进行辱骂或讥笑,明确规定了及时供给茶水、细心覆被等具体照护措施^{[14]207}。同时,首长慰问伤病员常态化。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多次到医院看望慰问伤病兵,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肯定他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在身体复原后再次回到前线为革命服务。这种制度化、情感化并重的关怀,不仅彰显了党的政治本色,更塑造了新型官兵关系。地方医师和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对伤病员怀有天然职业同情。他们曾亲历过国民党政权对伤病兵的冷漠和忽视——如伤病兵因缺医少药导致伤口化脓、恶臭难闻,受伤后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的残酷现实^{[15]226-227},而红军内部官兵平等、生命至上的氛围,与他们此前所处等级森严、漠视生命的旧环境形成强烈反差,情感天平开始向党 and 苏维埃政府倾斜。同时,他们也逐渐意识到自身正处于全新的社会环境中,而这种认知进一步增强了其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 坚持人道主义, 医治白军伤病员

“医治白军俘虏”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的政治主张。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对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待遇要与红军伤兵完全相同,要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为上好了药、发足了路费的敌方伤兵提供返回敌军的便利^[14]¹⁰²。国民党长期通过“共匪见人就杀”“共匪虐待俘虏”等谣言进行欺骗宣传,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但一些地方医师和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来到中央苏区后,亲眼见证了党践行民主平等、优待俘虏政策:在中央苏区的医院里,红军医护人员不仅认真为白军伤病员清洗伤口、包扎换药,给他们温暖和鼓励,还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他们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原有认知,使其逐步形成了对中央苏区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宿感。正如一些国民党俘虏兵所感慨的:“尤其是白军中受伤的同志,红军同样收容上药医治,说红军对俘虏的残忍也就充分证明是造谣欺骗了。”^[16]党一贯坚守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医治俘虏伤病员的实践得到彰显,这从客观上树立了党的良好形象,成为吸引地方医师及被俘虏、起义医师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感召力。

(三) 心系大众疾苦, 解决百姓“生疮害病”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救治伤病员的同时,想方设法解决普通民众“生疮害病”问题。为保障民众基本医疗需求,苏维埃政府不惜重金聘请专业医生,在各个区设立公共看病场所,为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于缺乏家庭照护的鳏寡孤独、老幼残疾等特殊群体,苏维埃政府专门组建残疾院,将他们妥善收纳入院,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和医疗上的保障。1930年,定龙在《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中有生动记载:“农民过去有病请医不起,只有问菩萨一条路,现在农民不但发生政治问题要提出意见到苏维埃解决,就是身上小小的病患,都有苏维埃解决”,“现在的闽西已经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成了两个绝不同的世界”^[15]²²⁸。这段描述展现了中央苏区医疗保障体系给地方民生带来的改善。因此,尽管当时国共两党战争形势复杂多变,但国共两党在政治治理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鲜明反差,使医务人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生活和忠诚为民的根本立场。这种认知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不懈奋斗的信念。

三、“优待国家技术人员”: 建构医务人员的利益认同

政治认同建构的基础是多维的,利益认同最为

关键。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这一论断揭示了利益诉求在政治行为中的根本性作用。脱离了利益关切,就失去了激发政治成员产生政治情感的原动力。如果苏维埃政府的治理长期无法满足医务人员的利益需求,即使短时期内能通过强化意识形态促使其服从强制性权力,但其对党治理能力的认可也会在长期被漠视中逐渐弱化乃至消解。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地方动员和国民党起义或俘虏的医务人员实行“优待国家技术人员”政策,既保障了其生存需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治系统的输出满足了其成员的需要”^[18]⁶⁸,从而激发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生成的原始动力。

(一) 实行“高薪”制, 保护其经济权益

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在中央苏区属于“高薪群体”。党和政府根据医务人员技术水平高低,实施差异化的津贴标准^[19]。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俘虏的李治、范英武、张杰等人,凭借其较高的技术水平,每月可获得10~20块银元的津贴;来自蒋鼎文部的蔡汶,加入红军后担任红军总军医处医务所医生,每月享受60元的津贴;宁都起义后投身苏区的吴子罕,担任红校工科教员期间,每月也有50元的津贴^[20],尽管待遇与其在国民党军队时存在差距,但与中央苏区高级领导人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自主培养的医务人员每月只有1至2块银元的津贴相比,他的待遇已经十分优厚。党和政府优待被俘和起义医务人员的政策,使其切实体会到经济层面的优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苏区内纵向比较中所获得的“物质承认”,有效弱化了原有身份的标签,强化了他们对新政权的归属感。部分人员进而产生革命自觉性,主动提出降低津贴,如陈义厚等四名医生主动要求减少20元津贴以支持革命未获批准后,便一次性捐赠同等数额。该行为表明,医务人员已将个体经济利益让位于革命需要,完成了从“技术雇佣者”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角色转换。

(二) 实行民主平等, 保证其政治关爱需求

医务人员不仅关注经济利益的保障,还注重自身政治生活的民主和被尊重。对于具备卓越技术的地方名医,党和苏维埃政府以高度仪式化的方式邀请:1933年,毛泽东亲赴汀州邀请傅连璋赴瑞金主持医务工作,随后中央局特许其列席中共中央干部会议,听取并讨论党内报告,在技术人才中传递“政治信任”的明确信号。对战场上俘虏过来的军医,中国共产党严格遵循“不刺激、不侮辱、不搜腰包”

的宽大政策,将他们视为朋友^{[6]322},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去留意愿:凡要求返乡者,一律发放路费并举行群众欢送大会;凡选择留下者,即纳入革命队伍,享受免费住房、子女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等一系列政治关怀。同时,通过红军首长探访、群众慰问、新闻宣传表彰等方式,将技术精英纳入苏维埃政治生活的中心场域,既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以可感知、可复制的程序,强化医务人员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从而提升其投身革命卫生事业的积极性与持续性。

(三)发挥工作专能,达成其价值体现诉求

“革命只有与个体的需求重合,才会吸引他们参加革命组织和参与革命活动。”^[21]医务人员尤其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实际工作安排上,苏维埃政府没有因为医务人员个人经历而区别对待,而是充分信任,根据业务专长分别委以相应重任。具备专业医疗技术的人员,安排他们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并选派到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更名为中央红色卫生学校)兼任教员,如李延年、孙仪之、李治等^[22]。对于兼具专业知识和领导组织能力的医生,则积极提拔他们担任领导干部职务,李治就担任过红军第一医院院长、医务主任等职务。为确保医务人员能够专注于医疗工作,中革军委明确规定:“红军医务人员未经中革军委批准,不得调充他项工作。”^[23]为满足医务人员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与开展学术交流的需求,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发起并组织中华苏维埃卫生研究会,创办《红色卫生》等专业刊物,推动诊治处方经验交流,鼓励医务人员开展研究以及发明创造,奖励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满足其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

医务人员在这种被信任与被保护的環境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主动投身医疗技术创新,为苏维埃卫生事业出谋划策。如傅连璋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成功用苏打水和雷弗努尔水治愈出血性黄疸和脓包性疥疮,此举被人们誉为“苏维埃医疗界的新发现”^[24]。

(四)关怀日常生活,保障其生活需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务人员的生活保障,依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对于未婚者,协助物色配偶使其安心工作;对于已婚者,允许携带家属到中央苏区生活,且家属同样享受生活优待^[25]。李资平回忆,在食盐极度匮乏时,红军医院为其开小灶,每月确保供应半斤食盐^[26]。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消除了留驻中央苏区原白军医生的顾虑,使其逐步产生优越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进而开始对中央苏区生活有了新的期待。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言,

若人们“被意识形态所激发的期望正在付诸实现”,这将“有助于使他们服从各种政治对象”^{[18]324}。

四、劳动实践、典型示范:建构医务人员信仰认同

信仰认同作为个体内心深层的政治价值判断标准和精神支柱,是驱动行为的核心力量。从信仰认同发生的心理机制来看,个体的认同往往源于所经历、所接触、所感受到的事实。党通过组织医务人员参与劳动实践、表彰先进典型等路径,推动医务人员与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融合发展,进而强化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事业和革命事业的自信心、责任感、光荣感和使命感,为信仰认同的建构搭建实践桥梁。

(一)组织劳动实践,凝聚阶级感情,建构信仰认同

政治心理虽源于个体,但人作为个体以群体形式存在的属性,决定了其政治心理必然受到群体互动的影响。组成群体的个人往往具有共性,即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及相互传染而趋向一致,并存在将暗示观念即时转化为行动的倾向^[27]。中央苏区时期,党通过组织医务人员参与劳动实践,包括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养鸡、打猪草,农忙时节帮助农民插秧收割,开展驻地大扫除和宣传卫生知识等活动,推动以身体为媒介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认同建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理念。医务人员在与当地群众的互动和共同劳动中,逐渐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群众对党的价值认同,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并感染医务人员,进一步强化其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投身革命的意识,从而扩大了信仰认同生成的实践效果。

(二)表彰先进典型,借助榜样力量,坚定信仰认同

典型示范是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选树先进典范,激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红星报》《红色中华报》专门开设“红板”专栏,对思想政治表现突出、工作认真负责及积极开展发明创造的医务人员予以表彰。例如,专栏宣传了医生杜志贤发明“茶岭膏”和“小佈丸”的事迹,表彰他把十二块大洋的个人津贴充作讲义费。专栏还报道了医务教员李治发明蒸馏法并亲身试验的事迹,对其探索精神予以肯定。表彰先进典型能快速引导其他医务人员通过观察先进者的行为模式,并逐渐产生与之相似的心理体验,进而形成与榜样一致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及政治意向,由此扩大信仰认同的生成效果,增强医疗卫生人员对党的政治认同,形成共同的价值共识和行为取向。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

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劳动实践与先进典型示范所激发的暗示效应、从众效应和模仿效应,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同步塑造着中央苏区医务人员的政治认同。苏区医务人员在这一重塑过程中,积极投身苏维埃革命和卫生事业建设,并在革命实践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和自身全面发展的统一。

五、党对医务人员政治认同建构的主要成效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旧医务人员的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大批医务人员投身中央苏区的革命医疗事业,既有傅连璋、戴济民等本地医者,又有陈义厚、戴正华、李治、姜齐贤等起义或被俘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积极投入红军的医疗救护工作^[28],并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信仰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如李治、陈义厚、戴正华分别于1931年、1932年、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傅连璋、戴济民、李治、陈义厚等四人还因医术高超、救治伤病员无数,被誉为“中央苏区医界四大金刚”,在苏区医疗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一) 医务人员从技术本位到人民本位的思想蝶变

受教育背景和职业特性的影响,地方医师及被俘、起义的国民党军医初入中央苏区时,对苏维埃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普遍缺乏认知,部分人甚至心存芥蒂,他们参加医疗救护工作,多从“小我”出发,聚焦于“能否治”“如何治”等纯医疗技术问题。在党的教育动员及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下,医务人员的认知逐渐向政治层面拓展,开始思考医疗卫生工作“为了谁”“依靠谁”等根本性问题。他们深刻认识到,党领导的医疗卫生事业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其发展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而将个体“小我”融入人民利益和革命事业的“大我”。戴济民担任工农革命红色医院院长期间,始终秉持“医院与群众相连,不损害群众丝毫利益”的理念,主动解决群众的医疗和生活难题,成为医务人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傅连璋则坚决追随红军踏上长征之路,他说:“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我受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育,红军是为祖国为人民的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有许多伤病员,然而没有医生,我责任所在,义不容辞。”^[29]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强烈的阶级觉悟,也彰显了他坚定的责任担当,展现了他由单纯的医疗技术人员成长为革命志士的蜕变过程。

(二) 医务人员的医者红心铸就苏区医疗脊梁

地方医师、被俘或起义的国民党军医经过教育后,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形成了服务革命的内在动力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成为推动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发挥专业特长,通过开办红军医院、设立医务学校、开展卫生运动、普及卫生知识、探索高效救护体系、制作医药器械、创新医疗技术等方式,全方位参与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实践成果,回应党的教育和改造。例如,傅连璋将福音医院迁至瑞金,组建了中央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看护学校”,亲自编写教材并悉心指导学员,在关键时刻多次成功救治毛泽东及众多高级将领,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周恩来赞誉他为党的“有功之人”。李治在长征途中以精湛医术成功为周恩来实施了“烂穿结肠壁”高风险手术,成为革命战争时期医疗救急的经典案例。陈义厚探索并构建起了“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救护体系,在其担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期间,经常通宵达旦编制教材、撰写教案,被誉为“红军卫生学校永不熄灭的蜡烛”。以上事例充分印证了这些医务人员在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创建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六、结语

“人才的成长涌现通常具有在某一地域、单位和群体相对集中的倾向。”^[30]中央苏区医务人员的成长历程,正是群体共生规律的生动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教育规训、人文关怀、利益引导等多元建构的综合作用下,大批医务人员实现政治认同的从无到有,并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卫生工作理念,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功利服从,逐渐蜕变为主动奉献、诚心服务,最终铸就政治忠诚、医术精湛的红色医魂。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的实践,既彰显了党把医疗卫生工作纳入政治工作范畴的战略眼光,蕴含着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和一心为民的政治底色,也体现了党务实高效的引才、聚才和用才策略。这一历史实践不仅为解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国之治”密码提供了新视角,更为新时代党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王敬尧,王承禹.再识“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分类建构[J].政治学研究,2023(5):84.
- [2] 冯彩章,李葆定.红医将领[M].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1:1.
- [3] 范迎春.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政治认同生成机制研究[J].山东社会学,2011(12):90-91.

- [4]江西省教育学会.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 [5]冯彩章,李葆定. 贺诚传[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67.
- [6]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 [7]高显恩,高良,陈锦石.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128.
- [8]饶作勋,王芒森. 医国着先鞭:纪念傅连璋将军[M]. 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4:22.
- [9]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创业艰难: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33.
- [10]陈志方. 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N]. 红色中华,1933-03-09.
- [11]关于我们的报纸[N]. 斗争,1933-12-12.
- [12]是病菌是原虫,卫生机关要把他消灭下去[N]. 红色卫生,1933-03-18.
- [13]拉兹洛. 系统、结构和经验[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1.
- [14]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6]俘虏兵口中的红军对白军士兵客气[N]. 红色中华,1933-03-18.
-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 [18]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19]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史研究中心. 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38.
- [20]何友良. 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9.
- [21]邓密生. 中央苏区党的宣传动员工作研究[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8.
- [22]张兴荣,章远庆. 江西医学教育史[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0:109.
- [23]发起组织卫生研究会征求会员宣言[N]. 红色卫生 1933-03-05.
- [24]苏维埃医药界的新发现[N]. 红色中华. 1934-06-12
- [25]陈毅,肖华. 回忆中央苏区[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260-261.
- [2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东党史研究资料(33辑)[M].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16.
- [27]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2.
- [28]任伟. 红军将士的死伤与救治[J]. 苏区研究,2018(1):57-58.
- [29]傅连璋. 在毛主席教导下[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26.
- [30]王通讯. 人才成长的若干规律[N]. 人民日报,2004-02-0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Medical Personnel by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ZENG Fanglian, ZENG Xinhua

(School of Marxism, G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ddressed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personnel by mobilizing local doctors and repurposing medical officers from the Nationalist army to join the Party's medical teams. Building political allegiance among these medical workers became a crucial political task for the Party during this era.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educational discipline, fostering class solidarity, addressing their material needs, and constructing bridges of identification, the Party enhanced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of medical personnel. It strengthened the suggestive, conformity and imitation effects that shape political allegiance, advancing the unity of emotional,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ll those efforts molded a group of "red doctors" who were "politically steadfast and technically proficient." The Party's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political allegiance among medical workers highlighted its unique approach of viewing healthcare work as part of political work. It embodied the Party's foundational commitment to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demonstrated its pursuit of hum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reflected its pragmatic and efficient talent policies. This provides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deciphering the early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medical personnel; po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邕钦”“廉玉”盐道史迹与风俗探微

庞广仪¹, 陆一萍²

(1. 南宁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2.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学生科,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邕钦”“廉鬱”盐道沟通两广、千年传承、联系各族、传承文脉、沉淀风俗。盐道民居既传承传统又兼容并蓄,以固态形式将文化沉淀在历史岩层中。商民尚武成风,使钦廉、玉林等地名将辈出、彪炳史册。食盐转运为各族人民带来了珍贵的饮食佐料,并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腌腊风味。“邕钦”“廉鬱”盐道及其所沉淀的地方风俗,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盐道;史迹;风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2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72-08

“盖民生日用,惟米、盐不可暂缺者。”^[1]“邕钦”“廉玉”盐道源远流长,孕育了诸多文化风俗。本文对此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邕钦”“廉玉”盐道的千年繁盛

钦廉沿海滩涂平坦,日照时间长,自古以来就是产盐佳地。“廉郡东北枕山,西南濒海”^[2],海岸线漫长,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和优良的港湾,滩涂平坦且绵延数百里,所产食盐质地细腻,颜色白里泛蓝,品味上乘,世称“廉盐”,远销桂、湘、滇、黔等地。

南朝齐建元元年(479年),朝廷于越州(治所在今浦北石埭镇)沿海设盐田郡^[3],此为钦廉规模化产盐之始。延至北宋,朝廷将钦州、廉州、高州、化州、雷州盐场整合为广南西路盐区,位列全国八大盐区之一,而廉州位于该盐区的核心地域,所出产的“廉州盐”以味美、粒匀、色佳(天然的海蓝色)而饮誉于世,与“南珠”并称“廉海双璧”。至清朝末年,从今天合浦山口至东兴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盐田遍布,《北海杂录》如是记载清末钦廉沿海食盐生产的盛况:“田在海边,底填以石,外筑小池一方,再外筑大塘一方,大塘开一窦门,遇每月潮信涨发两次时,海水即由窦门进入大塘,日色佳,则晒一二日,用龙

骨车名水车,引入小池,再晒一二日,然后运入石底盐田,如清晨运入盐田,晒至下午,便可收盐斛矣。……盐田以合浦属之石头埔居多,钦州属之东兴亦不少,尤以钦属之黄龙所出为最佳。”^[4]

自宋朝以降,钦廉食盐沿袭着二成供应周边州县(钦州、廉州、灵山、防城四属)、八成供应广西其他州县和滇黔两省东南部地区的分配格局。“邕钦”盐道转运路线如下:钦盐、廉盐集中钦州起运,溯钦江经陆屋、沙坪,至平塘江后入西江水系至邕州,再行配送桂西南和滇黔东南地区;廉盐另一部分溯南流江支流武利江至武利后转陆路到沙坪,经平塘江入西江水系转运。“廉玉”盐道转运路线如下:由廉州起运,溯南流江至玉林船埠,转西江水系至梧州,再行配送至桂北、桂中地区。

“邕钦”“廉玉”盐道转运之困在于水陆辗转,前人为解决该难题而提出开凿运河之策。明朝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下诏开凿“茂北运河”,沟通南流江畔的盐运重镇茂林(玉林)和西江水系的北流江,以解决“廉玉盐道”转运之困。“茂北运河”仅开工小部分工程,即因为“靖难之役”“成祖征交趾”等原因而耽搁,之后更是不了了之。

收稿日期:2025-05-13

基金项目:2024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年度项目“‘北部湾—西江’盐道历史研究”(24ZSB001)

作者简介:庞广仪(1977—),男,广西钦州人,历史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

由于“茂北运河”工程始终未能实施,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前广西长期是内陆省份,食盐奇缺,各族人民所用的食盐很大一部分经由玉林进行水陆转运。清朝末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朝廷将南流江辟为广西食盐进口主通道;民国年间,广西省政府在南流江畔船埠设立了盐务局,专门负责食盐转运。今天船埠依然留存“大码头”“丘左臣盐铺”“汇丰银行”“船埠盐务局”“玉林州商会船埠分会”“玉博蒸汽汽车站”“粤剧名旦红线女演出戏台”等颇具价值的历史遗址,不难想象昔日食盐水陆转运之繁忙。

而为了解决“邕钦盐道”转运之困,前人不断踏勘沟通郁江和钦江的转运通道,并由此而催生了“平陆运河”的构想。

近年来,学者们孜孜不倦地翻阅史料寻找“平陆运河”的最早规划者。柴奇在《中国水运》中刊文指出:1912年,法国水利专家勘察郁江和钦江水系分水岭后提出了开凿“平陆运河”的构想^[5]。但这只能说明法国水利专家较早地用现代科技手段勘测并规划“平陆运河”,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已经有了开通郁江和钦江水系分水岭的构思和行动。另有学者认为开凿“平陆运河”的设想和行动可以追溯至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定交州“二征”之乱期间,为解决水陆转运之困,曾率军疏浚郁江横州段的“乌蛮滩”,州人感念其恩,筑“伏波庙”以祀之;而“乌蛮滩”临近今天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以马援之雄才伟略,理当采取过开凿江海通道的行动。如果这一说法能找到确切的史料和文物依据,“平陆运河”的构想可以前溯近两千年。但笔者对此提法持有保留意见,理由如下:其一,古代开凿运河成本巨大,中原王朝既然已经开通了长安—汉水—长江—湘江—灵渠—桂江—浔江—北流江—鬼门关—南流江—合浦—交州的陆海通道(无论汉之马援还是唐之高骈,皆由此道入交州平乱),没有必要为了一两次重大军事行动而在相邻之地新凿运河;其二,史书明确记载了东汉马援和唐朝高骈为经营交州而疏浚南流江航道的行动,高骈为避开海运之险还专门开凿了“天威径”(“谭蓬运河”),而凿通郁江—钦江水系工程浩大,如有相关行动甚至构想,不至于于史无载。

在对钦廉食盐转运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后,笔者抛出如下观点:宋代之后钦廉食盐产销两旺、转运繁忙,这才是先人萌生开凿运河以通江达海的客观动力。兹从史料与实证两方面对此进行剖析:

自宋朝以降,广西乃至湘、滇、黔部分府县仰食钦廉食盐。《明神宗实录》如是记载:“产盐在广东,

行盐在湖广,运盐在广西。”^[6]一代又一代盐运挑夫来往于邕州、钦州之间,用脚板踏勘多条便捷通道。需要说明的是,“平塘江口—沙坪—陆屋”虽然也是邕钦盐运的重要通道(“平陆运河”的构想即源自此),但清代之前盐商和挑夫们更多是走“横州—烟墩”之间的“丹霞盐道”。明初大才子解缙曾作七言绝句《钦州》,其诗云:“万里南交指顾问,不应取路镇南关。横州便出钦州去,十日藤舡往复还。”^[7]其中“横州便出钦州去,十日藤舡往复还”指的是从横州出发,翻越郁江和钦江水系分水岭,即可乘坐小舟(藤舡)往返钦州。明人吴廷举曾主管钦廉食盐转运业务,留下诗作《过洪崖山望横槎》:“海北巡行遍九场,洪崖立马看封疆。一山界限东西粤,两水分流左右江。瘴疠不愁侵我辈,风烟渐喜近吾乡。横槎今昔逢交旧,应有新吟和海棠。”^[8]诗中的“海北九场”,指的是明代“海北盐课提举司”所辖的钦、廉、雷、琼诸州盐场。《明史·地理志》有载:“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以海北海南道属广西行中书省。四月,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六月,以海南海北道(钦廉地区)所领并属焉。”^[9]“洪崖山”位于今横州、灵山交界处,因其属丹霞地貌,故古人称为“洪(红)崖山”;“两水分流左右江”则指郁江、钦江以“洪崖山”为分水岭。明崇祯十年(1637年)8月,旅行家徐霞客游览广西山水,从贵县乘舟入横州境,“经乌蛮滩、麻埠、谢村、清江、白沙堡。十五日抵横城,并游宝华山寿佛寺。十六日早饭于宝华,下山五里,出大路,又五里,出峒前岭。望东北凤凰诸石峰在三十里外,令人神往。而屡询路远,不及往返。十七日平明发舟,雨色凄凄,风时顺时逆。舟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小水自江南岸入,江名南江。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陈步江(今横州南乡镇埠江口)码头舟船如鲫、穿梭不停,徐霞客为之惊叹不已,并通过询问船工而知晓该埠为钦州食盐的重要转运地,遂在游记中备注道:“钦州盐俱从此出。”^[10]笔者在灵山县烟墩镇实地考察时,发现“丹霞盐道”大体保存完好,无论是为便于人畜攀岩而开凿的“脚印”,还是为便于独轮车翻山而开凿的“辙道”,都清晰地保留在丹霞山崖之上。明清两朝钦廉归属广东,钦廉两州上呈的官方文书亦多经“丹霞盐道”送至横州,再由横州经郁江送至广州。所以,官方不仅在“丹霞盐道”上驻军守护(今天“丹霞盐道”上仍保留“牛靴寨”“石鼓寨”等军事色彩浓厚的地名),而且多次修整(分水岭的山脊上保留有“横州城内林钟杰修整桥路,福有攸归,同治甲戌春

重修”的石刻,而勒石记功的林钟杰在清代同治年间曾任横州知州)。图1是“丹霞盐道”遗址:



图1 灵山县烟墩镇“丹霞盐道”遗址

(中间为供人畜攀登的“脚印”,两边是供独轮车走的“辙道”,自摄图片,2023.12)

“平塘江—陆屋”的盐运通道鼎盛于清代。清代食盐走私泛滥,私贩为躲避官方征稽而有意绕开“丹霞盐道”和横州码头,改从钦江陆屋埠上岸,翻越分水岭后进入郁江支流平塘江,再从水路转运邕州和桂西南各地。有鉴于此,朝廷将钦廉食盐的征稽、转运中心由横州西移至平塘江和郁江汇流之处(今横州平塘江口,“平陆运河”起点)。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廷对两广盐运实行“改埠归纲”之法:将粤盐运销区域划分为东、南、西、北、中、平六柜,名为“引地”;每个“引地”都有明确的食盐配额以及销售范围,盐商不能越界运输销售,违者将受到严厉惩处。“改埠归纲”旨在平息盐商之间的纷争,维护食盐正常生产和运销秩序,同时也便于盐税的稽征和管理。其中,“平柜”统管钦廉食盐的转运与征稽,总埠设在平塘江口,其行盐区域和配额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清代钦廉食盐经平塘江口中转后,运销粤西、桂南和桂西一带,是各族人民生计之所系。平塘江口作为“廉盐之总”“平柜总埠”,在有清一代可谓帆樯林立、商贾荟萃、百年繁盛。“平塘江口—沙坪—陆屋”是转运钦廉食盐的便捷通道,盐商、挑夫络绎不绝地来往于两埠之间,《灵山县志》如是记载:“该江(平塘江)在清顺治初年开始行船,北部湾食盐都用船运至陆屋,转运至沙坪下船,再运到江口,转上大船远销湘、云、贵等省。平时有船200—300艘,最多时达370多艘,全是木质小船,每艘载重1~5吨,人力撑拉,日运量100吨以上,民国时期同样繁忙、兴盛。”^{[11]778}水陆转运的艰苦使成千上万的盐商、挑夫疲惫不堪,同时也增加了官方盐务管理的难度,有鉴于此,开凿运河、疏通盐道的构想

一直在官方和民间反复酝酿。所以,笔者认为:“平陆运河”的构想不能归功于某位精英或者某个团队,“邕钦盐道”千年繁盛,历代盐商、挑夫们一直孜孜不倦地用脚板踏勘翻越郁江和钦江分水岭的转运通道,这才是催生“平陆运河”构想的现实动力。

表1 清朝道光年间平行行盐情况

府(州)属	埠地	引额(235斤/引)
廉州府太平府 注:兼配西柜生盐	合浦县	2742.68
	钦州	1232.99
	灵山县	4049.48
玉林直隶州	玉林州	2598.72
	博白县	1864.82
	北流市	2075.11
	陆川县	1136.44
	兴业县	1341
思恩府 注:兼配西柜生盐	武缘埠	5350.33
	百色埠	5062.85
南宁府 注:新宁、隆安、横州三埠兼配西柜生盐	宜化县	3050
	新宁州	1487
	隆安县	3299.50
	横州	3299.50
	永春县	5030.54
	上思州	1297
	崇善县	226.70
	养利州	3988.72
	左州	745
	永康州	1226.77
宁明州	800	

资料来源:(清)阮元,伍长华.《两广盐法志》卷四,“六省行盐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新中国成立之后,“平陆运河”的构思与规划工作一直在开展。西津水库建成后,平塘江水位上升,沙坪港发展成为钦州市内河航运枢纽。1994年该港扩建,设计货物吞吐量为50万吨^{[11]779}。因此,“平陆运河”人工开凿河段也一度规划为“沙坪—陆屋”19公里河段,而这正是昔日盐商、挑夫所翻越的郁江、钦江分水岭路段。该河段可使南宁出海航路缩短约600公里。今天,“平陆运河”路线经过了科学勘测和反复论证,除了连接平塘江、沙坪与陆屋外,还将延伸出海直至钦州港,同时疏通郁江航道,使5000吨级海轮可直达南宁。虽然重新规划和设计的内河航道通江达海,但为了彰显对历史的尊重,依旧沿用了“平陆运河”旧名,其线路走向与传承千年的“邕钦盐道”基本相同。科学规划和命名的决策将使“平陆运河”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见证历史发展的重要纽带。

二、传承传统,兼容并蓄的盐道建筑——以南流江沿岸的客家民居为例

“邕钦”“廉玉”盐道两岸历史建筑林立,很值得

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兹以南流江沿岸的客家民居为例进行剖析。因为南流江流域客家先辈大多数是清代两广盐运实行“改埠归纲”后陆续从广东、江西等地迁入的,他们绝大多数都参与过食盐的经营与运输,故客家民居很适合作为研究盐道民居的典型素材。

南流江流域客家民居分布于北海、合浦、浦北、玉林、博白等市县。民居聚落一般沿河而建(距离南流江干流一般不超过5公里),呈带状分布。南流江不仅是食盐运输通道,也是沟通中原与岭南、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这体现在民居既有传统围屋、庄园,又有近代兴起且融汇外来文化元素的碉楼、洋楼等建筑之上。兹分列如下:

第一,传承传统,自成一体。堂横屋是南流江流域客家民居的基础结构。堂横屋是庭院式建筑(又称“天井地居式民居”)重要代表之一。作为庭院建筑的一支,客家堂横屋万变不离其宗,都以房子环抱天井作为基本结构,建筑的原点为祖宗厅堂,左右两边各自分设了四排庭院的建筑,每排庭院之间有四条横屋相隔,使得彼此之间既“别有洞天”又相互联系。在每两条横屋之间,还有四进房屋,以及天井来通风和采光。这种屋连屋、院接院的结构,既庞杂又不失秩序的特点,呈现出典型而又浓厚的客家民居风格。

第二,天人合一,法乎自然。国学大师钱穆指出,“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12]。客家民居建筑之美,还在于其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法乎自然”思想。

所谓“天时”,就是房子奠基的时候,选取日子和时辰要慎重,强调既要“顺乎天”又要“利于人”。所谓“地利”,就是选择在山环水抱、藏风聚气、郁郁葱葱、水土丰茂的“风水宝地”奠基立宅。一般而言,客家庭院选址都会在“阳地”(山南水北为“阳”),最忌选在“阴地”(山北水南为“阴”),同时讲究三山(左“青龙”、右“白虎”、后“玄武”)环抱宅院,宅院前面良田成片,视野开阔。

“天时”“地利”之说看似神秘,实际上是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古人务农须顺时而动,故作息起居也要顺应“天时”规律,建房子是关乎家族百年兴衰的大事,当然更要顺时而动。而“地利”则是因为古代人们生活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环境,选择能够挡风避寒、同时水土肥沃的地方居住方能发展农业。因此,看似神乎其神的理念背后,其实还是体现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第三,敬天法祖,崇德重教。客家先民十分重视

血缘和宗族传承,这种理念也反映在民居中,他们通常以儒教的礼制规范聚落空间,突显出较高的等级准则和序次。

客家先人聚族而居,祠堂和祖先神位则是家人和族人的精神寄托所在,客家庭院以祠堂或者祖先神位为建筑原点。其构造往往庄严肃穆。民居围绕祠堂或者祖先神位进行排列,围绕家族繁衍、传承为中心进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秩序的建构。一般来说,家族里的长辈或长房通常会居住于靠近祖厅两侧的厢房,而各个家庭则被分配到其他的“小单元”中起居,其居室分配的原则是按照辈分高低、长幼由里到外进行。在各自的“小单元”中,都有厅堂。厅堂则常用于教育孩子和接待客人。

客家先人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院落建筑的结构以方正为主,寓“天圆地方”之意。各厅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来布置厢房和廊房。此外客家民居一般会将“进士第”“举人第”等字样篆刻在院落的门匾上,同时厅房上还时常悬挂着“孝、悌、忠、恕、礼、智”等礼仪学术语的牌匾,旨在激励后人继承先辈的美德,保持良好的家风。

第四,屋城共体,住防合一。自古岭南盗匪横行、野兽出没,客家先民移居至岭南地区后,为抵御强盗和野兽的袭击,民居建筑的防御效能也在强化。南流江流域的客家庭院布局像一座功能齐全的小型城堡:首先在大院的四周挖掘一条深壕,其次在深壕的后方砌起围墙,围墙牢固且厚重,角楼矗立。此外,在大门的构造上,通常是由趟拢门和实木平开门来共同协调防御,并在门口安设有防御功能的瓮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聚族而居的百姓在院落周围加筑高耸厚重的城墙,城墙转角处设高塔,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防御建筑形式——坞堡。客家围屋是否来源于坞堡,学术界对此颇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客家大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中原地区“屋城整体、军住合一”的建造理念,并将其应用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复杂的岭南地区^[13]。

第五,中西合璧,兼容并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也在民居建筑上留下了烙印。下文以博白县大平坡水楼为例来阐述南流江流域客家民居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博白大坪坡水楼位于县城东南郊的大良村,门口面向子午线,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常用的“坐北朝南”方位规划。该宅院外表采用西洋“外廊式”建筑装饰风格,楼体采用进口建材构筑,高耸而坚固;同时保留传统客家围屋的防御理念,利用削凿池塘

引水的方法,将建筑放置在一个巨大水池中间,再现传统的“坚城深池”防御体系,在无意间又形成了“水上别墅”之景^[14]。

综上所述,南流江流域客家民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天人合一,法乎自然”“忠孝持家,仁义处世”“住防合一”和“兼容并蓄”等,同时又因地制宜地根据岭南地理和人文环境进行局部改造,并融入了西方建筑文化的特色,是弥足珍贵的地域文化遗产。

三、盐道沿线沉淀千年的尚武之风

由于岭南山高路险、民情复杂、盗贼终年出没,商人在缺乏武装保护的情况下运送食盐长途涉险,实无异于小儿抱万金走夜路,险情迭出、人财两空的情形司空见惯。所以,两宋三百年钦廉各场食盐转运主要采取官运形式,即朝廷派兵武装押运食盐至销场。明代虽然为了节省行政开支而招募商人转运食盐,但险要路段仍由官兵武装护送。

清初仍然实行食盐官运,至乾隆年间全面实行“官督商运”,以舒缓行政和军事压力。而这一举措直接引发了以下社会现象:

其一,“挑南盐”蔚然成风,相沿成习。

“挑南盐”泛指新中国成立之前粤、赣、湘、黔、滇各省青壮年劳动力往广东沿海(钦廉四属时辖于广东)一带挑贩食盐。《灵山县志》载:“所称乾脚、盐丁俱系挑贩夫名。”^{[15]168}其中的“乾脚”“盐丁”俱为灵山本地食盐挑夫。乾隆朝“官督商运”之后,“挑南盐”主要是民间自发行为,具体人数于官书中难觅踪迹,但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印证其规模之庞大。笔者幼时曾听祖父回忆:解放前灵山、浦北一带男性青壮年劳动力都会在农闲时期赴北海、钦州等地挑盐前往南宁或玉林等地,以换取微薄薪酬补贴家用;挑盐队伍小则数十,多则上千,蔚为壮观。学者谭肇毅(祖籍南宁刘圩,广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和姚世琰(祖籍玉林,广西职业师范学院退休教授)的父兄皆曾参加过“挑南盐”,他们亦向笔者回忆:解放前南宁、玉林等地大部分农村男劳动力都有“挑南盐”的经历。可见,“挑南盐”在当时的粤西钦廉四属以及桂南地区都是农民的重要副业。

其二,贩私盐之风屡禁不止。

清廷名义上“官督商运”,但政策一旦松弛就很难重新收紧,食盐走私由是盛行于粤西、桂南一带:“钦州、灵山等处与粤西接壤,肩贩私泉破案尤多。”^[16]钦廉私盐贩子的骁勇善战,即连皇帝也为之惊叹:“同一广东之人,而为盗贼私泉者,则强悍无比。”^[17]由于私盐泛滥、禁不胜禁,清廷不得不采取

妥协之策,对私盐征税之后加盖官印,视同官盐出售,直所谓“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18]。

其三,民间武装贩盐相沿成习,沿袭成俗。

“官督商运”虽缓解官方行政和军事压力,但又将人身和财产风险难题留给了盐商和广大民工。盐商民工为了自保,不得不采取商武合一的举措:其一,盐商本人也熟习武艺并亲自率队武装贩盐(古代长途贩运的商队往往也是武装集团,如著名的麦哲伦、哥伦布、汪直、郑芝龙等都是商业武装的首领);其二,发迹后的盐商高薪延请民间武装人员(主要是会党)护送商队;其三,民工为防路上不测之险,也纷纷习武自保。久而久之,盐商与会党武装相互混杂,商武合一。

盐道商武合一的现象可以从苏三、苏三娘的史迹中得以佐证。据《灵山县志》记载,苏三是灵山富商,同时也是会党武装骨干,曾与陈开(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与李文茂共同领导广东“红巾军”起义,后移师广西建立“大成国”,称“镇南王”)、张国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投入清营,累官至江南提督、江南大营副帅)等会党骨干往来于“邕钦”“廉玉”盐道之上,以武装贩盐为主业,同时也劫持官府饷船,救济穷人。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苏三娘夫妇的武装贩盐队伍拥众数千人(当时玉林、钦州、廉州驻防官兵皆不超过1000人),往返于钦廉盐场和西江各埠之间。新中国成立后,灵山耄耋向史志工作人员回忆:苏三夫妇曾率盐商武装围攻灵山县城,城郊父老亲睹苏三娘勇冠三军之武艺和飒爽绝伦之英姿^{[15]1362}。苏三为仇家所害之后,苏三娘率领余部2千余人加入太平天国。太平军自广西北上至定都天京期间,苏三娘麾下500女兵为全军前驱,晚清状元龙启瑞作《苏三娘行》^{[15]1379}赞之:

城头鼓角声琅琅,牙卒林立旌旗张。
东家西家走且僵,路人争看苏三娘。
灵山女子好身手,十载贼中称健妇。
猩红当中受官緋,缟素为夫断仇首。
两臂曾经百战余,一枪不落千人后。
名闻官府尽招邀,驰马呼曹竞气豪。
五百健儿听驱遣,万千狐鼠纷苍逃。
归来洗刀忽谩骂,愧彼尸位高官高。
……

苏三娘及其麾下女兵多出身寻常人家,但披挂上阵之后却能横扫千军、所向披靡,论者多以为奇事。这一现象与她们的出身关系密切:“邕钦”“廉玉”盐道沿线区域商武合一且世代传承,即便是女子也自幼跟随父兄习武防身。南流江沿岸有旧谚

云：“十三岁，挑盐去，莫在家啃父母”，说的是穷人孩子早当家，男子十三岁就成为劳动力。女子在早当家方面同样不遑多让，及笄之年便随父或随夫以护商贩盐为业，故武艺超群、骁勇善战殊不为怪。

再以刘永福和冯子材为例，两位名将及其麾下骨干多有在盐道上活动的经历。历史教科书中提到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人”，但其祖籍还可以上溯至博白县东平镇富新村。通过采访富新村刘氏族可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该村劳动力还长年往返于“廉玉”盐道上，刘永福先辈正是循盐道迁徙到钦州。而史料也记载，刘永福早年就生活在盐船上，而且也跟苏三娘一样加入了会党，练就了娴熟的武艺，积累了基本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并为其日后军事生涯锻造了核心团队。刘永福麾下黑旗军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都战功显赫、威震中外，而黑旗军的诸多骨干来自“邕钦”“廉玉”盐道沿线地区，与刘永福在早年贩盐的时候就配合默契。中法战争前期清军战事吃紧，清政府所倚重的滇、桂边军面临着巨大压力。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招募钦、廉、高、雷、琼诸州子弟兵组建“萃军”^[19]。钦、廉、高、雷、琼诸州子弟此前未历战阵，但很快在镇南关一役中勇挫强虏，彪炳史册。法军装备精良且久经沙场，清廷此前派出多是精锐之师，统兵将帅如唐炯、唐景崧和苏元春等皆当世能臣名将，然皆连番败绩。“萃军”初募之众，如果没有习武风气的长期积淀，很难想象他们能力克久经沙场之悍敌而成就盖世战功。

前文提到南流江客家民居保留着浓厚的军事色彩，而事实上，钦江、南流江沿岸的近代圩镇建筑、广府民居、少数民族民居同样军事色彩浓厚，众多城堡式建筑林立盐道上。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昔日盐道沿线尚武之俗。如坐落于南流江畔的名将陈铭枢故里就是比较典型的准工事型民居聚落：由数个互为犄角的城堡式院落构成，每个院落房屋外侧墙壁高厚而且枪眼密布；在院落墙角上设有高大的炮楼，形成一个防御式的碉楼；院落正门前凿有半月形水池，既契合传统风水理念又能起到“护城河”作用；每个院落都可以单独御敌，又可以与其他院落相互支援。陈铭枢自小生长于准军事环境之中，所受熏陶之浓烈是不难想象的。陈铭枢的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就以钦廉子弟为骨干（根据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碑文显示，牺牲的军官20%来自钦廉四属）。在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勇挫锐气正盛的日军，迫使其三易主帅。

除了陈铭枢之外，民国时期钦廉四属还涌现了邓本殷、陈济棠（粤系军阀首脑）、香翰屏（粤系军阀二号人物）、邓世增（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和林翼中等粤系军政骨干。

玉林五属同样名将如云，容县更有“小奉化”之称。民国时期涌现了马晓军（新桂系军阀奠基者）、黄绍竑（新桂系军阀前期二号人物）、黄旭初（新桂系军阀后期三号人物）、廖磊、夏威、刘岷、马拔萃、凌压西、韦云淞、陈雄和叶琪等新桂系骨干将领（新桂系的其他首脑如李宗仁、白崇禧虽是桂林人，但粤语却颇为流利，与集团骨干大多出身粤语片区的玉林、容县等地不无关系），他们都在中国近代军事史和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虽然今天学界和坊间更乐意将民国时期的桂军骁勇归结为明代广西土司“狼兵”武风传承。但笔者在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中注意到：近代钦廉、玉林名将的先辈大多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岭南盐运“官督商运”之后从广东等省循盐道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和广府人，他们的故居大多位于“邕钦”“廉玉”盐道沿线区域，他们本人或者先辈大多有在盐道上挑、贩食盐的经历。这与太平天国运动领导骨干多为客家移民之后的背景有着相似之处。可见，盐道本身也是商道、兵道和移民通道，其千年兴盛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崇商尚武之风，这可以说是近代桂南粤西名将劲旅辈出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之一。

四、独具特色的盐道腌腊习俗

千年盐道文化赋予地方饮食特色风味，尤以腌腊食品独具一格。今天我们更多从品尝角度理解腌腊食品，但前人更多考虑的是食物储存和卫生问题。

古代历朝皆“以农立国”，绝大多数百姓也“以农安家”，而其前提是社会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但岭南地区地方贫瘠，广西更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即在国家承平、风调雨顺的时期亦难以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一旦天灾人祸更是出现饿殍遍野的惨景。为解决粮食短缺困境，岭南百姓普遍采用腌、腊的方式存储食材：岭南地区由于气候炎热，粮食蔬菜容易腐烂变质，而储存方法主要就是和盐搅拌食物，然后采用腌、腊方式加工（具体方式因地而异），使食物脱水之后组织内大量渗入食盐，既能保存营养又能经年不坏。同样是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困境，岭南军民在山川河泽之间多方发掘食材，并逐渐形成“杂食”之俗，无论花鸟草虫，还是动物内脏等边角料，皆想方设法使之成为食材。“杂食”之俗虽是弥补粮荒的有效手段，但容易感染疾病，因为岭南素称“炎瘴之地”，病毒繁衍迅速，而动植物则

是病毒重要携带者(不少有过挑盐经历的老人曾目睹同伴因饥渴难耐而食用生水、生果而致命)。而食盐是廉价的药材,具有“除风邪,吐下恶物,杀虫,去皮肤毒。调和脏腑,消宿物,令人壮健”^[20]的功效,是消毒杀菌必备之物。

钦廉盐场和“邕钦”“廉玉”盐道千年繁盛,为各族人民腌腊食物提供了前提条件。兹对盐道沿线腌腊风味小吃进行简列:

钦廉沿海渔民多采用食盐加工海产品。由于有南流江、钦江和红河等河流注入,北部湾海域饵料丰富,是著名渔场,主要海产品有鲷鱼、沙丁鱼、金线鱼、金枪鱼、比目鱼、鲭鱼、鱿鱼、虾、蟹、贝类等。古代渔民出海打捞,短则数日长则累月不还。而海产品是高营养高蛋白的食物,隔夜后即产生蛋白质降解物,会损伤食用者的肝、肾功能。为了确保海产品品质,渔民一般都会携带食盐出海,将鱼虾捕捞上来之后,置于鱼舱中和盐搓洗、搅拌,在腌制脱水之后再悬挂于船头、船尾上晒制。经过腌制、晒制等工序制作的海鲜物轻价昂,便于保存和运输,更因别具风味而广受欢迎,其中“北海鱿鱼”“廉州腌鱼”“钦廉咸鱼”和“钦州蚝豉”等都声名远扬。2018年,“钦州蚝豉”制作技艺入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1]。

盐道沿线的各族人民都有制作腌鱼、腌肉的习俗。明代西江流域的大藤峡为农民起义军所盘踞,钦廉、粤东食盐转运桂林、柳州和湘南的水路为之受阻。正德三年(1508年),左都御史陈金率军征讨大藤峡义军。双方为减轻伤亡而订立“鱼盐之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鱼盐与之。诸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不得为梗。”^[22]其实非只大藤峡,盐道所经过的思恩府右江河段(治所在广西平果县旧城),官方也与少数民族武装订立类似约定。曾有学者将“鱼盐之约”理解为官方向义军馈赠“鱼”和“食盐”,但义军长期盘踞江上,水性娴熟,理当不缺鱼,故“鱼盐”应为腌制保存鲜鱼的食盐。今天,西江流域沿岸地区,各族人民依然保留着制作“腌鱼”的习俗,腌鱼成为地方美食。

“邕钦”“廉玉”盐道上的腊味同样声名远扬,尤以南流江沿岸所产“牛巴”风味为佳。“牛巴”,是岭南百姓对腊制牛肉干的称呼。今天,南流江沿岸各地“牛巴”厂家和作坊林立,皆自称“祖传”“正宗”。如玉林有“邝氏”“牛大叔”“文十六”“吴二记”和“黎伍福”等多家,灵山县武利镇“牛巴”亦有“张良记”“张强记”“韦四”和“颜美香”等多家。可见,南流江沿岸“牛巴”是盐道沿线千年饮食风俗沉淀的

产物。自两宋以降,盐道沿线已有“牛巴”制作之俗。宋人所著《清异录》“赤明香”有载:“赤明香,世传仇士良家脯也,轻薄甘香,殷红浮脆,后世莫及。”^[23]古代“牛巴”多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累死之牛制作,古人远涉千里贩盐谋利,牛、马等驮畜疲惫而死者司空见惯。盐贩、挑夫们一般不会随便丢弃死牛,而是就地取材,用盐将牛肉腌制,然后火烘日晒而制成“牛巴”。今天人们可能对于先辈用病残之牛制作“牛巴”之举难以接受,但由于过去食材极度稀缺,而牛更是农家之宝,无论是朝廷律令还是民间村规都严厉惩处食用耕牛行为。如清朝末年,在华外国人依靠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而在中国贩卖、食用耕牛,朝廷还为此特地照会外国人,敦促其尊重中国人不擅食牛肉的习俗:“中国素无耕牛、食用牛之分,凡养牛者,皆为耕种之用,故多肥壮。其老而无用者,始卖供人食。”^[24]所以,即便是用病残之牛制作的“牛巴”也属难觅之佳肴,盐贩、挑夫们一般并不舍得用来路上解饿,更多是用作商品换取盘缠,或者留作节庆待客之用。

今天“牛巴”的制作,仍以食盐为重要辅料:选用新鲜上好牛肉,先将杂筋剔除,再顺牛肉纹路切成二三指宽、十几厘米长的薄牛肉片,然后加入丁香、八角、白砂糖、酒、精盐等多种调味料腌制,时间约需40分钟,取出摊在通风透气的竹筴上,置于阳光下晾晒,或以炭火烘焙,待其干后,用花生油炸约15分钟,沥干即成“牛巴”,便可直接食用。在近代下南洋大潮中,南流江沿岸牛巴被广大侨工带到南洋各埠,并由此在南洋声名远扬。2010年,玉林牛巴获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美誉;2011年,玉林“牛大叔”牛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2018年,“灵山武利牛巴传统制作技艺”入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1]。

五、结语

自古以来,钦廉食盐质量上乘、享誉海内。“邕钦”“廉玉”盐道转运繁忙,辐射远至粤、桂、滇、湘诸省。以“邕钦”“廉玉”盐道为纽带,各族商民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沉淀并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发掘、研究与保护。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的推进,“邕钦”“廉玉”盐道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与保护。

参考文献:

- [1]郭秉. 粤大记(下)[M]. 黄国声, 邓贵忠, 点校,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904.

- [2]广东省地方志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二)乾隆廉州府志(卷一)[M]. 广州:岭南出版社, 2009:4.
- [3]萧子显. 南齐书(第14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4]梁鸿勋,梁澜勋. 北海杂录[M]. 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印制,1905:13.
- [5]柴奇. 关于平陆运河建设及治理思路的探索[J]. 中国水运,2023(10):62-65.
- [6]顾秉谦. 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21.
- [7]解缙. 解学士文集(第3卷)[M].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初刊本,1562:243.
- [8]吴廷举. 过洪崖山望横槎[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38.
- [9]张廷玉. 明史·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62.
- [10]徐霞客. 徐霞客游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259-260.
- [11]灵山县志编纂委员会. 灵山县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 [12]钱穆. 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未来可有的贡献[J]. 中国文化,1991(1):36.
- [13]吴庆洲. 客家围龙屋的哲理意匠与生态智慧[J]. 建筑史学刊,2023(2):22-31.
- [14]凌世耀,刘斯. 博白大观[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89.
- [15]灵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 灵山县志(第4卷)[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 [16]张茂炯. 清盐法志(第236卷)[M]. 苏州:中华民国盐务署,1920:11.
- [17]阮元,伍长华. 两广盐法志(第1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5.
- [18]屈大新. 广东新语[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400.
- [19]甘伟珊,周文涛. 桂籍历史人物[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211.
- [20]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77.
- [2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桂政发〔2018〕58号[R/OL](2018-12-20)[2024-10-13]. http://www.gxzf.gov.cn/zfwj/zzqrmzfwj_34845/t1509602.shtml.
- [22]张廷玉. 明史(第317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221.
- [23]陶谷. 清异录[M]. 李益民,等,注释.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3.
- [24]青岛市档案馆. 山东巡抚为牛只出口事与俄国领事的往来照会(1911年4月13日)[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6:45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Traces and Folkways of the “Yongzhou-Qinzhou” and “Lianzhou-Yulin” Salt Routes

PANG Guangyi¹, LU Yiping²

- (1. School of Law and Sociology,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2. Student Affairs Section, Guangxi Communications School,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Abstract: The “Yongzhou-Qinzhou” and “Lianzhou-Yulin” salt routes connected Guangdong and Guangxi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were important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nks too. Due to the prosperity of salt routes, unique local folk customs developed. The buildings along the salt routes not only inherited traditions but also embraced inclusiveness. Due to the martial arts culture among the people along the salt routes, many outstanding generals emerged. The transportation of salt had brought precious seasonings to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forming a unique “pickled food” flavor. The “Yongzhou-Qinzhou” and “Lianzhou-Yulin” salt routes and the local folk customs they had precipitated were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left to us by our ancestors.

Key words: salt routes; historical traces; folkways

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中的情感体验层次构建

——以 ARpedia 数字绘本为例

刘岩妍, 刘艺璇, 袁毅*

(太原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山西 太原 030008)

摘要:数字化技术重构了儿童绘本的阅读生态,但情感体验的理论支撑不足制约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高质量发展。以诺曼情感体验三层次理论(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为框架,结合 ARpedia 数字绘本案例,系统阐释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的情感体验生成机制。通过本能层的感官刺激设计、行为层的交互沉浸优化及反思层的教育价值深化,提出情感导向的数字化绘本创作模式,为出版业平衡技术赋能与儿童认知规律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情感体验层次;互动性;审美体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80-05

绘本,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视觉叙事手法为儿童打开了情感与认知的新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这一战略方向也为儿童阅读领域带来了深远影响。绘本的呈现方式在数字化浪潮中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化绘本作为这一转型的产物,与传统绘本共同构成了儿童阅读的两大重要形式。根据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突破1.48万亿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4),显示出数字化内容产品的强劲增长势头。其中,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等数字化阅读形式在儿童阅读领域表现尤为突出。2023年《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4.7%,较2022年的73.4%提高了1.3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数字化绘本在儿童阅读中的普及率和影

响力正在稳步提升。

除了出版量和销售额的显著增长,数字化绘本在阅读方式、互动性和个性化定制等方面也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数字化绘本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如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动画、音效等,丰富儿童的阅读体验。此外,数字化绘本还可以通过互动功能,如点读、拖拽、涂鸦等,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和创造力。同时,数字化绘本还可以根据儿童的阅读习惯和喜好,进行个性化推荐和定制,为儿童提供更加精准的阅读服务。

优秀的数字化绘本作品需通过多模态设计实现儿童情感唤醒与认知沉浸的双重目标。这不仅体现在数字化绘本的选题内容、数字技术运用、画面等常规方面,更在于创作者关注儿童的情感体验需求。那么,如何增强数字化绘本的情感体验?如何运用情感体验理论指导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本文旨在通过收集和分析近年来数字化绘本的发展数据,以情感体验层次理论为基础,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的方法论,从儿童情感的三个层面出发,系统地在每一个层面探究数字化绘本

收稿日期:2025-02-18

作者简介:刘岩妍(1981—),女,山西太原人,博士,太原工业学院设计艺术系教授,研究方向:品牌数字化与视觉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信作者:袁毅(1978—),男,山西忻州人,太原工业学院设计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品牌视觉艺术。

情感体验的可能性,结合优秀绘本案例的解析,阐述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的情感体验。

一、情感体验层次理论

情感体验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通过感官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产生的内在情感反应和体验^[1],对于儿童绘本阅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心理过程不仅深刻影响着儿童对绘本故事内容的理解程度与接受度,更在其情感发展和价值观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绘本阅读研究领域,情感体验理论占据着重要地位。它聚焦于读者如何通过绘本中的文本与图像,深入理解故事情节,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元素,进而与之产生情感共鸣^[2]。该理论强调绘本的叙事方式、视觉呈现以及读者的个体特质在情感体验中的核心作用^[3]。绘本作为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学形式,通过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构建出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世界。儿童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能够深入体验喜怒哀乐、爱与恐惧等多种情感状态,这种丰富的情感体验对于他们的情感发展以及社交技能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效应^[4]。

西北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安德鲁·奥托尼、威廉·雷维尔与唐·纳德·诺曼通过一系列研究,将人类的大脑活动划分为三个层次: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5],进而构建了情感体验层次理论,这一理论为分析人类与产品互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提供了有力的框架。在本能层,人们直观地感知事物,通过感官认知形成初步印象;行为层则聚焦于用户与产品互动时产生的情感体验,涉及用户的操作与反馈;反思层作为高级思维活动,是对前两个层次的深化,用户在思考与评估产品时,形成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儿童绘本的数字化情感体验研究中,我们可以依托这三个层次进行深入探讨,更好地理解和指导数字化绘本的出版中儿童阅读情感体验的发展逻辑。

在数字化绘本出版实践中,情感体验层次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本能层面上,设计师通过色彩、形状等视觉元素,充分契合儿童的感知与喜好,构建出充满吸引力的绘本世界;行为层可借助富有趣味性和可操作性的交互功能设计,引导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参与、探索,持续深化阅读体验的情感层次;反思层则通过深入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塑造,引导儿童进行深入思考,推动其情感认知发展与情感能力提升。数字化绘本通过整合多媒体元素和交互功能,为儿童搭建更为丰富、深入的情感体验空间。设计师和开发者在实践中,通过精心策划的音频、音效设计,增强绘本的情感氛围与角色表现力;利用交互

设计提升儿童的参与度和情感投入;通过富有深度的情节和人物塑造,激发儿童情感共鸣与表达。这些策略的实施,有效地在数字化绘本中实现了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三个层次的情感体验,为儿童带来更加全面、深入的阅读体验。

二、本能层驱动:情感体验的自然起点

本能层作为情感体验的基石,是人类对外界环境情感信号的基础天然反应机制^[6]。在儿童与数字化绘本的互动中,这种情感体验源自直观的感知与直觉,其核心在于绘本提供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重感官刺激,尤其体现在绘本的外观层面。

1. 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中的本能驱动元素挖掘

在儿童绘本的数字化出版过程中,本能驱动元素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绘本通过色彩、声效和动态影像等多模态设计,构建了兼具动态吸引力与认知启发性的阅读场域。色彩作为绘本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的情感体验具有显著影响。鲜艳、生动的色彩不仅能够迅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还能通过色彩心理学的作用,引发他们积极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彩虹小镇》这部数字化绘本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丰富的色彩和生动的画面来传达家的温馨与浪漫。绘本中,每个角色和场景都采用了鲜明的色彩,如温暖的橙色、柔和的粉色和宁静的蓝色等。绘本中以渐变的橙色和红色描绘的日落场景,利用暖色营造出温馨和浪漫的氛围。通过运用不同的色彩组合和色彩变化,绘本成功地营造出了不同的情感氛围,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深刻感受到故事中蕴含的情感内涵。

同样,声音与动态呈现也是数字化绘本中重要的本能驱动元素。声音与画面带来的原始刺激,通过模拟真实世界中的声音和动态效果,为儿童打造一个更加生动、立体的阅读环境。在绘本中,逼真的音效和流畅的动态画面让儿童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这除提升数字绘本自身吸引力外,还增强了儿童的参与感和代入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绘本所传达的情感与价值观。因此,声音与动态化呈现与色彩相辅相成,这种情感传达方式不仅增强了绘本的艺术感染力,还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故事中的情感内涵。

2. 本能层驱动对儿童情感体验的初始激发

数字化绘本在本能层面通过丰富的视觉元素和动态呈现方式,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这种设计上的趣味性不仅增强了儿童对绘本的参与意愿,更有助于他们深入理解和感受绘本故事中所蕴含的情感。

当对本能层的刺激带来愉悦感时,不仅能够促进儿童的学习,也更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创意。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艾丽丝·伊森博士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能够拓展儿童的思维空间^[7]。如果数字化绘本的外观设计无法有效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即便内容再精彩,也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价值。因此,在数字化绘本的设计过程中,确保儿童能够从外观层面获得强烈的情感体验至关重要。此类设计策略通过感官刺激激活儿童认知本能,并转化为探索行为的持续性驱动力。

三、行为层解码:互动参与中的情感体验深化

情感体验在行为层面的体现,紧密关联于实际使用过程及功能的实现。儿童在数字化绘本阅读中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源于实际探索与感受的阅读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绘本内容、交互方式及操作体验等多个方面。

1. 交互设计的情感沉浸机制

数字化绘本中的情感表达和故事情节与儿童生活经验紧密相连,通过展现角色的情感变化、故事冲突及解决等情节,儿童得以认识并理解不同的情感状态,进而学会如何表达自身情感。这种情感认知的培养有助于儿童建立积极的情感态度,提升情感调节能力。根据认知心理学中的“主动建构理论”,儿童在与绘本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自主操作和选择,能够主动建构对故事的理解和情感体验。这种交互机制为儿童提供贴合个体偏好的探索路径,促使其深度参与叙事建构。Smith 和 Anderson(2018)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交互性设计能够增强儿童的参与度,使其更加沉浸于故事情节,从而深化情感体验^[8]。同样,Jones 等人(2020)的研究也表明,交互性设计可以促进儿童对绘本内容的理解和记忆,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情感体验^[9]。这种设计使儿童不仅仅是阅读的接受者,更是故事的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点击、拖拽、选择等操作与绘本中的元素进行互动,进而影响绘本的呈现方式和内容。这种互动体验不仅增强了绘本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还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故事中的情感内涵。

2. 操作引导的认知适配策略

鉴于数字化绘本在技术操作方面可能存在的难度,从儿童行为层次出发,当绘本采用复杂交互手段时,需设计明确、清晰的指示引导系统。这有助于避免儿童因误解而导致交互失败,确保其能够自信、顺畅地探索绘本内容。具体而言,良好的操作引导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可以运用直观的图标和简明的文字说明,为儿童提供清晰的操作提示。

此外,通过合理的界面布局和交互设计,可以确保儿童能够自然而然地与绘本产生互动行为。同时,还应关注儿童在使用过程中的反馈和体验,不断优化引导系统,使其更加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和操作习惯。

四、反思层启迪:情感体验的升华与启迪

情感体验反思层与信息、文化以及产品的含义和用途紧密相关。在情感体验的反思层面,需从两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一是从儿童作为接受者的角度,考量数字化绘本对其情感发展的长远影响与启迪价值;二是从出版与创作的专业视角,分析如何在本能层与行为层的基础上,对绘本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思索与评估。

1. 反思层对儿童情感体验的长远影响与意义

数字化绘本的题材内容决定反思方向。在数字化绘本的创作中,那些蕴含深刻内涵、能够触动儿童内心世界的主题,常常能够引发他们持久的思考与感悟。这些主题可能源于生活的细微之处,或是那些简单却充满智慧的道理,它们通过绘本这一媒介得以生动展现,为儿童的情感世界注入丰富的养分。当儿童沉浸于绘本阅读,不仅欣赏画面,聆听故事,更与绘本的主题深度对话与心灵交流。这些主题可能涵盖友情、亲情、勇气、坚持等多元面向,通过故事情节与角色塑造的具象化表达,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共鸣与情感投射,从而深化情感体验。

数字化绘本的制作参与增进情感联系。当儿童亲自参与数字化绘本的动手制作或创作环节时,他们不仅是在体验一种全新的互动方式,更是在与绘本内容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通过亲身参与,儿童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绘本的主题与内容,他们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思考、探索与尝试,与绘本中的角色和情节进行更为深入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儿童对绘本内容的记忆与理解,更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制作过程中他们会投入大量的情感和精力,与绘本内容建立起独特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会在儿童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成为他们日后回忆和分享的重要内容。

2. 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中反思元素的巧妙运用

从出版与创作的视角来看,反思层面主要体现在对创作的深度思考与持续改进上。创作者需通过反馈不断改进绘本,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在创作过程中,出版社与创作者需要不断反思绘本在主题、内容、图像、文字以及交互设计等方面的表现,确保其真正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与审美需求。通过市场调研、读者反馈与专家评审等方式,收集并分析关于绘本的各方面信息,为后续的改进提供有力依据。此外,反

思元素还体现在对绘本整体风格的把握与创新上。出版社与创作者需根据市场趋势与儿童阅读习惯的变化,及时调整绘本的风格定位,确保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将新技术应用于绘本创作中,为儿童带来更为新颖、有趣的阅读体验,也是反思层面不可或缺的部分。

五、ARpedia 数字系列绘本:情感体验创作模式的实践探究

ARpedia 是由韩国 Woongjin Thinkbig 公司设计开发的一款交互式数字化英文学习绘本,凭借其创新性设计荣获 2021 年 Reddot 红点国际设计大奖^[10]。作为数字化绘本的典范,该产品通过高保真视觉呈现、动态交互机制与教育性内容融合等多模态叙事,构建了儿童情感体验的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优化模型,在用户黏性与教育效能层面均表现出显著优势。

1. 影色交融:外观设计中的情感表达

在本能层设计维度,通过多模态感官整合实现情感唤醒。磨砂材质的长颈鹿支架作为物理交互载体,通过触觉亲和性降低技术介导的疏离感,同时为 AR 投影提供空间锚点,形成虚实融合的认知界面。这种设计通过独特的外观形式激发了儿童的愉悦情绪,进而促使其对学习内容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

色彩设计采用高饱和度与高明度的配色策略,有效平衡认知负荷,降低负面情感唤醒阈值。例如,在恐龙主题中,深色的霸王龙与鲜艳的黄、绿、红色背景相结合,既突出了主体形象,又增强了视觉吸引力。此外,ARpedia 与 iPad 设备的结合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使纸质书中的色彩在电子屏幕上更加鲜艳明亮,显著提升了儿童的视觉享受。

多模态叙事通过声画同步性增强情感引导效能。以恐龙主题为例,低频音效与动态追捕镜头的时空耦合,触发儿童的具身认知反应,实现从情境沉浸到主题探索的无缝过渡。随着旁白与音乐节奏的变化,儿童的注意力被引导至主题内容,激发了对“恐龙探究”的探索欲望。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绘本的趣味性,还通过多感官刺激深化了儿童的情感体验与认知参与。

2. 浑然一体:交互界面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从行为层的维度深入剖析,ARpedia 数字化绘本产品展现出了卓越的用户体验设计。其主题内容选取、交互方式创新以及界面操作优化,共同构建了高度沉浸式互动体验环境,为儿童用户带来了深刻的阅读感受。

在主题内容的设计上,ARpedia 系列创作紧密

围绕儿童生活及兴趣点展开。通过选择日常生活元素,如交通工具、小动物以及传统节日活动等,产品成功将故事情节与儿童的生活经验相融合。这种融合增强了故事的代入感,助力儿童多角度体验,理解故事情感表达,深化阅读情感层次。

在交互方式的创新上,ARpedia 巧妙地结合了实体道具与虚拟技术,实现了跨平台的无缝互动。通过 AR 与投影技术的运用,儿童能够在实体纸质书与虚拟屏幕之间自由切换,进行实时互动。例如,当儿童使用实体道具在纸质书上进行操作时,虚拟屏幕上的内容会即时发生变化,这种即时反馈机制极大地提升了儿童的参与感和沉浸感。此外,ARpedia 通过情境自适应的交互模态,支持儿童基于叙事语境选择差异化参与路径。例如,实体卡片涂鸦与虚拟动画生成的双向映射机制,实现了从具象操作到抽象认知的转化。

在界面操作的设计上,ARpedia 同样展现出高度的人性化设计。尽管产品拥有丰富的交互功能,但操作界面却简洁直观,易于儿童理解和使用。通过文字与动画相结合的提示方式,产品能够有效地引导儿童完成相应操作。对于复杂的多步骤操作,ARpedia 还提供了分步提示功能,以确保儿童能够顺利完成操作而不至于因操作不当产生中断。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儿童的操作体验,也确保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3. 思维共鸣:读者反思与创作者反思的和谐共振

从反思层的角度来看,ARpedia 数字化绘本的主题设计凸显出其明确的教育目的与深远的人文关怀。以英语学习为主导,融入丰富的常识科普内容,这一策略不仅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更能够为他们提供持久而深刻的精神支持。

在情感联系层面,ARpedia 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积极倡导儿童的参与性阅读。以航空火箭主题为例,ARpedia 巧妙地设计了动手参与的环节,鼓励儿童在小卡片上挥洒创意,绘制心中的火箭形象。这一环节不仅激发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在绘画的过程中建立了他们与绘本内容的深度情感联系。儿童通过作品可视化(如火箭分离与发射动画)获得情感满足,激发自我效能感与认知内化。这种情感的满足和成就感的获得,必定会增强他们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出版与创作层面,ARpedia 团队展现了专业性与持续优化的精神。他们深知作品质量对于读者体验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对作品进行优化和完善。同时,他们积极接纳并反馈读者的建议与意见,以更好地

满足读者的需求。这种对产品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 ARpedia 能够得到广大消费者认可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出发,ARpedia 团队深知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因此他们深入研究如何将每一个步骤做好,打造出真正优质的数字化绘本作品。他们注重绘本的视觉效果、交互设计以及内容选择,力求为儿童提供一个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的阅读体验。

五、结语

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数字出版打破了纸质书籍的时空限制,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多模态话语的融合,为受众提供了沉浸式的交互体验。另一方面,数字出版也改变了传统作者和出版商主导叙事的方式,赋予了受众更多的自主性,从而拓宽了叙事的边界,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富有创意的叙事空间。这种变革不仅丰富了受众的阅读体验,也为信息传播领域带来了创新性的发展机遇。

数字化绘本通过情感体验优化赋能儿童阅读,提升阅读效能,同时为出版业的技术融合与文化创新提供范式参考。它代表了出版业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方向,体现了出版业在文化遗产和创新方面的使命与担当。本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数字化绘本的情感体验机制,更在于为推动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绘本创作理念的持续创新,我们相信数字化绘本将在儿童情感认知、审美体验、社会教育以及心灵启迪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和创作者能够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与创作,共同为儿童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阅读资源和服务,推动出版业的繁荣与文化遗产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37.
- [2]刘绪源.儿童阅读专家指导书系:绘本之美[M].济南:明天出版社,2016:56.
- [3]姚本先.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89.
- [4][美]斯蒂芬·P·安德森.怦然心动-情感化交互设计指南[M].侯景艳,胡冠琦,徐磊,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67.
- [5]王波伟.拥抱“儿童性”:基于人本取向中国原创绘本的价值共创机制及路径[J].编辑之友,2023(6):27-33.
- [6]岳涵.基于学龄前儿童特征的电子绘本交互设计要素及趋势探究[J].编辑之友,2020(8):85-90.
- [7]赵慧文,张建军.网络用户体验及互动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3-114.
- [8]刘国斌.融合出版视野下AR技术在少儿图书出版领域的应用研究[J].传媒论坛,2023(3).
- [9]韩文利.数字时代儿童绘本出版的新方位[J].中国编辑,2018(8).
- [10]STROUSE G A, GANEA P A. Parent - Toddler Behavior and Language Differ When Reading Electronic and Print Picture Book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7(8).

(责任编辑 林川)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Levels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aking ARpedia Digital Picture Books as an Example

LIU Yanyan, LIU Yixuan, YUAN Yi*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08,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digital technology has transformed the way children experience picture books,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motional engagement restricts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Norman's three-level theory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on level) and ARpedia digital picture book ca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hrough sensory stimulation design at the instinctive level, the interactive immersion optimization at the behavioral level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 at the reflective level,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motion-oriented digital picture book creation model,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o balanc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law.

Key words: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digital publishing; level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teractivity; aesthetic experience

新媒体时代提升黄河文化精神与价值引领力路径探讨

陈春梅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4)

摘要:黄河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新时代引领中华民族重塑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脉,探讨黄河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将其深植于民族文化精神土壤,正是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的重要举措。具体讨论新媒体时代黄河文化精神的新名片,着力挖掘黄河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对传统的大禹治水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以及当代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进行挖掘,使黄河文化精神焕发新的时代价值。通过传承弘扬新时代的黄河文化精神,充分彰显黄河文化精神的时代引领能力。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黄河文化精神;价值引领力;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85-06

一、引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孕育出来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卓越进取的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历史上的黄河,多灾多难,中国古语有“黄河宁,天下平”之说,一部黄河治理史也是中国多难兴邦的治国史。当历史进入新的时代,“弘扬和传承黄河文化精神”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战略,作为承载着黄河文化重要精神的河南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是河南人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和新的责任。因此,在构筑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传播的大语境下,提升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传播力,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精神的价值引领力,将黄河文化精神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河南省当前一个时期内重要的“文化强省”战略任务。

二、新时代黄河文化精神的“名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结合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依托我省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着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就成了重中之重。富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根脉特征的黄河文化以及黄河文化在新的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文化特质,使得我们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中必须以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为己任,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一面。而这种“文化自信”,与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联系。在新媒体智能传播时代,黄河文化精神的外延更加广泛,不仅限于黄河沿岸的自然和人文精神,还应有更加广泛的时代精神。

(一) 开拓进取的大禹治水精神

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传说。大禹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面对滔天洪水,

收稿日期:2025-02-06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融通 跨界 实战’——新闻传播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208);202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跨媒介传播”(2023cwx043);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ZGJG202407A)

作者简介:陈春梅(1980—),女,河南新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体文化传播。

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率领民众与滔滔黄河做斗争,改变“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最终获得了胜利,体现出大禹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业,体现出他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大禹故事中蕴含的开拓进取、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依靠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成功,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

(二)坚定不移的愚公移山精神

《愚公移山》的故事源自《列子》,这则故事的发源地,在愚公的故里河南济源。《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愚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挪走的故事。通过愚公的坚持不懈与智叟的胆小怯懦,以及“愚”与“智”的对比,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信心和毅力,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坚持不懈的道理。故事传达的不畏艰难、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被一代又一代人传颂。

新媒体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对当代人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2]愚公移山精神与报告中所说的三种文化形态都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愚公移山精神本身属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其“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本质自带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其次,愚公移山精神所彰显的“斗争精神、知难而上、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坚定的信念”这些优秀品质被共产党人继承,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英勇向前,奋勇拼搏,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三,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说,愚公移山精神所体现的开拓进取,思想解放、勇于担当的精神与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形成的改革创新精神一脉相承。“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既是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之举,也是共产党坚定文化自信、凝聚中国精神的时代需求。”^[3]

(三)全心为民的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

共产党人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的突出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曾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等都是共存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在哪一步都不会过时。”^[4]焦裕禄精神不仅是河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5]2021年,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其中包括焦裕禄精神。

(四)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

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安阳市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凭借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比较原始的生产工具,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了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红旗渠,并在修渠实践中孕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基本内涵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基因,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科学求实、敢想敢干、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是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核心,以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导向,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良传统,同时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今天的红旗渠,已不是单纯的一项水利工程,它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值得继续学习和发扬光大。

(五)攻坚克难的大别山精神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6]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鄂豫皖苏区之行,让大别山精神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伟大征程中,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始终坚持革命,有着28年红旗不倒的光荣经历,体现了极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这种精神被概括为“大别山精神”。孙可兴、李泉豫认为,弘扬大别山精神可为践行和推进‘四个伟大’提

供精神支柱和实践参照,大别山精神为新时代进行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实践范例,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思想启迪,为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了价值遵循,为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信念支撑^[7]。大别山精神作为我党革命斗争时期的重要精神,对重塑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新时期,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豫南大别山地区的红色革命精神不应被忽视,因此,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时代黄河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引领力

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丰富和发展黄河文化精神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对黄河文化精神的理解就不局限于有限的地域,黄河文化是河南的、中原的,也是民族和世界的。当前我们大力提倡弘扬的“大禹治水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别山精神”,都是我们世代中原人民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河南,更属于中国。今天,在黄河文化精神谱系中占有龙头地位的河南省,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的主人翁意识显得空前强烈。充分挖掘河南现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利用新媒体的手段创新传播,发扬光大,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精神在坚定“文化自信”战略中的价值引领力,是河南学人和媒体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8]。黄河文化精神所具有的当代价值,仍然是我们新时期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朽精神动力。结合前面所列举黄河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我们可以将新时代黄河文化精神的价值引领力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艰苦奋斗 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

大禹治水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别山精神都有共同的本质,就是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与民众同吃同住,艰苦奋斗,英勇地同泛滥的洪水搏斗,用疏而不堵的策略,用坚定不移的信念,最终战胜洪水;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更是知难而上,身先士卒,在艰苦的环境中走在最前面,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大力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亲自种植泡桐树,以满腔热情和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改天换地的英雄壮歌。焦裕禄同志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艰苦奋斗作了生动的诠释,为共产党人在艰苦创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所体现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所蕴含的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朴素愿望,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我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的就是这种敢想敢拼,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和干劲。大别山精神,根植于红色革命土壤,28年红旗不倒,大别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在振兴老区经济的目标下,弘扬大别山精神的时代价值,仍然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二)“实事求是 尊重规律”的科学态度

历史上黄河流域多灾多难,黄河曾经多次决口,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大禹治水精神开始,之后的几千年里,中华儿女不断地为治理母亲河黄河而殚精竭力,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治河英雄。无论是引漳灌邺的西门豹,提出“治河三策”的贾让,还是经过实地考察后两次上疏阻“回河”的欧阳修,又或是提出“束水攻沙”的潘季驯,这些治河英雄用治理黄河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黄河桀骜不驯,但也有迹可循,只要我们尊重自然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再桀骜的黄河也能被我们驯服。中华民族2000多年与黄河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黄河文化史,历代人民在与黄河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团结、拼搏、求实、开拓、奉献”的黄河精神,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黄河文化精神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我们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与黄河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并行不悖的。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及文明发展高度重视,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治理黄河,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这些都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表现。

今天我们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因噎废食。要充分尊重黄河自身的自然规律,走生态和谐发展的路子。我们在保护和利用黄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精神的价值引领力,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解放思想 善于变通”的革新精神

黄河文化精神的优良基因密码就是敢为人先,善于变通,勇于进取,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大禹治水改变了父亲鲧“堵”的方法,用“疏”的方法,勇敢地与洪水作斗争,最终成功治理水患。焦裕禄在一片荒凉的盐碱地上,不断探索多种方法抵御风沙灾害,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最终找到合适的方法治理风沙,改良土壤,在兰考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红旗渠精神创造的伟大奇迹更是告诉我们,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敢于解放思想,坚定信念,用一往无前的勇气开拓进取,直到取得胜利。大别山精神坚持28年红旗不倒的伟大革命精神,正是我党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坚定信念、勇于进取的优秀战斗精神的具体体现。

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黄河文化精神,充分彰显黄河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引领作用,就要求我们敢于解放思想,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应对当前媒介瞬息万变的传播现状,开拓进取,从这些优秀的黄河文化孕育的精神中汲取不竭的动力,用来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四)“统筹兼顾 生态文明”的发展眼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黄河文化。2019年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9]这对沿黄人民在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的同时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形势,把握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确保“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10]。

众所周知,黄河造就了生生不息的黄河文明,但历史上的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沿黄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黄河既是我们的母亲河,在历史上也是我们时刻要警惕的害河,我们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要将“黄河宁,天下平”的思想贯穿始终,统筹兼顾,走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子,要坚持以黄河文化为引领,科学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打造黄河流域新的生态文化景观,深入推动黄河文化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三、新媒体时代提升黄河文化精神与价值引领力的路径探讨

黄河文化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是中华民族的和魂,历史在不断传承和演进,“黄河故事”在当代仍在不断上演。因此,弘扬和保护黄河文化精神,充分挖掘黄河文化精神蕴含的当代价值,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河南作为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和拥有丰富中原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大省,更应该充分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不遗余力地把讲好黄河故事,挖掘黄河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引领力作为重要工作,在“一带一路”和“传承黄河文化精神”国家战略目标的引领

下,做好设计,同时也依托具有人才传播优势的河南高校,让黄河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引领力覆盖到广大学生,让大学生从思想上、行动上系统接受黄河文化精神的熏陶和浸染,对提升黄河文化精神的传播力、价值引领力,都具有非常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当下新媒体时代,如何借助现有媒介传播作用,扩大黄河文化的价值引领力、提升黄河文化精神辐射面以黄河文化精神引领国人、重塑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化强国战略引导下,如何提升黄河文化精神当代价值引领力,探索何种实践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媒体融合 正面宣传

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媒介力量,讲好黄河精神的故事,树立黄河英雄的形象,抢占新媒体话语和流量的先机,增加曝光度。通过媒体融合,对黄河文化精神进行正面宣传。2021年4月13日—5月8日间,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人民政府、开封市人民政府与洛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黄河文化月活动成功举行。黄河文化月活动持续25天,将“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文化旅游活动作为融媒体创新实践,以郑州为原点,联动开封、洛阳,推出郑汴洛旅游盲盒新玩法,并在活动期间,利用新媒体,推出新型直播活动,郑州以“嵩山之旅”“河洛之旅”“南岸之旅”为黄金主线,邀请专家学者、明星大咖、流量网红、旅游大V、主持人、金牌导游等作为体验嘉宾,在咪咕视频、微博直播、知乎圈子、百度直播、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直播,打造互联网旅游时代的新型直播业态,极大地对黄河文化进行传播。在郑州、开封、洛阳三个城市开展多场明星名人体验黄河旅游线路活动,充分利用互联网,结合融媒体思维,用全新的形态,生动讲述黄河故事,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文旅融合 创意产业

利用文旅融合推动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与发展,是新时代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使命与责任。河南省利用现有黄河文化资源进行产业整合,着力推动文旅融合,在文旅融合中促进沿黄生态保护,使相关文旅活动能够实现新时代黄河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体现高品质、高质量发展。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结合融媒体思维,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在新的媒体语境下,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契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文化求知欲越来越旺盛,以文化发展带动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经济等各种相关领域的繁荣与发展。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契机面前,如何下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这盘大棋,如何利

用河南省境内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对黄河文化做好传承和发扬?治理好黄河,使之成为造福沿黄人民的“幸福之河”,不仅是一项重大战略目标,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在文旅融合方面,如何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讲好“黄河故事”,河南的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认为,河南沿黄地区是典型的文化旅游资源富集带,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并持续迭代更新。一是要善于挖掘文化内涵,实现资源到产品的转化。二是打造黄河文化标志性项目建设,展示“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的理念,要有品牌意识。三是进行产教融合,重点依托黄河流域的博物馆、大遗址等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推出一批黄河文化研学旅行精品线路,推动黄河文化植入国民教育体系,让黄河文化形象在年轻人心中活起来、火起来。四是以科技、文化创意、互联网等赋能黄河文化。坚持“跨界融合”思维,借助科技、文化创意、互联网等激活并传播黄河文化^[11]。

2021年4月,首届黄河文化月活动活动在郑州开启大幕,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郑州市导游管理服务中心共同邀请专家学者对300名导游进行专项培训,围绕提升讲好“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文化故事的能力,进一步提升郑州导游水平,旨在向海内外游客诠释好黄河文化,生动展示郑州“山”“河”“祖”“国”等核心文旅资源,以文旅融合推动创意产业发展,讲好郑汴洛“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文化故事,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去郑州看华夏古国。这是一档文化旅游直播活动,是河南文化旅游发展的新IP,在各新媒体平台上线,获得很好的播放量。首届黄河文化月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新媒传播,文旅融合,创意产业的路径很好地助力了黄河文化的宣传。

(三) 高校布局 课程引领

高校是青年人聚集的阵地,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青年人才是主力军,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于河南高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就是作为地方高校,不仅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更要承担起引领地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任,这是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新的历史使命,“河南高校应立足育人基本职能,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载体、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路径。不同类型高校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黄河文化对学生的思想滋养,使黄河精神成为大学生的人格和文化特质,使河南高校成为黄河文化输出和传播的重要基地。”^[12]这对河

南高校是很大的挑战,如何将丰富的黄河文化纳入地方高校人文课程体系中,做好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各地方高校需结合各自实际情况,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课程设计,充分发挥教师在专业技术方面的能动性,在对地域黄河文化的研究中,让河南高校青年学子全面、深入地接受黄河文化精神的熏陶,塑造自强不息的黄河精神和品格,培养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树立青年学子坚定的文化自信,真正做到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内在精神。

例如郑州大学开展了“中华文明根系研究”“黄河文化保护与文明传承战略”等特色项目研究,强化中原历史文化的学术影响力,建设中原文化系列课程(慕课),打造“中原论道”“根系中原”等以中原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育人品牌和校园文化景观,依托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少林寺、安阳文字博物馆等文化载体,开展“中原历史回眸”“中原文化写生”“武林汉韵巡演”等实践活动,培养青年学子立足中原、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充分发挥高校育人功能^[13]。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中心在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上也展现出高校的担当和使命。2022年1月22日,河南大学举行“《黄河保护与发展报告》新书发布会暨2022黄河国家战略新年论坛”,《报告》着重提出了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四大战略及十大工程。“四大战略”即:打造集中展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魅力文化带、创新性构建中国特色的黄河文化价值体系、对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进行活化保护、融合性发展黄河流域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产业。并拟筹办黄河学院,推动“黄河学”研究^[14]。

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不仅仅是作为河南高校领头羊的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在行动,其他地方高校也都在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和师资力量,对黄河文化传播与高校育人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机融合,在未来“十四五”规划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2022年3月24日,大河网发表一篇题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河南高校的担当与作为》的文章,文章认为:文化传承是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河南高校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方面,担负着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作为中原地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河南高校应立足区域发展、着眼中原出彩,积极融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大力开展黄河文化研究,切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努力加强黄河文化传播、提高黄河文化综合效益,自觉讲好黄河故事,保

障文化遗产传承不绝,实现民族记忆历久弥新^[12]。这些好的做法和观点,也为河南其他高校布局黄河文化育人体系提供很好的借鉴。

(四)创新传播 文化自信

黄河文化蕴含着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与“魂”。因此,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要增强黄河文化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自信以及凝聚精神能量。

以前,河南纵有丰厚的黄河文化资源,但受限于传播手段单一,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缺乏深度有效融合,黄河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多样化,传播方式也越来越灵活自由,再加上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的国家战略,黄河文化逐渐进入普通民众视野。近几年,河南卫视借助传统文化火爆出圈,传统文化与科技手段完美融合,进一步证明创新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说明国人坚定文化自信的刚性需求。

我们可以在丰富和拓展黄河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拓宽黄河文化的表现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借助虚拟场景项目,带动人们进行沉浸式黄河文化体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的年轻态。比如充分利用年轻人喜爱的微信、微博、抖音(简称“两微一抖”),用短视频的形式,集中抢占抖音、快手、视频号、B站等短视频新媒体平台,在内容上进行创新,充分展示黄河文化精神的价值魅力。在创新传播方面,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等河南主流媒体做出了不俗的成绩,2024年河南省文化与旅游厅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火爆出圈,再次证明创新传播的重要性。

四、结语

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省份,河南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文化标识,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引领下,河南应利用好自身的文化富矿资源,凭借地域优势,创新传播方式,充分挖掘黄河文化精神的“中原特色”“河南特色”,辐射河南乃至全国,让青年一代知晓黄河文化精神的内涵及当代价值,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作为有着宝贵的大禹治水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的河南省,责无旁贷应担当起讲好“黄河故事”的重任,利用自身的历史文化优势和地域优势,运用好新媒体,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人民出版社,2022:31.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日)[2024-5-25]. <https://www.12371.cn/2017/10/18/ART1508330185050793.shtml>.
- [3] 周海涛.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与坚定文化自信[N/OL]. (2019-11-26)[2024-05-25]. www.hnsl.org/zhuanti/zyzk/2019/zt5/.
- [4] 王乐. 初心印记: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基本内涵[N/OL]. (2021-08-11)[2024-05-0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794142212481062&wfr=spider&for=pc>.
- [5] 习近平: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 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EB/OL]. (2014-03-18)[2024-05-021].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18/content_2641072.htm.
- [6]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N]. 光明日报, 2019-09-19(01).
- [7] 孙可兴,李泉豫.“四个伟大”视域下大别山精神的当代诠释[J]. 晋中学院学报. 2020.9(6):5-9.
- [8] 崔学军. 深入挖掘精神内核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N/OL]. (2021-03-25)[2024-05-08]. https://www.sohu.com/na/457233062_120125238.
- [9] 习近平.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19(20):4-11.
- [10] 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OL]. (2021-10-22)[2024-5-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2/content_5644331.htm.
- [11] 姜继鼎. 大力弘扬黄河文化,筑牢文化旅游强省之魂[N]. 河南日报, 2020-09-16(21).
- [12] 王彦.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河南高校的担当与作为[N/OL]. (2022-03-24)[2024-03-25]. <https://theory.dahe.cn/2022/03-24/988691.html>.
- [13] 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融入育人体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N/OL]. (2022-04-10)[2024-03-25]. <http://education.news.cn/20220410/4a9fd94819fb4196b55c780851d0f3d3/c.html>.
- [14] 河南正筹办黄河学院 推动“黄河学”研究[N/OL]. (2022-01-22)[2024-4-23]. <https://t.yinet.cn/baijia/32102820.html>.

(责任编辑 林川)

(下转第112页)

高校思政教改双螺旋式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探析

王苏琪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高校思政课为把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落到实处,多管齐下,综合发力。在内容上,契合中国化、现代化、全民化的教育主旨;在教学方法上,不断迭代精进,充分调动所有思政要素,形成了师生双主体、两个课堂双场域、虚拟线上与现实课堂双协同的结合;在教学模式上,拓展校园与社会紧密链接、个人价值认同和社会价值实现的双螺旋模式,并通过主体翻转、相互评价、社会实践实训、多方联动、总结复盘和算力创新等介质的联动,实现学理逻辑的科学引导与化心铸魂的情感共鸣,完成思政教育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使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双螺旋;创新;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91-06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为国育才、为党育人使命,既凸显了思政课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可称之为“政理性”);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学科的学理性依然突出,彰显科学性。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学习者的思维与判断过程,体现为对生活和社会的价值洞察与逻辑分析,价值属性不言而喻。学理性、政理性与价值性共同构成思政课的三重属性:政理性高瞻远瞩、方向明确;学理性逻辑清晰、强基健构、上下贯通;价值性观照自我、启智润心、激扬斗志、自信平和。

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如何激活教学两端、为课程赋能,筑牢大学生“三观”根基,是思政“强基工程”的现实使命。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各类教学模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融合式双螺旋教学模式,以期推动思政课全要素协同并进,提升课程实效。

一、高校思政教学现有模式的回顾与递进

高校思政教学模式经历了传统的 CDIO(构思—设计—实施—运行)模式和 ADDIE(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模式,均以教师为中心推动课堂进程,呈现“教师单向输出、学生被动接收”的静态特征。此后,翻转课堂(问题设置—学生自学—自主解答—教师确证—总结互动)与 BOPPS(引入—学习目标—课前摸底—参与式学习—课后检测—总结)模式逐步取代了传统模式,开启了双向互动的有益探索,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学全过程。但在实践中,因师生对教学目标的认知存在偏差,且人机界面交互、人技信息交互等环节存在障碍,其推行过程历经曲折。

在此基础上,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师生翻转)、OBE 成果导向模式(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及 5E 教学模式(吸引—探究—解释—迁移—评价)应运而生,它们依托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借助互联网技术强化师生联结,并通过信息与数字技术对课堂知识目标及学生行为痕迹进行评价,引

收稿日期:2025-04-16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思政类)“双螺旋式高校思政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研究”(2024SJGLX0987)

作者简介:王苏琪(1970—),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导学生在已有知识结构中探寻事物的因果关联与内在规律,在“发现学习”^[1]中组织教学、求证结论,并将结论应用于新的探索,最终建构知识图谱与认知框架体系,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类模式对纯粹的技能教学或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学习虽有一定参考价值,却存在忽视学生个性、智力及能力差异的短板,其与思政课“塑人铸魂”的教学目标、课程要求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时代化动态教改进程仍存在差距。

借鉴上述思政教学模式的优点,结合“两个大局”背景下思政课的教学目标——“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2],在教育新质科技的助推下,数字技术带来的智能推送、算法分析、精准画像、精确评估验证等功能,为高校思政课实现全时供给、全域链接、全景呈现、全程再现、全员参与的模式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中要素检视和聚焦

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虽在课程目标、教学途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动力体系与逻辑核心上存在差异: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学生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本质不同;教师需践行“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师德典范要求,而学生则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者看似要求不同,实则通过言传身教形成潜移默化影响。师生双方依托思政课教学的显性与隐性两条线索、政理性与学理性两个特征,将真理、情理、伦理相联结,完成课堂交流与第二课堂(如书院活动)交互两个场域、线下实体空间与线上网络虚拟两个时空的切换,并通过理论与实践两种途径、校园与家庭及社会两种评判体系等介质实现全程联结。这种互动如同基因组运行般相互作用、彼此助推,又各自在自身轨迹上螺旋上升,其中任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对整体态势产生影响。将螺旋运动的全要素与教学模式结合,实现双向平行驱动与相互作用,做到因时而动、循势而为、以适而进、融合汇通,并在实践中反复调整,最终追求高质量人才培养与思政课教学效果的统一。

理想化的设计回归现实思政课教学模式后,其效能考察面临三个关键难题。一是教师端。高校思政必修基础课程因师生比1:350的标准要求,近年来青年硕博士进入师资队伍的比例大幅提高。在青

年教师培养过程中,他们对课程教学模式的理解、熟悉,对教学方法的学习、转化,对个人教学风格的形成,以及对教学模式的熟练驾驭等方面仍需加强。还有个别教师良性驱动力不足、思想不够坚定、语言说服力不强,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训、考察与督促,逐步提升理论素养与知行合一的能力,掌握教学技能并熟悉教学模式。二是学生端。多数大学生虽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但零散而不系统、宽泛而不深入,多停留在表层认知,深入学习时易觉枯燥,且局限于知识记忆而非学理逻辑的理解。学习态度上,重专业课而忽视思政课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且思政课学习呈现分化状态:一部分学生有自主学习动力,好学多问,能运用学科知识架构与学理逻辑分析问题,乐在其中;另一部分学生则政理敏锐度不足、学习兴趣不高,仅以学业过关为目标,课堂与课下均处于游离状态,呈现自我边缘化特征,在朋辈群体中似被裹挟,依赖外力推动,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几乎为零。三是家庭和社会评价端。许多家庭教育观念未能与时俱进,仍停留在重技能而忽视思想品德的固有认知,以功利性标准衡量价值,缺乏深入沟通。部分家庭认为大学生已成年,代际观念差异显著,交流不畅甚至存在障碍,导致家庭思政教育功能逐渐弱化。但社会评价日益积极正向:科技进步与全球化推动下,人们既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的生存法则,也切实感受到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的竞争,逐渐排斥“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3]的人,深刻理解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日益清晰——这正是党和国家长期重视思政教育的成果。

此外,主动配备先进教育设施与设备、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等院校应走在时代前列,依托自身智力资源优势,研发适配的教育教学设备,主动配备现代化、智能化教学工具,引领时代潮流,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中承担引领责任;同时挖掘思政要素、讲好励志故事、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教学模式全链条中大胆创新、持续赋能。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师生敢于钻研、勇于创新,开展探究性学习,独立思考、认识自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高校思政教学模式的借鉴与创新

各国对国民教育高度重视,将富有创造活力的青年大学生视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系统又全面。尽管各国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之为公民道德教育,有的称其为国

民素质教育,但其本质一致,都是将国家需求内化为大学生自身进步的内在动力。二战后,美国对苏联实力的快速上升深感忌惮,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将自身科技领先地位的动摇归咎于教育的失败,进而开展了全领域的教育改革:着重强调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培养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竞争意识、创新意识,致力于实现“从一种以声望为基础的体制向以绩效为基础体制的转变”^[4]。同时,美国开启了 STEM(即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融合教育模式,这对其扭转当时的劣势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的学术自由和创造精神受到了法律体系以及“捐赠金主”意愿的干扰^[5]。即便如此,个性自由、民主平等和勇于创造依旧是美国所标榜的国民精神。英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变了过去宗教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并重的导向,转向世俗化、渗透式、生活化的公民道德教育,提出培养公民的独立人格和绅士品行,并采用大中小一体化的教育模式。直至今日,“过去的模式仍持续影响着现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使政府不断宣称自己代表民族、代表人民,促使民族意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通过教育使年青一代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6]。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但他们更注重将公民道德教育贯穿于各学科和技能教学过程中,使其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以此培养年轻人对行业与企业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总之,西方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和公民品格教育模式逐渐朝着多样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辩论、模拟和实践成为认知和检验的常用方式。

我国的思政教育始于建国之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知识型人才,因此思政教育从文化学习入手,辅以思想教导,采用听讲互动的教学模式,这种方式简单且高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我国在思政教育方面的不足:“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7]对思政教育内容的忽视,必然导致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粗放。21 世纪初,我国将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有力地推动了思政教育的学科发展。首先,对学科划分进行调整,将思想政治教育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一级学科,并在 2012 年调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为高校本专科的常设必修课。与此同时,大力加强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巩固。其次,突出思政教育“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重要作用,

课程教学坚持“八个统一”,这促使思政课教学受到广泛关注,也激发了思政课教师探索新教学模式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办好学校思政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实到位。”^[8]他还指出“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失败。我们决不能犯这种历史性错误!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把握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什么可隐晦、可商榷、可含糊的”^[3]。这些重要论述为高校思政课“动起来、活起来”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教学方法取得长足进步,实现了教学模式的突破,使思政课理论与形式得以同步发展。再次,教育教学现代技术的推广为教学模式的更新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数据研究途径。大学慕课、云课堂和智慧教室的普及,以及适时连线的教学资源、问卷调查和教学效果的数据反馈,能够及时观察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适配情况,以便充分进行调整和磨合。最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逐步实现贯通,思想、知识、技术与运用之间的隔阂被打破,社会要素也融入其中,产学研创有机结合,个体体验与公共觉知充分融合。在中小学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高校思政教学模式不断衔接提升,实现了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的有机统一。高校思政教学模式历经不断探索与调整,从理论讲授模式、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德育综合教学模式,发展到 ADDIE、BOPPS、OBE、CDIO 及 5E 等模式的综合运用,并持续升级,形成了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系统模式。

四、高校思政课模式创新和实践路径

(一) 尊重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征内容的规律,依据学理与政理、情理与伦理相辅相成的教育规律,启动双螺旋驱动体系,厘清模式构建的核心逻辑和原始动力

第一,思政课程的核心逻辑来自其显性和隐性并存的学科特性。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思政学科由一二十门具体课程支撑,它们都反映了世界运行变化(包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规律,阐述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规律,分析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评判和自我认知要素及规律。这些科学知识奠定了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逻辑。学理性是外显的,但所起的作用却是隐性的。思政课的隐性一方面来自接受者的感知程度和接受水平,特别是自身实践的觉悟体验,从而实

现思维的升华和行动的指南。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即统治阶级秘而不宣的意图:统治阶级想要长治久安,就要动员、统摄全社会成员,形成凝聚力和归附感,这是维护其统治的历史前提;通过教化每个成员遵旨奉行,使其发挥统治阶级设定的职责和动能,以保障政权稳固。思政课的国家和阶级意志毋庸置疑,但任何时代的民众谁不希望生活安详、富足、幸福呢。以往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稳固阶级统治的目的,隐蔽其政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起,就确认人民当家作主,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由人民行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样一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没有必要吞吐隐匿、扭扭捏捏,而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将思政的隐性与显性结合起来,贯彻到底。

第二,无论是学科底蕴还是国力条件,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都是外因;思政课的承载者才是主体,是内因。双螺旋立教之本、力量之源来自师资的主导驱动。高校的思政师资不仅包括专职思政教师,还包括辅导员、专项宣传导师、书院管理和学生管理教师、联合课程导师,以及班级带头同学、校园学长、知名校友,社会先进典型、青年榜样、时代先锋、企业行业嘉宾等。他们活跃在学生生活、生活的各个方面,看似是两支队伍,实则是“三全”育人的系统体系。在推动螺旋式上升的思政教学改革中,高校不仅要扩充师资数量,还需在增量提质方面持续推出新举措。首先,对刚刚加入思政课教学的年轻教师,从身边开始,形成阶梯状培训养成训练营;利用假期集中时段,按照学校—校际—城域—省级—国家级的纵向路径开展学习交流,同时通过指导导师,进行课前分析准备—课中调动推进—课后检测互动—双向总结评价的横向研磨跟踪观摩;借助推广的公众号、案例库、云共享、数字课堂、智造课堂等分享的教法技能,给予新教师关爱和指导,增强其专业归属感和职业热爱,使其快速掌握教学程序,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其次,加大教学督导力度。各高校既有院校两级校内交叉听课检查,又有省市级、国家级的云中课堂和随机抽查,还有校友、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更有校际精品云课堂的共享同修、学分互认。这些举措既加大了对教师运用知识、驾驭课堂的考验和监督,也激发了专兼职教师争先创优、获赞受尊的成就动力。再次,利用个人、团队、班级微媒,校园群公众号,自由贴吧、吐槽空间等信息传媒开展交流互动,既能助推校园实时正能量

的教育与感染,又能防患于未然,增强师资端所有主体的自律自爱意识,促使其坚守师者初心,巩固思政课师资“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示范作用和牵引力量。

第三,学生角色具有双重性,既是学习主体,也是互动主导。信息时代,获取纯粹的知识变得轻而易举。对学生个体而言,学习动能首先通过思想上的“触动、思考、评判、吸取、消化、凝练、转变”产生,进而通过行为上的“探索、确认、固化、重复”形成个人特质,而螺旋驱动的核心要素是情感上的获得感和价值认同。对学生团体而言,其组建或参与的团队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兴趣爱好是成员志同道合的源动力,而团队中同伴群体的相互鞭策、相互肯定则是更为长久的支持力量。这就要求高校思政教育模式必须满足大学生个性化精神领域的需求,留出释放个体情感的空间:一方面要容纳其自我意识的展现和生活价值的世俗化表达,客观看待其非理性和去公众化行为,允许“幼稚”发声和“平民主义”再现;但另一方面,不能放任自流,特别是在虚拟空间中,思政教育者要化身为同伴,提升共情能力,催生奋进、积极、健康的情感共鸣,用情感温度和视域宽度回应大学生在学习、生活、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困惑犹豫,以事理沉淀内容,用哲理唤醒理念逻辑,带动情感共鸣,增强引领能力,凝聚共同的精神支柱,形成良性多元的价值共识。大学生群体的匀质性和内聚性,是动力体系中不可轻视的力量。

(二)健全思政课程的链接介质,助力螺旋运行

第一,注重思政课程的目标推进,课前做好调查研究和摸底工作。掌握教学对象的总体状况、生源特点、专业特长、基础能力,才能知己知彼。要设计和规划每次教学进程,课前发布思考内容和任务,划分小组、竞选组长,教师入组,实现师生角色互换,营造课前积极主动、轻松融洽的氛围。课中构建问题链以打造讨论平台,分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行师生多次主体翻转,利用设置的理论探讨、案例介质或实践操作增强师生黏性,引领学生探索和推动目标进展。在固定的教室也可以创设平台让渡,除了讲坛,还可预设论坛主席、辩手位置、挑战区、助站台,也可以设置问题阵营,重新编组,以“观点—评价—感悟”展开,将师生双螺旋串联起来,像DNA链动一样,因思而动、因时而行、因事而新、因理而育、因势而推。课后留下话题,延续思绪,同时保持灵活有趣,如同牵引风筝的线,便于下次课堂串联,更好地启迪智慧。此外,在环节结束时,需设置公正的评价和奖励机制。

第二,强化思政课堂与校内第二课堂、平行书院的联动,完善校内联动模式,将“三进”与“三全”育人落到实处。同时,推动场域的双螺旋切换,调动校内与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学校与家庭、家乡、企业及社区的资源,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红色教育示范基地和文化创新基地,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场域转换,兼顾师生的心理期待与新鲜体验,通过持续注入“鲜度”,延伸螺旋旋转空间,扩展螺旋上升边界。这如同呼吸多氧一般,既能保持与时偕行的热度,又能保障运行的自然流畅,为思政教育教学赋予多元素的适时滴灌和精准施教。需要强调的是,思政课专兼职教师不能做甩手掌柜,而应成为思想动态的观察者、正确立论的引领者、偏离主题的纠偏者、错误隐患的吹哨者,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潜行用心、润物无声。

第三,保持师生线上和线下的同频共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参与创想、剪辑和推介。师生不仅可以从线上的慕课、超星、高校联盟、国内精品课程、大咖论坛、纪录片、讲座、云课堂获取学习内容,还能通过对视频、影视、讲座进行美图、涂鸦、配文等方式生产思政内容。经过师生线下的共同构建和技术性处理,将产生的情感认同重构为线上资源——例如“感动中国”“开国大典”等思政教育内容,以及“大国工匠”等主题素材,由师生多主体从多角度、多层次共同创作抖音作品、快剪短视频、编辑快闪、运营公众号、编排微视频等,成为情感共振的载体。通过这种方式,师生互相开展思政教育,共享数据资源与教学红利,线上线下无形中涵养精神、巩固品行与人格。

(三)利用内循环政策利好,增强教育技术设施和教学手段双螺旋底座系统

首先,要加大校园软硬件投入。教育教学设施的现代化和技术、数据资源的支持,是改善和提高高校教学水平的基础,高质量的产出与互动需要高质量的投入。“德布雷依据叙事媒介变迁,将人类社会划定为‘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图像时代’,人类社会的叙事方式也经历了‘语言叙事’‘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的转变”^[9]。生动鲜明的音像影视打破了教学空间的有限性和时间的束缚,使思政教育的承载与传递能够超脱现实,实现多主体集中的沉浸式体验和交互。这并非简单的多媒体PPT展示或网络互动,而是需要数字教室、数据即时传送、反馈及溯源等技术支撑,需要对校园进行现代化改造升级,提升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科技支持能力。

其次,充分汇聚各高校的思政资源,品鉴异同、共享精品,促进思政“金课”的涌流。要拆除各自为战、相互提防的偏见藩篱和认知栅栏,站在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的高度,塑造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利用现代化手段和科技工具,实现片区—区域—国内高校的思政课教育互鉴链接。教育管理需切实转化为服务教育,以融合代替攀比,以互鉴互动代替秘占独享,推动高校思政教学模式的进阶与提升。

最后,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和社会思政要素,扩充教育内容,完善教学实践体验模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民为邦本、富民厚生的价值观,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未来理想,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人文精神,守中致和、知行合一的思维方法,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亲仁善邻、贵和尚中的交往逻辑等。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的中华精神与智慧,可通过参观全国各省市的博物馆、历史文化馆、地质地理馆等馆藏展览,游历文化名城、探访历史名人遗迹、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及地方志教育基地,拜访时代楷模、先进典型、模范人物、领军人物等方式,使现实素材中丰富的思政要素“动”起来、“活”起来。身边人、身旁事的教育感染,更能深入人心、激起共鸣,触发深层次情感体验和民族情结,实现润心育魂的效果。

(四)加大师生双螺旋评价和反馈机制

第一,健全评价评估制度,建立常态化师生互评机制和流程优化程序。改变师生评价流于形式的倾向,对教师评价采取突出肯定与欣赏要素的个性评价法,着重彰显思政课教师的个人风格魅力和示范带动作用。在生生互评体系中,提高日常品行的权重分值,鼓励创新思维、志愿活动和奉献行为,以团队贡献衡量个体表现,以具体排序替代模糊评价,允许学生在自我评价中以突出的特点与长项冲抵课程学习中的阶段性弱项,以此涵养学生的正气与热爱,保持评价的宽容度,促进学生良好品行的巩固与养成。注重校内与校外评价的结合,将学生思政课学习的校外辅修、志愿活动和社会服务统一纳入评价体系。优化高校与社会的链接流程,在大学生个人征信系统中增设思政品行与师生评价栏,由思政课程教师、辅导员、书院导师、实习实训活动指导员等组成评价团队,对思政教育效果和学生个体表现进行系统化汇总,形成档案资料,与个人征信、国家奖励系统、就业系统联动,按程序纳入全社会的档案备案体系。

第二,注重建立“满足感”激励和幸福感反馈

机制。思政课一方面帮助学生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另一方面在化育成才过程中须遵循“尊其性”“成于乐”的规律,使乐见其成与施教于乐相互促进。要彻底摒弃“挑毛病”“找缺点”的评价方法,改变“面无表情”的冷漠态度,剔除“指责”“甩锅”类的考察指标,将思政教师的成就感与学生的满足感结合起来进行考核。首先,设计量表开展“时刻、事件、自我幸福感”的正向测验与反馈,推动专兼职教师将个人的“成就快感”转化为对全体学生的积极影响,将教师的自我感知与学生的“幸福获得”评价进行比对,通过正向分享引导反馈方向,激励教师以“快乐感染”带动学生。其次,设置数字课堂和实训实践过程中的氛围活跃度指标,由各级教学督导与线上抽调的评估专家将其作为模式设计过程评价的考核内容,从全程观测到效果呈现,将高质量的由衷快乐和幸福获得作为加权分值,结合学生评教结果,反馈至数据库和思政教学效果评估体系,既纳入活跃度评价指标,又记入师生职业成就和学业成长数据链条,为典型观摩推荐和奖先评优提供依据。

五、结语

双螺旋式高校思政模式与时俱进,通过课程本质、目标、参与主体、链动介质、评价体系的纵横连接和平行互动,为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路径,也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方法论支撑,使得“理

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得到确证,能够实现教学效果的预期价值,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挖掘研究、宣介推广。

参考文献:

- [1][美]杰罗姆·布鲁纳.教育过程[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57.
- [2]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 [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5.
- [4]梅伟惠,经湛.近十年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核心特征[J].世界教育信息,2024(4):21-29.
- [5]郭剑英.美国2024年高教趋势报告出炉,问题挺多[N].中国科学,2024-04-09(03).
- [6]林林.历史性、现代性和建构性:对霍布斯鲍姆西方民族理论的探析与省思[J].世界社会科学,2024(20):236.
-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7.
- [8]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3-19(1).
- [9]汪大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生成逻辑及策略建构[J].江苏高教2024(4)-108.

(责任编辑 许峻)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Double Helix Mode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Suqi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multi-pronged and two-way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goal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curriculum aligns with the core principles of Chinese-centric, modernised,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In teaching methods, continuous refinement and innovation are pursued, fully leveraging al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to establish a model featuring dual-subject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dual-domain classroom environments, and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virtual online and physical classroom settings. In terms of teaching models, they have expanded the dual-helix model linking campus and society, and the alignment of personal value recognition with societal value realization. Through the chain of medium such as flipped learning, peer evaluation, social practical training,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reflective summary review and innovation it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ducational laws of explicit academic logic and implicit heart and soul, the double helix model has been promoted, and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nurturing individuals for the party has been completed.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double helix; innovation; practice

焦裕禄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意蕴与机制构建

武香俊

(郑州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1400)

摘要:焦裕禄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容的相通性、目的的一致性、本质的契合性和使命的同向性,高校应大力弘扬“永远不会过时”的焦裕禄精神,深挖焦裕禄精神内涵,将焦裕禄精神融入办学治校各方面,建立全员育人的相互配合机制;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构建全方位育人的多维联动机制;融入人才培养各阶段,优化全过程育人的有机衔接机制;融入人才成长各领域,健全全社会育人的多元保障机制,充分发挥焦裕禄精神的引领价值、教化价值、务实价值、辐射价值和激励价值。

关键词:焦裕禄精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6

中图分类号:G641;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097-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1]焦裕禄精神具有持续性、传承性和时代性等特征,是永不褪色的伟大精神^[2],能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想滋养和价值标杆;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最富活力、最具朝气的社会群体,焦裕禄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继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一、焦裕禄精神与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3]那么,焦裕禄更是大学生学习的榜样。焦裕禄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将影响一代代大学生的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一) 内容的相通性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教育者向教育对象传递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政治要求、道德规范等。^[4]¹⁷⁴它主要涵盖以下内容:世界观教育,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观教育,包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等;人生观教育,涉及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法治观教育,像社会主义法治、遵纪守法等要点;道德观教育,则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层面。深入剖析焦裕禄精神,可发现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度契合。例如,焦裕禄的求实作风体现了世界观教育的内涵;他的奋斗精神彰显着政治观教育的价值;他的公仆情怀诠释着人生观教育的意义;他的道德情操展现着法治观和道德观教育的要求。焦裕禄在关爱民众、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的平凡而生动的事迹中,所展现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道德品质,构成了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深刻且具体,鲜活而可感,有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最终实现与教育对象

收稿日期:2025-05-12

基金项目:教育部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思政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应用”(21SZK14062001);郑州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思政课程)“焦裕禄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机制构建”(2024SZK054);2024年度郑州工商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受众认同视角下高校思政课教学话语创新研究”(GSJG2024026)

作者简介:武香俊(1983—),女,河南新乡人,硕士,郑州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心灵的沟通,启迪智慧、润泽心田,激发他们的斗志。

(二) 目的的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焦裕禄精神作为一种能够指导实践的精神动力,同样具备清晰的目的性,且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遇重大挫折,焦裕禄精神应运而生。彼时,宣传和弘扬焦裕禄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旨在激发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英勇斗志,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掀起第二次学习焦裕禄精神的热潮。鉴于当时部分党员干部背离党的宗旨,腐败之风盛行,此次学习重点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清正廉洁”的内涵,目的在于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和公仆意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精神予以高度重视,从不同角度对焦裕禄精神进行了概括与提炼。其目的在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能力素质和工作作风,帮助普通民众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正能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教育对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5]。将焦裕禄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养和人文素质,进而激发大学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与斗志。由此可见,焦裕禄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

(三) 本质的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所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4][53]}。这一本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通过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6][9]}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导向性、教育性,这决定了其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本领。可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焦裕禄精神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

(四) 使命的同向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反复

强调“时代新人”这一概念,其中饱含着对广大青年学子的深切勉励与殷切期望。“时代新人”是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列,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是时代新人的信念依托,“敢担当”是时代新人的历史任务,“能吃苦”是时代新人的必备素养,“肯奋斗”是时代新人的应有状态。焦裕禄精神作为一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是民族精神的伟大传承与发扬,也是当下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将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焦裕禄身上展现出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追求真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以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道德情操^[7],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些精神品质阐释了新时代大学生应具备的品格和道德修养,能够筑牢时代新人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涵养时代新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由此可见,焦裕禄精神本身就深刻蕴含着立德树人的属性,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存在内在的同向性。

二、焦裕禄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 引领价值:坚定理想信念,明晰人生方向

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焦裕禄的一言一行都彰显着这一宗旨。他曾冒着风雪,强忍着剧烈的肝痛,前往梁孙庄梁俊才老人家中,送上救济粮款。那句饱含深情的“我是您的儿子”,让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焦裕禄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间,秉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态度,因而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深情回忆:“这节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对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8]只有秉持“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的精神,才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新时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应当学习焦裕禄“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志存高远,甘于奉献,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奔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将自身利益与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多做好事、多作贡献,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二)教化价值:矢志艰苦奋斗,积蓄青春力量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经验总结,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更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长期的贫困落后状况,毫不气馁、无所畏惧,毅然决然地选择艰苦奋斗、奋力拼搏。上任伊始,焦裕禄同志便许下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9]焦裕禄始终秉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的办公桌、办公椅破旧不堪却仍坚持使用,衣服和鞋子缝缝补补,其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如今的大学生大多为“00后”,出生于新世纪,成长在新时代,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便当下生活日益优渥,但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依旧是战胜一切困难挫折的法宝,我们仍需继承发扬焦裕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所讲:“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10][21]}

(三)务实价值: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知行合一

实事求是 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内涝、盐碱、风沙“三害”长期困扰兰考人民,尽管此前多次治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焦裕禄坚信,唯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深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只有深入结合兰考实际,探究“三害”的根本成因,才能做出正确决策。他曾一连几晚住在肖位芬的牲口屋里,向这位老饲养员请教改变兰考面貌的办法,由此知晓了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树,可起到挡风、压沙的作用。通过深入调研,焦裕禄基本掌握了“三害”的成因与规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凭借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遍了兰考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依据这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制定并实施了正确决策,为治理“三害”奠定了坚实基础。焦裕禄身上科学求实的伟大精神与人格魅力,对新时代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反复告诫大学生,“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广大青年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11]新时代大学生要秉承焦裕禄“科学求实”的优良作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立足实际,脚踏实地,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在扎实奋斗中成长,在勤勉务实中建功。

(四)辐射价值:坚守无私奉献,诠释志愿担当

清正廉洁、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焦裕禄一生秉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对自身要求极为严格。即便病情日益加重,他仍不舍得花钱看病,始终废寝忘食地坚守在工作岗位。同事为他买药,他却因药价昂贵而拒绝服用。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时时刻刻挂念着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11]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学习焦裕禄“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不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更要将奉献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学习、生活以及志愿服务中,以理想为指引,用奋斗书写奉献篇章,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与紧迫感,不断为人生增添绚丽色彩。

(五)激励价值:敢于迎难而上,积极主动作为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焦裕禄前往兰考任职时,已然知晓当地自然灾害严重,农业产量低迷,群众生活困苦。然而,面对重重困难,他并未向灾害低头,而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攻坚克难,愈挫愈勇,最终带领兰考人民探寻到治理“三害”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10][210]}在新时代,各种风险挑战与激流险滩层出不穷,大学生应学习焦裕禄“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敢拼敢闯,越是艰难越向前,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勇克难关,切实承担起时代赋予青年的光荣使命。

人的道德品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要素转化为精神动力后,将贯穿人的一生,永不消散,对人的实践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随着人们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实践的持续拓展而愈发彰显其力量。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新时代大学生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未来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中坚力量以及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们能够感染和感召身边更多的人践行焦裕禄精神,凝聚成强大的整体精神力量,形成精神合力,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汇聚磅礴伟力。

三、焦裕禄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构建

(一)融入办学治校各方面,建立全员育人的相互配合机制

1. 做好顶层设计,打造特色品牌

(1) 将焦裕禄精神融入党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6]27}学校党委应将焦裕禄精神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党政工作计划，融入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发挥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以焦裕禄精神为旗帜引领安排部署党建思政工作。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宣讲焦裕禄精神，带动全员育人，使之蔚然成风。

(2) 将焦裕禄精神融入全员育人工作

学校应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党群机构、行政部门、教学科研机构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全员育人委员会，统筹规划，积极研究焦裕禄精神融入全员育人机制；制定焦裕禄精神融入全员育人文化建设、全员育人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为焦裕禄精神融入全员育人提供坚实制度支撑；实施全员育人培养模式，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学业导师、育人导师、心理导师、校外导师、朋辈导师等“五导师”育人机制，共绘焦裕禄精神融入全员育人“同心圆”，共唱焦裕禄精神全员育人“合奏曲”。

(3) 加大对焦裕禄精神的价值性阐释和时代化宣传

结合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基础理论上深耕五种精神、四个内涵、三股劲及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阐释研究，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具体语境，充分挖掘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意义及育人价值。

2. 加强思想引领，形成统一认识

(1) 构建大学生育人共同体

推进焦裕禄精神“三全育人”，育人主体建设是关键。拓宽育人主体，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导下，形成由全体教职工参与的以焦裕禄精神“育人”为核心的团队。强化教职工对焦裕禄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蕴的认识，形成焦裕禄精神育人的合力。以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努力打造一支乐为、敢为、有为的全员育人队伍。

(2) 提高育人主体的育人能力

育人主体能力的提升是增强焦裕禄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点。高校教职工可以通过聆听“焦桐”故事，诵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追忆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定期组织教职工以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开展党性问心和感悟提升活动，重温初心使命，激励担当作为，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教师、好干部。

(3) 实现育人主体的优势互补

不同育人主体各有所长，实现优势互补能更好

地推动焦裕禄精神“三全育人”工作。高校辅导员、班主任、专任教师、行政管理人员这“四支队伍”在焦裕禄精神“三全育人”中的工作内容、职责范围、能力特点各有不同，需要各司其职、融合互助、取长补短、协同育人，推进焦裕禄精神“三全育人”工作走实走深走细。思政课教师重在理论教育，用焦裕禄精神触动学生灵魂；专业课教师讲求润物无声，将焦裕禄精神与专业内容进行有机融合；辅导员做好人生导师，用焦裕禄的事迹和品格培根铸魂；管理服务人员以身作则，用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感染学生。

(二) 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构建全方位育人的多维联动机制

1. 融入课堂教学，夯实主阵地

(1) 融入思政课

充分发挥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主阵地的关键作用，运用案例教学、专题研讨等多元化教学手段，将焦裕禄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引导大学生深入理解焦裕禄精神内涵，坚定理想信念，培育担当精神与顽强意志，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紧密结合新时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尤其是针对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迷茫与困惑，精心打造并开发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为主题的精品课程与微党课，例如邀请焦裕禄精神研究专家进行线上线下讲座，与课程内容相融合，提升课程吸引力与实效性。

(2) 融入课程思政

构建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促使各类课程紧密配合、协同发力，确保每门课程都切实承担起育人职责。组织专业课教师通过集中培训、分散学习和兰考调研等形式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兰考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县域经济等内容将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价值融入课程思政。

2. 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建好“主引擎”

(1) 融入第二课堂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如举办学习焦裕禄精神演讲比赛，以演讲的形式激发学生深入挖掘焦裕禄精神内涵，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组织传承焦裕禄精神主题党日、团日活动，促使焦裕禄精神进支部、进社团、进网络、进团课，使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深深扎根。制定详细的实践研修活动计划，定期组织学生前往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焦裕禄纪念馆、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地开展实践研修活动，安排专业讲解员进行深度讲解，让学生在实地参观中感受焦裕禄精神的力量。同时，要求学生撰写实践报告与心得体会。

会,引导学生将焦裕禄精神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不断增强焦裕禄精神在学生群体中的鲜活力与感染力。

(2) 融入校园文化

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2]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环境育人的重要性。通过建设焦裕禄精神展览区,以丰富的图片、文字、实物等资料,全方位展示焦裕禄的生平事迹与精神内涵;打造文化长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艰苦奋斗的故事;构建“焦桐园”文化广场,让学生在休闲漫步中感受焦裕禄植树治沙的坚韧决心;设立“四面红旗”主题宣传栏,宣传兰考在焦裕禄精神指引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创建翻淤压沙劳动体验基地,让学生亲身体会当年兰考人民改造恶劣环境的艰辛过程。使学生在校园中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焦裕禄精神的熏陶,在可观、可感、可触的浓厚氛围中深入学习并积极践行焦裕禄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培养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三) 融入人才培养各阶段,优化全过程育人的有机衔接机制

1. 提高育人各阶段的针对性

焦裕禄精神全过程育人贯穿“从学习到生活”“从课堂到课后”“从学业到就业”的整个大学生涯。不同学习成长阶段的大学生,其心理需求、思想特点与意识诉求存在差异。因此,全过程育人需遵循大学生学习成长的客观规律与身心发展特点,结合不同阶段学生的需求,设定差异化的育人目标与方法。通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开展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全过程育人落到实处。针对大一和大二学生,重点做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衔接过渡,发挥焦裕禄精神的引领与教化功能,强化理想信念和道德行为养成教育。引导他们树立人民至上、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涵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习风气,保持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为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筑牢根基。对于大三和大四学生,发挥焦裕禄精神的激励与辐射功能,强化责任担当和成长成才教育,侧重引导其完成从“学校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着重培育亲民爱民、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塑造无私奉献、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为培养焦裕禄式的职场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2. 增强育人各阶段的衔接性

全过程育人需遵循从具象到抽象再到实践的递进规律,注重习惯养成、参与体验与社会实践的纵向

衔接和内外联动。一方面,将日常学习与假期实践、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等不同场景有机衔接、高效利用,把焦裕禄精神融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组织学生赴兰考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活动,邀请焦裕禄的家人、同事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讲述其感人事迹;鼓励学生围绕焦裕禄精神进行艺术创作,以绘画、戏剧、歌曲等形式诠释其时代价值;充分发挥社会大课堂的作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亲身体验和践行焦裕禄精神。另一方面,系统统筹大学生学习生活各学段、各环节的特点,在焦裕禄精神教育中实现各学段的依次递进与有机衔接。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征,制定循序渐进的育人目标,将焦裕禄精神层层深入地融入不同阶段和环节,最终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学、讲、践、悟”四个环节的层层递进,引导学生将理论认知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焦裕禄精神的育人作用,推动学生做到明理、崇德、力行,增强育人过程的深刻性与成效的持久性。

(四) 融入人才成长各领域,健全全社会育人的多元保障机制

1. 融入家庭

建立教育协同机制,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合作,形成教育合力,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留下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家风非常赞赏。焦裕禄一向反对不劳而获,他要求自己的每个孩子都要自食其力,有才艺的靠才艺,有力气的靠力气,坚决不能搞特殊化。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他的子孙们都力争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清。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风建设,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优良的家风建设是社会良好风气的基础,只有千千万万个家庭拥有良好的家风,整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尚^[13]。共同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以焦裕禄家教家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继承和弘扬,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

2. 融入社会

社会教育是彰显焦裕禄精神价值的大课堂。弘扬焦裕禄精神是一项需要个人终身参与、群体全员覆盖的社会大工程,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建立焦裕禄精神传承激励机制。优化精神激励手段,丰富物质激励内容;拓宽激励对象范围,涵盖党政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各个群体。其次,建立焦裕禄精神传承宣传机制。依托传统媒体的优势,充分发挥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的宣传作用,树立当代焦裕禄式的先进形象,发挥榜样示范效应;

开发焦裕禄精神文化产品,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等艺术形式,结合教育基地的实地展示,传承焦裕禄精神。再次,建立焦裕禄精神传承参与机制。发挥各社会团体的作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活动,让焦裕禄精神渗透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社区,形成有领导、有组织、有规模的群众学习团体,营造有利于育人育德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结语

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对焦裕禄精神予以高度关注,并从不同维度展开重要论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精神的本质、精髓、灵魂及鲜明特征,进行了更为具体、全面且理论化的阐释。这一系列新阐述与新定位,标志着党对焦裕禄精神的认知,已升华至更为深刻、全面的全新境界。

焦裕禄精神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鲜明旗帜,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指引。在新时代,我们应充分发挥焦裕禄精神的引领作用,以“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筑牢大学生的信仰根基;以“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砥砺大学生的奋进力量;以“科学求实”的优良作风,涵养大学生的务实品质;以“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激发大学生的拼搏意志;以“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升华大学生的道德境界,从而引领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 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N]. 人民日报,2021-8-20(01).
- [2] 康风云,黄仁森. 焦裕禄精神的话语变迁及其当代意蕴[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 [3] 董学彦,柯杨,龚砚庆,等. 人民永远记得他[N]. 河南日报,2022-8-16.
- [4] 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5] 毕红梅,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90-91.
- [6]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7]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继续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N]. 光明日报,2014-03-19(01).
- [8] 舒立春. 以高尚人格感染学生[N]. 人民日报,2019-04-10(05).
- [9] 张洋,孟祥夫.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N]. 人民日报,2021-8-20(06).
- [10] 习近平. 论党的青年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1]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2018-05-03(0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2-173.
- [13]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N]. 光明日报,2016-12-13(01).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ng Jiao Yulu's Spir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U Xiangjun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400,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Jiao Yulu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joy consistency in content, purpose, essence and mission. Universities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never outdated” spirit of Jiao Yulu, explore its connotations, integrate it into all aspects of school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a mutu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all personnel educ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integrate it into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linkage mechanism for all-round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Jiao Yulu should also be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stag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optimizing its organic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education. Furthermore, it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of talent growth, improving the diversified security mechanism of society as a whole to educate people. The spirit of Jiao Yulu should full play its leading value, educational value, pragmatic value, radiation value and incentive value.

Key words: Jiao Yulu Spirit;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教学路径探索

——以“随机过程”课程为例

聂亚昕,胡贵新*,白慧云

(河南理工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根据“随机过程”课程特点,分析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必要性,找出研究性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短板,并指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将思政元素内化于专业知识之中,将研究性教学实践贯穿课程教学过程,探索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教学模式,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课程思政;随机过程;教学改革;实践教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7

中图分类号:G642.0;O2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103-05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其中明确提出,要在各类专业课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1]。2022年4月,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加强普通高等学校研究性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结合本省实际,明确要求省内各本科高校推进研究性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科研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2]。

一、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必要性

研究性教学是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密切结合实际问题,引导学生按照科学研究的模式分析和解决问题,以达到获取知识和培养能力的一种教学过程^[4]。研究性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教学理念:在传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转变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定位——将教师从课堂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将学生从被动学

习者转变为自主研究者。

课程思政是高校以“立德树人”为目标,通过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路径,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课堂为主渠道,以课程为载体,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引领学生价值观,为党和国家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教学过程。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思政入课堂”的重要途径。与义务教育阶段相比,高等教育的专业性更强,与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联系更紧密,课程思政有助于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应^[3]。

作为理工科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随机过程”课程交融渗透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电气自动化等多学科的知识,其内容中的许多概念和原理不仅能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更有助于塑造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因此,将课程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入教学,是“随机过程”教学改革创新应有之义、必备内容和关键环节,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

收稿日期:2025-03-21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研究性教学系列项目“基于雨课堂信息化平台的研究性教学模式在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究”(2022SYJXLX033);2024年度河南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随机过程”(2024YSZ01)

作者简介:聂亚昕(1997—),女,河南洛阳人,硕士,河南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数理统计。

通信作者:胡贵新(1982—),女,山东聊城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随机微分方程。

面,“随机过程”是理工科学生开展科研实践的必备工具,课程内容与科学研究、专业背景应用及实际问题解决联系紧密;同时随机模型的建立对多个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相关科研案例丰富。因此,加强研究性教学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提升创新实践能力,是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经过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后的“随机过程”课程应融入国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等思政育人元素,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挖掘随机过程的文化内涵、特性及其社会文化价值,培养学生根据已知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和能力。同时,该课程具备“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的特点(见图1),这与研究性教学的理念不谋而合。研究性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导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和学习,培养其创新与实践能力。因此,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教学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推动二者“同向而行”,能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紧密融合(如图2),既是切实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客观需要和有效途径,也是教育教学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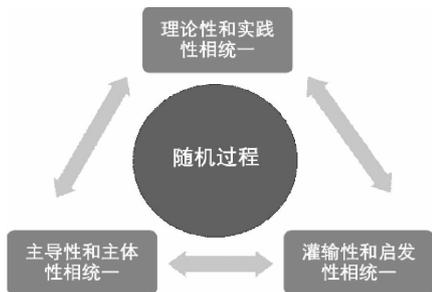


图1 “随机过程”课程特点



图2 “随机过程”课程改革三要素

二、当前“随机过程”课程中思政教学的短板

“随机过程”作为理工科核心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后续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然而,当前本科高校的“随机过程”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仍存在一些短板。

(一)思政教学安排不合理,课程实践环节欠缺

“随机过程”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为先修课程。部分学校在学生尚未系统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便开设此课程,导致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受阻,进而影响整体学习效果。现有教材偏重理论推导,缺乏思政育人元素与研究性案例,与实际生活关联较弱,既难以激发学生兴趣,也不利于培养其实践能力。此外,部分本科院校的课时安排中未纳入实践环节——而课程实践能有效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课程内涵,培养探索创新的优良品格与能力。因此,需完善课程安排以保障教学效果。

(二)思政目标预期较低,课程育人内容陈旧

传统“随机过程”课程的教学目标多聚焦于专业知识传授,缺乏对学生价值观、思想品德及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与新时代“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理念存在偏差。一方面,课程内容蕴含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但当前教学中尚未充分融入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感等育人元素,未能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引领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随机过程”作为专业理论与科学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课程,其理论及模型与理工科学生的专业科研联系密切,因此教学目标中还需明确对学生科研实践能力的要求。

(三)思政教学手段落后,未融入研究性教学模式

“随机过程”课程的理论及证明内容较多,国内多数院校仍采用“灌输式”授课,教学手段陈旧,未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与网络资源。教师“一支粉笔讲到底”的模式未体现“以学生为中心”,课堂缺乏互动性与趣味性,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同时未融入研究性教学手段,未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自主学习、思考、讨论及实践机会。这种教学方法难以满足当代学生的学习需求,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教师需积极运用雨课堂、慕课等工具,推行研究性教学模式,提升教学的吸引力、自主性、互动性与启发性。

(四)缺乏高素质思政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国内高校对“随机过程”课程思政的探索仍处于初期阶段:部分资深教师习惯“灌输式”授课,秉持守旧求稳心态,改革创新动力不足,实施思政教学与研究性教学的积极性较低;年轻教师虽愿意革新传统模式,主张融入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元素,但因缺乏相关教学及实践经验,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5];部分学校虽存在个别高素质教师,但仅靠少数人难以从根本上提升课程整体教学水平。

因此,需加强教师研究性教学能力培养,组建高素质教学团队。

(五)课程思政考核体系不完善,教学效果未达预期

当前“随机过程”课程的考核方式以期末考试为主,多采用闭卷笔试,仅侧重考察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缺失过程性考核环节,既未纳入对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也未将研究性教学成效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此外,本科院校通常将学生层面的考核作为重点,忽略了对教师教学效果及学校保障机制的评价,未能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考核体系。这种单一考核方式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不利于其综合素质提升;同时导致教师无法准确把握学生在价值观塑造、思维方式转变及实践能力提升等方面的进展,影响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针对性调整,阻碍课程质量的持续提高。

三、研究性教学和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教学路径探索

“随机过程”是一门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课程,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后续课程的顺利开展。针对上述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不足,需探索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路径,将研究性教学模式与思政育人元素融入专业知识传授过程,结合引

导启发、能力培养等研究性教学特征与价值引领、育人精神等隐性思政元素,具体可从五个方面优化课程建设。

(一)合理安排课程体系,强化课程实践环节

理工科本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大多已完成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先修课程,且后续专业课学习需以随机过程知识为基础。因此,建议将“随机过程”课程安排在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确保学生具备一定数学理论基础,提升对课程的理解与认知。此外,随机过程应用性较强,教学不应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尤其对研究生而言,随机过程是科研实践的重要工具,学生对课程内容与科研现状、工程应用的结合及实际问题解决抱有浓厚兴趣。^[6]因此,课程需增设实验课时,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同时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补充课程相关文献与资料,完善教材及教辅体系建设。

(二)完善教学目标,更新课程内容

“随机过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课程内容蕴含丰富思政德育元素,为融入课程思政提供了潜在空间;同时,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也对课程的研究性提出了要求。基于此,“随机过程”课程思政建设需将研究性教学目标融入思政理论教学体系,制定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研究性教学目标。(见表1、表2)

表1 “随机过程”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

目标方向	具体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掌握随机过程的定理、概念、证明及计算等理论知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理解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对立统一等哲学概念
能力方面	强化对随机过程抽象性、系统性、严密性及逻辑性的认识;具备推理演算、抽象论证、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及创新意识等能力
价值方面	了解科学家的成就与贡献,激发科学探索精神;培养高尚情操,塑造具有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人格特质

表2 “随机过程”课程的研究性教学目标

目标方向	具体教学目标
坚实研究基础	转变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索;了解学科前沿、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拓宽科学视野和知识边界
培养科研方法	具备文献检索、模型建立、实验设计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研读课程及专业领域文献,掌握基本科研方法
科研实践训练	融入学院、学校及企业相关科研团队,参与科研项目;借助科研实践平台开展创新实践,提升科研实践能力

在完善课程教学目标的同时,应积极更新课程教学内容:一方面,将思政元素与理论知识融合,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引入科研热点话题与最新成果,拓展科学视野,培养学生从已知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与能力。

教师可从两方面挖掘资源、打造特色研究性教学内容:(1)从核心素养挖掘思政育人元素。例如:从家国情怀切入,围绕党和国家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培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从个人品格切入,围绕

道德情操、健全人格、逻辑思维,培养学生的做人品格;从科学观切入,围绕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及学术诚信,培养学生的做事方法。“随机过程”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见表3)。(2)采用4S(师、时、史、势)教学法打造研究性教学内容,即学习师长楷模、深议热点时事、剖析知识沿革、把握发展趋势。授课内容选取需结合应用数学类专业特点及前期课程衔接,体现因材施教原则。4S教学法在“随机过程”研究性教学中的应用(见表4)。

(三)融入研究性教学手段,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随机过程”课程交融、渗透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电气自动化等多学科的知识,教师可以借助雨课堂、慕课、云班课等信息化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推行研究性教学模式^[7]。以河南理工大学的“随机过程”为例,在雨课堂一体化教学基础上,整合线上资源,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新路径:

表3 “随机过程”课程内容融入思政元素教学案例

序号	随机过程教学内容	案例名称	思政元素
1	随机过程基本概念	“有限维分布函数族的近似”	远大理想的实现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2	马尔科夫链与C-K方程	“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	辩证看待贫富现象,树立“幸福靠奋斗”的信念
3	泊松过程(等待时间的分布)	“黎明前的黑暗”	成功需经历时间积累与磨砺
4	生灭过程	“排队问题”	强调良好协作与高效沟通的重要性
5	平稳分布	“艾伦菲特链”	在稳定环境中探索规律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助力理想实现

表4 4S(shi)教学法打造“随机过程”研究性教学内容

方向	内容
师	学习师长楷模 介绍专业领域优秀前辈及科学家,以其锲而不舍、终身奉献科研的精神为榜样,引导学生传承科学精神
时	深议热点时事 结合热点时事,引导学生探索其与课程的关联,针对焦点问题开展研究,提升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史	剖析知识沿革 梳理随机过程的发展历程与知识演进,介绍发展中的数学及科研成果,增强学生对科研的了解与兴趣
势	把握发展趋势 引导学生阅读科研文献,引入最新成果,把握学科前沿趋势,培养创新能力

课前:依据教学大纲及学生个体差异,设计并发布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与任务,搭配线上资源及领域前沿文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

课中:通过雨课堂强化考勤、互动及习题推送,借助信息化平台实时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引入实际案例开展启发式教学,融入思政引导,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后:通过雨课堂布置小组作业及思考题,提升学生的思辨、协作及实践创新能力;依托雨课堂学习报告,直观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及实践情况,据此进行教学反馈与评估,优化教学不足。

通过上述方法,可将思政内容与研究性内容融入知识传授,提升学生对现实世界随机现象的理解,增强学习兴趣;助力学生挖掘随机过程的文化内涵、特性及社会价值,培养从已知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与能力。

(四)提升教师研究性教学能力,组建高素质课程教学团队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及正确价值观塑造的职责。其知识水平、科研能力及品德素养直接影响研究性教学改革成效,也是学生的学习典范。学校需从三方面推进团队建设:

1. 完善教师引进机制,引进科研能力强、兼具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2. 通过组织教学研讨会、继续教育、名校进修等,提升现有教师的研究性教学能力^[8];
3. 推动团队教师定期开展研讨交流,强化协作,组建专业硬、思路新、凝聚力强的高素质教学团队。

(五)完善课程考核机制,提升课程建设效果

课程考核与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教学效果的关键。教师需以课程教学目标为导向,融入思政元素与研究性教学要求,建立多元化、多维度的考核机制^[9]。考核内容应涵盖研究性教

学在专业评价、课程评价、教师评价及学生评价中的体现,综合考察思政要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度、学生课堂参与度与满意度、教学保障制度完善度等,全面评估课程思政建设效果。课程考核体系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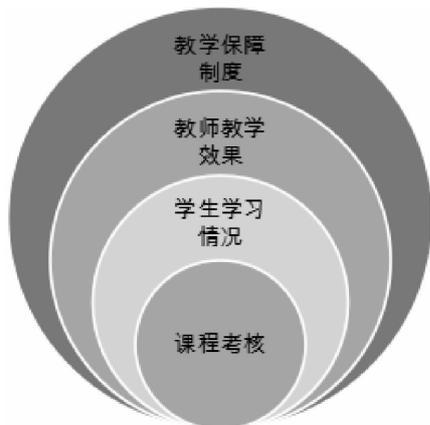


图3 课程考核体系建设

1.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核:结合课堂问答、交流讨论、课后作业、小组成果、信息化平台报告、标准化考试及结业小论文等,既考核学生对课程内容与思政目标的接受度,也要求其达到一定实践能力与研究水平,评估研究性要求与课程思政的达成度,据此改进课程不足。

2. 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考核:采用电子档案袋评价法、心理量表测验法、问卷调查法、课程嵌入式评价法及学生自评等,评估思政及研究性内容的教学效果;同时调研教师认为有效的教学环节,促进教师间的经验交流,共同提升研究性教学水平。

3. 对教学保障制度的考核:学校需健全课程思政与研究性教学融合的运行管理机制,明确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小组的职责;完善“随机过程”课程评价机制(如课堂听课评估、教师绩效考核等);成立课程临时党支部、组建学科专业研究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推动工作持续改进。

通过上述考核机制,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确保课程目标有效达成。

四、结语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应坚持“以德为先”,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与良好道德品质的学生。同时,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需突出“应用”导向,体现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要求,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10]。“随机过程”课程交融渗透多学科知识,具备实施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的基础。基于此,需针对当前本科院校该课程教学中的不足,积极探索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改革创新路径,使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切实提升其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 (2020 - 06 - 01) [2025 - 01 - 0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2]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研究性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 [EB/OL]. (2022 - 04 - 26) [2024 - 07 - 26]. <https://jyt.henan.gov.cn/2022/04-26/2438937.html>

[3] 王敏,高婷. 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方法和实现途径研究:以应用随机过程为例[J]. 现代商贸工业,2024(2).

[4] 王卉. 如何理解研究性教学[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22(3):82-88.

[5] 罗章松,苏雪芹. 研究性教学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可行性探析[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3,42(7).

[6] 冯海林,宋月. 新的培养目标下随机过程课程建设与探索[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6):105-106.

[7] 杜文胜. 经济学类专业中“应用随机过程”课教学探讨:以郑州大学为例[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22(3).

[8] 张培. 数学类专业“随机过程”课程教学的探讨[J]. 科教文汇,2023(18):103-106.

[9] 刘澍,郎量. 面向新工科的“随机过程”课程思政建设[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23,45(2):87-91.

[10] 张瑞,马霞. 应用型本科院校随机过程课程教学现状及优化路[J]. 西部素质教育,2024,10(1):182-185.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ing Synergistic Teaching Pathways for Research-Based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Stochastic Processes as an Example

NIE Yaxin, HU Guixin*, BAI Huiyu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urse of Stochastic Processes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synergistic teaching pathways for research-based teaching and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dentified the shortcomings in research-based teaching and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uggeste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athways. It merg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tegrated research-based teaching practices into the entir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and explored a synergistic teaching model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and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s.

Key words: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ochastic Processes; teaching reform; practical teaching

新工科背景下新形态教材建设研究

——以“基础工程”课程为例

杨庆年¹, 王永伟¹, 张彩霞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以“基础工程”课程为例,探讨新形态教材建设的基本内容,分析新形态教材在技术应用、教学模式改革以及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研究表明,新形态教材通过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高度交互性,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促进个性化学习。总结新形态教材在基础工程课程中的应用效果,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和发展的建议,以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形态教材;信息技术;教育改革;教学质量;项目化教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8

中图分类号:G642.0;TU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108-05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产业变革的加速,传统工程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创新型、复合型工程人才的需求。为应对这一挑战,教育部提出“新工科”建设战略,旨在通过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教材作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载体,是人才培养的基础^[1]。但传统教材普遍存在内容陈旧、形式单一、互动性欠缺等问题,难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及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因此,开发建设新形态教材,成为新工科背景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2]。

二、新形态教材发展现状

近年来,新形态教材建设在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和教育理念创新的共同驱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逐

步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3]。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初期探索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

在初期探索阶段(2010—2018年),新形态教材主要以“纸质教材电子化”为主,如PDF电子书、PPT课件等,虽实现了资源的便捷获取,但内容静态化、形式单一、互动性不足,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例如,早期数字化教材《基础工程》仅将传统文本转为电子版,缺乏动态演示和案例拓展。

2019年至今,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改革的深度融合,新形态教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形态、功能和应用场景均有一定创新,形成“纸质教材+数字化资源+在线课程”的立体化模式;同时,教材形态扩展至活页式、云教材等,构建“静态内容+动态资源”的立体知识体系^[4]。在教学实践中,新形态教材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培养了

收稿日期:2025-02-16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智能建造专业群新工科新形态教材建设示范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209);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智能建造专业群新工科新形态教材建设示范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ZGJG202411A)

作者简介:杨庆年(1977—),男,河南南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校长、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王永伟(1981—),女,河南温县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结构工程;张彩霞(1966—),女,河南辉县市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理论、职业教育及德育。

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尽管新形态教材发展迅速,当前仍面临以下瓶颈:

一是内容更新滞后。部分教材缺乏动态修订机制,难以快速响应行业技术变革,例如 BIM 技术在基础工程中的应用尚未全面纳入教材体系。

二是技术应用深度不足。部分教材存在“技术堆砌”现象,如 VR 场景设计脱离教学目标,或数据分析仅停留在表层统计,未能实现精准学情诊断。

三是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脱节。传统课堂的“单向讲授”模式难以适配新形态教材的互动需求,且现有评价体系仍以考试成绩为主,忽视过程性能力(如协作创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三、新形态教材建设基本内容

本文以《基础工程》教材为例,系统探讨新形态教材的建设内容、技术应用与教学模式,通过优化结构、创新形式、更新机制等方法,构建“内容重构、技术赋能、教法协同”三位一体的新形态教材建设框架。

(一) 内容建设方面

1. 强化基础,突出重点

新形态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精选教学内容,强化基础理论,突出工程应用,注重知识更新。例如,《基础工程》教材可精简冗余内容,突出地基处理、桩基设计等核心知识点,结合最新工程规范详细讲解其原理、适用范围及施工要点,助力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工程应用能力。

2. 创新形式,增强互动

新形态教材应依托多媒体技术,开发微课视频、动画演示、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资源,通过丰富呈现形式增强趣味性与互动性,进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5]。例如,讲解桩基施工工艺时,三维动画可直观演示施工流程与技术要点;讲解复杂地质条件时,虚拟仿真系统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观察地质构造,深化理解深度。

3. 优化结构,提升逻辑

优化教材结构需注重知识体系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例如,在《基础工程》教材可以按照“基础理论—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工程案例”的逻辑顺序编排内容,通过知识点的前后衔接和层次递进,帮助学生系统掌握课程内容。

4. 更新机制,持续改进

新形态教材建设应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将最新

科研成果和工程案例融入教材,确保内容与时俱进^[6]。例如,可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教材修订,将 BIM 技术应用、绿色地基处理等前沿内容纳入教材体系,保证教材内容与行业发展同频。同时,在教材使用过程中需常态化收集学生反馈,持续优化内容。

5. 注重应用,培养能力

新形态教材需融合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设置案例分析、项目设计等实操环节,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例如,教材中可引入实际工程案例,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借助虚拟实验系统,让学生模拟施工过程,验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二) 技术应用方面

目前新形态教材存在技术应用与教学内容融合度低、平台兼容性差、数据分析与反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7]。具体表现为:部分教材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误区,技术应用与教学内容脱节;不同平台因缺乏统一标准,导致资源难以共享、使用效果不佳;此外,对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能力不足,难以提供精准反馈和个性化指导,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提升。

针对上述问题,新形态教材建设需从三方面优化技术应用:一是精选适配的技术手段,推动技术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二是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范,促进跨平台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三是依托学习分析技术工具,系统收集并分析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为其提供精准反馈和个性化指导。例如,可开发兼具资源共享功能的智能推荐系统,根据学生进度和测试结果自动推送适配的学习资源与练习题,助力查漏补缺;同时开发智能答疑系统,提供实时解惑服务,提升学习效率。

此外,引入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构建沉浸式学习环境,能显著优化学生学习体验^[8]。例如,讲解复杂施工工艺时,学生可通过 VR 技术“亲临”施工现场观察细节;借助 AR 技术在纸质教材上叠加三维模型,将抽象概念可视化,进一步深化理解。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不仅能丰富教材表现形式,更能推动教学资源向智能化、个性化升级,为新工科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 教学模式及评价方面

新形态教材的教学模式应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核心,通过教材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有机融

合,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新型教学模式。具体可设计“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案例研讨—课后项目实践”的混合式教学流程:课前,学生扫描教材中的二维码观看微课视频与动画演示,完成预习任务;课中,教师依托教材中的工程案例库,引导学生分析实际工程问题,培养其工程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课后,学生通过虚拟实验系统完成项目实践,巩固所学知识。

同时,结合教材中的工程案例库和虚拟实验模块,可开展基于真实工程场景的探究式学习^[9]。例如,在桩基设计章节,学生可利用虚拟仿真系统模拟施工过程,验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通过项目式学习,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实际工程项目的设计与实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此外,采用翻转课堂模式将知识传授环节前置,课堂时间聚焦案例研讨与互动教学。例如,讲解地基处理时,教师引入某大型工程案例,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互动强化师生反馈,显著提升教学效果。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师生互动强化”的教学模式,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度,更为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路径。

当然,新形态教材教学模式也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对教师信息素养和教学设计能力要求更高,部分教师难以适应角色转变;二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但部分学生缺乏相应能力与习惯,难以适应新学习模式;三是需建立适配的教学评价体系,目前仍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与方法。对此,应从三方面优化:广泛开展新形态教材教学模式应用能力培训,提升教师信息素养与教学设计能力;通过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加快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将学习过程、学习成果及信息素养等纳入评价范围。

四、新形态教材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案例

“基础工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传统课程及教材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内容聚焦浅基础、桩基础等基础内容,对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与推广相对滞后;二是难以满足现代工程建设快速发展的需求,更无法适配大土木背景下的人才培养目标。新形态教材能够提供更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建立广泛的知识联系,并可根据学习进度和兴趣提供个性化路径与反馈,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10]。

新形态教材在编写中从四方面作创新设计:一是内容设计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以真实项目为载

体、知识图谱为辅助,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实际工程项目基础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分解学习知识点^[11]。如学习柱下独立基础时,课题组以某小区基础工程设计为例,通过知识图谱分解知识点(见图1),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核心内容。二是形式设计采用“纸质教材+数字化资源”的融合模式:纸质部分保留核心理论框架,数字化资源则通过动态演示、虚拟仿真等形式辅助学生理解内容。如学习浅基础破坏模式时,学生扫描教材二维码即可观看“地基破坏模式”动画,直观理解不同土质下的破坏特征;学习桩基荷载传递路径的交互式模型时,可拖动滑块调整桩长、桩径,实时观察轴力分布曲线变化;桩基静载试验、基坑开挖支护等内容则通过模拟系统、虚拟场景呈现。三是增设工程案例库与即时测验模块:学生可通过实际工程图纸、施工视频(如某高层建筑桩基施工实录)学习并巩固知识;每章结束后,可通过嵌入的选择题、计算题进行测验(系统自动批改并反馈错题解析)。四是构建多元化评价与反馈机制:项目组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由课程负责人组织召开项目评审会议,邀请第三方、企业导师、授课教师及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共同参与评价(见表1)。

2021级(传统教学)和2022级(新形态教学)学生学习成效对比分析(见表2)显示:应用新形态教材后,学生的设计计算准确率、创新方案占比(答辩)显著提升,构造细节错误率明显降低,验证了其在土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显著优势。

在“基础工程”课程中,新形态教材通过项目化教学(如某小区基础设计任务)、知识图谱分解核心知识点,结合虚拟仿真技术(如地基破坏动画、桩基交互式模型)及工程案例库(如高层建筑桩基施工实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然而,为进一步优化新形态教材,还需突破四方面瓶颈:降低虚拟仿真技术的硬件依赖(如推广轻量化WebVR工具);强化校企协同更新机制建设,整合智能基坑监测技术等行业前沿案例;完善教师信息化培训,提升技术工具应用能力;建立跨校共享的标准化资源平台,推动教材从“知识传递”向“能力孵化”全面升级。

五、结语

新形态教材在内容建设、技术应用和教学模式方面的创新,有效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新形态教材在基础工程课程中的应用,不仅破解了传统教学中“理论抽象、实践薄弱”的痛点,更通过数字化资源的深度整合,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思维与创

新能力,为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范式。然而,新形态教材的建设与应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行政部门、高校、教师、学生及企业等多方协

同发力^[12]。相信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和优化措施的逐步落实,新形态教材必将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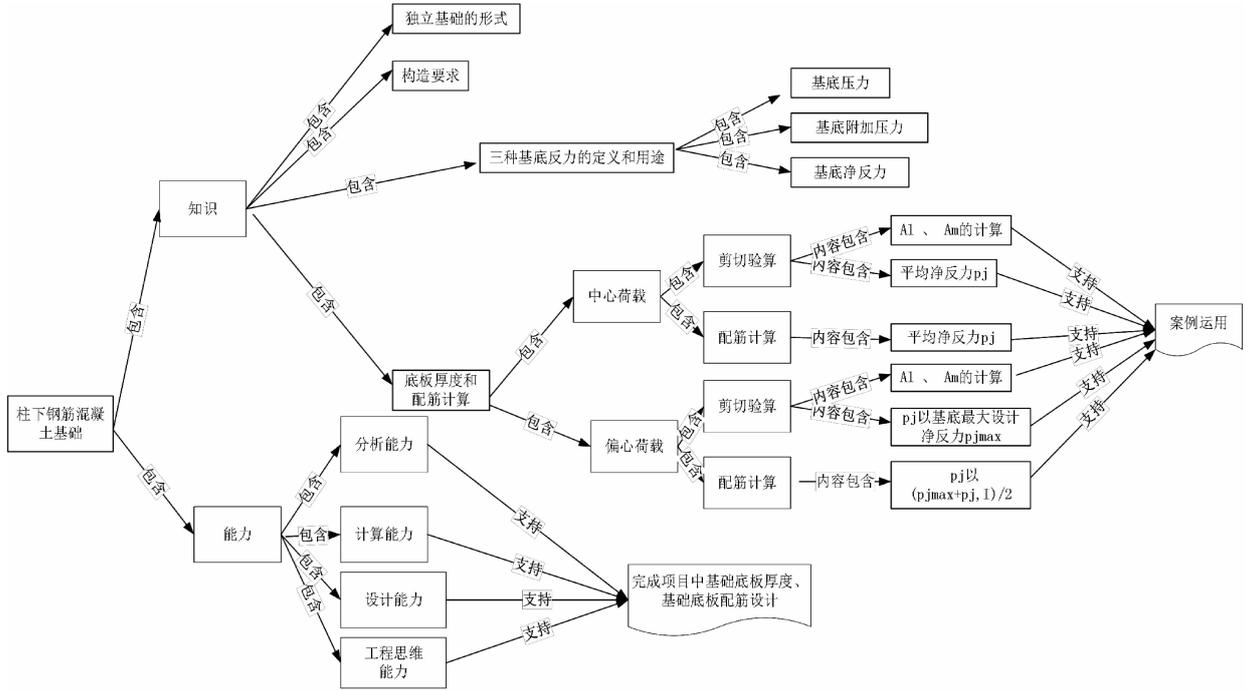


图1 柱下钢筋混凝土基础知识图谱

表1 多元化评价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方式	评价主体	权重
知识掌握	线上、线下测验成绩	授课教师	40%
实践能力	基础设计优化方案、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第三方评价+行业专家评价+教师评价	30%
综合能力	小组答辩(展示设计逻辑与创新点)	企业导师+授课教师+学生互评	20%
学习态度	在线讨论参与度、资源使用频率	授课教师	10%

表2 2021级、2022级学生学习成效对比

指标	传统教学组	新形态教学组	提升率
设计计算准确率	62.2%	90.1%	27.9%
构造细节错误率	43.6%	12.3%	31.3%
创新方案占比(答辩)	21.4%	73.8%	52.4%

参考文献:

[1]徐利娜,刘建,郭云波.《电路分析基础》新形态应用型教材建设[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5,(35).
 [2]宋倩倩,毕晴晴,杜雪梅.关于应用型高校建设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的探讨[J].中国信息化,2022(1).
 [3]宋毅,王繁.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发展现状与建设思路[J].中国大学教学,2023(12):4-7.
 [4]黄明东,蔺全丽,李晓锋.高校新形态教材的特征、发展态势与建设路径[J].出版科学,2022,30(2):32-39.
 [5]蔡连玉,金明飞,周跃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从技术整合到人机融合[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3):36-44.

[6]王润.数字教材何以推动教学变革:逻辑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20(5):44-51,68.
 [7]柴龙会,肖向红,张晶钰,等.“互联网+”时代关于新形态教材建设与应用的思考[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7(2):50-52
 [8]刘超,黄荣怀,王宏宇.基于知识图谱的新型教材建设与应用路径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23(8):10-16.
 [9]赵清梅.“互联网+”背景下职业教育教材新形态一体化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0):76-79.
 [10]赵丙勋,袁华莉.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新形态数字教材的应用场景及建设路径[J].出版科学,2025(33):55-65.
 [11]张铎,张慧丽,邵伟华.应用型高校“项目式”新形态课程与教材一体化研究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4(13):117-120.
 [12]孙燕,李晓锋.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教材发展需求、现状与对策[J].中国大学教学,2023(12).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Format Textbooks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Course

YANG Qingnian¹, WANG Yongwei¹, ZHANG Caixia²

(1.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Railw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urse of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developing new-format textbooks and analyzes their specific applications i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reform,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new-format textbooks, featuring enriched content, diverse formats, and high interactivity, effectively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stimulate student engagement, and promote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utcomes of new-format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course of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and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new-format textbook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al reform; teaching quality; project-based teaching

(上接第 90 页)

Discussion on Approaches to Enhance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Value Guiding Power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Era

CHEN Chunmei

(School of Media,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4,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a precious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vital root for rebuild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Exploring its contemporary value and deeply rooting it in the nation's cultural ethos are crucial measures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is spirit.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examines new avenues for expressing the spirit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era, focusing on uncovering its modern relevance. It delves into traditional ethos such as Yu the Great's Flood Control Philosophy and the Yugong Spirit of Unwavering Resolve,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ethos including the Jiao Yulu Spirit, the Red Flag Canal Spirit, and the Dabie Mountains Spirit. By revitalizing these cultural legacies,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gains renewe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Carrying forward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spirit in the new era effectively manifests its contemporary guiding power.

Key words: new media era; spiritual essence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value-guiding power; approaches

研究生波谱分析课程的现代教学实践策略

郑昕¹, 时梦红¹, 秦洁琼¹, 韩丹丹¹, 李玉玲², 徐翠莲^{1*}

(1. 河南农业大学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波谱分析课程是化学化工类研究生重要的基础课程,对波谱分析课程开展现代化的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以当前波谱分析课程的教学现状为背景,分析教学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从学生兴趣出发,通过案例或问题设计,利用现代仪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探究物理防晒剂的防晒效果,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为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拓宽学科知识领域,和自身发展上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波谱分析;研究生;紫外实验;案例设计;实践教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19

中图分类号:G642;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113-05

波谱分析包括紫外光谱(UV)、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谱(NMR)和质谱(MS),是解析化学、化工、制药、材料及相关领域中有机化合物结构的重要手段。因此,波谱分析课程是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1]。掌握波谱分析课程的基本理论,厘清各种波谱与有机化合物结构之间的关系,培养综合解析能力,是该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但是,波谱分析课程内容繁多、理论抽象、解谱困难,一直是教师教学难度大、学生学习困难的课程。此外,分析仪器的快速更新与发展,对操作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和操作技能熟练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波谱分析课程教学的状况分析

(一)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国家提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战略^[2],强调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正逐渐向工程应用转型。对于化学化工类研究生而言,波谱

分析课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更要求其将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融会贯通,做到熟练应用以解决科研与实际问题。

当前传统波谱分析课程的教学面临诸多困境,学生学习难度较大:首先,课程基础理论抽象且信息量大,在学校规定的标准课时内,学生很难全面掌握这些复杂的理论知识。以核磁共振波谱理论为例,涉及原子核自旋、能级跃迁等微观概念,学生理解起来十分困难,也严重影响后续学习。其次,大型仪器操作机会稀缺。波谱分析课程依赖核磁共振仪、质谱仪等大型精密仪器开展教学与实践,但这些仪器不仅购置成本高昂,后期维护成本也居高不下。受资金和资源限制,学校难以保证每位学生都有充足的操作机会,这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许多学生在理论学习后缺乏实操经验,面对真实实验数据与科研任务时,往往手足无措。再次,大型精密仪器更新换代迅速,而教材内容却明显滞后。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新型波谱分析仪器与分析技术不

收稿日期:2025-05-31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精品教学案例项目——农化产品高效利用和管理”(YJS2024AL060)

作者简介:郑昕(1979—),男,河南周口人,博士,河南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聚集诱导发光材料及荧光可视化应用。

通信作者:徐翠莲(1965—),女,河南驻马店人,博士,河南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有机有机合成化学、生物源活性物质转化与利用。

断涌现,现有教材却未能及时纳入这些前沿技术与成果,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行业前沿脱节。当学生参与实际科研项目或企业生产实践时,就会发现所学知识难以满足实际需求,难以跟上行业发展步伐。最后,理论知识与实验谱图的结合是波谱分析课程学习的关键,但学生在此方面困难较大。一方面,学生在解读实验谱图时,很难将抽象理论与具体谱图特征对应起来,无法准确分析谱图蕴含的化学信息;另一方面,对于常用的化学专业软件(如谱图处理和数据分析软件),学生因缺乏系统培训与实操练习,难以熟练操作。这不仅增加了学生处理实验数据、撰写科研报告的难度,更制约了其学习效果与科研能力的提升。

(二) 存在的问题

现有教材的内容设计存在诸多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一方面,不同学生在学习能力、兴趣爱好及知识储备等方面差异显著,但教材内容相对单一,缺乏弹性与分层设计,难以实现因材施教。另一方面,教材知识点更新迟缓,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当前科技日新月异,各行业新技术、新成果与新规范持续涌现,教材内容却未能及时纳入这些前沿元素,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现实脱节、缺乏新颖性,无法接触到行业最前沿动态。

在此背景下,如何将行业新技术、新成果、新规范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学生,已成为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学生若不能及时了解行业最新动态,踏入社会后,将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要求。同时,如何将抽象枯燥的文字知识转化为学生可灵活运用实践能力,亦是一大挑战。单纯的文字知识往往晦涩难懂,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唯有转化为生动实用的知识,才能真正提升学习效果。此外,教材知识点分散、缺乏系统整合,不利于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唯有通过系统梳理,才能帮助学生深化理解与掌握。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其对教育质量提升与学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深远。

二、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差异

波谱分析作为一门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占据重要地位的专业课程,虽在教学内容上存在一定重叠,但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及培养目标等多个维度均呈现显著差异^[3]。

在本科阶段,波谱分析课程的教学具有独特的侧重点。首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体系。对于刚接触波谱分析领域的本科生而言,他们需从基础概念、基本原理学起,逐步搭建专业知识框架。这就如同建造高楼,稳固的理论基础

是后续学习与应用的基石。在此过程中,教师需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复杂理论知识,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考虑到波谱分析课程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为避免课堂教学过于生硬枯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尤为重要。为此,本科阶段的教学应注重设计具有趣味性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可乐瓶材料的认知与剖析”这一综合性实验中^[4],教师巧妙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可乐瓶作为教学素材,通过提出“废品回收站为何将瓶身与瓶盖分开回收”这一贴近生活的问题,迅速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其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以兴趣为学习驱动力,学生在积极参与实验的过程中,不仅能亲身体验并练习操作精密分析仪器,掌握化学物质分析测试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还能在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分析能力与探索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类实验教学,学生能深刻认识到波谱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及其重要性,同时实现化学与科技、社会、环境的有机融合。在此过程中,学生逐渐树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理念,增强对化学学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研究生阶段的波谱分析课程教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研究生阶段更注重对课程原理的深入探究、仪器操作技能的精准掌握,以及谱图综合分析与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由于研究生培养目标更高、要求更严格,其需具备更强的科研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研究生在波谱分析课程学习中,不仅要透彻理解课程原理,还需熟练运用这些原理开展实际操作与数据分析。在仪器操作方面,研究生需掌握各类先进精密仪器的使用方法与技巧,能独立完成复杂实验操作。在谱图分析方面,研究生需具备综合分析与解读复杂谱图的能力,能从谱图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科研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内容更广泛,涵盖波谱分析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与最新技术应用。同时,学习模式也更多样化,除传统课堂讲授与实验教学外,还包括学术讲座、科研项目实践、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通过参与这些多样化的学习活动,研究生能拓宽学术视野,了解学科发展最新动态,培养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本科生波谱分析课程教学侧重基础知识的掌握,难度不宜过高,旨在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而研究生教学则注重原理的深入理解、实践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学科发展趋势的把握,着重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图谱问题的能力,为其后续科研及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三、改革策略

(一)“问题导向”原则

在研究生阶段,波谱分析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解析复杂谱图的能力,以及结合科研项目或生活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提出“问题导向”原则,以“任务驱动”为核心动力,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锻炼其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可采用研究性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师生互动,结合案例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等方法构建教学过程^[5]。例如,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使用防晒霜,但当被问及如何选择防晒霜、哪种防晒霜效果更优及适用人群等问题时,学生往往无法准确回答。因此,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生活现象切入,在实验中展开深入学习,实现“学”与“用”的统一。

提出这一问题时,首先需了解防晒剂的相关知识。防晒剂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用品,市面上的防晒剂根据作用机理不同,可分为化学吸收剂(化学防晒剂)和物理性屏蔽剂(物理防晒)^[6]。化学吸收剂多为含羰基的芳香族化合物,其化学结构允许分子吸收高能紫外线,并以低能射线形式释放能量,从而阻止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物理防晒剂即紫外线屏蔽剂,通过反射及散射紫外线对皮肤起到保护作用。研究发现,市面上的婴儿防晒剂基本为物理防晒剂,成分多为单一的 TiO₂ 或 ZnO,或两者的混合物(表 1)。紫外线根据波长及对人体的影响不同,可分为三个波段:长波紫外线(UVA)、中波紫外线(UVB)、短波紫外线(UVC)。其中 UVA 波长较长(320~400nm),会深入肌肤深层,损伤真皮层,导致肌肤老化;UVB 波长居中(280~320nm),仅能到达肌肤表皮;UVC 波长较短,在大气中已被臭氧层吸收或散射,无法到达地面。对于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学生,可将其作为科普内容融入教学;课堂讲授时,以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替代枯燥的课本知识,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有效活跃课堂气氛,同时拓宽学生知识面,丰富知识储备。这一模式体现“以人为本”的学生观,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表 1 市面上的物理防晒剂成分

某品牌物理防晒剂	主要成分	适用人群
物理防晒霜 1	ZnO、纯净水等	儿童、敏感肌人群
物理防晒霜 2	非纳米 TiO ₂	儿童、成人、孕妇
物理防晒霜 3	ZnO、TiO ₂ 等	新生儿宝宝、儿童

在本科阶段的实验教学中,学生已接触并学习了液体紫外测量的相关内容,通过实际操作,对紫外仪器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and 实践经验。然而,随着学业深入,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他们面临的研究课题

和材料更加复杂多样,研究材料的状态不再局限于单一液体,固体、气体等多种形态的材料频繁出现在研究中。这种变化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凸显了本科阶段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因此,本实验以 TiO₂ 和 ZnO 为例,学习固体紫外的测量方法,以弥补本科阶段的不足。本着刨根问底的学习态度,可提出问题:哪种成分的物理防晒剂防晒效果更优?其有效波长范围是多少?基于这一思路,设计了 TiO₂ 和 ZnO 的紫外测试实验。以生活中常见物质为切入点,一方面可探究这两种物质对 UVA 与 UVB 的紫外吸收情况,另一方面也能掌握紫外仪器的使用方法。

在进行紫外测试时,首先需学习样品制备。通常测量液体时采用溶液法制样,本实验中该方法是否依旧适用?通过这一问题,可锻炼学生自主思考能力。通过思考与交流,学生可自主得出结论:本实验待测物质为固体,制备成溶液可能改变其理化性质,故上述方法不适用。可将固体粉末研磨后压片进行测试,以在不改变其性质的基础上实现准确测量。确定制样方法后,即可开展具体操作。首先,使用 BaSO₄ 参比板进行基线校正。这一步骤可消除仪器本身误差及环境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为后续测量提供准确基准。校正完成后,将待测样品与 BaSO₄ 按一定比例研磨均匀,涂覆于基底上,控制厚度,以表面光滑为原则。将制备的样品放入样品槽中,即可进行测量。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亲自动手完成压片、参数调试、背景测量等步骤,不仅能强化实验操作能力,还能提升自主学习与独立研究能力。同时,课后可布置作业,让学生总结固体紫外测量步骤——通过亲身实践归纳的内容更通俗易懂、易于操作。最终,得到不同比例的固体紫外光谱图(图 1)。从图中数据可初步得出结论:TiO₂ 在 280~320nm 波段有明显吸收峰,可阻挡一定量 UVB;在 320~400nm 波段,TiO₂ 基本无吸收,而 ZnO 有明显吸收峰,可阻挡一定量 UVA。因此,单一的 TiO₂ 或 ZnO 物理防晒剂无法完全阻挡 UVA 和 UVB,两者混合使用可有效阻挡这两个波段的紫外线。因此,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物理防晒剂时,选择同时含有 TiO₂ 和 ZnO 成分的产品。

本次实验通过调节待测样品的不同比例进行测试,通过改变样品浓度调节吸光度,进而改变峰高。还可尝试其他比例的样品测试,探索更合理、具有良好峰形的固体紫外光谱图。通过设计此类实验教学,学生可练习实验操作与 Origin 绘图软件的使用,掌握原始数据的作图方法,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与

学习效果。

同时,研究生阶段需在实验室开展系列实验,对于这类“研究性实验项目”,可采用“理论+实践+反思”的流程:学生自主查阅相关领域文献,追踪最新学术动态,并基于所学知识设计合成路线;经组内交流探讨后,开展实验操作;对于实验最终合成的目标产物,学生需能做出初步判断,确认其是否具备与目标产物一致的特征官能团及结构特征。在产品检测过程中,可查阅文献进行标准谱图对照,开展反思与总结,引导学生思考“合格图谱的判定标准是什么”,最终由教师给出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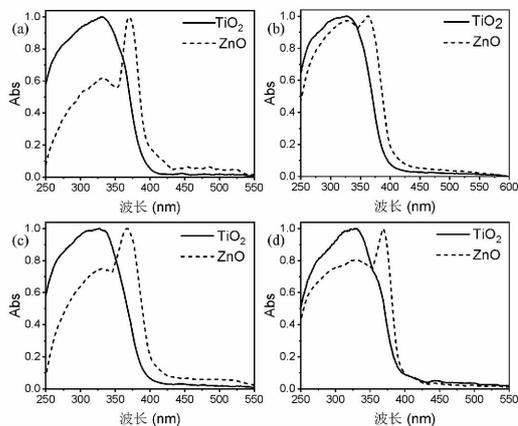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比例的 ZnO 和 TiO₂ 与 BaSO₄ 混合归一化后的紫外光谱图。(a) 只含有 ZnO 和 TiO₂ 样品粉末;(b) ZnO 和 TiO₂ 与 BaSO₄ 的比例为 1 : 5 ; (c) ZnO 和 TiO₂ 与 BaSO₄ 的比例为 1 : 10 ; (d) ZnO 和 TiO₂ 与 BaSO₄ 的比例为 1 : 20

这一教学模式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7],以科研与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学生通过该阶段的学习可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同时增强课程的实用性^[8]。

(二)“学生中心”原则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提出了“新三中心”理论,即以学生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从“旧三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向“新三中心”的转变,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知识是基于学生已有经验主动构建的。针对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可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例如,利用“超星学习通”^[9]网络教学平台,将课程内容(包括课件、随堂练习、作业等)提前推送至学生,学生可借助这些资源有针对性地学习,提前掌握重难点,存疑之处可在课堂上及时提问(图2)。同时,由于研究生教学人数较少,亦可采用“翻转课堂”模式:在探究 TiO₂ 和 ZnO 防晒效果的实验中,可让学生讲解紫外漫反射的实验原理与过程,绘制实验流程图,并总结固体紫外的通用操作步骤;其他

同学进行补充完善,最后由指导老师总结评价。这种方式既能改善学生常出现的“似懂非懂”状况,又能巩固所学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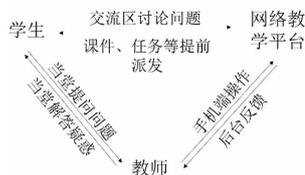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教学平台的三方示意图

在学习方式多元化的同时,学生的考核方式也应该作出相应调整。可引入“形成性评价”等方式^[10],增设单元专题测试或非正式考试,旨在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有效调控学习过程,从而在掌握学情的基础上改进教学。其评价结果不作为“终结性评价”^[11]的依据,实现“为学习而评价”而非“为评价而学习”。

此外,着眼于研究生未来实际工作需求,亦可引入计算机辅助软件的教学内容,重点介绍数据处理软件(如 MestReNova 的功能与基本操作),以及其他与课题组研究相关的测试仪器及配套软件。教学过程中,亦需结合仪器实际情况明确“主次问题”:例如,在紫外、红外等实验中,要求学生能够独立主导整个实验过程(包括原理理解、样品制备、测试操作、结果分析),这些均为核心问题;而核磁共振仪等大型仪器因有专业测试人员操作,故制样及后续分析为核心问题,仪器测试则为次要问题。因此,教师可重点讲解 MestReNova 的各项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核磁共振谱图的精准处理、信号峰的分析、数据的模拟与预测等。通过详细讲解与实际操作演示,学生可逐步掌握该软件的基本操作流程,学会利用软件高效处理和分析实验数据,从而提升科研工作的效率与准确性。

除 MestReNova 外,教师还可结合课题组研究方向与实际需求,介绍其他相关测试仪器及配套计算机辅助软件。不同课题组的研究领域与实验方法存在差异,所用测试仪器与软件亦有所不同:例如,有机合成研究中常用前文提及的固体紫外、核磁共振等设备;材料分析领域中,热重分析仪(TGA)、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及其配套分析软件应用广泛;聚集诱导发光(AIE)领域中,量子产率仪器(QY)、荧光寿命仪器(TaU)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学生不仅要学习仪器的使用,还需掌握相关专业软件(如 Gaussian 软件及相关晶体解析软件等)。通过对这些与课题组研究相关的测试仪器及软件的学习,研究生能更好地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研究结合,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四、结语

基于波谱分析课程教学的现状和研究生授课的特点,本文重点探讨了若干教学改革策略,核心围绕“问题导向”与“学生中心”两个原则。文中以生活中的防晒剂为具体案例,将固体紫外光谱的操作方法与生活实际、社会应用相贯通,通过分析比较TiO₂和ZnO的波谱特征,明确二者的紫外吸收波长,进而确定各类物理防晒剂的有效防护范围。上述教学改革策略能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建立与实际应用的关联,实现理论的形象化,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化合物“构效关系”的理解,还能有效改善波谱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此外,结合更多元化的网络教学辅助手段与考核方式,可真正推动教学从“老师教得好”向“学生学得好”转变。

参考文献:

- [1] 汤新景,师晓萌,王超.波谱解析课程的本科教学改革探索[J].大学化学,2023,38(2):38-40.
- [2] 李玉玲,孙浩冉,王宇飞,等.“双创”背景下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教育信息化论坛,2023,(3):69-71.
- [3] 王多志,刘晨江.本科生与研究生有机波谱分析课程教

- 学差异对比[J].大学化学,2016(6):29-32.
- [4] 任德财,赵冬梅,杜宇虹,等.介绍一个综合性实验:可乐瓶材料的认知与剖析[J].高分子通报,2022,26(7).
- [5] 杨晓聪,向晨曦,朱静.大数据背景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以食品化学课程为例[J].中国食品,2024(14).
- [6] 郑洁.防晒剂的性能及质量评价[J].日用化学品科学,2010,33(8):18-21.
- [7] 王亚琦,王丽英,贾慧劼,等.OBE教学理念下波谱分析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大学化学,2019(6).
- [8] 张文娟,黄宏升,张红燕,等.OBE教育理念下的工科大学基础课程改革探索[J].山东化工,2018(12).
- [9] 景慧萍,洪海龙.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天然药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J].广东化工,2018,45(19):135-138.
- [10] 梁少英,吴晓琴,曹小萍,等.基于教学活动及教学平台的混合式学习过程性评价方案的设计[J].护理研究,2020,34(14):2555-2557.
- [11] 孙晶,刘新.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教学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4):94-100.

(责任编辑 许峻)

Morden Teaching Practice Strategy of Spectral Analysis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ZHENG Xin¹, SHI Menghong¹, QIN Jieqiong¹, HAN Dandan¹, LI Yuling², XU Cuilian^{1*}

(1. College of Scienc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of spectral analysis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modern teaching reform for spectrum analysis learning.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a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on account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spectrum analysis course. The sunscreen effect of physical sunscreen agent is explored by a UV-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 through case or problem design based on students' interests. In the hope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reality, it will play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mode, broadening the subject knowledge field, and improving their self-development.

Key words: Spectrum Analysis; postgraduate students; ultraviolet experiment; case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条件随机场的特征函数产生机制及量化研究

于江德^{1,2}, 黄继海^{1,2}, 刘秋菊^{1,2}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2. 河南省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条件随机场作为应用广泛的序列数据标注模型之一,特征函数对模型训练至关重要,是运算的主体和参数估计的中心。对条件随机场的特征函数产生机制及相关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设定样本窗口大小和特征模板集是建模的关键,每个样本从特征模板扩展出上下文特征,上下文特征和任一标记组合生成特征函数,特征函数作用于模型训练得到相应权重参数。采用B、M、E、S四词位标注集,研究了基于条件随机场的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中特征函数的产生及其对模型训练的影响,在第二届国际汉语分词评测提供的PKU和MSRA两种语料上进行了特征函数产生的量化研究。研究表明:单字、双字、三字特征模板在同一语料中扩展出的特征函数的个数快速增加,不同单字特征模板在同一语料上扩展出的特征函数个数基本相同。训练出的模型大小与扩展出的特征函数成正比,训练时长和特征函数没有必然联系。

关键词:条件随机场;样本窗口;特征模板;上下文特征;特征函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20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118-06

1 引言

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s)是Lafferty于2001年在隐马尔科夫模型和最大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判别式条件概率模型^[1]。CRFs在观测序列的基础上对状态序列进行建模,常用于解决序列化数据标注问题。由于条件随机场强大的表达能力和出色的性能,它被广泛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2-12]、目标跟踪^[13]、图像分类^[14]、物体检测^[15]等领域。近年来,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CRFs已经被成功应用到词语切分^[2-4]、事件抽取^[5]、领域术语抽取^[6]、句法分析^[7]、新词发现^[8]、语义角色标注^[9]、时态标注^[10]、Web实体活动抽取^[11]、情感分类^[12]等众多任务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性能。但目前对条件随机场模型的特征函数产生机制及量化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解决了应用条件随机场建模时的两个关键问题:(1)特征函数的产生机制;(2)条件

随机场训练过程中特征函数个数、训练时长、模型大小等数量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条件概率模型,条件随机场在对序列数据标注的建模过程中,上下文扮演着解决问题所需的语言知识和资源提供者的重要角色。在CRFs建模过程中,样本经特征模板扩展出的上下文特征起到了表征上下文的作用,且每个上下文特征可以生成一组特征函数,而特征函数是模型训练的运算主体和参数估计的中心。在训练语料一定时,模型训练时设定的样本窗口大小和特征模板集对产生的特征函数的数目起决定作用,直接影响着条件随机场训练的时间、训练后模型的大小等。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CRFs建模过程中上下文特征表示方法和特征函数产生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B、M、E、S四字位标注集,使用CRF+ +0.58工具包实现了字串序列的词位标注,研究了词位标注汉语分

收稿日期:2024-12-10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252102210167);202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24B520036, 25B520030);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重点项目(2024SJGLX0206)

作者简介:于江德(1971—),男,河南林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CCF高级会员,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词中特征函数产生的数量情况和对模型训练的影响。在第二届国际汉语分词评测提供的 PKU 和 MSRA 两种语料上进行了特征函数产生机制的实验,并就特征函数对模型训练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数量关系研究,通过实验厘清了设定的样本窗口和特征模板集、生成的特征函数个数、训练时长、训练后模型大小等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2 条件随机场简介

条件随机场是一种以给定的输入序列值为条件来预测输出序列值概率的无向图模型,即通过定义状态序列和观测序列的条件概率 $P(S|O)$ 来预测最可能的状态序列。用于对序列数据标注建模的 CRFs 可以用简单的链图或线图示意(如图 1),它是一种最简单也最重要的 CRFs,称为线链 CRFs。在模型图示中随机变量之间的无向边表征了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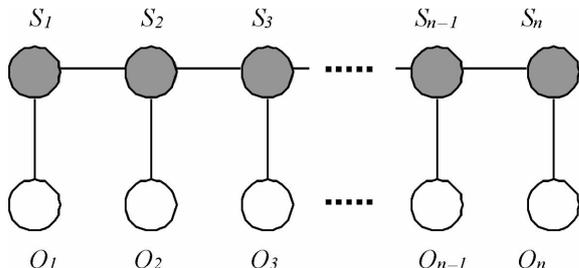


图 1 线链 CRFs 的图形结构

设 $O = \{o_1, o_2, \dots, o_T\}$ 表示被观察的输入数据序列,例如,对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任务而言,观察序列就是有待标注词位的汉字序列。 $S = \{s_1, s_2, \dots, s_T\}$ 表示被预测的状态序列,在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任务中,每一个状态本质上就是一个词位标记(例如词首 B、词尾 E),本文规定字只有四种词位: B(词首)、M(词中)、E(词尾)和 S(单字成词)。这样,在一个输入序列给定的情况下,参数为 $\Lambda = \{\lambda_1, \lambda_2, \dots, \lambda_K\}$ 的线链 CRFs,其状态序列的条件概率为:

$$P_{\Delta}(S|O) = \frac{1}{Z_O} \exp\left[\sum_{i=1}^T \sum_{k=1}^K \lambda_k f_k(s_{i-1}, s_i, o, t)\right] \quad (1)$$

其中, Z_O 是归一化因子,它确保所有可能的状态序列的条件概率和为 1,即它是所有可能的状态序列的“概率得分”的和:

$$Z_O = \sum_s \exp\left[\sum_{i=1}^T \sum_{k=1}^K \lambda_k f_k(s_{i-1}, s_i, o, t)\right] \quad (2)$$

$f_k(s_{i-1}, s_i, o, t)$ 是特征函数,用于表征上下文所蕴含的语言特征,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条件随机场模型通过特征函数能够整合任何上下文特征,对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任务而言,包括可观察字序列 O 在时刻 t 的所有特征,即当前字及其上下文所蕴含的各种上

下文特征,以及隐变量词位的状态转移特征 $s_{i-1} \rightarrow s_i$ 。一般来说,特征函数定义在一个伽氏集 $O \times S$ 上,其中, O 是可能的上下文或者任意的预定义条件的集合, S 是一组可选的标注集,通常是一个二值表征函数,表示如下:

$$f_k(s_{i-1}, s_i, o, t) = \begin{cases} 1, & \text{如果满足条件} \\ 0, & \text{否则} \end{cases} \quad (3)$$

λ_k 是一个需要从训练语料中学习估计的参数,是相应的特征函数 $f_k(s_{i-1}, s_i, o, t)$ 的权重,取值范围可以是 $-\infty$ 到 $+\infty$ 。给定一个由公式(1)定义的条件随机场模型,在已知输入的字串序列 O 的情况下,最可能的词位标记序列可以由下式通过韦特比算法动态规划求出。

$$S^* = \arg \max_s P_{\Delta}(S|O) \quad (4)$$

从字序列到词位标记序列的条件随机场建模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参数估计和特征选择。参数估计是从训练数据集学习每一个特征函数的权重参数,即求解向量 $\Lambda = \{\lambda_1, \lambda_2, \dots, \lambda_K\}$ 的过程;而特征选择是筛选出对 CRFs 模型有意义的特征,结合本文所采用的 CRF++ 0.58 工具包,其关键在于根据具体的任务设定合适采样窗口和特征模板集。CRFs 模型进行序列数据标注时需要使用大量的上下文特征,习惯上,把这些上下文特征按照共同的属性分为若干组,称之为特征模板。

2.1 参数估计

参数估计就是从训练数据集学习权重参数向量 Λ 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最大对数似然估计实现。将训练数据集表示为: $D = \{O^{(i)}, S^{(i)}\}_{i=1}^N$, 其中,每个 $O^{(i)} = \{o_1^{(i)}, o_2^{(i)}, \dots, o_T^{(i)}\}$ 是一个输入数据序列; $S^{(i)} = \{s_1^{(i)}, s_2^{(i)}, \dots, s_T^{(i)}\}$ 是相应的输出数据序列。在训练数据集 D 下对数似然为:

$$L_{\Delta} = \sum_{i=1}^N \log P(S^{(i)} | O^{(i)}) \quad (5)$$

将 CRFs 中的条件概率公式(1)代入(5)式,得:

$$L_{\Delta} = \sum_{i=1}^M \left[\sum_{t=1}^T \sum_{k=1}^K \lambda_k f_k(s_{t-1}^{(i)}, s_t^{(i)}, o^{(i)}, t) - \log Z_{O^{(i)}} \right] \quad (6)$$

为了避免对于大量参数估计时出现过拟合,对数似然经常需要将参数作先验分布的调整,采用高斯先验调整后,(6)式变为:

$$L_{\Delta} = \sum_{i=1}^N \sum_{t=1}^T \sum_{k=1}^K \lambda_k f_k(s_{t-1}^{(i)}, s_t^{(i)}, o^{(i)}, t) - \sum_{i=1}^N \log Z_{O^{(i)}} - \sum_k \sum_k \frac{\lambda_k^2}{2\sigma^2} \quad (7)$$

其中,最后一项是用于进行调整的特征参数的

高斯先验值, σ^2 表示先验方差。优化(7)式需要一个迭代的过程,传统的办法是 Della Pietra 等人在通用迭代算法(generalized iterative scaling, GIS)的基础上提出的改良迭代算法(improved iterative scaling, IIS)。IIS 算法或基于 IIS 的算法的最大弱点是计算量大,求解速度慢。本文所采用 CRF ++ 工具包中采用 L-BFGS 算法进行参数估计。L-BFGS 是一种被实验验证^[16]的训练速度快于 IIS 的算法,它是一种充分利用以前的梯度和修改值来近似曲率的二阶方法,可以避免准确的 Hessian 矩阵的逆矩阵的计算。因而使用 L-BFGS 算法进行 CRFs 训练只要求提供似然函数的一阶导数,训练数据集的对数似然函数的一阶导数为:

$$\frac{\partial J_{\Delta}}{\partial \lambda_k} = \sum_{i=1}^N \sum_{t=1}^T f_k(s_{t-1}^{(i)}, s_t^{(i)}, o^{(i)}, t) - \sum_{i=1}^N \sum_{t=1}^T \sum_{s, s'} f_k(s, s', o^{(i)}, t) p(s, s' | o^{(i)}) - \frac{\lambda_k}{\sigma^2} \quad (8)$$

其中,第一项为特征 f_k 在经验分布下的期望值;第二项为特征 f_k 在模型 Λ 下的期望值。对它们的计算,可采用动态规划算法高效实现。

2.2 特征函数的产生机制

建立条件随机场模型的另一个关键是如何针对特定的任务为模型选择合适的特征集,用简单的特征集表示复杂的语言现象。一些实验^[17]已经显示了特征选择和归纳对 CRFs 的性能有明显影响。在条件随机场的训练中,每个特征都对应了一组特征函数,这些特征函数对 CRFs 模型的训练至关重要,是运算的主体和参数估计的中心。而这些特征又是由一个个样本经过特征模板产生的,所以,样本窗口和特征模板的设定就至关重要。

2.2.1 样本窗口大小的设定

条件随机场建模中,上下文扮演着解决问题所需语言知识和资源提供者的重要角色。通常情况下,上下文的选取是基于当前语言单位前后一定范围进行的,这个固定的范围称为“样本窗口”。在条件随机场建模中,自然语言被看作是一个随机过程,图 2 是把词位标注看作一个随机过程的示意图,图中每个“时刻”窗口中的内容是确定的,是该随机过程的一个样本。图中的样本窗口是随“时间”逐字滑动的,随着样本窗口的滑动,其中的样本也随之改变,图中示意了样本窗口经过若干次滑动得到的另一个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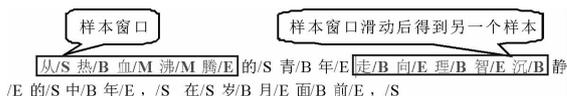


图 2 词位标注作为随机过程的示意图

图 3 是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中可能的样本窗口示意图,从图 3 可以看到样本窗口可以有不同的大小,可以是“7 字窗口”“5 字窗口”“3 字窗口”,也可以是“4 字窗口”等。词位标注汉语分词时,上下文特征从样本中产生,对词位标注任务而言,可供选择的特征非常少,主要考虑的是字特征。字特征是指当前字本身及其前后字所构成的特征,如果使用“当前字前后各两个字”作为样本窗口,则这一具体任务的字特征是指当前字本身、以及当前字前后各两个字经过任意组合而成的特征,此时的样本窗口就是一个“5 字窗口”,也是本文实验所采用的样本窗口,如图 3 方框内所示。如果选取的字特征是指当前字本身、以及当前字前后各一个字所组成的特征,此时的样本窗口就是一个“3 字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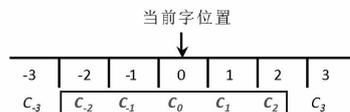


图 3 可能的样本窗口

2.2.2 特征模板的作用及设定

在条件概率模型中,通常是采用特征模板来表征上下文中的特征。特征模板的主要功能是定义上下文中某些特定位置的语言成分或信息与某类待预测事件的关联情况。习惯上,特征模板可以看作是对一组上下文特征按照共同的属性进行的抽象。在条件随机场的训练学习中,用于训练模型的上下文特征是通过特征模板从样本中扩展来的,所以设定合适的特征模板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具体使用 CRF ++ 0.58 工具包进行词位标注汉语分词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来设定特征模板。例如,样本窗口为“5 字窗口”时,根据模板中出现的字与当前字的距离属性将常见的字特征抽象为 13 类,对应了 13 个特征模板,表 1 给出了这些特征模板及其表征的意义,以及样本为“从/S 热/B 血/M 沸/M 腾/E”时这些模板扩展出的上下文特征。在 CRFs 模型进行训练的时候,这些特征模板将会扩展出数量不等的特征,并且每个特征都对应一组特征函数,这些特征函数对 CRFs 模型的训练至关重要。

为了对条件随机场中特征函数产生机制及数量关系进行研究,以便对应用 CRFs 中的样本窗口、特征模板、上下文特征、特征函数之间的关系有个更清楚的认识,作者从多个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并设计了相关实验。表 2 列出了实验中用到的 11 组特征模板集。其中, TMPT - 10 是在相关工作中最常用的一组特征模板, TMPT - 6 也是常用的一组特征模

板,有时配合 6 词位标注集使用。后缀“Single”和“Double”分别表示相应特征模板集中的单字或双字特征模板。例如, T10 - Single 是指 TMPT - 10 中的单字特征模板。前缀“Single”“Double”和“Ternate”分别表示相应特征模板集中只有一个单字、双字或三字特征模板。

表 1 特征模板列表

特征模板	模板表征的意义	扩展出的特征
C_{-2}	当前字的前面第二个字	从
C_{-1}	当前字的前一个字	热
C_0	当前字	血
C_1	当前字的后一个字	沸
C_2	当前字的后面第二个字	腾
$C_{-2}C_{-1}$	当前字的前面两个字组成的字串	从热
$C_{-1}C_0$	当前字前一个字和当前字组成的字串	热血
C_0C_1	当前字及其后一个字组成的字串	血沸
C_1C_2	当前字的后面两个字组成的字串	沸腾
$C_{-1}C_1$	当前字的前一个字和后一个字组成的字串	热沸
$C_{-2}C_{-1}C_0$	当前字前两个字和当前字组成的字串	从热血
$C_{-1}C_0C_1$	当前字及其前后各一个字组成的字串	热血沸
$C_0C_1C_2$	当前字及其后面两个字组成的字串	血沸腾

表 2 特征模板集列表

序号	特征模板集名称	包含的特征模板
1	TMPT - 10	$C_{-2}, C_{-1}, C_0, C_1, C_2, C_{-2}C_{-1}, C_{-1}C_0, C_0C_1, C_1C_2, C_{-1}C_1$
2	TMPT - 10'	$C_{-2}, C_{-1}, C_0, C_1, C_2, C_{-1}C_0, C_0C_1, C_{-2}C_{-1}C_0, C_0C_1C_2, C_{-1}C_0C_1$
3	TMPT - 6	$C_{-1}, C_0, C_1, C_{-1}C_0, C_0C_1, C_{-1}C_1$
4	T10 - Single	$C_{-2}, C_{-1}, C_0, C_1, C_2$
5	T10 - Double	$C_{-2}C_{-1}, C_{-1}C_0, C_0C_1, C_1C_2, C_{-1}C_1$
6	T6 - Single	C_{-1}, C_0, C_1
7	T6 - Double	$C_{-1}C_0, C_0C_1, C_{-1}C_1$
8	TMPT - 5	$C_{-1}, C_0, C_1, C_{-1}C_0, C_0C_1$
9	Single - TMPT	C_0 (也可以是 C_{-2}, C_{-1}, C_1, C_2 中的任意一个)
10	Double - TMPT	$C_{-1}C_0$ (也可以是 $C_{-2}C_{-1}, C_0C_1, C_1C_2, C_{-1}C_1$ 中的任意一个)
11	Ternate - TMPT	$C_{-2}C_{-1}C_0$ (也可以是 $C_0C_1C_2, C_{-1}C_0C_1$ 中的任意一个)

3 特征函数量化研究实验

3.1 实验环境及实验数据集

本文所有实验是在实验室 DELL Optiplex 760 台式机进行的,软硬件环境主要参数为:CPU 为 Intel (R) Core (TM)2 Quad CPU Q8200 2.33GHZ;内存为 4GB;操作系统为 Microsoft Windows 7 操作系统。

本文采用的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是 SIGHAN 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中文分词评测所提供的简体中文语料,分别是北京大学 (PKU) 和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 提供的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表 3 是这些

语料的相关统计信息。其中,这些语料集中训练语料是采用空格或制表符作为分隔符进行了汉语分词的语料,采用 CRF ++ 工具包进行模型训练时,首先需要对这些语料进行预处理。表 3 中“训练语料大小”项中后一个数值为作者编写的语料转换工具对这些训练语料预处理之后的文件大小。

表 3 第二届国际中文分词评测语料的统计信息

语料提供者	训练语料大小/MB	训练语料词数/K	测试语料大小/KB	测试语料词数/K
PKU	5.63 / 15.0	1,110	335	104
MSRA	12.2 / 33.7	2,368	367	107

3.2 实验设计

本文设计了相关对比实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应用 CRFs 实现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中特征函数的产生机制及对模型训练的影响进行量化研究。实验中采用四词位标注集,使用 CRF ++ 0.58 工具包实现了字串序列的词位标注,研究了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中特征函数产生情况和对模型训练的影响,并在第二届国际汉语分词评测提供的 PKU 和 MSRA 两种简体中文语料上进行了特征函数的量化研究,通过实验厘清了设定的样本窗口和特征模板集、生成的特征函数个数、训练出的模型大小、训练时长等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4 实验结果分析

4.1 特征模板对特征函数数目的影响

实验中分别使用表 2 中序号为 1 ~ 11 的十一组特征模板集,在 PKU 和 MSRA 两个语料集上进行训练。分析两个语料集上产生的特征数,可以得出结论:(1)相同特征模板集,MSRA 训练语料上产生的特征数均高于 PKU 训练语料上产生的特征数,这是因为 MSRA 训练语料的量是 PKU 训练语料的两倍还多。(2)相同训练语料,不同特征模板集扩展出的特征函数数目相差很大。例如,在 MSRA 训练语料上,2 号特征模板集扩展出 22244212 个特征,而 6 号特征模板集扩展出的特征数为 61884 个。(3)不同的单字特征模板在同一语料中扩展出的特征数基本相同。例如, $C_{-2}, C_{-1}, C_0, C_1, C_2$ 五个特征模板不论在 MSRA 还是 PKU 训练语料中,扩展出的特征数都非常接近,甚至相等。这是因为根据特征函数产生的机制,语料中的每个字随着样本窗口的滑动,会依次由这五个特征模板扩展出上下文特征,然后再产生特征函数。另外,第 4、6、9 号特征模板集分别由 5 个 ($C_{-2}, C_{-1}, C_0, C_1, C_2$)、3 个 (C_{-1}, C_0, C_1) 和 1 个 (C_0) 单字特征模板构成,不论在 MSRA 训练语料还是 PKU 训练语料上,由 4 号、6 号特征模板集扩展出的特征数大约是由 9 号特征模板集扩

展出的特征数的5倍、3倍。(4)单字、双字、三字特征模板扩展出的特征数快速增加,双字、三字特征模板比单字特征模板扩展出的特征数多得多。另外,连续的双字特征模板、三字特征模板扩展出的特征数也基本相同,而双字特征模板中 $C_{-1}C_1$ 扩展出的特征数增加很多。

3.2.3 特征函数对模型训练的影响

实验中分别使用表2中序号为1~9的九组特

表4 PKU和MSRA语料上的训练过程记录数据

模板集 序号	PKU 语料训练数据					MSRA 语料训练数据				
	f 参数值	特征数	训练时长/s	迭代次数	模型大小	f 参数值	特征数	训练时长/s	迭代次数	模型大小
1	1	6180528	1416.69	131	51.1 MB	1	9677444			
	2	4933828	5450.69	220	40.9 MB					
2	1	12311104				1	22244212			
	2	3621500	1827.09	153	38.4 MB	2	7148496			
	3	4208624	4677.66	191	43.9 MB					
3	1	4006216	1347.30	133	33.0 MB	1	6292896	4375.27	197	51.1 MB
4	1	92572	1069.86	115	733 KB	1	103056	2780.64	135	813 KB
5	1	6087956	651.86	62	50.4 MB	1	9574388			
	2	2803584	698.64	63	23.8 MB	2	4839640	3215.22	136	40.2 MB
6	1	55588	907.11	98	443 KB	1	61884	2337.98	115	490 KB
7	1	3950628	536.23	53	32.5 MB	1	6231012	1778.14	81	50.6 MB
8	1	2197904	1530.19	157	18.2 MB	1	3424036	4135.41	193	28.0 MB
9	1	18532	534.50	58	152 KB	1	20632	1317.00	65	166 KB

综合分析表4中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同等条件下,训练出的模型大小与扩展出的特征数成正比,因为训练出的模型中存储的就是特征函数及其对应的权重参数。(2)模型训练的时间长短和扩展出的特征数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在MSRA训练语料上,6号特征模板集扩展出61884个特征,训练时长为2337.98s。而7号特征模板集扩展出的特征数为6231012个,训练时长仅为1778.14s。

5 结论及研究展望

条件随机场作为序列数据标注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模型之一,在模型训练过程中,特征函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整个运算过程的核心以及参数估计的中心。本文围绕条件随机场在实际应用中特征函数的产生机制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在应用过程中,样本窗口大小的合理设定以及特征模板集的科学选取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从特征模板出发,通过特定的扩展规则能够衍生出丰富的上下文特征,而这些上下文特征再与任意标记进行有机组合,进而生成数量众多的特征函数。随后,这些生成的特征函数作用于模型训练过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和分析,最终得到与之对应的权重参数。

本文采用四词位标注集,研究了基于条件随机场的词位标注汉语分词中特征函数的产生及其对模型训练的影响,并在第二届国际汉语分词评测提供

征模板集(都不包含词位转移特征模板),在PKU和MSRA两个语料集上进行了词位标注汉语分词的训练,表4给出了使用这九组特征模板集在这两个训练语料集上的训练过程数据,其中 f 参数值是训练过程中特征出现次数所取的阈值,因为所用工具包在训练语料较大、特征数较多时不能完成训练致使部分数据为空。

的PKU和MSRA两种语料上进行了特征函数产生机制及相关数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单字、双字、三字特征模板在相同的语料下,其扩展出的特征函数的个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双字、三字特征模板相较于单字特征模板,能够扩展出数量更为庞大的特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连续的双字特征模板和三字特征模板在扩展特征时,最终所获得的特征数量基本保持一致。并且,在其他条件均保持等同的情况下,经过训练所得到的模型大小与扩展出的特征数量呈现出明确的正比例关系,即特征数量越多,模型大小越大。然而,模型训练所耗费的时间长短与扩展出的特征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下一步将围绕条件随机场以及其他统计语言模型中的特征选择算法展开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具价值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PEREIRA L J, MCCALLUM F A.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probabilistic models for segmenting and labeling sequence data [C]// Proceedings of 18th Int Conf on Machine Learning. San Francisco, USA: AAAI Press, 2001: 282-289.
 [2] 陈晨. 基于BERT模型和条件随机场的中文分词研究分析[D]. 兰州:兰州大学, 2020.

- [3]常芳玉,才智杰. 一种基于八词位标签的 BiLSTM-CRF 的藏文分词方法[J]. 中文信息学报,2024,38(10): 64-70+79.
- [4]徐浩煜,任智慧,施俊,等. 基于链式条件随机场的中文分词改进方法[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6,33(12): 211-213+233.
- [5]贺瑞芳,段绍杨. 基于多任务学习的中文事件抽取联合模型. 软件学报[J]. 2019,30(4):1015-1030.
- [6]王健,殷旭,吕学强,等. 基于 CRFs 的专利文献领域术语抽取方法[J].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9,40(1):279-284.
- [7]张宇. 基于树形条件随机场的高阶句法分析[D]. 苏州:苏州大学,2021.
- [8]陈飞,刘奕群,魏超,等. 基于条件随机场方法的开放领域新词发现[J]. 软件学报,2013,24(5):1051-1060.
- [9]宋毅君,王瑞波,李济洪,等. 基于条件随机场的汉语框架语义角色自动标注[J]. 中文信息学报,2014,28(3): 36-47.
- [10]陈怡疆,徐海波,史晓东,等. 基于树形条件随机场的跨语言时态标注[J]. 软件学报,2015,26(12): 3151-3161.
- [11]张传岩,洪晓光,彭朝辉,等. 基于 SVM 和扩展条件随机场的 Web 实体活动抽取[J]. 软件学报,2012,23(10):2612-2627.
- [12]何炎祥,刘健博,孙松涛,等. 基于层叠条件随机场的微博商品评论情感分类[J]. 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5,50(11):67-73.
- [13]黄树成,张瑜,张天柱,等. 基于条件随机场的深度相关滤波跟踪算法[J]. 软件学报,2019,30(4):927-940.
- [14]张帆,闫敏超,倪军,等. 高阶条件随机场引导的多分支极化 SAR 图像分类[J].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23,28(10):3267-3280.
- [15]龙科军,郭妍慧,刘洋,等. 基于全连接条件随机场的车道线检测方法[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20(6):149-158.
- [16]SHA F, PEREIRA F. Shallow parsing with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C]// Proceedings of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of NAACL, Edmonton, Canada: ACL Press, 2003: 213-220.
- [17]MCCALLUM A. Efficiently inducing features of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C]//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eenth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uston, USA: IEEE Press, 2003: 403-410.

(责任编辑 李玉玲)

Research on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Quantification of Feature Functions for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YU Jiande^{1,2}, HUANG Jihai^{1,2}, LIU Qiuju^{1,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Henan Provinc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Model and Applica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s), as one of the widely used sequential data annotation models, feature functions are crucial for model training, serving as the subject of computation and the center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We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generating feature functions for CRF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related parameters. Setting the sample window size and feature template set is the key to modeling. Each sample extends contextual features from the feature template, and contextual features are combined with any label to generate feature functions. The feature functions are used to train the model and obtain corresponding weight parameters. The generation of feature functions in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ased on CRFs and their impact on model training were studied using the B, M, E, and S four word-positions annotation sets.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feature function gener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PKU and MSRA corpora provided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Evalu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feature functions extended by single character, double character, and ternate character feature templates in the same corpus increased rapidly, while the number of feature functions extended by different single character feature templates on the same corpu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The size of the trained model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extended features, but there is no necess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ining duration and the number of features.

Key words: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sample window; feature template; context feature; feature function

基于尖点突变理论的矿柱失稳预测研究

赵雯雯¹, 龚剑¹, 焦华喆², 杨柳华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河南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3)

摘要:为了保证采空区稳定和作业安全,首先依据尖点突变理论建立了矿柱力学模型,推导出力学模型失稳的判断准则,随后将力学模型应用于工程实际,分析了采空区内矿柱的受力状态,并参照判断准则预测了矿柱内监测点的稳定性,最后依据声发射特征参数的变化趋势对预测结果进行了验证。现场应用表明:突变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现场实际情况一致,说明尖点突变理论能有效应用于矿柱失稳预测,为突变理论在冲击地压的防治方面提供了依据,同时声发射监测技术可实时判断岩体微裂纹变化规律,二者的结合使用有助于提高矿柱失稳预测的准确性。

关键词:尖点突变理论;力学模型;声发射;失稳预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4.021

中图分类号:TD3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4-0124-05

近年来,部分中小型矿山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采取粗放式、掠夺式滥采方式,导致地下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空区。这些采空区一般仅依靠少量矿柱支撑,极易产生应力集中现象,引发矿柱变形、地表塌陷等地质灾害,甚至诱发重大安全事故,已成为制约矿山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难题。

目前,矿柱稳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实验研究和现场监测等方法。其中,理论分析方法中,以弹性力学理论、连续梁理论和流变体系理论等应用较为广泛^[1-3]。研究表明,矿柱失稳过程实质上是岩体内部微裂隙不断孕育、演化,最终形成宏观裂纹并贯通的过程^[4-5],这一过程导致岩体强度持续降低,最终发生突发性失稳破坏,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突变特征^[6]。针对这一类特征问题,研究者们将非线性突变理论引入工程领域,在煤岩失稳机理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例如,秦四清^[7]通过分析突变模型,建立了岩质边坡系统势函数稳定性评价方法;夏开宗等^[8]将突变理论应用于岩体动力失

稳问题,建立了相应的突变理论模型;赵延林、吴启红等^[9]基于突变理论提出的采空区重叠顶板稳定性强度折减法,创新性地引入了采空区重叠顶板安全系数概念。这些研究成果为运用突变理论分析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10-11],但该理论在矿柱失稳预测领域的应用仍相对不足。

基于此,本文依据突变理论建立矿柱力学模型,以实际工况为工程背景,通过力学模型判断矿柱内监测点的受力状态,对监测点的稳定性进行预测,并依据声发射特征参数的变化趋势对预测结果进行验证,为突变理论在矿柱失稳预测及冲击地压的防治方面提供依据。

1 突变理论分析

矿柱失稳破坏是典型的非线性动力学行为,其演化过程受工程条件、地质环境及几何参数等多因素的耦合作用影响,具有突发性、瞬时性及变形不连续性等显著特征。此类由连续变形积累引发的突变失稳现象,与突变理论的研究范畴高度契合,尤其适

收稿日期:2025-04-16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矸石充填体多场耦合强度损伤机理及资源化利用研究”(24A440012)

作者简介:赵雯雯(1986—),女,安徽合肥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深地材料与固废基新材料和矿山安全。

用于以尖点突变模型为代表的非线性突变分析方法。该模型因数学形式简洁、控制参数明确,已成为刻画复杂系统状态跃迁过程的有效工具,可通过构建状态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映射关系,揭示系统突变的临界条件并量化系统的稳定性水平。

1.1 尖点突变理论基本原理

尖点突变模型的势函数表达式为:

$$V(x) = x^4 + ux^2 + vx \quad (1)$$

式中: x 是状态变量,主要表征系统当前所处的状态, u 和 v 是系统控制参数,反映系统的稳定性,可控制和决定系统的演化方程,如图 1 所示。评定系统稳定性需通过求势函数极值:对方程(1)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零,得系统平衡方程^[13]:

$$V'(x) = 4x^3 + 2ux + v = 0 \quad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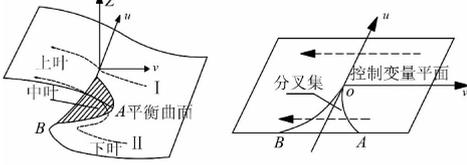


图 1 系统平衡曲面图

由图 1 可得,在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中,平衡曲面表现为具有折叠特性的几何结构,其内部由尖拐型临界点构成的集合称为奇点集,这些奇点在控制参数平面(u, v)上的垂直投影成分叉集。

奇点集由 $V(x)$ 的二阶导数确定,对方程(1)求二阶导数,可得^[14-15]:

$$V''(x) = 12x^2 + 2u \quad (3)$$

$V''(x) > 0$ 时,图 1 中的平衡曲面处于上叶,系统为稳定状态; $V''(x) < 0$ 时,平衡曲面处于下叶,系统为不稳定状态; $V''(x) = 0$ 时,在平衡曲面上叶与下叶交界处,系统处于临界平衡状态。联立方程(2)与方程(3),消除 x 后可得系统突变时分叉集方程为:

$$\Delta = 8u^3 + 27v^2 \quad (4)$$

1.2 尖点突变力学模型

矿体开采后形成的采空区力学模型如图 1 所示。假定矿柱是均匀的各向同性体,呈对称性分布,宽度小于矿房宽度,受荷载作用后的变形远大于围岩变形。将顶板岩层视为固支梁,在受力过程中始终发生弹性形变,矿柱对顶板的作用力为集中力,上覆岩层压力及顶板自重为均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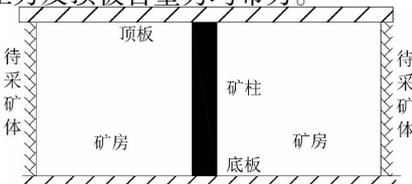


图 2 采空区分布示意图

顶板与矿柱构成的系统势函数 V 由顶板的弯曲变形能、矿柱的变形能与外力做功组成,势函数 V 的数学表达式为:

$$V = \frac{EI\pi^4}{8L^3} m^2 + \lambda m_0 [m_0 - (m_0 + m) e^{-m/m_0}] - qLm \quad (5)$$

$$k = E_b A / H \quad (6)$$

$$I = bh^3 / 12 \quad (7)$$

式中, E 为顶板弹性模量, I 为顶板惯性矩, L 为顶板的长度, m 为矿柱的压缩位移, m_0 为应力峰值点的极限压缩位移, q 为上覆岩层压力及顶板自重, b 为顶板宽度, h 为顶板厚度, E_b 为矿柱初始弹性模量, k 为矿柱的初始刚度, A 为矿柱的横截面积, H 为矿柱高度。

以 m 为状态变量,依据尖点突变理论模型,由系统平衡方程 $V' = 0$ 得:

$$V' = km e^{(-m/m_0)} + \frac{\pi^4 EI}{4L^3} m - qL = 0 \quad (8)$$

进一步求导,由平衡曲面的特性即可求得尖点 m_1 处的状态变量值,在尖点处有 $V''' = 0$:

$$V''' = \frac{k}{m_0} \left(2 - \frac{m}{m_0} \right) e^{(-m/m_0)} = 0 \quad (9)$$

求解方程(9)可得,在尖点处 $m_1 = 2m_0$,将方程(8)在尖点处的状态变量 m_1 利用泰勒级数展开,并取至 3 次项,可得:

$$km_1 e^{(-m_1/m_0)} + \frac{\pi^4 EI}{4L^3} m_1 - qL + a_1(m - m_1) + a_2(m - m_1)^2 + a_3(m - m_1)^3 = 0 \quad (10)$$

a_1, a_2, a_3 为泰勒级数展开式的系数,表达式为:

$$a_1 = \left[k \left(1 - \frac{m_1}{m_0} \right) e^{-m_1/m_0} + \frac{\pi^4 EI}{4L^3} \right] \quad (11)$$

$$a_2 = \left[\frac{k}{m_0} \left(\frac{m_1}{m_0} - 2 \right) e^{-m_1/m_0} \right] \quad (12)$$

$$a_3 = \left[\frac{k}{6m_0^2} \left(3 - \frac{m_1}{m_0} \right) e^{-m_1/m_0} \right] \quad (13)$$

将式(9)代入方程(10)并化简,令 $z = (m - m_1)/m_1, u = 3(\gamma - 1), v = 6(\gamma - \lambda + 1)$,且

$$\gamma = \frac{\pi^4 EI}{4L^3 k e^{-2}} \quad (14)$$

$$\lambda = \frac{qL e^2}{k m_1} \quad (15)$$

得到标准平衡曲面方程:

$$4z^3 + 2uz + v = 0 \quad (16)$$

其中, z 为状态变量, u, v 为控制变量, γ 为刚度比, λ 为力学参数, u, v 的取值由 γ 与 λ 确定。

1.3 力学模型判断准则

分叉集方程中 Δ 值的大小,表示岩体所处的稳

定性状况,即:

(1) $\Delta > 0$ 时,岩体处于稳定状态,此时岩体内部微裂隙处于孕育阶段,岩体变形在持续变化,承受的应力未达到峰值,稳定性较好。

(2) $\Delta = 0$ 时,岩体处于临界状态,此时岩体内部微裂隙已贯通,在外界干扰下可能突变为不稳定状态,存在失稳风险。

(3) $\Delta < 0$ 时,岩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发生突变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岩体稳定性显著降低。

Δ 值是系统稳定平衡的临界点,需满足条件 $u > 0$ 以确保系统不会跨越分叉集产生突变,即需满足 $\gamma > 1$ 。

2 工程应用

2.1 工程背景

本文以新铁矿业为工程背景。该矿矿体呈东南—北西走向,平均倾角 70° ,平均厚度 15 m,矿体上盘为蚀变闪长岩、矽卡岩,下盘为蚀变闪长岩。由于矿体急倾斜,相邻水平的采空区出现重叠,产生叠加作用,仅留有少量不规则矿柱支撑,易产生应力集中现象。以 -205 m 水平为例,采空区规模为长约 100 m,宽约 40 m,高约 25 m,且部分采空区向上贯通至 -180 m 水平,可能导致上覆岩体冒落。

2.2 力学模型计算

依据突变理论力学模型,对 -205 m 水平进行稳定性分析,选取现场 3 处矿柱作为研究对象,布设监测点,如图 3 所示。确定采场结构参数与矿柱参数,运用尖点突变理论力学模型对其进行稳定性计算,3 个监测点的岩性条件不同,其抗压强度、矿柱半径、弹性模量等物理力学参数取值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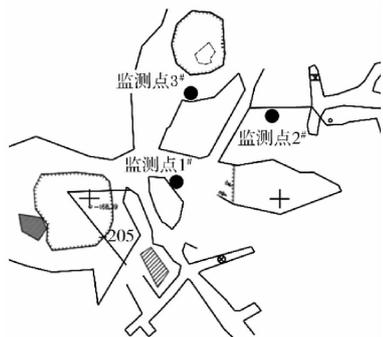


图 3 -205 m 水平采空区分布图

表 1 物理参数取值表

物理力学参数	监测点 1	监测点 2	监测点 3
s/m	16.5	16.6	15
σ/MPa	43.16	50.68	45.25
r/m	0.6	1.1	0.9
$\rho/(kg \cdot m^{-3})$	2346	2700	2218
E/GPa	53.95	71.38	60.33

将参数代入式(15),计算出各监测点控制变量的取值,判定各点的稳定性状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监测点稳定性状况

监测点号	$E_u/(GPa)$	L/m	$k/kN/m$	$E/(GPa)$	γ	是否稳定
监测点 1	64.25	16.56	12.16	53.95	0.9716	否
监测点 2	57.21	19.25	14.67	71.38	1.1336	是
监测点 3	55.95	18.65	12.81	60.33	1.0314	是

由表 2 可得,依据尖点突变力学模型计算结果,得出监测点 1 处的 $\gamma < 1$,说明监测点 1 处矿柱稳定性状况较差,矿柱内部微裂隙的发育导致自身强度劣化,存在较大的失稳风险;监测点 2、监测点 3 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矿柱能够保障采场安全,且监测点 2 处稳定性状况优于监测点 3。

3 声发射现场监测

矿柱的荷载大小可由声发射信号的波动幅度来衡量,依据岩体在不同荷载状态下声发射特征参数的表征规律,对新铁矿业监测点 1、监测点 2 与监测点 3 实施声发射监测,对 3 个监测点的声发射特征参数进行分析,捕捉前兆信号,对其稳定性进行评价,验证突变理论的计算结果。

3.1 监测方案及数据分析

声发射监测周期设定为每天 1 次,单个监测点单次监测时长为 0.5 小时。实际监测周期需根据实时数据动态调整:当监测数据出现显著波动时,需提高监测频率并延长单次监测时长。依据 8 个月的监测数据,绘出声发射特征参数变化趋势图,如图 4、图 5、图 6、图 7、图 8、图 9 所示。图 4 和图 5 分别为监测点 1 声发射振幅 (db) 和能率 ($mv \cdot ms$) 趋势图,由图分析可知,声发射振幅与能率在监测初期的几个月内保持稳定,仅有小幅波动,参照声发射特征参数的变化规律,可得出此时声发射特征参数处于稳定阶段。在监测后期的两个月内,声发射振幅、能率出现了大幅增加,声发射特征参数增长速率显著加快,伴随产生声发射大事件,说明应变能释放加剧,局部微裂纹开始扩张,岩体产生局部破坏,稳定性较差。因此,基于声发射特征参数的监测数据综合分析,可判定监测点 1 处岩体已处于不稳定状态。监测点 2 与监测点 3 的声发射特征参数平稳,处于稳定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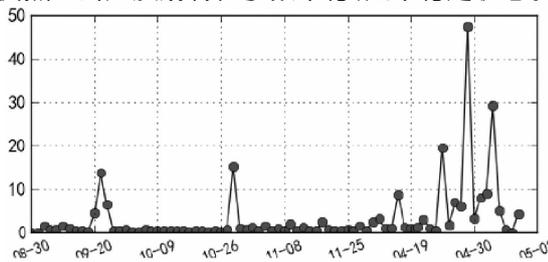


图 4 监测点 1 声发射振幅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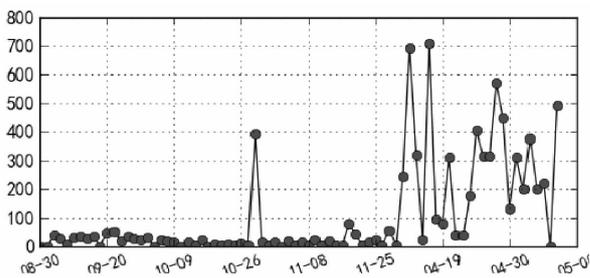


图5 监测点1声发射能率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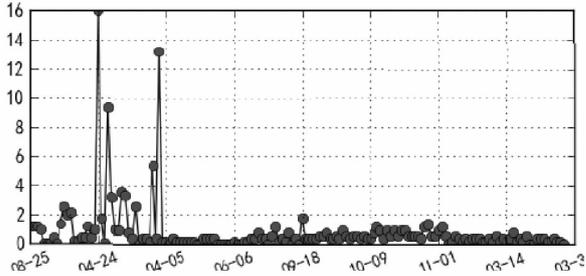


图6 监测点2声发射振幅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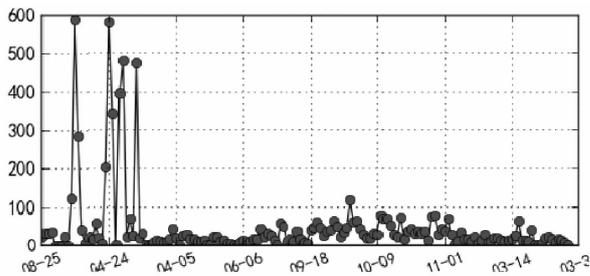


图7 监测点2声发射能率趋势图

行局部微裂纹观测,其微裂纹分布变化趋势如图10所示。从图10(a)可以看出,在监测期180 d时岩体表面有主裂纹与次生裂纹产生,在210 d时主裂纹逐渐扩展,次生裂纹呈现发育趋势,在240 d时主裂纹持续延伸,有贯通趋势,并产生了多条次生裂纹,岩体表面裂纹如图10(d)所示。由监测结果可得,监测点1处岩体微裂纹持续扩展,处于不稳定状态,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很大,与尖点突变力学模型分析结果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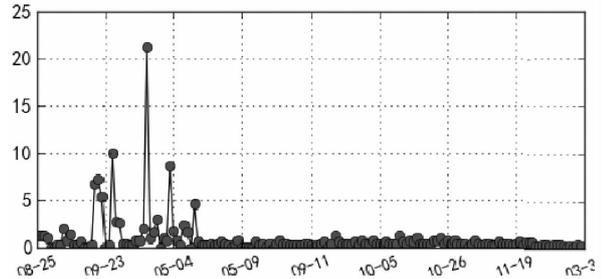


图8 监测点3声发射振幅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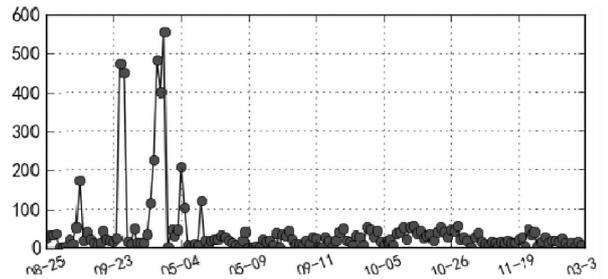


图9 监测点3声发射能率趋势图

3.2 岩体微裂纹演化监测

在声发射监测周期内,对监测点1处的岩体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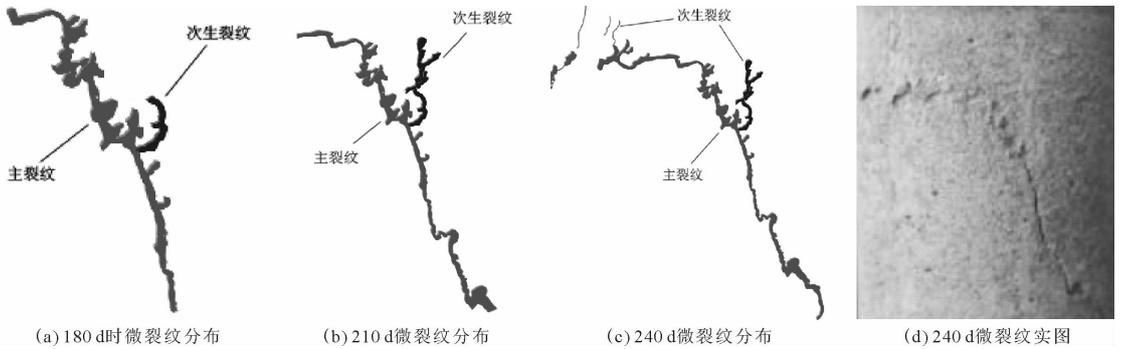


图10 监测点1微裂纹变化趋势图

4 结论

(1) 依据尖点突变理论建立矿柱力学模型,对现场3个监测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监测点1存在较大失稳风险,监测点2、监测点3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2) 对现场监测点实施声发射监测,分析声发射特征参数,捕捉前兆信号,通过声发射特征参数的表征规律,判断出监测点1处岩体处于不稳定状态,监测点2与监测点3处的岩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与尖点突变理论的分析结果相同。

(3) 实际应用表明,尖点突变力学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尖点突变理论能够有效应用于矿柱失稳分析与预测,同时声发射监测技术可实时判断岩体微裂纹变化规律,二者结合使用有助于矿山安全开采。

参考文献:

[1] 李铁,刘诗杰,马海涛,等.采空区顶板流变破断发展及

灾变时间[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016, 26(3): 666 - 672.

[2] 文小松, 王沉, 黄欣欣, 等. 基于尖点突变理论的采场矿柱稳定性分析[J]. 矿业科学学报, 2024, 9(6): 897 - 908.

[3] 雷忠平, 姜立春, 付建生. 采空区顶板 - 矿柱支撑系统失稳破坏研究[J]. 矿业研究与开发, 2023, 43(11): 53 - 60.

[4] 赵奎, 王万银, 曾鹏, 等. 胶结充填体顶板承载层厚度的尖点突变模型及其应用[J]. 金属矿山, 2022(8): 57 - 62.

[5] 赵康, 酆化彪, 冯萧, 等. 基于能量法的矿柱稳定性分析[J]. 力学学报, 2016, 48(4): 976 - 983.

[6] 史秀志, 柯武阳, 苟永刚, 等. 大跨度采场上部硐室条形矿柱尺寸优化研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2020, 37(6): 1084 - 1093.

[7] 秦四清. 斜坡失稳的突变模型与混沌机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0, 19(4): 486 - 492.

[8] 夏开宗, 刘秀敏, 陈从新, 等. 考虑突变理论的顺层岩质边坡失稳研究[J]. 岩土力学, 2015, 36(2): 477 - 486.

[9] 赵延林, 吴启红, 王卫军, 等. 基于突变理论的采空区重叠顶板稳定性强度折减法及应用[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0, 29(7): 1424 - 1434.

[10] 郭华伟, 朱宝龙, 索玉文. 强降雨作用下岩质边坡失稳的尖点突变分析[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4, 29(4):

43 - 46.

[11] 徐恒, 王貽明, 吴爱祥, 等. 基于尖点突变理论的充填体下采空区安全顶板厚度计算模型[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7, 36(3): 579 - 586.

[12] 张钦礼, 曹小刚, 王艳利, 等. 基于尖点突变模型的采场顶板 - 矿柱稳定性分析[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1, 21(10): 52 - 57.

[13] 蒋腾飞, 姜谔男, 许梦飞, 等. 基于尖点突变理论和爆破累积损伤模型的岩溶基坑防突厚度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21, 40(9): 1902 - 1913.

[14] 尚向凡, 苗胜军, 于兆新, 等. 基于突变理论的采空区顶板安全厚度多因素预测模型[J]. 中国矿业, 2021, 30(12): 76 - 82.

[15] 杜逢彬, 郭微. 基于突变理论的矿山转采隔离顶柱稳定性分析[J].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 2018, 14(2): 552 - 557.

[16] 龚剑, 胡乃联, 王孝东, 等. 塌陷区下部采场顶板稳定性分析及岩移预测[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2015, 32(02): 337 - 342.

[17] GAO W, Ge M M. Stability of a coal pillar for strip mining based on an elastic - plastic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6, 87: 23 - 28.

(责任编辑 李玉玲)

Prediction of Pillar Instability Based on Cusp Catastrophe Theory

ZHAO Wenwen¹, GONG Jian¹, JIAO Huazhe², YANG Liuhua²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goaf and the safety of operation, the pillar mechan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usp catastrophe theory, and the judgment criterion of instability of pillar mechanical model was deduced. Subsequently, the mechanical model was applied to field engineering, the stress state of different monitoring points of pillar was analyzed and the stability of monitoring points was predicted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criteria. Finally, the prediction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the variation trend of acoustic emiss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The field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catastrophe model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n site. This verifies that the cusp catastrophe theory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pillar instabilit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atastrophe theor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ock burst. At the same time, acoustic emiss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can judge the variation law of rock mass micro cracks in real tim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illar instability prediction.

Key words: cusp catastrophe theory; mechanical model; acoustic emission; instability prediction